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目 录

俄罗斯思想研究

- 3 徐 衍 / 杜金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哲学渊源
- 33 张昊琦 / 俄罗斯“国家性”的历史结构

俄罗斯舆情与地区

- 67 王 文, 张婷婷 / 俄罗斯对华认知的新变化及前景展望
- 88 官晓萌 / 俄罗斯地区选举与地区政治新发展——兼论 2018 年地区选举

中东欧问题研究

- 127 松里公孝 / 顿巴斯战争与前线城市中的政治——以马里乌波尔、克拉马托尔斯克为例
- 155 杨友孙, 卢文娟 / 波兰西里西亚人争取族群地位问题评析
- 180 刘作奎 / 日本的中东欧政策及对中国“16+1 合作”的影响分析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冯绍雷

副 主 编: 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 阎德学

封面设计: 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9 年 4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9 年第 2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Сюй Янь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Дугина: ее философск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3)

Чжан Хаоц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33)

Ван Вэнь, Чжан Тинтин

Но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Россией Китая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и ег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67)

Гуань Сяомэн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Выбор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2018 году (88)

Кимитака Мацузато

Война на Донбассе и политика в прифронтовых городах: Мариуполь и Краматорск..... (127)

Ян Юсунь, Лу Вэньцзюань

Анализ вопроса стремления силезцев к этническому статусу в Польше (155)

Лю Цзокуэй

Анализ политики Япон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 её влияния на кита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16+1»(180)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9 年第 2 期 (双月刊)

Contents

Xu Yan

Dugin's Conservative Political Thought: Its Philosophical Origin..... (3)

Zhang Haoqi

The Historic Structure of Russia's "Statehood" (33)

Wang Wen, Zhang Tingting

New Changes in Russia's Perceptions towards China in Recent Years and its Outlook..... (67)

Guan Xiaomeng

Regional Elections and Reg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ussia: also on the 2018 Russian Federal Regional Elections..... (88)

Kimitaka Matsuzato

The Donbas War and Politics in Cities on the Front: Mariupol and Kramatorsk (127)

Yang Yousun, Lu Wenjuan

On Polish Silesians' Efforts in Obtaining its Status (155)

Liu Zuokui

Japan'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Policies and its Impacts on China's "16+1" Cooperation..... (180)

杜金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哲学渊源

徐 衍*

【内容提要】亚历山大·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以及“第四政治理论”，作为俄罗斯反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单极世界秩序的替代物，源于右翼的保守主义思潮。其思想根基实则源自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两位思想家：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论”政治的思考启发了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给杜金构建“多极化文明”的地缘政治思想注入了活力。鉴于海德格尔也曾以将俄国和德国进行类比的方式，对前者的地缘政治前景表示过担忧，杜金的政治哲学可算作是“右翼海德格尔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复兴。这一思想旨在重新挖掘后期海德格尔思考“另一个开端”的哲学遗产，希冀俄国能以“多极化文明”的名义承担起复兴欧亚文明的任务，以海氏的“后形而上”时代，借由欧亚文明特殊的、地域化的“历史的延续”，对抗普世化、全球化的“历史的终结”。

【关键词】俄罗斯保守主义 杜金政治思想 新欧亚主义 欧亚文明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2-0003(30)

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俄罗斯知名的地缘政治理论家，这一身份与事业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便开启了。彼时的杜金早就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阵营的显要人物：他先是在利莫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担任要职，2000年以后，又作为“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政治运动的旗手，继续活跃在俄罗斯的政治舞

* 徐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

台上。自此，新欧亚主义几乎就成了亚历山大·杜金的代名词。其实，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并非全新的事物。它脱胎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欧亚主义”运动。该运动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其核心人物也是当时俄罗斯知识界的知名人士，有出身世袭公爵家庭的比较语言学学者特鲁别茨科伊(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出身宦官家庭、拥有惊人语言天赋的跨学科天才萨维茨基(Пётр Савицкий)，出身文职将军和石油公司董事长家族的出版人苏夫钦斯基(Пётр Сувчинский)和出身敖德萨神职人员家庭、自幼接受宗教思想熏陶的弗罗洛夫斯基(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等。^①第一代的“欧亚主义”总体而言坚持的是俄罗斯民族身份的纯正性，亦即，俄罗斯民族主体是属于兼具欧洲和亚洲文化特性的跨文化民族，也就是“欧亚”的，而非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欧洲”的民族。因为自13世纪至15世纪，俄罗斯民族都一直是处于蒙古人的统领之下。第一代“欧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论断”是：应当用思想专制制度，即“公正之国”，来取代世界现存的民主制度。所谓的“公正之国”，是在古俄罗斯就形成的、倡导“国家从属于永恒性本原的思想”的概念。^②而按照亚历山大·杜金在后苏联时期提出的“新欧亚主义”的理论解释^③，欧亚地区应该致力于重建并发挥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广泛影响力，而这又需要依靠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进步力量，重新发现其深厚的历史和传统价值观，借以抗衡由美国和北约主导的“大西洋”势力。^④近年来，尤其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映衬下，亚历山大·杜金的政治思想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杜金的思想 and 俄罗斯的现实政策结合得非常紧密。身为政治理论家的杜金甚至被称为是“普京的大脑”、克里姆林宫的“智囊”。^⑤于是，欧美思想界对杜金的政治思想越发

① 陈训明：“俄罗斯的欧亚主义”，《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3期，第30页。

② О.Д·沃尔科戈诺娃：“欧亚主义：思想的演进”，《世界哲学》，1996年第1期，第32页。

③ 关于杜金“新欧亚主义”和“古典欧亚主义”之间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荆宗杰：“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评析——以“多极世界理论”为例”，《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6期，第61-64页。

④ 杜金关于“新欧亚主义”和其政治目标详见 Alexander Dugin, John B. Morgan(ed.& trans.),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London: Arktos, 2014, pp. 163-187.

⑤ 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牵动全世界心弦之际，杜金发表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

重视起来，他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很快被翻译成德、英等主要西方语言。^①

虽说杜金被誉为俄罗斯政治和政策的幕后推手，但事实上，杜金的“政治哲学家”的身份还并未得到应有的认识，遑论重视了。此外，近年来，杜金的政治思想越发受到 20 世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的影响，这一点似乎也并没有被人们注意到。本文认为，首先，要全方位了解身为政治哲学家的亚历山大·杜金的思想，我们有必要重点关注其过去十年里日趋成熟的政治思想当中深受海德格尔启发的诸多方面。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在何种意义上如杜金思想所示的那样，海德格尔可以被视为其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来源。这其中，内含于海氏思想中的激进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革命传统，可视作是杜金著名的“第四政治理论”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的理论源泉。再者，有鉴于海德格尔曾宣告，西方形而上思想的现代性在当代会面临终结，并且完结之后的西方思想将会重新见证一个全新的“另一个开端”，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政治思想，也正是力图在当今世界以俄罗斯为中心、寻找这“另一个开端”的尝试。第三，杜金对海德格尔的右翼立场的理解与流行于拉丁国家的主流解释，即所谓的“左翼海德格尔思想”截然不同。虽然这些思想资源也都可以找到出处，但随着海德格尔“黑色笔记本”的出版，欧美学界日益意识到，对海德格尔的解释采取右翼立场，是符合海德格尔思想的原始意图的。最后，因为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还认为，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正经历着一个从日趋全球化和单极的世界向一个由各种不同文化传统所主导的“文明多极化”的时代转变的过程，所以，考察海德格尔和另一位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 (Carl Schmitt)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对西方地缘政治处境的分析，亦即“大空间”理论，是理解杜金政治思想的重要补充，因为“第四政治理论”的地缘政治思想，其智识来源正是卡尔·施米特。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阐述了乌克兰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告诫，希望后者对乌克兰问题保持克制。见 Alexander Dugin, “Lette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Ukraine”, April 27, 2014, <https://www.infowars.com/letter-to-the-american-people-on-ukraine/>

① Marlene Laruelle 提供了有关杜金政治思想在欧美学术界的传播情况的概要，是目前笔者能够找到的最全面的梳理。参见 Marlene Laruelle, “Eurasia, Eurasianism, Eurasian Union Terminological Gaps and Overlaps”, *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 2015, No.3.

一、杜金、海德格尔和激进保守主义的回归

杜金认为，目前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地缘政治力量主要有两股，分别是“欧亚秩序”和“大西洋秩序”，而且这两股势力是互相对立的，其对峙状况非常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美苏意识形态抗衡。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应陷入低潮，欧亚秩序亟须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这股新的思潮将是一股代表了欧亚地区特有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力量，以戮力抗衡主导欧美的大西洋意识形态，或曰大西洋秩序。换言之，新的欧亚秩序将会是一个和政治与经济意义上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分庭抗礼的智识力量。这便是杜金在其著作《第四政治理论》中所表达的主要理论诉求。他认为，20世纪主导了西方思想的政治思潮主要有三大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且迄今为止，自由主义是三者中唯一在21世纪的西方仍旧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主流思想。法西斯主义随着第三帝国的溃败早已挫败，共产主义也在苏联解体后逐渐式微，至少在西方已不再是一个广泛被接受的意识形态选项了。杜金在《第四政治理论》中勾勒并提供了一个迥异于以上三大思想的意识形态替代物——他称其为“第四政治理论”。杜金在对以往政治思潮中的“自由”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传统和“民族特殊性”的传统等若干范畴加以保留的同时，拒斥了他们各自腐朽的部分：弥漫于欧美自由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充斥于苏联共产主义的“世俗和物质主义”，以及贯穿德国法西斯主义始终的“种族主义”。此外，杜金认为，他在这个综合和扬弃的过程中，将这三种思想中所共有的“普遍的、单极的和单一的历史目的论”也一并涤荡掉了。^①这一综合的结果即是一个杂糅的体系，它融合了反物质的精神性、反个人主义的共同体主义和反普遍主义的特殊性理论三重路径，旨在凸显共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的重要性，尤其强调这诸多传统在保留文化差异性的同时，它们多样化的宗教、精神和智识方法在通达终极意义上的融贯性。

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不仅明确拒斥了流行于20世纪的意识形态中所共

^① Alexander Dugin, John B. Morgan(ed.& trans.),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London: Arktos, 2014, pp.101-114.

有的现代性宏大叙事，而且坚决否定了隐藏在这些思想背后的线性时间观念，因为它们都是世俗目的论的、进步主义的和乌托邦的。^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第四政治理论继承的是 20 世纪晚期“后现代”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发起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发起的这一波攻势，反对的是肇始于 17 世纪晚期欧洲启蒙思想对所谓自主、理性、独立的个人主体的崇拜。不过与此同时，杜金也预见到了“现代性的终结”。他深知，启蒙时代之后的后现代主义世界绝非形势一片大好；虚无主义和冷漠厌世是后现代的必然产物。于是，杜金号召人们对此发动积极的反抗。^②事实上，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不同于后现代性的特征，被他自己称为是一种“超现代性”；这是一个他借自尤里乌斯·伊沃拉（Julius Evola）而自创的概念。用杜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犹如驾驭一头野兽，也就是说，充分挖掘它的力量为自己所用，但同时发现它的弱点并克服，而不是尝试避免或者忽略它们，抑或直接与野兽的獠牙和利爪硬碰硬”。^③对此，杜金写道：

径直越过现代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第四政治理论必须回溯到现代性的先驱、回去直面现代性抗争的对象，即便它最终变成和后现代性几乎完全无关的东西。我们必须回归传统，回归到前现代，回到遥远的古代，回到神学，回到神圣的学问和古代哲学。^④

所以说，尽管启蒙现代性借助反传统和反迷信的名义与前现代性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现代性却变得越发对此无动于衷、无能为力，最终沦为了一个特设假定（ad hoc assumption），亦即纯粹为了反对而反对，却不能提供任何理论支持和方案的反驳。^⑤因此杜金的这一后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姿态所采取的战略，便是要通过重新发掘前现代的遗产，并将其再一次激活，借此以对抗的姿态回应这一莫衷一是的态度。不过杜金也强调，他的第四政

① Alexander Dugin, John B. Morgan(ed. & trans.),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pp.129-166

② Alexander Dugin, Mark Sleboda & Michael Millerman(trans.),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Arktos, 2012, pp.12, 23.

③ Alexander Dugin, John B. Morgan(ed. & trans.), *Putin vs Putin: Vladimir Putin Viewed from the Right*, London: Arktos, 2014, p.286.

④ Ibid.

⑤ 关于政治哲学论辩中何为“特设假定”参见 Peter S. Wenz, *Political Philosophies in Moral Conflict*, Boston: McGraw-Hill, 2007, p.22.

治理论中所体现出的保守主义和现行的欧洲保守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第四政治理论保守主义不同于诸如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和尤里乌斯·伊沃拉等人的原教旨-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因为后两者的立场根植于一种向着前现代价值观的回归和转向，其做法不仅过于简单，还显得和现时代格格不入，可谓是一种反动的思想。再者，第四政治理论的保守主义也迥异于以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保守主义，或者说一种维持现状的守成保守主义，后者的基本立场并不反对启蒙理性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只不过不赞成这种现代性往极端的方向发展，演变成了后现代的种种表征。^①亚历山大·杜金本人的保守主义思想既非向后看，即简单地回归往昔，亦非向前望，走入后现代主义的死胡同，陷入空洞的虚无主义。

杜金提出的第四政治理论，倡导的是一幅以多极全球政治秩序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图景。在这一情形下，他所谓的“第一政治理论”，亦即自由主义将被大大削弱，甚至可以说被挫败，取而代之填补这一意识形态空白的，自然就是第四政治理论。杜金引入的这第四条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谓是一项参与全盘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范式的“邀请”。^②第四政治理论所构想的世界，在意识形态上是和以西欧以及美国的自由民主制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截然对立的。也因此，这一理论坚定的反现代主张摆出的是一种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国——的姿态。总体而言，《第四政治理论》这本著作所关切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首先，它关注的是俄国未来的政治前途和历史命运。彼时，冷战末期，弗朗西斯·福山曾对苏联抱有很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苏联不会不愿意加入到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阵营中去，因此问题并非苏联是否融入自由主义国际

① Alexander Dugin, John B. Morgan(ed. & trans.), *Putin vs Putin: Vladimir Putin Viewed from the Right*, pp.145-153.

② Alexander Dugin, Mark Sleboda, Michael Millerman(trans.),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Arktos, 2012, p.35. 值得注意的是，杜金的这个表述却并没有指出究竟是谁“被邀请”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有论者认为，“受邀方”很可能是俄罗斯新右翼(the Russian New Right)、法国新右派(the Nouvelle Droite)和欧洲新右翼(the European New Right)。参见 Anton Shekhovtsov, Andreas Umland, “Is Aleksandr Dugin a Traditionalist? ‘Neo-Eurasianism’ and Perennial Philosophy”, *The Russian Review*, 2009, Vol.68, No.4, pp.662-678.

秩序之中，而是其参与度有多高。^①当然，随着日后俄罗斯政权在普京的领导下日渐稳固，福山多年前的言之凿凿如今看来不免有些讽刺的意味。福山的误判源于他采纳了一种线性进步的史观，其本质上是对世界政治大环境所持有的启蒙派立场。但这一据福山所称承袭自黑格尔-科耶夫一脉的思维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亦即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对历史演进的态度却是反现代的，而且他们对政治环境的设想和理解也是非线性的。而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历程，似乎也进一步证伪了福山的想法，因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和西方自由主义所设想的世界新秩序渐行渐远。而此刻，杜金在俄罗斯后苏联时代政治强人治国的背景下抛出第四政治理论，亦可谓恰逢其时。对此，杜金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坦言：

与此同时，普京又登台掌权，开启第三任期，这也是他和自由主义断然决裂的时刻。如今，普京业已接受了欧亚主义和激进右翼的思路，和[我的]第四政治理论越走越近了。这一举措正在进行。可以说，现在普京所倡导的政治现实主义正在和第四政治理论以及升级版的欧亚主义联手共进。^②

尽管杜金的这一描述未必属实，但却反映出他的理解与理论抱负。《第四政治理论》分析的第二个重点是西方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的没落。虽说这个命题至多只能称之为是一个有待检验的断言，但杜金绝不愿意看到自由主义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而且，对所谓随着法西斯的垮台、共产主义在西方的式微，自由主义应该实至名归地成为唯一主导西方世界的政治思

① 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后经他解释，其实称之为“历史目的论”更符合他的原义，因为英文单词“end”既可以表示终点，也可以意指目的；而他当时在选择书名时，正是意在使用这个双关。）的时候，基于他自己研究苏联精英阶层的著作和自己与他们联系的经验，曾声称，彼时戈尔巴乔夫身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自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欧洲文明的接触，都认可他关于历史已经终结（抑或说已完成其目的）的判断。参见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② Alexander Dugin, “Interview: The Long Path”, May 27, 2014. <http://openrevolt.info/2014/05/17/alexander-dugin-interview/>. 杜金的许多观点散见于各类媒体和网站的访谈，他本人除了公开发表著作之外，也会在自己专论“第四政治理论”的专题网站上（<http://www.4pt.su/en>）发表各类文章。因此，虽然有些说法未必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公布（杜金严格意义上也不能算是学院派政治哲学家），但只要具体的出处，并且杜金本人未公开对之发出质疑，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些都是杜金自己所持有并认可的观点。

潮这一说法，杜金也是明确不予接受的。因此，假如像杜金所言的那样——虽难免有大而化之的嫌疑——西方政治思想的主体就是“历史终结后”胜出的自由主义，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第四政治理论》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篇目标直指自由主义的宣战书——它举起了保守主义的大旗，将自由主义视为大敌，对其发起了猛攻。在杜金看来，西方自由主义的漏洞是足以致命的，它铺设了一个无神论的陷阱，而“从中突围的路只有一条”，^①这条出路就是“拒绝经典的政治理论，不管它们曾几何时是输家还是赢家；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把握住新世界的现实情况，正确地认识到后现代性的挑战，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这种新的事物[必须]超越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斗争……第四政治理论是超越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尤其是[超越]自由主义的……[它]将重新定义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而不再是一个被西方霸权主导的世界。”^②杜金在以上那篇论及普京的政治主张和自己理论相似之处的访谈中也曾说：

自2008年起，当我在形成第四政治理论的核心主张之时，我就已经明确拒绝了第二或者第三政治理论（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它们对我而言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了。反之，我将精力全部集中在了阐发这个完全独立的第四政治理论上；这一理论要和现代性坚决地划清界限。^③

本文认为，杜金自己这一支的保守主义路线，同时也是他理论建构的基础，根植于一战和二战期间，尤其是德意志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保守主义革命运动”。在这一思想阵营中，最具影响力的派别以及人物是以奥斯瓦尔多·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范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以及埃德加·容(Edgar Julius Jung)和卡尔·施米特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保守派(die Jungen Conservativen)，以及民族革命派(die Nation-revolutaere)的代表恩斯特·荣格(Ernst Juenger)。^④尽管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既孕育了保守主义革命运动，又滋生出了纳粹和法西斯主义，但这两股思潮

① Alexander Dugin, Mark Sleboda, Michael Millerman(trans.),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Arktos, 2012, p.12

② Ibid.

③ Alexander Dugin, “Interview: The Long Path”, May 27, 2014.

④ 曹卫东（编）：《危机时刻：德国保守主义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页。

却截然不同。保守主义从根本意义上说，具有反现代性的特征——它对现代性的诸多面向，比如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都是明确反对的。不过，杜金认为，虽说这股保守革命力量对现代性采取的是负面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仅仅是怀旧式的反动：保守革命的力量并不认为现代性是一场不幸的偶发事件；而认为它是一段必然发生的、无法取缔的历史发展历程，而我们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待它发展到极致后再将其“超克”。故而，保守主义革命所谓的“革命”，就应该理解为是一种循环的、而非线性的时间概念。就这一点而言，杜金对革命含义的理解以及对革命本质的把握所体现的，正是这个词原初的意义。“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学术语，由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而在自然科学中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科学用法中，这个词保留了它精确的拉丁文原义，指的是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众所周知，这并非人力影响所能及，故而是不可抗拒的，它肯定不以新、也不以暴力为特征。相反，这个词明确地表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①也诚如魏玛时代德意志青年保守派的领军人物范登布鲁克在《德意志第三帝国》（1923）中所写的那样：

保守主义试图发现从哪里可以创生出一个新的开端。他不得不既是一个保守人士又是一个反叛者。保守主义思想在所有的人类关系中看到的是永恒和往复；它们时而凸现前沿，时而退居幕后，但它们从不缺席，永远都在为自己伸张。但即便是这种永恒的原则也必须从时间中不断重新创制出来，不断翻新。^②

正是在海德格尔身上，杜金找到了这类德意志色彩浓厚的保守主义思想和现当代地缘政治问题的相关性。杜金在其著作《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中，将海德格尔视为激进保守主义的核心思想家。杜金进一步认为，就系统性的联系和接触、智识上的影响以及政治思想的亲缘性而言，海德格尔必须被理解为德国保守主义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③根

① [美]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陈周旺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② Arthur Moller van den Bruck, Hans Schwarz(ed.), *Das dritte Reich*, Hamburg: 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 1931, p.189.

③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 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Arlington, VA: Radix, 2014, pp.23-26, 171-173.

据杜金的解读，海德格尔哲学关注的问题，恰恰就是激进保守主义意义上的智识和精神“革命”：海德格尔的教义是，西方现代性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行将终结；但这给新的开端留下了可能性。这个崭新的西方世界的根基绝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对西方传统的再造和革新。新生的西方世界将摆脱旧有的框架，不再重返现代性的窠臼。正如杜金此书书名显示的那样，这是有关“另一个开端”的探讨；这另一个开端（*der andere Anfang*）也正是海德格尔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进入其思想晚期之时提出的一个观念。因而，杜金完全有理由将海德格尔视为保守主义革命运动的哲学传人。杜金写道：

海德格尔是一个“保守主义革命者”，因为正如他自己所理解的那样，人类被召唤去担当“存在的守卫者”……与此同时，冒险跃出一步，进入到另一个开端（这个“革命的”时刻，朝着未来的开始）。^①

海德格尔关于一个新的开端的思考，是试图找回迷失于现代性之中的人类存在（*Sein*）之根本意义。^②这个尝试既非反动，亦非怀旧，而是朝向了一个现代性之后的未来。正是海氏这种保守主义-革命性的思想动力，使得亚历山大·杜金将其视为 21 世纪哲思的奠基性人物。

海德格尔虽然在 20 世纪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思者，但这个时代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他……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完全把握住了海德格尔的思想，遑论因循着他的思路去寻找那另一个开端……因此，21 世纪从本质上说，还没有开始：今天存在于我们之中的关于意义的东西仍旧属于前一个世纪……唯有当我们真正开始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才能说我们进入了 21 世纪。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机会作出另一个决定，一个朝向另一个开端的的选择。这个选择必定朝向“自在发生”（*Ereignis*），

①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 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p.172.

② 此处关于海德格尔的用词，需要做一个说明。据孙周兴考证，海德格尔使用 *Sein* 这个词来替代日常德语的 *Sein* 来表示“存在”虽算不上是自创新词的做法，因为 *Sein* 是 18 世纪德语正字法的 *Sein* 写法，但海氏的改造有其特殊的哲学意义。孙周兴指出，海德格尔这一做法的用意在于表明 *Sein* 不再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被思考的。换言之，海德格尔是想用 *Sein* 一词来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所思考的“存在”范畴；类似的做法还包括后文表示“存在之历史的”这个概念用 *Sein* 来表达。参见孙周兴：“海德格尔《哲学论稿》译名讨论”，《世界哲学》，2009 年第 4 期。杜金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中，也肯定了 *Sein* 这一用法，并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

朝向“四方域”（Geviert）^①

不过，我们还必须要问：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另一个开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此外，海德格尔的这两个术语“自在发生”和“四方域”，对杜金的政治哲学又有何理论贡献呢？

二、海德格尔和“后形而上学时代”西方的“另一个开端”

海德格尔在其早期未完成的巨著《存在与时间》（1927）中，形成了一个“基础本体论”思想。海德格尔的目的在于重新提出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而这个问题随着西方哲学传统的演进，到了海德格尔的时代却逐渐被人遗忘了。这个问题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关于“存在（Sein）”之本质的基础本体论问题。海氏所追问的这个存在之本质，不是个别范畴的特定属性，也不是各种存在物本身是什么，他问的是：“存在本身，它究竟是什么？”^②而且，这一追问远非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或者古代哲学的回归。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简单地重述“存在”之问，而是要以一种决然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分析式提问的方法重新对此提出追问^③；我们要问的是，存在的含

① Ibid, pp.277-278. 关于海德格尔的哲学用语 Ereignis 和 Geviert 的翻译，本文采用王庆节教授的译法，即将 Ereignis 译为“自在发生”，将 Geviert 译为“四方域”。原因在于海德格尔在其后期思想中，常常有意避免使用传统的哲学术语来表达他的思想。因而其后期思想充斥着海氏自己生造的词汇。详见王庆节：“也谈海德格尔‘Ereignis’的中文翻译和理解”，《世界哲学》，2003年第4期。

② 后来，海德格尔在1935年夏季学期讲课中又一次提到：“存在（是）”是自明的概念。在一切认识中、一切命题中，在对存在者的一切关联行止中，在对对自己本身的一切关联行止中，都用得着“存在（是）”。而且这种说法“无需深究”，谁都懂得。谁都懂得“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等等。然而这种通常的可理解，不过表明了不可理解而已——它挑明了：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任何行止中，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任何存在中，都先天地有个谜。我们向来已生活在一种存在之领会中，而同时，存在的意义却隐藏在晦暗中，这就证明了重提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参见[德]海德格尔著：《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页。在杜金看来，海德格尔的这类追问方式是可以运用到政治哲学上的，因为这可以塑造出一个新的政治能动者。本文第二部分第一段后半部分和第二段对此有展开论述。

③ 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哲学只有通过“对‘实体’的存在意义的分析和阐明才能探寻存在的意义问题，因为，实体就是“形而上学”核心探究主题的“作为存在的存在”，换言之，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存在”本身。所以说，亚里士多德是将“什么是存在”的

义到底是什么？对海德格尔而言，这个含义追问主要不是一个有关西文动词结构“to be”之定义的问题，而是一个现象学和诠释学意义上的问题。由此，海德格尔之间的实质便是：从现象学和诠释学的角度出发，是什么使得“此在”（Dasein）能被领会：首先，有意义的存在物在场（present）；再者，又是什么使得有意义的实在能被这个此在获得（accessible）。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此在（Dasein）在海德格尔那里的含义并非简单地意指“后笛卡尔”哲学意义上一个积极能动的、自主存在的思想或者行为主体，而是一个在本体论意义上被决定了的、作为实存而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并且富有意义地“存在于-世（Da-sein）”的那个存在。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来说，便是：“人是这个‘此’（das ‘Da’），也就是，人是存在之澄明——人就是这样成其本质的”。^①而在亚历山大·杜金看来，海德格尔的功绩，抑或说他对政治哲学的贡献，就在于他不仅彻底解构了“后笛卡尔”意义上的主体概念，还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激进但深刻的对人类存在状况的理解，亦即：人类的存在必须以一种非自足性、动态的、时间性的方式来理解。^②正是这两点，使得杜金认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Dasein）”为自己的第四政治理论提供了绝佳的理论支持，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政治能动者的模式。因而，第四政治理论的这个政治能动者，在杜金看来，就是其余三种现代意识形态行为主体的替代者了。^③

问题转化成了“什么是实体”的问题。因而，亚里士多德分析存在的方法，依靠的仍然是（形式）逻辑学；亚氏自己——在海德格尔看来——就只是一个逻辑主体，缺乏对“人类存在状况”的把握。而海德格尔对此问题的分析方法却是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他试图抛开对主体性和逻辑的依赖，将“存在”概念导向一个晦暗、抽象的普遍性范畴之中。

① [德]海德格尔著：《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81页。乔治·斯坦纳解释道：“Dasein即是‘此在’（to be there），而‘此处’（there）则是一个世界，即那种具体、平凡、实际的日常世界。做人就是要沉浸、注入并根植于这个世界，根植于这个世界之日常的事实状态之中（‘人类’（human）一词含有拉丁文词根 humus，意为‘人世’）。那种试图通过抽象使自己凌驾于日常意义的日常状态之上的哲学是空洞的，它无法告诉我们存在有什么意义。”参见[美]乔治·斯坦纳著：《马丁·海德格尔》，李河、刘继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8-139页。

② 有关海德格尔对自笛卡尔哲学以来主体概念的批判和解构的详细分析，参见朱清华：“海德格尔对主体‘自我’的解构”，《世界哲学》，2009年第6期，第107-115页。

③ Alexander Dugin, Mark Sleboda, Michael Millerman(trans.),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Arktos, 2012, pp.32-54.

保罗·戈特弗里德 (Paul E. Gottfried) 在为杜金《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海德格尔对“此在 (Dasein)” 的揭示，将人类引领到了一个崭新的未来，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Auftrag) ——这个唯有我们存在于时间之中方能显现自身的事业。并且，海德格尔强调，人类的存在 (Dasein) 是由朝向未来的劳作所规定的，直至哪一天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我们身上，这一劳作才会停止。因而海氏认为，正是这一“朝着死亡的存在”才有可能释放出一个未经发现的存在之领域。戈特弗里德认为，杜金的思想完全有理由说是承袭了海德格尔，并深入到了对“存在之历史 (Seynsgeschichte)” 的探索。^①

事实上，海德格尔的对“存在之历史”的追问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部分中，将存在的意义赋予了它在时间维度中的情境特征。这就是说，将有意义的存在者 (尤其是“此在”) 置于一个动态的、在时间中构成的“意义-情境”里，进而“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就成了一个在时间中构成的、动态的、取决于情境的过程。^②由此，暗含于古代形而上学传统中的、存在者对“存在状态本身” (being-ness) 的理解就不必然被“重塑”或者说“还原”，而是相反，被“转化”为一种诠释学的模式。这其中，“有意义之存在者”的“在世状态”的时间性、历史性和情境性便不再是可化约的了。然而，这个根本意义上的本体论塑造的使命，因其方法论和概念上的缺陷^③，使得海德格尔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完成整部《存在与时间》，迫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本体论构想的合理性。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纳粹势力抬头，保守主义革命运动风生水起。海德格尔自己也在 1933 年到 1934 年间和纳粹有过一段短暂的密切接触。这几

①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 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Arlington, VA: Radix, 2010, 前言。

② [德]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 20-23 页。

③ 乔治·斯坦纳指出，海德格尔致力于追问终极问题的坚定性，他关于人的严肃思想必须永远关注那“首要的和最终的事物”的坚定主张，在写作《存在与时间》的过程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转变——转向了存在论立场。但这一存在论立场最终却没能在《存在与时间》中完成，因为斯坦纳认为那时的海德格尔还无法彻底摆脱宗教神学的价值论立场。参见[美]乔治·斯坦纳著：《马丁·海德格尔》，第 15 页。

起事件对海德格尔在那段时间的哲学思考有很大的影响。也正是在彼时，海氏思想发生了“转向”（Kehre）。海氏后期对“基础本体论”的重新思考，将他导向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他开始建构一则理解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存在-历史”叙事。在这则新的叙事中，这个新的开端不再只是时间序列意义上的重新开始，而是获得了一个本源意义上的新生命。在杜金看来，后期海德格尔关切的重点就在于：首先，重新审视“前苏格拉底”（pre-Socratic）时期的希腊哲学，对存在的本质发出追问；其次是对技术（*techne*）施加于人类生活的统摄加以批判；最终则通过提出“四方域”（*Geviert*）这个概念，试图重新建构起人类生活的意义。杜金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一书中，不但详细地分析了这些主题如何在海德格尔后期的著作中互相联系起来，也解释了一个纯粹被技术所支配的文化如何阻碍、甚至摧毁了对真理的索求，而这一索求本身是离不开人类对事物的神圣感和人类之于宇宙的限制性的。^①

具体而言，这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新开端，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因为在巴门尼德看来，事物之间所有的差异、对立和否定都可以被消解，从而可以达到一种纯然的、毫无偏见的肯定性状态。这一肯定性，让所有的事物，亦即所有存在，都可以被思想所把握。^②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西方形而上学经过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再到笛卡尔哲学，最终到达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这一番改造，其思路的重心逐渐从“存在”本身转向了思考活动本身。更确切地说，它转向了思考的主体和那个能动的自我。并且，这一路向到尼采那里达到了巅峰。从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读来看，他认为“存在”在后者那里成了无意义的东西，而且经过后者设想中主体的重塑，最终被改造成了“通向权力的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因此，作为“通向权力的意志”的生命，在其自我指涉和漫无目的的自我保存和自我提升的运动中，将仅仅只有暂时性和工具性的意义——却没能赋予生活真正的价值。

①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 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Arlington, VA: Radix, 2010, 前言。

② [德]海德格尔著：《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5-346页。

质言之，在这个尼采式的、超现代的、虚无的技术统治时代，意义和价值都成了暂时性的主体建构，成了统治和控制的工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宣告说西方形而上学达到了其顶峰。曾经以理论生活为目的、以沉思为方法的古典哲学^①如今已风光不再，因为它的形而上根基已被彻底瓦解了。因此，它将逐渐被实证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所规定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后两者将成为积极对自然和社会加以控制和规划的途径。^②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人类身处这样一个超现代性的时代，要想有真正意义上革新的哲思，就唯有从重新思考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假设开始——通过重新找回西方思想的“原初开端”，通往“另一个开端”。^③进入思想晚期的海德格尔认为，自己的哲学事业就是在为迎接这另一个开端做着准备。不过，海德格尔从来都没有把这个开端体系化过。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写于20世纪30、40年代的著作，尤其是《哲学论稿》（1936-1938），仅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围绕这个开端的可能性进行论述，并时不时地同形而上学在古希腊的开端作对比。

海德格尔期许的另一个开端，意味着哲学会向超验性、不可企及性以及非在场性敞开。而原本，超验性、不可企及性和在场性，都是人类在探索生命之意义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的、试图理解事物的追问方式；只不过，这些理解方式随着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被逐步抛弃了，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在演变的过程中，其传统关注的对象蜕变成了纯粹理性能力本身，而对纯粹理性能力的关注，势必会导向人类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全盘控制和操纵——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被“座架（Ge-stell）”所统摄的意思。^④“要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类就需要拒斥形而上学遗产和‘技术性’的诱

① 所谓的“理论生活”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按亚氏的说法，它的意思是指“心智的全面实现和发展”——因为按照他的目的论解释，人类这一“政治动物”生活的至高目的就是实现幸福（eudaimonia），而幸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相应地，这需要通过以“理论的方式”进行沉思——这种最高级的人类活动——方能实现。

② [德]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第66-69页。

③ Heidegger, Richard Rojcewicz & Daniela Vallega-Neu(tran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Of the Event)*,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45.

④ 有关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宰治的分析和克服，参见冯军：“座架能否回到存在真理的基础上——评海德格尔克服现代技术思想”，《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8期。

惑。”^①按照海德格爾的要求，另一个开端的哲思之旨趣应该被置于情境化的时空维度中，而且这些维度本身并不以实体的方式在场，而是导向以及建构每一个单个的情境或者事件，指明意义的方向。这个情境化了的背景结构，正是海德格爾后期思想中的“四方域”（Geviert）——大地、天空、神、人——这个出了名的艰涩术语所指涉的具体含义。根据杜金的解读，借助这个四方域的框架，有意义之物通过指向终极目标和目的（神），以及有限的、历史的人类居所（人）之极限域，获得了属人的意义。有了“神-人”这一轴后，又可以打开一个智性的、可见的和表象的空间（天空），这其中知觉可以感知到的物质性（大地）便可以被有意义地表达出来，并被情境化。^②可见，另一个开端不同于古代希腊形而上学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再以被“理念”所构建出来的实体，抑或以事先被理性所构建起来的“存在”来切近存在本身。相反，它将“存在”视为一个不断生成的、处于动态中的“意义构建”之事件，这个事件不断地构筑和情境化有意义的在场：作为“自在发生”（Ereignis）而存在。自在发生，亦即Ereignis，便是后期海德格爾“事件本体论”的核心概念。

三、杜金的激进保守主义：右翼海德格爾主义

亚历山大·杜金在《马丁·海德格爾：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中指出，尽管海德格爾和激进保守主义有着内在的亲缘性，也曾和纳粹有染，但奇怪的是，海氏思想在政治哲学中的影响，无论在二战前还是二战后，都主要集中在左翼知识界。比如，海德格爾最著名的德裔弟子，就包括了新左派的偶像和理论大师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即便在德语地区以外的地方，海德格爾遗产的最初继承者也主要是诸如萨特（Jean-Paul Satre）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其后，20世纪60年代，另一波的“海德格爾热”又是法国哲人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

① [美]乔治·斯坦纳著：《马丁·海德格爾》，第124页。

② 对于这个“四方域”的解读，详见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 (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 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Arlington, VA: Radix, 2010, pp.189-279.

(Jacques Derrida)掀起的。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第三波“左翼海德格尔主义”的理论旗手仍是以拉丁语国家的理论家为代表，其中以法国的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和意大利的瓦蒂莫(Gianni Vattimo)以及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最为出名。总之，右翼保守主义思想似乎从未从海德格尔那里借鉴过太多的理论资源。事实上，只有在亚历山大·杜金这里，真正的“右翼海德格尔主义”，这种带着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激进保守主义，才得以浮现。杜金曾公开宣称，他就是要“将海德格尔隐秘的政治哲学请上舞台。”^①从杜金关于保守主义革命的视角看，正是“另一个开端”的思想，作为海德格尔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遗产，凸显出其重大的理论意义。本文认为，杜金对海德格尔的解读，比起许多对海氏思想的左翼路径切入更深入，其在很多方面也比后者更加贴近海德格尔的真实意图和愿景。

实际上，随着近年来海德格尔思想日记，也就是俗称“黑色笔记本”(Schwarze Hefte)的陆续出版，欧美学界已经开始重新看待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尤其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的意义了。《黑色笔记本》甫一问世，欧美学界的反应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和他对纳粹不该有的肯定性立场上。欧美学者们捕风捉影般地试图在黑色笔记本的字里行间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证明海德格尔不仅仇视犹太人，更是打心眼里赞许纳粹的行径。不过，随着笔记本一部部被公开并整理出版，对此的研究也陆续在欧美学界取得了新的进展。学者们发现，《黑色笔记本》实际上并未清晰无误地表明海德格尔积极地响应了纳粹的号召，更不能证明他是货真价实的纳粹分子。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黑色笔记本》的整理人之一佩特·特拉夫尼(Peter Trawny)撰写的两本论著：《自由落败：海德格尔的无政府》(2015)和《海德格尔和犹太世界阴谋的迷思》(2016)。两本书处理的主题虽然不同，但都引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海德格尔真正的政治哲学思想应该被归类为右翼，而非左翼。^②假如说海德格尔属于右翼，那么这就可以证明杜金对海氏

① Alexander Dugin, John B. Morgan(ed.& trans.),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London: Arktos, 2014, p.114.

② 参见 Peter Trawny, *Freedom to Fail: Heidegger's Anarch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和 Peter Trawny, *Heidegger and the Myth of a Jewish World Conspiracy*,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有关左翼海德格尔主义的政治含义，参见 Carsten Strathausen, "A Critique of Neo-Left Ontology", *Postmodern Culture*, 2006, Vol.16, No.3.

思想的理解，亦即认为海德格尔政治哲学代表了一股激进保守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特拉夫尼的研究表明：起初海德格尔对影响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思想的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乃至有哗众取宠之嫌的所谓“世界的犹太化”等观念，都是出于海氏对现代计算理性和技术操控的担忧而产生的。但这些想法到了后期慢慢升级为一种对西方现代性之终结的忧患，其最终的结果便是引发海氏的思想转型：思索另一个开端的可能性。并且，随着海德格尔在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和纳粹渐行渐远，他对纳粹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那个时候的海德格尔开始认识到，纳粹自身就是“现代性之终结”的激进、甚至是极端的表现。至于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海德格尔则认为，这是其现代主体主义思想的必然后果，这种现代主体主义的逻辑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一种漠视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间区别的极端生命/生物政治。因此，纳粹就是不加约束的现代性的一个表征。^①海德格尔在写于战后的一则笔记中提到说，假如当时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成功了，那么他们下一步给欧洲带来的就会是虚无主义了。这就是说，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讲，欧洲就将迎来一个彻底的、被无边无际的操控所主宰的时代，欧洲人就将变成一个完全同质化的、生物化的整体。^②

所谓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其和左翼海德格尔主义间最重要的差别，体现在两者对海德格尔用来表示“存在”的那个词 *Sein* 的不同理解之中。^③杜金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中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从第 9 页到第 142 页）对此作了解释。可见这一区分对理解右翼海德格尔主义的重要性所在。对左翼海德格尔主义而言，*Sein* 这个“存在”，指的是造成本体（*ontic*）和本体论（*ontological*）间差异的构成性事件；而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则认为它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基础本体论的场域。具体来说，左翼认为，既然所有的根基都是本体论的，而且所有的本体论都是可以摧毁的，那么所

① 本文的这一概念借鉴自[美]沃格林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② 海德格尔有关共产主义概念的形而上学思考，可参见张文涛：“海德格尔生存论历史观的内涵与价值”，《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第 23-26 页。

③ 关于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参见 Oliver Marchart, *Post-Found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Difference in Nancy, Lefort, Badiou and Laclau*,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有根基就都是可以连根拔除的了。所以，左翼的结论就是：没有什么根基存在，有的只是多样性和偶然性。而在右翼看来，西方哲学的“初次”开端（也就是“前苏格拉底”时代）只是部分地完成了自身，因此导致了对存在（*Sein*）的遗忘；而海德格尔意欲开启的第二个开端，必须克服透过“存在者”（*das Seiende*）思考存在（*Sein*）本身的做法，必须要让存在（*Sein*）解蔽，显示自身。因此，右翼海德格尔主义面向的就是那“另一个开端”——正如杜金《开端》一书的书名所示的那样。如本文第二部分谈到的那样，杜金亦认为，正是海德格尔经由“四方域”这组概念所阐发的事件本体论思想开启了“另一个开端”，因而真正的海德格尔是属于右翼的。杜金基于海德格尔的“四方域”，提出了自己的诠释，认为：

[四方域]正是存在（*Sein*）本身。它在“自在发生”中被现实化，将纷争引入到了一切事物之中，在世界的极化力量中，呈现出了张力。而这些极化力量正是基础本体论意义上的战争性力量。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Sein*）就是战争。因为同时囊括了“是”，[事件本身]和“否”，[虚无。比如说存在中的无 *das Nichten im Sein*]。在无/虚无/毁灭和作为存在的存在间的分隔，剥夺了[后者]发生的可能性，也就等于剥夺了作为复数的存在（*beings*）发生的可能性，而它们诞于战争，亦诞向战争。对海德格尔而言，此种分析和赫拉克利特将战争视为万物之父的主张是吻合的。^①

虽说如此，但杜金对“四方域”也进行了一些改造。^②这样，海德格尔的“四方域”就可以被用来帮助我们对“神-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多维度的思考。因而，从基础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就没有必要非常迫切地为世俗政治而斗争，也没有必要迫切地需要转向神权政治。而且，“四方域”的含义远远超越了“新的开端”的基础本体论结构的范围。杜金的分析表明，这个多重结构也可以被用来作为一幅将西方形而上学史中对存在之遗忘叠加于上的图谱，其目的是为了揭示出在历史的每个阶段，对存在之遗忘究竟到了什

①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 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Arlington, VA: Radix, 2010, pp.148-149.

② 杜金对四方域的几种改造，详见 *Ibid*, pp.165-170.

么程度。^①可见，存在（Sein）在“四方域”中的呈现不该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根基。“认为存在（Sein）是，而且将永远会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东西，是一幅幻象。存在是在敞开中显示自身的；它永远是鲜活的……。”^②而正是这“新的开端”中存在（Sein）的偶然敞开性，才是右翼海德格尔主义的重点和关切所在。

如果说左翼海德格尔主义基于其对存在（Sein）的理解选择站在了一个“差异性”的政治存在论立场，而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则因循海德格尔的原意，坚守着基础政治存在论，那么它们在政治哲学上分别代表着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层面的关切：（1）关于律法的神圣性来源；（2）关于“宗教性-神圣性”的回归以及世俗性的退却。考虑到第一个问题事实上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法篇》，而第二个问题和现代性的诸特征，比如世俗化、全球化、技术、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等密切相关，^③因而本文主要分析第二点，并且重点在于厘清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对此问题的看法。总体而言，左翼海德格尔主义倾向于摧毁神学的根基并建立一个激进的民主制度。反之，右翼海德格尔主义的政治理论却远没有那么具有颠覆性，它给后现代时期的神学和政治思想留下了余地，同时对当代民主制提出了深刻的见解。^④杜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仍需要回到海德格尔的“四方域”，并且首先要明白的是：“四方域”中的神，并非宗教意义上的一神或者多神。他说道：

总体而言，人类和神圣性的联系太过理性、太过功利、太过技术化了，即便是整合完成后的神学和神智学，亦复如此。宗教意义上的诸神蜕变成了各种表现为惩罚或宽恕、谴责或拯救等形式的机制。诸神成了

① 比如，杜金认为“四方域”对应于柏拉图时代所呈现出来的形式是：首先，理念即天空、大地即物质；其二，人掌控住了逻各斯，并形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而不是反过来，在遗忘存在的过程中被逻各斯掌控；但是，神却是隐去的。又比如，在右翼海德格尔主义看来，被歪曲了的“后现代性”图谱成了“四方域”最糟糕的表现形式。Ibid, pp.182-203.

②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 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③ 见 *Political Theologies: Public Religions in a Post-Secular Worl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的导论部分。

④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 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pp.134-136.

“人性的、太人性的存在”；这已经表明它们的位置已经被取代了。这样的诸神不会和人类开战，而人类亦不会和他们发生纷争。这是因为：它们[在人类看来]不是神明，它们和存在（Sein）是分裂的；因此人类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不依靠它们，而使用技术手段让自己得到满足。这样的神是俯首称臣的神（subdued gods），dei ex machina。^①

正因为宗教意义上的诸神仍旧是西方形而上学图谱上的点墨，因而它们“随着当代虚无主义的到来，已经一文不值、行将就木了。不过“四方域”中的神圣性，却仍是“和存在（Sein）紧密相连的神圣性。”^②杜金敏锐地指出，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论‘自在发生’》中对此有过详细的表述。杜金转述道：

因为存在（Sein）正是诸神的需要，与此同时，存在又只能在其自身对真理的探索中找到，并且这种思索究其本质就是[另一个开端的]哲学，因此诸神需要的就是存在之历史的（Seynsgeschichtliche）思索，也就是哲学。诸神之所以需要哲学，并非因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去对自己的神圣化进行哲思，而是说，如果诸神意欲再一次闯入决定的境遇并为[作为命运的]历史（Geschichte）找到一个自身本质的根由，那么哲学就必须介入其中。存在之历史的（Seynsgeschichtliche）思索，作为存在（Sein）自身的思索，是由诸神所先定的。^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另一个开端的哲学就是右翼海德格尔的政治哲学。也因此，“四方域”图谱中的诸神/神圣性和右翼海德格尔主义的新开端之间是存在着直接联系的。既然后期海德格尔的哲学可谓是杜金“第四政治理论”中的理论基石，^④因而在右翼海德格尔主义中，“神学-政治”这一思考的维度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维度——无论是其中的神学部分还是政治部分——都必须被放置在基础本体论上进行思考。至于右翼海德格

①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 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p.158.

② Ibid, p.156.

③ Ibid, p.158.

④ 杜金称海德格尔的哲学是“第四政治理论中最深刻的基础。”海氏的哲学“也许是所有一切的轴心——从第二政治理论和第三政治理论一直到神学和神话的回归……”，参见 Aleksandr Dugin,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Arktos 2012, pp.28-29.

尔主义和民主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认清，杜金所代表的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和左翼海德格尔主义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借鉴了一系列包括激进保守主义革命、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等在内的传统元素，将自身基础存在论意义上的发生时刻放置在了一个特定民族的此在（Dasein）之中；其次，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并不认为民主是好的，遑论是值得欲求的。^①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右翼海德格尔主义既拒绝了社会民主制，又排斥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因为它们都是属于旧有的第二和第三政治理论的，因而也是不值得信任的。而按照杜金自己的说法，他的“第四政治理论”提出的是一种“有机的”、抑或说是“整体性的”民主观。因此，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和左翼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它能够、并且愿意从同根同源的民族这一角度出发，将其视为人类政治历史的主体。^②

四、从“世界秩序”到“文明多样化”：欧亚“大空间”

由是观之，隐含在海德格尔政治哲学中的“地缘政治观”正是对一个逐步趋向于同质化、逐步被拉平，进而人类的种族、文化和历史差异被消弭的可能的世界所作出的反应。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保守主义革命正是对一个潜在的全球秩序的反抗。这股保守主义革命的“地缘政治”理念也和当时青年保守派最著名的理论家卡尔·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相结合了起来。施米特的这一地缘政治观，旨在将世界表述为一个扩大了地理空间，以抗衡最初以国联为代表、由美国主导的普世化的世界秩序。^③而早在1933年，时任弗

① 杜金认为，我们必须和“民主”保持“批判性的距离”，这样才能创造一个理解的空间，从概念上将其厘清。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拒绝将民主作为一种教条接受下来。杜金说：“不信任民主并不意味着敌视民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做民主的囚徒，不要被民主的迷魂汤灌晕。任何一种将民主的好处先验地接受下来的政治哲学根本不配称自己是哲学。”

② 参见杜金自己专论“第四政治理论”的网站上关于民族社会学的演讲：<http://www.4pt.su/en>

③ 1939年4月1日，施米特在基尔大学政策和国际法研究所成立25周年时作了题为“国际法的大空间原则”的演讲中，首次推出他的“大空间秩序”理论，并发表了长文“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论国际法中帝国的概念”。参见方旭：“以大空间秩序告别普世帝国”，《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注释25。

莱堡大学校长的海德格尔，便公开支持希特勒让德国退出国联的决定。海德格尔强调说，就好比一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真正的共同体是绝对不能依靠盲目使用武力捆绑在一起的一样，它也不能建立在国联这样一个“无根的、毫无责任意识的父权制世界”之上。因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需要每个国家都对其自身特殊的“使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的呼唤不单单是假借民族的名义发出的。因为虽说海氏的言辞似乎是在唤起德国承担起一个神圣的使命、呼吁德意志人民承载起国族的命运，他也非常明确地表明，他主要将德国看作是欧洲的代表乃至欧洲哲学的代表；毕竟按照海氏的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叙事路径来看，最后一批伟大的哲人，也就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以及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尼采，都是德国人。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说道：

这个欧罗巴，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它总是处在千钧一发、岌岌可危的境地。如今，它遭遇来自俄国与美国的巨大的两面夹击，就形而上的方面来看，俄国与美国二者歧视是相同的，即相同的发了狂一般的运作技术和相同的肆无忌惮的民众组织……我们处在夹击之中，我们的民族处于中心点经受这猛烈的夹击。我们的民族是拥有最多邻人的民族，而且是最受损害的民族，而且在所有一切情况中它是个形而上的民族。但是只有当这一民族从其自身产生出一种对上述境遇的反响，产生出这样一种反响的可能性，并且创造性地理解其传统，那么这个民族才能从这一我们已经确知的境遇出发赋予自身以一种命运。^①

在施米特和海德格尔的激进保守主义地缘政治愿景中，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初承诺，就应该是带领德国创建一个欧洲的“大空间”和当时正在崛起的两个对德国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大型政治单位——苏联和美国——分庭抗礼。在两位哲人构想中的这一由德国牵头的欧洲大空间，将不同于美苏这两个大型政治实体所代表的普世化的意识形态。相反，它代表的是一个“特殊-地方”主义政治思想的实践。施米特认为，“德国位于欧洲中央，受到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普世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的东方普世

① [德]海德格尔著：《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39页。

主义两面夹击，只有通过大空间秩序才能对抗这两种普世帝国，从而排除外部空间干涉。”^①而这一空间建立的基础是“尊重每一个作为生命现实的，并且由种源、鲜血与大地（Blut und Boden）所决定的民族。”^②海德格尔也有相似的理念，只是他并没有像施米特一样强调血缘和种族，而是从特定的文化和精神性传统来建构欧洲身份，尤其是德意志民族身份的；海德格尔认为这特定的文化和精神遗产的继承者正是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哲学。

不过，随着德国军队最终于 1944 年从列宁格勒败退，纳粹第三帝国所宣称的地域、国族和文化的特殊性也一并被瓦解和颠覆了。至此，任凭纳粹再怎么雄心勃勃地弘扬欧洲大空间的理念，强调其建立在同质化、生物性和技术宰治的本质，它对激进保守主义而言也彻底地不再有吸引力了。对此，海德格尔写道：

欧洲新秩序是一则全球统治的规定。确定无疑的是，它不能再是一个帝国了……欧洲是一个“历史-技术（historiographische-technische）”，也就是“全球（planetarische）”的、一个既囊括又融合……西方和东方都决心完结现代性的本质，这种本质在统治着东方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同时，也以同样的、毫不含糊的方式统治着西半球（美国）。欧洲是两者的完结。^③

于是，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纳粹的欧洲愿景，不再被看作是除了以美式自由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力量之外的第三种选择，也不再被当作是和美俄意识形态抗衡的力量了：这一愿景自身反倒是一种极端的方式终结了现代性。所以，海德格尔才会说：“美苏冷战，作为一场发生在两股当代强力间、争夺世界统治权的角逐，本质上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罢了”。^④这类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根本上都是发生在意识形态

① 方旭：“以大空间秩序告别普世帝国”，《开放时代》，2018 年第 4 期。

② Samuel Salzborn, “Carl Schmitt’s Legacy in International Law Volksgruppenrecht Theory and European Grossraum Ideas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to the Present D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2016, Vol.4, No.2, p.11

③ Maritin Heidegger, 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 (ed.), *Gesamtausgabe, vol. 71: Das Ereignis [1941–42]*,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2009, p.95.

④ Heidegger, Andrew J. Mitchell (trans.), *Bremen and Freiburg Lectur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48.

上处于对立状态、但“形而上学”意义上无甚差别的力量之间的对决。它们的目标无非是为了控制大地上的物质资源和人口资源。用施米特的话说，它们都是“全球内战”^①，而远非发生在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真正的冲突。施米特对此有详尽的表述：

一整部东西方之间全球性冲突的历史，从根本上说，都可以化约为一组对立：大地和海洋。我们现如今称之为东方的地带，是一个单一的、坚实的土地实体：[包括有]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它是一片巨大的土地，伟大的英国地理学家哈福德·麦金德爵士称其为“中土大地”。而我们称之为西方的，是全世界诸海洋区域和半球的一部分，其中涵盖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唯有清楚地看到在海洋势力和陆地力量之间存在着抗衡，才能对文明[两]极化现象做出准确的解释。而正是这场在全球范围内上演的冲突，在不停地给全世界制造着压力，也激发着全球历史不断演进。^②

施米特甚至还预言了新世界秩序的三种可能性。^③20世纪60年代，施米特又在冷战的格局下，对大秩序理论进行了反思，设想着一种新的大空间。这一“新大空间”的中心“不仅得之于技术，也得之于人类基于他们的宗教和种族、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以及基于他们国族遗产的生命力而为人类发展共同努力的精神实质。”^④随着历史的演进，施米特的预言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印证。因为当今美国推行的、单极的“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遭遇了滑铁卢，普世帝国的扩张虽然打破了旧的格局，但秩序被瓦解的地区又无力照搬西方模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导致动荡不断。所以，受到普世价值冲击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各自的地缘政治状况，在大国的包围下，反而促进着更广阔的多极化大空间的出现。

① 参见 Schmitt, G. L. Ulmen(trans.), *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 New York: Telos, 2009.

② 参见 Schmitt, *The Planetary Tension Between Orient and Occident a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Land and Sea*, <https://quod.lib.umich.edu/p/pc/1232227.0005.011?view=text;rgn=main>

③ 第一种秩序是美苏用技术统治整个星球；第二是美国通过海军和空军充当世界警察；第三则是产生多个不同的大空间，参与新的世界秩序构建。参见方旭：“以大空间秩序告别普世帝国”，《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④ [德]施米特著，李柯译，载吴彦、黄涛（主编）：《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卡尔·施米特专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0页。

杜金敏锐地捕捉到了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洞见。在他看来,尤其是施米特有关一个单极的全球体系和一个多极化的大空间之间的对比,在后冷战时代仍然没有过时。现如今,这一对比的一端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新世界秩序”,这一理念由小布什总统作为政策愿景提出(1990),同时又由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目的)”(1989)作为理论支撑;另一端则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3)预言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将会演变成“文明的冲突”。按照杜金的看法,在当代,虽然施米特提出的这一对抗的参与者变了,但其本质却丝毫没有改变。杜金还进一步认为,亨廷顿的预言相比较福山的断言更加接近事态的真相,而且前者所划分的几个主要文明、抑或者说宗教和文化地域间的分歧,更有助于复兴施米特的“大空间”秩序理论。不过,虽然杜金基本赞同亨廷顿的判断,但他同时也认为,福山的论断不全错,而且不同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图景的悲观色彩太过浓烈。因为按杜金自己的判断,当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冲突,并非如亨廷顿所言是发生在单个文明之间的纷争,而是发生在多极化的众文明和福山所言的自由主义单极化力量之间的矛盾。综合而言,冲突的双方分别代表特殊性、地域性的“历史的延续”和普遍性、全球性的“历史的终结”。对此,杜金写道:

一个多极的世界将会为人类政治历史的延续性创造出真正的先决条件。当然,这之中既有对话也有对立。不过更重要的是:历史将会继续。我们会从根本的历史之死胡同中走出来,回到曾经的道路上去:在这条道路上,人类曾以进步、理性和人性逐步完善的坚定信念驱使着自己一直走下去……不管是在物质世界还是在精神领域,都不会有普世的标准。每一种文明都至少会有权利自由地主张符合自身意愿的衡量(进步与否)的标准。^①

在杜金构想的多极世界中,历史将会继续。但这个历史不再是那个由启蒙理性的目的论叙事所规定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的那个宏大的、大写的人类历史。相反,历史将是各个文明空间所经历的、地区性的叙事。在这个

^① Alexander Dugin, Mark Sleboda & Michael Millerman(trans.),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Arktos, 2012, pp.116, 120.

新的历史叙事中，各个文明只要愿意采纳“解释学”的基本立场，^①亦即尊重他者、尊重有限历史传统的多元化，就都有能力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家园，相互协调共存。显然，杜金的这个愿景至少和施米特意义上的多极地缘政治论的精神是基本相符合的。两者唯一的差别仅仅在于，杜金念兹在兹的并非施氏耿耿于怀的那个欧洲大空间，而是“欧亚-俄罗斯”这一全新的文明空间，而这其中，俄罗斯又无疑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施米特曾经提出三种大地的法和秩序。第一种谓之古代人的“应许之地”，这是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秩序；这一秩序随着欧洲的远洋探险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便不复存在了。第二种便是以欧洲中心为框架的民族国家秩序，不过这一秩序也被二战所打破，随即世界便分成了以冷战为特征的东西对峙，而这不只是地缘意义上的对立，更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Kultur）和文明（Zivilisation）间对抗。而杜金的地缘政治思考，正是试图沿着施米特的道路，建立第四个大地法和秩序。他相信这个新的秩序将会是以欧亚大陆为中心，尤其是在中心地带的俄罗斯的领导构建起来的秩序。^②

更有意思的是，上述杜金的欧亚主义理念也可以在海德格尔那里找到源头。当海德格尔听闻德国对苏联发起攻击之后，他曾大为振奋，提到说不仅仅是日本，连俄罗斯也是欧亚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既不属于欧洲，又不能算“非欧洲”，而是夹在欧洲和亚洲中间的地带。并且，海德格尔还专门表述过对俄国国民性的态度；他认为俄国是一个在精神力量上具有潜力的跨欧亚大国。况且无论是德国还是俄国/苏联，最终它们都被自己各自采纳的“主义”所戕害了，结果就是两个国家之历史性存在中的德国性和俄国性都分别被涤荡殆尽了。这种国族性的消失远非军事上的溃败抑或物理意义上的被摧毁那么简单；事实上它意味着两个国家都被以同质化和扁平化、庸俗化的现代性漩涡无情地吞没了。正是海德格尔以上的这些论断，给了亚历山大·杜

① 这里的解释学有两层含义，分别是由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解释学”。关于“方法论解释学”，可参见姜韦：“论伽达默尔解释学经验的特征及其对他者问题的启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关于“生存论解释学”，可参见王庆丰：“海德格尔思想谱系中的实际性解释学”，《哲学研究》，2013年第9期。

② 杜金在自己的网站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中提出过这一设想。详见<http://www.4pt.su/en/content/east-and-west>

金充分的理由，认定海德格尔就是“我们重新思考西方和我们自己（俄罗斯）之于西方这一问题的伟大智识来源。”^①

五、结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亚历山大·杜金的政治哲学主体，亦即“第四政治理论”，并非一个全新的、原创的政治哲学体系。“第四政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哲学/政治哲学的改造和革新。此外，杜金的政治理论尚有许多重要的细节和表述有待完善，比如它并没有赋予“文明”和“传统”的本质和内涵以精确的、前后融贯的定义；进而两者之间的诸种可能的互动关系也是付之阙如的。再者，这一理论的核心部分甚至都没有被很清晰地表达完整，比如书中名为“第四政治实践”的章节只有寥寥数页的篇幅。最后，鉴于“第四政治理论”和欧洲其他右翼理论和运动之间的暧昧关系，这一理论的核心理论基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和其他右翼保守主义理论严格地区分开来，也是成问题的。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杜金的确给旧的理论——欧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深刻地影响了俄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思考和政策制定。如果我们将第四政治理论放在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下看的话，或可认为他的理论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新发现并重申了一种独特的反现代性保守主义思想；而这股思潮之前却未曾被发掘并利用为一种可行的意识形态替代方案，那便是德意志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激进保守主义革命传统。而在杜金的理论之前，这一思潮却因为同期纳粹主义的猖獗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统领而至多沦为一个陪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本文进一步认为，透过纯理论的视角观之，杜金在海德格尔的后形而上学政治思考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一独特的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思潮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特立独行的。因此，尽管杜金将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理论糅杂在一起而发明的这一“文明多极化”地缘政治愿景，究竟在俄罗斯政治运动层面、乃至国际政策

^①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 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Arlington, VA: Radix, 2010, p.186.

制定方面最终会产生何种翔实的应用价值尚有待观察，但其势必会推动 21 世纪保守主义思潮的复活，并在保守主义政治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话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 Abstract 】 Alexander Dugin’s theory of “neo-Eurasianism”, as a substitute for Russia’s opposition to the West-dominated globalization and unipolar world order, is a conservative current of thought. Ideologically, it originates from two thinkers in the era of the Weimar Republic of Germany: Heidegger’s thoughts on the politics of “existentialism” inspired Dugin’s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and Schmidt’s theory of “big space” injected vitality into Dugin’s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constructing “multipolar civilization”. Moreover, given that Heidegger has also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geopolitical prospects of Russia through its analogy with Germany, Dugin’s political philosophy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revival of “right-wing Heideggerism”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is thought is aimed at re-excavating the philosophical legacy of Heidegger’s thinking of “another beginning”, hoping that Russia can undertake the task of reviving Eurasian civilization in the name of “multipolar civilization”. And in the “post-metaphysical” era called by Heidegger, Dugin wishes that Russia could compete against the universal and globalized “end of history” through the special and regional “continuation of history” of Eurasian civilization.

【 Key Words 】 Russian Conservatism, Dugin’s Political Thoughts, Neo-Eurasianism, Eurasian Civiliz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Тео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Дугина о «новом евразийстве» как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ю глобализированному униполярному мировому порядку, возглавляемому Западом, является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ом.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дан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берут своё начало в работах дву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Веймар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Германи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Хайдеггера о политике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а» вдохновили «четвёрт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теорию» Дугина, а теория «больш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Шмитта вселила жизненную силу 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Дугина о построении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Более того, учитывая, что Хайдеггер, проводя аналогию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Германией, также выражал обеспокоенность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и пер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философию Дугина мож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ак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равого хайдеггеризма». Данная идея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новое открытие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более позднего периода мышления Хайдеггера о «другом начале», и возлагает надежду на то, что Россия сможет выполнить задачу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о им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в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ую «метафизическую эпоху» Хайдеггера будет специальным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истори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борющимся против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го и глобализированного «конца истор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Дугина, новое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国家性”的历史结构

张昊琦*

【内容提要】“国家性”是一个涵义多端的复杂概念，19世纪下半叶出现在俄国工人运动理论家的文献中，随后在俄国境内外得到了广泛运用。作为一个法政概念，“国家性”的涵义一开始主要与“国家”概念类似，但是在俄国保守主义者那里却被赋予了神性色彩，体现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国家性”既是一个内核相对稳定的概念，又是一个发展变迁的概念；它既源于基本政治制度的历史架构，也源于以意识形态和理念为核心的精神结构。历史上的基辅罗斯是一个松散的贵族共和国联盟，但是鞑靼蒙古人的入侵破坏了它的政治系统，将王公-贵族-教会-谓彻所组成的四元结构转变为单一的王公专制独裁结构。绵延的世袭制传统、东正教中的神性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最高权力与民众的心理结构，共同服务于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构成了俄罗斯国家性的精神层面。俄罗斯政治转型主要在于由专制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其关键是重构国家性，使传统国家性蜕变为现代国家性。

【关键词】俄国特殊论 “国家性” 现代政治 “普京主义”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2-0033(34)

引言

“俄国特殊论”是基于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而形成的一种特殊主义，对俄罗斯人来说，它是一个经久不衰、时时翻新又令人困惑的命题。“俄国

* 张昊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作者衷心感谢《俄罗斯研究》编辑部尤其是冯绍雷先生所提出的宝贵而中肯的修改意见，但是文责自负。

特殊论”针对的是西方发展道路的普遍主义，西方的“标尺”角色不仅仅是它认识自我、分辨自我和确定自我的“参照”，也是它的一个历史心结。在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上，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相互交织，相互辩难，相互牵制，但是特殊主义始终是俄罗斯的本色和历史发展基调。

俄国特殊主义是在西方普遍主义大规模渗透的背景下逐渐生发和成熟起来的。从17世纪开始，西方的影响在俄罗斯“民族无力的感觉”中如期而至。在战争、对外交往和商业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加深了俄罗斯人对自身落后的认识。^①但是与此同时，对西方影响的怀疑和抗拒也在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中掀起了巨大波澜，教会的分裂损害了俄罗斯“古制”的权威，反教会的骚乱也成为一场反国家的骚乱。^②

18世纪是俄罗斯“面向西方”的世纪，彼得大帝虽然用鞭子将野蛮落后的俄国人驱赶进欧洲，但也奠定了俄国的“精神分裂”——后来的斯拉夫派谴责彼得的粗野政策，他们从彼得前的时代追寻“古风”，构建那个和平古朴的斯拉夫世界。彼得的伟大继承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圣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俄国的法律理应具有欧洲的原则，但她的结论却是，俄罗斯就其辽阔的幅员来说，只能由专制君主来治理。^③因此，她的所谓“开明专制”，其实是用启蒙主义者的言辞掩盖俄国特殊性的实质。19世纪是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之争的世纪，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就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主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虽然后来被其他历史主题所掩盖，但其余绪一直延至今日，困扰着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20世纪是俄罗斯的革命世纪，布尔什维克超越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在帝俄的废墟上构建起苏联这个庞大的共同体^④，走出了另一条道路；但在七十年后，苏联的

①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三卷，左少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7页。克氏特意区分了“影响”与“交往”，他认为，尽管15-16世纪俄罗斯与西方有了外交和商业关系，俄罗斯借鉴了西方的教育成果，而且聘请了西欧的工匠和专业人员，但这只是“交往而非影响”；西方的影响是从17世纪开始的。

② 同上，第315页。

③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Екатерина Вторая. Наказ, данный Комиссии о сочинении проекта нового уложения. / Под ред. В.А.Томсинов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проф. У.Э.Батлер. М.:Зерцало, 2008. С.31-32 (глава I, глава II).

④ 参见张昊琦：“思想之累：东西之争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5期。

解体以及共产主义的崩塌，使俄罗斯重新陷入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选择。90年代初，俄罗斯以普遍主义原则构建起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精神根基以及转型所引发的混乱，从叶利钦时代中后期开始，俄罗斯开始回归特殊主义。而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可控民主”，尤其是2005年所宣示的“主权民主”以及后来所昭示的“新保守主义”，则是基于特殊主义的理由拒斥普遍主义。

这种特殊主义的理由，被前意识形态总管苏尔科夫在《普京的长久国家》一文中胪列出来。首先，指引国家建设之路的并非进口的幻想，而是历史的逻辑；俄罗斯庞大的政治机器由“意志绵长”者所创建，依次更迭，不断自我修复，适应现实，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确保俄罗斯世界的发展绵延。其次，俄罗斯的体制并非更加“优雅”，但更为诚实，依然具有吸引力。再次，俄罗斯拥有“深层人民”，深层人民以自己的庞大整体形成了无法战胜的文化万有引力，将国家凝聚起来，而且决定了国家的形式。最后，俄罗斯国家的现有模式始于信任，亦靠信任得以维持，这是与“传播怀疑和专事批评”的西方模式的根本区别所在。^①

苏尔科夫以跌宕的言辞和玄远的内容，将人们引入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圣谕》以及19世纪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政治世界中。将苏尔科夫的文本与《圣谕》和季霍米洛夫的《君主制国家性》^②相比对，只要将“君主制”一词划掉，其原则基本相通；而苏尔科夫所谓的“深层人民”，与乌瓦洛夫“三原则”中的“人民性”^③也并无二致。苏尔科夫的文本回避了现代政治中的概念和原则，虽言及普京缔造了“新型”俄罗斯国家，但并没有展现出“新型”国家的“新型”叙事，而只是强调俄罗斯政治的独特性和神圣性的一面。苏尔科夫将“普京的长久国家”与其前辈伊凡三世、彼得大帝和列宁所创建的国家模式相提并论，强调它们之间的内在延续性，以致一些政论家忍不住发问：“新型”国家究竟“新”在何处？苏尔科夫的特殊主义理由是历史主义的理由，而世纪之交现代性的转向和“多元现代性”的兴起似可为

① Сурков В.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 февраля 2019 года.

② Тихомиров Л.А.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М.:РОССПЭН, 2010.

③ Уваров С.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сновы Отв.ред. О.А.Плотонов. М.: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4.

俄罗斯拒斥普遍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在多元现代性迅速展开并得到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关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言说，越来越具有深入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并且日益反映在政治实践中。多元现代性的核心在于，不只有一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性，而是存在着由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状况所塑造的不同文化形式的现代性；这些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在价值体系、各种制度及其他方面将来也依然会存在着差异。^①在多元现代性的视角下，西方的现代性并不是唯一的，其普遍主义也是一种特殊主义；它也不具有先验的道德优势，并且在向全球推进的过程中还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必要的，但俄罗斯的问题是，在拒斥西方现代性的时候，如何基于本土文化构建俄罗斯的现代性。

为了解俄罗斯所坚持的特殊性，以及苏尔科夫所提出的“长久国家”及其历史逻辑，本文从俄罗斯关于国家的一个独特概念——“国家性”来进行考察。“国家性”（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是当今俄罗斯政界、学界及媒体中所习见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苏联解体以来关于新俄罗斯国家建构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俄罗斯联邦宪法》前言指出，通过宪法的目的之一，是“复兴俄罗斯主权的国家性并确认其民主基础的不可动摇性”^②。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不断重复加强和巩固俄罗斯“国家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梳理这一概念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现状，也有助于历史地理解俄罗斯现代性建构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何谓“国家性”？

“国家性”是俄国人发明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涵义多端的复杂概念。

① [德]萨赫森迈尔、理德尔、[以]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棠、王为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页。

②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constitution.ru/index.htm>. 在俄罗斯宪法中文版中，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出现了多种译法，有译为“国体”，见于洪君译：“俄罗斯联邦宪法”，《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2期；有译为“国家体制”，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有译为“国家”，见孔寒冰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俄罗斯》，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有译为“国家观念”，见徐向梅主编：《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俄罗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俄罗斯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也是径自取来，而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的定义。“国家性”虽源于“国家”，但它们是两个概念，目前学界在辨析“国家性”时，常将这两个概念进行对比，不过很多时候“国家性”作为“国家”的同义语而被广泛使用。

“国家性”（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是“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的派生词。Государство则由государь（君主）派生而来，15世纪已见诸俄文典籍^①，意为“国家”，“土地”或者“统治”，“国君的权力”^②；而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则是一个后起词，没有出现在19世纪之前的俄语词汇中^③。19世纪著名的《达利大俄罗斯语详解词典》（1863-1866年初版）也没有收录该词。当代流行的《奥热科夫详解俄语词典》对该词的释义失之过简，仅解释为“国家体制”和“国家组织”^④；大型的20卷《当代俄罗斯文学语词典》也只有两个释义：“国家制度（政体）”、“对政体或国家制度原则的忠诚度”^⑤。由此可见，“国家性”一词的历史并不久远，但通用的语言词典似乎满足不了人们深入理解其涵义的需要。

据一些学者考证，米·亚·巴枯宁首先使用“国家性”一词^⑥，他于1871年曾撰写《巴黎公社以及关于国家性的概念》^⑦一文。1873年在其所著《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国际工人协会内两党的斗争》^⑧一书中，巴枯宁用“国

①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Т.1. Вып.4/ Под ред. Н.М.Шаньский, М.: Изд.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150.

②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XI-XVII вв. Вып.4./ гл. ред. С.Г. Бархударов, М.: Наука, 1977. С.108.

③ 权威的《古俄语词典（11-14世纪）》（Словарь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XI-XIV вв.): В 10 т./ АН СССР, Ин-т рус. яз. М.: Рус. яз., 1988.）、《11-17世纪俄语词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XI-XVII вв. В 31 т. / АН СССР, Ин-т рус. яз. М.: Наука, 1975-2016.）、《18世纪俄语词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XVIII века. С 1984 г. 21 выпуск / АН СССР. Ин-т рус. яз.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84-2015）以及语源词典均不见收录。

④ Ожегов С.И, Шведова Н.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97. С.141.

⑤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Т.III / АН СССР, Ин-т рус. яз. М.: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92. С.281.

⑥ Белканов Е.А.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ня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13. №3.

⑦ Бакунин М.А. Парижская Коммуна и понятие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Бакунин М.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РОССПЭН, 2010. С.431-442.

⑧ Бакунин 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анархия: Борьба двух партий в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обществе рабочих/ Бакунин М.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РОССПЭН,

家性”来概括现存国家制度以及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革命专政，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产生专制和奴役，因此必须消灭一切国家，不论是君主国、共和国、人民国家还是红色共和国，都要把它们作为奴役人民的机构加以消灭。事实上，他还是将“国家性”等同于“国家”。

巴枯宁发明“国家性”这一概念后，同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列宁在其著作中也加以使用。不过列宁使用这个术语比较晚，而且主要集中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917年8月19日）、《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等为数不多的著作中。这可能与当时俄国国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列宁需要向广大工人群众说明：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夺取国家政权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应当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建立起什么样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将要建立起的“无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国家的特性是什么？它是否会长久存在？在这些作品中，列宁所谓的“国家性”，其涵义并没有突破巴枯宁的范围，主要还是将“国家性”与“国家”等同起来。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①，列宁谈到了“无产阶级国家”，还谈到其他形式的“国家”，并断言：“‘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这里所谓国家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制的国家。”^②

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国家性”有四种涵义：一是作为“国家”的同义词，或者是某一历史类型的国家，如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二是某一阶级的专政体系（无产阶级国家）或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联共（布）党史教程》即在此意义上用“国家性”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三是国家机构体系，即国家机器；四是体现某种共同特征的国家类型，如民族国家、民主国家。^③从这些释义来看，苏联时期学术界对“国家

2010. С.463-694. 中译本《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马骧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译本将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译为“国家制度”。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译本中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有时被译为“国家制度”，有时径译为“国家”。俄文本见 Ленин В.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Пятое издание. Т.33. М.: Изд.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9.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第79页。引文中的“国家”在俄文中均是“国家性”一词。

③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3 издание. Т.7.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2.

性”的分析主要还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法的理论，而且主要是为了考察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演进。

“国家性”概念除了在俄国和苏联得到广泛使用外，还流传到俄国境外。由于巴枯宁的书触及重大的时代主题——国际工人运动问题，几乎被翻译成所有的欧洲语言，因而“国家性”这个术语作为“国家”概念的同义词进入政治学和国家学说中，例如在英文中被译为statehood^①，在德文中被译为die Staatlichkeit。但是“国家性”概念在俄国境外的流传和再造也存在着“跨境回移”现象，出现了涵义另有所指的新的替代性概念，又重新被译为俄文中的“国家性”。例如1968年，J·内特尔在statehood一词之外引入了stateness，这个词在俄文中被回译为“国家性”（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其含义是国家实现其功能的能力。^②内特尔之后，“国家性”（stateness）概念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得到发挥，如研究政治转型和民主问题的学者胡安·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在其《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中，提出了民主转型与巩固的一个宏观自变量，即国家、民族和民主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将这个自变量称为“国家性”，并且认为，一些政治体不存在国家性问题，而对于另外一些政治体而言，国家性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民主。^③

相对于巴枯宁和列宁等工人运动理论家对“国家性”的简洁解释，以及西方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现代性理解和延伸，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在使用“国家性”一词时，则赋予了它极强的神性色彩以及它之于俄罗斯帝国的独特性。列·亚·季霍米洛夫针对俄罗斯帝国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于1905年出版了《君主制国家性》一书。他认为必须要从1861年之前的俄国历史中去考察俄罗斯的国家性以及君主制原则的发展历程，因为“君主制本质上是民族道德理想的表达，其命运与民族的历史观

C.162.

① 在俄罗斯宪法网站所提供的英文版本中，与俄文“国家性”相对应的词即是 statehood。

② J.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1968, Vol.20, No.4, pp. 559-592.

③ [美]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二章（16-39页）。这个译本将 stateness 译为“国家性”。

念或历史使命密切相关”^①；在1861年前的民族历史中，“君主制与民族共生、共存、共发展，共同经历辉煌和衰落，寻找共同复兴之路，在所有的历史任务中一直处于民族生活的首要位置”，它是“为人民所认同的真理的权力”，它的基础是最高权力与民众之间的隐秘的心理联系。因此，即使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俄罗斯发生的“一切社会、种族和观念上的斗争，不仅不会废除专制制度，相反仍然需要它”。^②在季霍米洛夫看来，俄罗斯的“国家性”是与君主制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即使未来改行议会制，但俄罗斯人的精神特征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君主主义者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既不承认贵族政治，也不认可民主制。^③从季霍米洛夫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所谓的俄罗斯的“国家性”类似于日本政治思想史中的“国体”。日本思想家企图以“国体”来论证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地位与明治宪制中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国体”指的是天皇的神圣性和日本国作为“神国”的特殊性。^④而俄罗斯独有的“神圣罗斯”观念以及君主世袭结构，早已在俄国史学家卡拉姆津那里得到历史叙述，并在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教育部长乌瓦洛夫的“专制制度-东正教-人民性”三位一体结构中得到论证。1905年8月6日的《国家杜马召开宣言》开宗明义地强调，“俄罗斯国家是在沙皇和人民、人民和沙皇密不可分的联合中建立和成熟起来的”，“沙皇和人民的联合是在几个世纪中创造俄罗斯的伟大的道德力量”^⑤。因此，沙皇的权力并不受国家杜马的制约，而杜马成员的誓词中也有如是表达：“我们——卑微的子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发誓，竭尽心力履行国家杜马成员的义务，尽忠于全俄罗斯专制君主和皇帝陛下。”^⑥这表明，在推行代议制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国家性”仍然需要得到保证。

如果说巴枯宁和列宁所使用的“国家性”是一个与“国家”相当的通行

① Тихомиров Л.А.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М.: РОССПЭН, 2010. С.389.

② Там же. С.390, 393, 408.

③ Там же. С.424.

④ 参见尹钰：《第一共和的诞生》（未刊稿），转引自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8页；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⑤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обр. III. Т. XXV. Отд-ние 1-е. СПб., 1908. Ст. 26656. С.637.

⑥ Тихомиров Л.А.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С.431.

性概念，不仅可用于俄国，也可以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国家的话，那么季霍米洛夫以及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国家性”概念则集中于解释俄罗斯国家的独特性，因此可以称之为俄罗斯的传统“国家性”。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如何对一般“国家性”以及俄罗斯“国家性”的发展进行理论解释和评估是俄罗斯学界面临的问题^①，事实上这项研究也在各个维度上得到展开。一方面，它在沿袭苏联时期官方解释的同时又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它在法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各个视野下得到了考察和运用。^②但是，俄罗斯学者承认，目前对这一术语还没有一致的清

① Венгеров А.Б.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8. 1997. №.1.

②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关“国家性”的著述层出不穷，包括专著、教材、论文、学位论文以及公开报告，如 Четкое 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как атрибут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кризис, угасание или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3. №.1; Бачило И.Л. Факторы, влияющие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1993. №.7;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т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 / В. Бакштановский, Г. Бурбулис и др. М.: УРСС, 1996; Ильин В.В, Ахиезер А.С.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стоки, традици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1997; Венгеров А.Б.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8. 1997. №.1; Морозова Л.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дис. ...д-ра юрид. наук. М., 1998; Кириллов А.Д.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нов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8. №.2; Величко В.М. Философия рус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СПб.: Изд-во Юрид. ин-та, 2001; Рябинин Н.А.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 дис. ...канд. юрид. наук.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1; Лукьянова Е.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пециф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2. 2002. №.1; Краснов Ю.К.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генезис и эволюция институтов власти, проблем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дис. ... д-ра юрид. наук. М., 2002; Раянов Ф.М.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учеб. курс. М.: Пра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2003; Затонский В.А. Эффективн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М.: «Юрист», 2006; Винниченко О.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в контекст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Тюмень: Изд-во Тюмен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2007; Бондар А. Тради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Власть. 2008. №.10; Тимофеева А.А.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М.: Флинта. 2009; Лубский Р.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систем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2011. №.4; Шабуров А.С.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проблемы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Вестник сиби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права, экономики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2012. №.1; Его ж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проблемы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13. №.1. Карсканова С.В. Основ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х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ых учениях XIX-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晰定义。^①在苏联时期以及当代的法学理论中，作为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国家性”经常与“国家”等同，一些学者认为，国家概念的运用已经是歧义横生，“国家性”概念不应等同于“国家”概念。^②苏联时期，学者们更为经常使用的是“国家”，苏联时期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在静态和平面上发展的，往往是分析一定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形式、机制和功能。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国家不论作为一种现象还是作为某些研究对象的具体国家，都应该在发展中考察，在由一种类型和形式向其他类型和形式的演进或革命性转变中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内在原因和动力，因此需要将其纳入“国家性”这个更为宽泛、更富包容性、更有方法论意义的概念框架中；而“国家性”学说既可丰富国家和法的理论，也能丰富其历史，并将其提升到新的科学理论水平。^③

当代俄罗斯学者对“国家性”一词的诠释角度不同，因而对其涵义的理解也自然不同。有人将目前学界对“国家性”的理解路径归纳为三类：一是功能性的（国家履行自身功能的有效程度），二是心理性的（人民对国家的接受程度），三是国家主义的（“国家性”实际上与“国家”吻合，或者说它囊括了与之相关的所有社会现象）。^④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的“国家性”应从行政区划、民族种族和文化等三个相互结合的视角进行综合考察，以建立一个通用的规范性解释。^⑤

尽管目前俄罗斯学者对“国家性”尤其是俄罗斯“国家性”的解释存有差异，但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共性之处。首先，在界定“国家性”概念的时

дис. ... канд. юрид. наук. Белгород, 2014. 近年来，俄罗斯还出现了一批以“国家性”冠名的辞典和工具书，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 в 7 книгах. М.: Наука, 1996-2016; Андреев 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терминах. IX -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М.: Крафт, 2001;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справочник в 3 томах / Б.Г. Пашков. М.: Книжный союз, 2009.

① Тимофеева А.А.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С.7.

② Венгеров А.Б.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③ Шабуров А.С.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вопросы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Известия Ирку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2012. №.3.

④ Белканов Е.А.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ня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⑤ Лубский Р.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систем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候，必须确定“国家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除了将“国家性”与“国家”相等同的观点之外，一些学者认为，“国家”与“国家性”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①，“国家”只是“国家性”各结构要素中的中心环节^②。其次，“国家性”与社会密不可分，同时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学者们强调，国家性是社会的国家组织方式，包括动态发展的所有国家法现象，因此可以被视为国家与社会合而为一的质性状态，应该在动态过程中进行考察^③；“国家性”可以简明地表述为“国家解决俄罗斯社会发展中历史积累问题的方法”^④。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国家性”具有历史延续性，“延续性是俄罗斯‘国家性’发展的主要规律”^⑤，保证社会和国家发展进程延续性的历史主义“直接影响到‘国家性’的组织方式”^⑥。要想系统地考察国家的演进，必须将其置于“国家性”范畴——“这是政治系统的牢固的制度基础，它保障多样性和动态性政治的结构统一和完整”^⑦，因为“国家性”是相对稳定的，而“国家”是变化的，有时经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例如权力的组织方式、性质和内容的改变；“国家性”是永恒的背景，而“国家”却是充满活力的，国家性直接影响到国家制度的功能、法律规范，等等。^⑧学者们强调，虽然“国家性”是动态演进的，但它具有一些“常量”，这些常量既包括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制度型模”（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матрица）^⑨，同时也包括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等深层结构因素。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国家性”的生成和发展取决于俄罗斯的传统特性和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如聚合性、集体主义、家长制、爱国主义、强国主义和东正教等等。^⑩

当代俄罗斯学者关于国家性的辨析虽然芜杂而繁琐，但是不论从历史语

① Краснов Ю.К.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генезис и эволюция институтов власти, проблем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С.316.

② Морозова Л.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С.29.

③ Лукьянова Е.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пециф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④ Венгеров А.Б.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⑤ Рябинин Н.А.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С.6.

⑥ Бачило И.Л. Факторы, влияющие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⑦ Ильин М.В. Слова и смыслы...С. 187.

⑧ Андреева Ю.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осмысление понятия. С.176-178.

⑨ Кирдина С.Г.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матрицы: макро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ая гипотеза//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1. №2.

⑩ Те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6. С.187.

境还是立足于现实分析俄罗斯的“国家性”，其目的在于界定传统“国家性”和构建现代“国家性”。他们也认识到从传统“国家性”转向现代“国家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俄罗斯处于后全能主义“国家性”的过渡状态，将现代“国家性”的构建甚至视为“国家存在的文明基础的全面转型”^①，而不仅仅限于政治改革和国家权力的重构。而且，由于“国家性”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和继承性，现代“国家性”的构建受制于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传统。^②

俄罗斯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而非以权利为中心的国家，这也是19世纪俄罗斯国家学派阐释俄国特殊性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国家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动力，它有别于西欧社会自然发展的模式。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诸多基本要素直接发源于中世纪，西方现代国家权力观念亦发轫于中世纪，这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③然而，同样经历了中世纪的俄罗斯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而是任由其特殊的“国家性”决定了其后来的历史发展道路。事实上，“国家性”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俄罗斯的“正统性”，它是服务于最高权力的特殊安排、特殊的合法化机制，以及法律体系再造的典型手段。^④它既源于一些政治制度的历史架构，更源于其以价值和理念为核心的精神结构的塑造与恒常维持。有鉴于此，本文在探讨俄罗斯的“国家性”时排除了一般意义上与“国家”概念通行的涵义，而着力于其传统的特殊性涵义，即根据俄罗斯的历史语境，将俄罗斯的“国家性”视为一个由“深层权力结构”、王朝世袭正统性以及神圣性的意识形态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通过对这个结构的考察，意在揭示俄罗斯在由传统“国家性”转向现代“国家性”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① Веденеев Ю.А.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переход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развит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1995. № 1; Он же.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прав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гражда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1997. № 2.

② См.: Синюков В.Н. О форме федер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1993. № 5; Веденеев Ю.А.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переход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развит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③ 参见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李筠：《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现代国家权力观念的中世纪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④ Богданов А.Н. Эволюционные формы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ой анализ: дис. ... канд. юрид. наук.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2005. С.5.

二、作为深层权力结构的“国家性”

俄罗斯是一个专制主义渊源深厚的国家，国家至上的原则一直延续至今。历史学家在探讨国家作为历史发展动力源头的时候，往往强调俄罗斯幅员的辽阔、人力资源的不足、技术的落后、私有观念的缺乏，等等，因而需要有一个强力的国家来进行统合，以维持秩序。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也如是强调国家在俄罗斯社会的作用。^①所有这些，可以说是俄国专制主义来源的外部原因。然而历史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俄罗斯早期的历史中，基辅罗斯时期与其说是一个君主制国家^②，不如说是一个贵族共和国或商业共和国。^③虽然它与当时的西欧存在一些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因此在探讨专制主义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外部原因，更重要的是它的内部原因。而在探讨内部原因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往往聚焦于莫斯科公国以及绝对主义的形成和此后的演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纷呈，争论不休。^④一些历史的乐观主义者，如当代历史学家鲍·米罗诺夫从法制演进的角度将俄国的政体演变划分为：17世纪的人民君主制、18世纪的贵族世袭专制、19世纪的合法君主制和泛等级合法君主制、1906-1917年的二元法制君主制^⑤，并且认为俄罗斯通往法治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本来可以按照历史的自然规律演进，但是十月革命中断了这一进程。^⑥

从政体以及国家形式演变的角度来探讨国家权力结构以及专制主义的嬗变，对于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以及政治发展的研究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俄国专制主义结构这种“万世一体”的绵延特性。这种结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 декабря 1999 года.

② [俄]奇斯佳科夫主编：《俄罗斯国家与法的历史》（上卷），徐晓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③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ве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М.: РОССПЭН, 2006. С.75.

④ 关于绝对主义的起源、成熟以及其划分等，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参见周厚琴：《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与形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⑤ [俄]鲍·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册），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九章。

⑥ 同上，第174页。

构我们姑且称之为“权力的深层结构”。它具有很强的自适性，往往在历史的过渡性或关键性时刻，扭转历史的进程，使历史按照它原本的轨道发展。这并不是“例外状态”，而是在俄国历史中经常出现的状态。例如，由于留里克王朝绝嗣而导致的“混乱年代”延续了15年，外来势力的干涉以及两度僭主的短暂统治并没有改变此前莫斯科国家的发展惯性，米哈伊尔沙皇即使是由极具广泛代表性的缙绅会议推举出来的，他所拥有的专制权力较之以往有所削弱，但权力的专制属性没有本质的改变，而且到彼得大帝时期发展到顶峰。1917年的革命埋葬了沙皇专制政府，但是随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重新延续了集权和专制的道路。苏联解体为俄罗斯的政治转型铺平了道路，但最后仍然走向威权主义，而普京通过一系列举措有力地恢复了这种传统的深层权力。理查德·萨克瓦通过一个“双态模型”来解释当前俄罗斯政治运行的制度特点，这个“双态”，一是宪政，一是处于规范之外的行政制度。宪政赋予了当代自由民主国家的规范价值观，政治的民主运行由政党、议会和代议制构成，受到选举法和相关法律的制约；而处于规范之外的行政制度则具有很强的调适性和随意性。^①其实这种处于规范之外的行政制度正是“深层权力”运行的结果，它可以根据时势的需要，自由地越诸宪政的框架之上，从而造成国家权力的重心不在议会而在总统办公厅的现象。因此，仅仅以国家形式或者政体来判断俄罗斯的政治运行是不够的，还需要历史地探讨这种深层权力的生成。

俄罗斯学界喜用“最高权力”这一概念，但是在基辅罗斯时期，代表“最高权力”的大公或王公并不拥有无限的权力，其权力的使用受到严重的制约。英国政治历史学家芬纳在分析国家政体时采用了一个统贯性框架，以隐喻的方式提出四种政治力量——宫廷、教会、贵族和论坛——决定了政治的性质，宫廷指专制政治，教会指神权政治，贵族指精英政治，论坛指大众政治。这四种政治力量的结合又派生出其他形式。^②在基辅罗斯，相应的四种力量形成了一个政治运行的权力结构，即王公—贵族—教会—谓彻。利哈乔夫根据16-17世纪文献中的屡次提法，即“伟大的国君提出，大贵族们做出决定”

① Richard Sakwa, *The Dual State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2010, Vol.26, No.3.

② [英]芬纳：《统治史》，马百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或“伟大的国君提出，而大贵族们没有做出决定”，得出“大公的权力是相对的”这个结论。^①他还指出，古罗斯的王公每天一早就与由军人及平民组成的亲兵开会，经常召开王公“大会”；诺夫哥罗德、基辅、普斯科夫以及其他城市的人民参加谓彻；市政会议和宗教会议在莫斯科罗斯有着巨大作用。^②这说明，罗斯的各个城市虽然并不一样，四种力量有强有弱，各有侧重，但它们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一个总体性的平衡框架，保证了政治运作没有滑向王公一家独大的极化局面。

12 世纪初，统一的基辅罗斯国家开始分裂成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国，在这些国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公国和两个共和国，即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加利奇-沃伦公国、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和普斯科夫共和国，它们分别代表了东北罗斯、西南罗斯和西北罗斯。从权力运行的特点看，虽然它们各有差异，但共同点仍然居多。在加利奇-沃伦公国的权力结构中，大贵族的作用比较突出。基辅衰落之后，加利奇-沃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东西贸易的中心，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邻国波兰和匈牙利的影响，贵族力量的崛起也与这两个国家地主阶级的发展类似。贵族常常自称拥有延请和废除王公的特权，而王权与之相比则是一种“姗姗来迟的、更表面的且受到严重制约的现象”^③。在西北罗斯，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是典型的商业共和国。诺夫哥罗德处于“瓦希之路”的水运线上，是罗斯通向欧洲的门户，商贸发达。在诺夫哥罗德的权力结构中，贵族和商人结成联盟，共同限制和反对王权，而作为市民大会的谓彻在其中作用突出。王公可能因不受欢迎而被市民驱逐，基辅大公派来的王公可能一开始就被拒绝，这样的情况在诺夫哥罗德经常发生。1102 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波尔克安排儿子到诺夫哥罗德当王公，诺夫哥罗德派使者来到基辅，阻止了大公的任命。^④从 1126 年起，谓彻自行选举市政官，王公的权力形同虚设。1136 年诺夫哥罗德人起义后，谓彻不

① [俄]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上），杨晖、王大伟译，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年，第 30 页。

② 同上，第 29 页。

③ [美]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焯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82-83 页。

④ [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朱寰、胡敦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00-201 页。

仅选举市政官，还选举千人长和主教等重要职务，而王公只限于战时统帅军队。相比于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的王权受限更多，谓彻的作用更大。东北罗斯的情况与上述两者有些不同，王公在权力结构中地位明显突出。1157年北方王公安德烈·鲍戈柳勃斯基成为基辅大公，但他违背传统拒不前往基辅就职，后来又将首都迁至苏兹达里城郊的弗拉基米尔，企图建立不受限制的专制政权，但他没有成功，被阴谋刺杀。安德烈的弟弟大窝弗谢沃洛德被奉为王公后，打击贵族，加强王权，但是13世纪上半叶，弗拉基米尔公国分裂为许多小公国，各自为政，相互倾轧。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尽管罗斯各个地区情况不一，但是权力结构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的平衡。除了政治实践外，俄罗斯早期的政治思想家也阐发了与这种权力结构和组织相适应的观点。例如，伊拉里昂虽然将作为最高权力的大公视为上帝的意志，但他明显倾心于君主制中的咨议方式，规劝大公根据这项原则安排权力。与他同样，《往年纪事》的作者推崇最高权力组织中的咨询原则，强调大公不应独自决断，而应召集侍从进行商讨。大公莫诺马赫在其《训诫书》等著作中阐述大公权力的范围及其组织形式、基督型国君的道德特点以及其与治下居民和王公的关系，同样强调咨议方式。丹尼尔·扎托奇尼克在历史上首次提出建立“杜马”——大公委员会的问题。

基辅罗斯时期的权力结构最终被鞑靼蒙古人彻底摧毁，“深层权力结构”由此逐渐生成。苏联历史学家格列科夫认为，“不研究俄罗斯人民曾与之进行英勇斗争的金帐汗国，就不能理解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①关于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和作用，历来观点不一^②。20世纪初兴起的欧亚主义将蒙古人的统治视为一支正脉，强调俄罗斯对蒙古人的继承性，以此论证它在欧亚大陆统治的历史合法性。随着全球史的兴起，蒙元研究成为一门显学，也大都将蒙古人的征服视为全球史的开端^③。蒙古人“文治不输武功”的观

① [苏]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6页。

② 关于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历来观点不一，可参见孙嵩霞：“蒙古统治俄罗斯历史新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3期。

③ 例如，[日]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美]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马晓林、求芝蓉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等。

点也时常见诸史论，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在蒙古的统治之下，罗斯的文化发展神速”，征税制度、户籍制度、行政机关，以及军事编制和战术等都采用蒙古模式；蒙古式道路是“一条最伟大的商路”，“促进了知识、观念和技术穿越长距离的大规模传播”，培育了经济扩张，等等^①。但是，被称为“鞑鞑桎梏”的两个多世纪的蒙古统治，对俄罗斯国家影响至为深远的一面是在政治方面。

蒙古人的征服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不在于八思哈制度的推行，也不在于对俄罗斯的严厉控制和榨取，最为根本之处在于其塑造了权力的“暴力模式”，并且以此模式驯服罗斯王公，摧毁了此前的政治权力结构，从而形成了俄罗斯“奴化”的政治心理。论者通常认为，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最突出、也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没有“法律制约性”，由于没有封建制度，也就没能将契约性引入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中。^②这种“法律制约性”以及“契约性”在“暴力模式”下更不可能得以建立。在蒙古人到来前，东北罗斯的“暴力模式”虽然开始显现，但实力基础限制了它的全面展开，而且政治文化和心理结构也没有彻底改变，依然存留着基辅罗斯古制的影响。12世纪，弗拉基米尔大公安德烈·鲍戈柳勃斯基曾经企图改变俄罗斯的国家政治制度，通过“暴力模式”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但他还缺乏展开“暴力模式”的实力，结果被阴谋杀害。大窝弗谢沃洛德较其兄更进一步，完全置以前的顺序制于不顾，以武力兼并其他公国的领地，例如在梁赞市民不同意其子做梁赞王公的情况下，下令焚毁梁赞，并将其领土归入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但是这种情况还没有全面铺开。只有在蒙古人征服俄罗斯之后，“暴力模式”才得以全面展开。

蒙古人在征服俄罗斯之后并没有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罗斯王公实行间接统治。分裂割据的罗斯虽然有利于蒙古人的征服，但并不有利于蒙古人的统治，所以蒙古人通过册封大公的方式在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相对集中的政权以维护秩序，为汗国征集贡品，要求各王公服从大公的领导。这种服从是

① [美]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6-100页。

② [英]芬纳：《统治史》（第三卷），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5页。

以“暴力模式”作为基础的，而且蒙古人为这种模式的实施提供了实力基础。1245年切尔尼戈夫王公米哈伊尔因不屈服于弗拉基米尔大公，被拔都杀害于汗国的首都萨莱。作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后来被尊奉为俄罗斯民族英雄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借助蒙古军队残酷镇压了所有反抗蒙古人掠夺的民众。这种“暴力模式”对基辅罗斯的政治结构也是致命的。因为民众都会反对蒙古人的榨取，表达民意的谓彻等机制自然不利于蒙古人的统治，所以废除这些机制不仅合乎此前王公集中权力的需要，也合乎汗国的利益。到13世纪下半叶，除了西北罗斯如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之外，其他地方的谓彻基本上被荡平。除了谓彻之外，教会的权力也被归附于王公之下。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拒绝君士坦丁堡派来的全俄都主教基普里安，因为他需要的是臣服于他的都主教。至于贵族，也失去了原来的“王公-亲兵”性质，而变成了“君主-臣仆”关系。在“暴力模式”的推进过程中，为了独占统治权力，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被启动，最奴颜婢膝和最专制暴虐的王公成为力量最强的王公^①，“在这场卑鄙无耻的角逐中，莫斯科这一支最终赢得了这次竞赛”^②。

关于蒙古人统治之后俄罗斯的发展道路，论者常认为存在两种模式，即莫斯科模式和诺夫哥罗德模式的竞争；如果诺夫哥罗德模式获得主导地位，则俄罗斯有可能走上民主发展的道路。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在历史中是无法实现的。经历了蒙古人的统治之后，“暴力模式”已经得到强化，而且在此过程中积蓄了应有的实力和资源，这是诺夫哥罗德模式所无法具备的。

蒙古人的“暴力模式”为俄罗斯塑造了一种“深层权力结构”，这种结构可以通过俄罗斯政治学家皮沃瓦洛夫等人构建的“俄罗斯系统”^③得到深入理解。这个系统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权力（大写的权力）。二是“居民”，

① [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蒋琳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②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4卷，第310页。

③ Пивоваров Ю.С., Фурсов А.И. «Рус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как попытка поним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с. 2001. №4; Пивоваров Ю.С.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е русской власт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идеи, концепции, методы (под общ. ред. О.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ой).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5.

指的是历史上具有主体特征但后来失去了主体特征的居民，其主体性在权力的正常运作中是被否定的。三是“多余的人”，他们可以是个体，如19世纪-20世纪初的部分贵族，也可以是集体，如17世纪的哥萨克；他们没有被权力“磨碎”，因此既没有成为权力的有机体，也从“居民”中“滑落”出来，成为边缘角色。这个系统决定了三者的互动模式中，权力是唯一的主体，它的原则就是：权力就是一切，居民微不足道。“暴力模式”最充分地体现在彼得大帝时期，这也是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绝对主义在俄国定型的时期。彼得在1716年颁布的《陆军条例》中规定：“陛下乃至高无上的君主，其行为无需对世上任何人负责。作为一位基督教国王，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判断治理国家。”^①事实上，作为最高权力的沙皇成为唯一的主体，确实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约束：贵族地主匍匐在沙皇的脚下；教会失去独立性，接受官僚机构的管理；城市的力量无足轻重；人民起义被强力镇压，从来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②在“暴力模式”基础上形成的“深层权力结构”，它不仅是在以合法化的国家暴力下采取强制性措施，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心理和社会意识中强化“秩序”和“铁腕”观念，这种观念在蒙古人之后逐渐内化为俄罗斯的民族心理。尽管俄国历史上作为“最高权力”的君主，其资质、能力、性格各有不同，其拥有的实质权力也不尽相同，而且时有更迭，但在俄罗斯的历史长河中，这可能并不重要。在民众呼唤“铁腕”和“强人”的情况下，“庸君”之后自有“明君”！

三、作为正统性的“国家性”

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面向外部文化，学习和借鉴外部文化。可以说，俄罗斯自身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外部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① 转引自[英]芬纳：《统治史》（第三卷），第383页。

^②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309—310页。

俄罗斯特色文化的生成。^①而构成“国家性”的正统性亦源自外部。其一，作为国家存在，20世纪初期之前俄罗斯的千年历史，经历了留里克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这两个王朝的延续有其相承性。^②君主制王朝的基础在于它是世袭的，因此世袭的正统性是王朝延续的理由。对于俄罗斯来说，国家的起源问题一直纠缠至今，但是一开始主要的关注点不是“怎样”建立国家，也不是建立了“什么样”的国家，而是“谁”建立了俄罗斯国家。其二，构成俄罗斯国家的神性因素毫无疑问地来自拜占庭，东正教的引入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特质，也决定了国家的内在性格和外在气质。作为教会和国家权力象征的“牧首”和“沙皇”称号均来自拜占庭，它们在进入俄罗斯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装”，为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论及俄罗斯国家的起源，毫无疑问应回到典籍的记载中。古罗斯留下的第一部编年史《往年纪事》，开篇即提出俄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罗斯人源自何处，是谁成为基辅第一任王公，而罗斯国家又是如何产生的。”^③事实上，《往年纪事》讲述的主要是“谁”建立了古罗斯国家的问题，至于“怎样”建立的，建立的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则不是它关心的问题。因为在“邀请瓦兰人”之前，当时的波利安人、德列夫利安人、克里维奇人、伊尔门湖的斯洛文人以及德烈戈维奇人等，都各有自己的“公国”；关于波利安人，编年史家还记载了基辅建城王公基伊三兄弟的传说。^④

围绕俄罗斯国家起源问题，针锋相对的诺曼论和反诺曼论相互攻讦^⑤，自18世纪中期至今仍无定论。简而言之，这是个“南北问题”：诺曼论者认为，俄罗斯国家是来自北方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兰人建立的，中心是诺夫哥罗

① Успенский Б.А. Царь и патриарх: харизма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изанти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и ее русское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8. С.5.

② 1598年沙皇费奥多尔去世，留里克王朝因绝嗣而终结，从而引发了十五年的国家动荡（“混乱年代”），最后由缙绅会议选举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开启了罗曼诺夫王朝。米哈伊尔虽非正系，推举他上位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伊凡四世的皇后阿纳斯塔西娅是他的姑祖母，他以外戚身份勉强接续了留里克王朝的血脉。此后罗曼诺夫王朝亦多次出现类似的情况。

③ [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第3页。

④ 同上，第7-9页。

⑤ 可参见曹维安：“俄国史学界关于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争论”，《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周通：“浅析诺曼观点与诺曼理论”，《兰州学刊》，2018年第11期。

德及其附近地区（公元 862 年留里克就任诺夫哥罗德王公）。而反诺曼论者认为是来自第聂伯河流域中部的斯拉夫部落的“罗斯人”建立的，中心是基辅及其附近地区；所谓的瓦兰人并非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而是斯拉夫人的分支。诺曼论的系统论证者是德国学者拜耶，其后得到了米勒和施略策尔的进一步论述和发扬。在俄国历史学家中，卡拉姆津、索洛维约夫、波戈金、克柳切夫斯基、沙赫玛托夫等大批职业历史学家赞同诺曼论。反诺曼论的奠基人是罗蒙诺索夫，其追随者也人数众多，如科斯托马洛夫、伊洛瓦伊斯基、格杰奥诺夫等。

关于俄罗斯国家起源的争论，与其说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数个世纪前的编年史上的几行文字，竟然成了民族和政治的斗争武器，主要源于当时的政治现实。安娜女皇统治时期（1730-1740）是俄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①。她由远嫁的德国返国执政，不相信俄罗斯人，所以大量启用德国人，形成了所谓的“比隆恶政”。安娜女皇之后，一直居住在俄国的伊丽莎白女皇通过政变上台，国内爱国主义热情大增。罗蒙诺索夫在与米勒辩论时指责诺曼论有失俄国“体面”，因此克柳切夫斯基说，罗蒙诺索夫对米勒的驳斥只是“出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②。后来两派之争的民族主义因素有所减弱。19 世纪的诺曼论与反诺曼论之争，其实是俄罗斯两大君主派别的争论，反诺曼论者伊洛瓦伊斯基与诺曼论者卡拉姆津相比，其君主主义色彩一点都不弱。因此如当今学者所言，诺曼论“与其说是在解释罗斯国家的起源，不如说是在解释罗斯王公王朝的起源；如果留里克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那么应邀来到罗斯可以看作是对当时罗斯社会王公权力的现实需要的回答”^③。这种需要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尤其如此。

18 世纪参与争论的许多历史学家大都求诸语源学和系谱学材料，马卡里都主教于 1560-1563 年主持修撰的《皇室系谱》^④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文献。《皇室系谱》以留里克为罗斯王公第一人，按世系一直修至伊凡四世，有着

①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四卷），张咏白、郝建恒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289 页。

②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О.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7. Специальные курсы. М.: Мысль, 1989. С.194.

③ Орлов А.С.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М.: Проспект, 2011. С.28.

④ ПСРЛ. Том 21, 22. Книга Степенная царского родословия. С.-Петербург, 1908, 1913.

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16世纪中期是莫斯科国家发生巨变之时，在“合并”俄罗斯土地的过程中，莫斯科的统治者急需为国家寻找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寻找历史的、甚至神学的根据来肯定自己的力量”，因此“用新的称号和礼仪为自己的政权装潢门面，用系谱和传说来阐述自己的过去”^①。1563年伊凡雷帝的大臣同波兰使节会谈，为了给伊凡的沙皇称号寻找根据，援引的即是留里克系谱。留里克一系的正统性一直延续至罗曼诺夫王朝的终结。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沙皇政府历来以诺曼论为正统，出身德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也非常重视《皇室系谱》，以虔敬之心将其奉为权威史料。^②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直接介入此事。1852年8月，根据人民教育部长呈递的报告，尼古拉一世正式将瓦兰人留里克“应邀”建国的862年定为俄罗斯国家生活的开端，并将这一日期置于权力象征的神圣地位。8月21日签署命令，要求所有教育机构严格遵守。^③1862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举行俄罗斯千年庆典，并为庆典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他亲自参与了庆典仪式的制定以及“俄罗斯千年”纪念碑方案的讨论。“俄罗斯千年”适逢“大改革”时代，亚历山大二世赋予了庆典以新权力战略的象征性意义——既延续了其父亲的专制政治神话，又对这个政治神话进行现代化重构。^④虽然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终结，次年沙皇一家被害，但是80年后，新俄罗斯隆重安葬沙皇，确定其历史地位；普京执政后也对杀害沙皇全家的行为进行了严厉谴责。^⑤

在述及正统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几乎所有大型的暴动或起义都是在“正统性”的旗帜下发动的。“混乱时期”的僭主格里高利以伊凡雷帝被杀的幼子德米特里为名而登上皇位，史称伪德米特里一世；在他死后又出现了伪德米特里二世。斯捷潘·拉辛起义时表明不是为了对抗皇室，而是反对波雅尔和贵族，并宣称早已死去的皇太子阿列

①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四卷），第126页。

② Сиренов А.В. Степенная книга и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XVI-XVIII вв. М.; СПб.: Альянс-Архео, 2010. С.508.

③ ЖМНП. 1852. №11.

④ Ольга Майорова. Бессмертный Рюрик: празднование Тысячелетия России в 1862 г.//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0. №43.

⑤ Эксперты объяснили почему Путин боится и ненавидит Ленина. <https://ghall.com.ua/2016/01/27/>

克谢和被废黜的尼康牧首就在自己的队伍中。普加乔夫冒充彼得三世发动起义，为了表明他是真正的沙皇，他不仅展示沙皇的标志，还编造了自己死里逃生、隐姓埋名的故事。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冒充彼得三世者达二十余人^①。对于这种现象，俄国保守主义者列昂季耶夫说，“以僭称沙皇发动的暴乱适足以证明我们世袭沙皇制的特殊生命力和力量”，“暴动者的心灵中也蕴含着深刻的保守思想”。^②

如果说，以留里克率瓦兰人入主俄罗斯大地并建立国家的诺曼论为俄罗斯的王朝世袭、君主统治提供了正统性的话，那么基督教从拜占庭的引入则赋予了俄罗斯国家及君主统治以绵延的“神圣性”。利哈乔夫认为，如果不算俄罗斯本身的民间和多神教文化，那么斯堪的纳维亚和拜占庭这两股完全不同的影响越过东欧平原多民族的辽阔地域而来，在创造罗斯文化方面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是南方和北方，而不是东方和西方，是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而不是亚洲和欧洲；斯堪的纳维亚赋予罗斯以军队亲兵结构，拜占庭文化则赋予罗斯以基督教宗教性质。^③

988年弗拉基米尔在基辅强迫民众受洗，皈依基督教，是为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罗斯受洗”在编年史中是一个一次性事件，实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公元9世纪，基督教开始在基辅罗斯渗透。在伊戈尔大公时期，不少上层贵族开始信仰基督教，伊戈尔之妻奥尔加劝其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皈依基督教，但她的基督教信仰还受到儿子的嘲笑。编年史家将罗斯接受基督教看成是神意青睐罗斯，是弗拉基米尔“洞悉”神意的结果，而苏联史学家则批评前辈史家不求内因，只从外部找根据，认为接受基督教是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深刻变化。在格列科夫看来，古罗斯国家的阶级历史和封建化过程，为承认基督教的国家宗教地位奠定了基础，基督教是阶级宗教，而多神教则是氏族宗教。^④

基督教传入俄罗斯并成为国家宗教，与当时罗斯同拜占庭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记载，从9世纪初开始，东斯拉夫人就不断地进攻拜占庭。

① 转引自孙成木等：《俄国通史简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6页。

② Леонтьев К.Н. Восток, Россия и славянство. Том 1. Москва, 1885. С.101.

③ [俄]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上），第32-33页。

④ Греков Б.Д.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3. С.476-478.

860 年罗斯人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罗斯和拜占庭签订了第一个条约。^①此后罗斯数度远征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庭签订了一系列条约：944 年条约（伊戈尔王公）、959-961 年条约（奥尔加）、971 年条约（斯维亚托斯拉夫）、987-988 年条约（弗拉基米尔）。1043 年智者雅罗斯拉夫最后一次远征君士坦丁堡，这也是罗斯对拜占庭的最后一次进攻。俄罗斯与拜占庭的军事冲突主要因为贸易、克里米亚领地等问题而引起，在一些俄罗斯史家看来，宗教和意识形态也是主要的原因。1043 年的远征是罗斯企图摆脱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领导、追求俄罗斯教会独立性而引发的，但是这个目标由于远征的失败而没有实现。^②利哈乔夫则进一步认为，拜占庭的意识形态政策使 11 世纪上半叶的罗斯存在失去主权、成为拜占庭一个省份的危险，1043 年远征是罗斯争取政治独立的高峰。^③这些论点有可能夸大其词，一者智者雅罗斯拉夫作为一个强势君主，不可能容忍自己的权力受到外来力量的侵蚀，二是君士坦丁堡教会任命的都主教即使是拜占庭的代理人，当时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在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宗教和意识形态问题越来越突出，俄罗斯开始通过基督教思考自己的定位问题。

1051 年，智者雅罗斯拉夫在没有获得君士坦丁堡同意的情况下，任命罗斯人伊拉里昂为基辅都主教，而伊拉里昂在其著名的布道词《论律法与神恩》中，也显示了与拜占庭在意识形态上分庭抗礼的倾向。伊拉里昂首先宣示俄罗斯也是一个“神选的民族”：“信仰漫向各个民族，也来到了我们俄罗斯大地”^④；罗斯受洗意味着俄罗斯被纳入到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后来的《往年纪事》，以《圣经·创世纪》大洪水之后的地理分布着手，逐渐聚焦斯拉夫民族的足迹以及罗斯国家的起源，显然也是将俄罗斯民族视为“神选”的民族。其次，伊拉里昂圣化将基督教引入罗斯大地的

① 这个条约没有流传下来，但是 911 年 9 月 2 日奥列格王公与拜占庭帝国签订的条约提到了这个条约的存在。Будовниц И.У.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XI-XIV вв.). М, 1960. С.65.

② Приселков М.Д. Очерки церков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X-XII вв.. СПб., 1913. С.91-92.

③ Лихачев Д.С. Рус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 и их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М.-Л., 1947. С.44.

④ Митрополит Иларий. 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1.С.37.

弗拉基米尔，不仅强调圣弗拉基米尔不受任何人指示、不受任何人教导，完全独立地“选择了基督”，而且还将弗拉基米尔与君士坦丁大帝、将弗拉基米尔的祖母奥尔加与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叶莲娜置于同一高度。^①利哈乔夫在解读伊拉里昂时认为，伊拉里昂的各民族平等的学说是与拜占庭的普世教会和普世帝国理论相对立的，各个民族在神恩的普照下将共同归依于基督的世界中。^②最后，伊拉里昂宣示弗拉基米尔是“自己国家的专制君主”^③，罗斯的历史并不始于受洗，罗斯之前的历史并非默默无闻。从伊拉里昂的论证中可以看到，基辅罗斯数度远征君士坦丁堡，即使不将拜占庭视为政治独立的威胁，也有一种强烈的反拜占庭倾向，因此《论律法与神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针对拜占庭的意识形态宣言。^④

此外，伊拉里昂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最高权力的来源、本质、组织和目的等问题。他认为上帝的意志是最高权力的来源（君权神授），把因世袭而获得全权的大公称为“天国的参与者和继承人”。弗拉基米尔“出身尊荣”，而雅罗斯拉夫则是“弗拉基米尔的全权代理人”。出身尊荣的人从幼时开始即进行系统的培养和教育，以准备完成上帝和人的最高职责。伊拉里昂认为权力和国家是统一的，就像“三位一体”一样不可分割，权力、国家和教会构成了他的三位统一。王公负责统治人民和国家，这是上帝所托付的，他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关心自己的臣民。^⑤

虽然伊拉里昂将俄罗斯视为充满神性的国家，但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俄罗斯不论是政治实力还是宗教影响力均未能独自成立，正统性的转移和继承还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在奉留里克一系为俄罗斯君主统治的正脉之外，16世纪的莫斯科国家又从拜占庭引入大量加强国家和权力合法性的资源，这被克柳切夫斯基认为是莫斯科君主“政治意识提高”的结果。^⑥

① Митрополит Иларион. 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 С.99.

② Лихачев Д.С. Рус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 и их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С.60.

③ Митрополит Иларион. 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 С.82.

④ Будовниц И.У.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XI-XIV вв.). М., 1960. С.65.

⑤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правовых учений/ Ред. В.С.Нерсесянц, М.: Норма, 2004. С.210-211.

⑥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二卷），贾宗谊、张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9页。

摆脱蒙古桎梏以后，莫斯科数代君主致力于俄罗斯国家的统一，一个大国即将呈现在欧洲的东部。莫斯科君主“意识到自己处于新的地位”，“因此在国内外探索着同这种地位相适应的形式”，以“明确自己的新的作用”。^①事实上，对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而言，虽然拜占庭帝国已经灭亡，但它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大国政制模式。而莫斯科与已经灭亡的拜占庭的联系以及继承性，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就已经得到展开。其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是，在拜占庭灭亡二十年之后，伊凡三世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帕列奥洛格为妻。这显然不是一桩普通的婚姻，而是一桩政治婚姻。“它向全世界表明：这位公主作为已经衰亡的拜占庭家族的继承者，把这个家族的统治权转移到了莫斯科这个新的皇室。”^②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则是，在拜占庭灭亡五十多年后，普斯科夫修道院的修士菲洛费伊在给瓦西里三世的上书中提出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概念。

事实上，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断了联系。为了成为“第三罗马”，必须要有自己的“沙皇”或“皇帝”（俄罗斯称拜占庭皇帝为“沙皇”），必须要有自己的牧首。^③俄罗斯一方面求诸拜占庭的传统，另一方面更多地是以自己对神权国家的想象来构建意识形态，借用拜占庭的传统概念，对“沙皇”和“牧首”的权力进行了魅化。^④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成为俄罗斯第一位沙皇，这是莫斯科大公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界标；但是他登基的时候没有涂油，结果莫斯科的外交家们费尽艰难，才使沙皇的封号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承认。^⑤16世纪50年代下半期，莫斯科方面花费巨资，千方百计地获得了希腊主教的确认书；但是研究表明，这张从君士坦丁堡寄来的确认书布满了签名，却是伪造的。^⑥在费奥多尔执政时

①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二卷），第120页。

② 同上，第122页。

③ 1448年，俄罗斯正教会自行召开主教会议，选举俄罗斯人梁赞主教约纳为莫斯科和全罗斯都主教。这是俄罗斯正教会事实上独立自主的开始。

④ 参：Успенский Б.А. Царь и патриарх: харизма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изанти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и ее русское пересмысление).

⑤ Хорошкевич А.Л. Россия в систем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ередины века. М., 2003. С.66-132.

⑥ Фонкич Б.Л. К истории учреждения царского титула Ивана IV. Соборная грамота 1560 г. Фонкич Б.Л. Грече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в России в XIV-начале XVIII в. М.,

期，莫斯科国家的实权操纵者鲍里斯·戈都诺夫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局势，最终使君士坦丁堡同意莫斯科设立独立牧首区。1589年，都主教约夫（Иов）成为俄罗斯首任牧首，并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祝福。

经过这一系列的构建和努力，世俗的权力与教会的权力在俄罗斯完成了它们自拜占庭转移至俄罗斯的“神性”正统化过程，与君主制的世袭正统性合而为一。因此，列昂季耶夫声称，俄罗斯有三种强大的东西，除了村社的“米尔”之外，就是拜占庭的东正教和不受限制的世袭君主专制。^①

四、当代俄罗斯“国家性”：在祛魅与复魅之间

俄罗斯的政治转型，经历了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几近三十年。这种转型，最初是以西方的普遍主义为标杆，以建立现代政治为目标而铺开的：俄罗斯以西方模式为样本，构建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与政治转型相适应，俄罗斯当局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转型。但是，在没有顾及俄罗斯国情，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遽然推进的“休克疗法”，不仅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痛，而且为民主政治的巩固增加了障碍。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实际上是在失序状态下运行的。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不仅没有缓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压力，反而加大了俄罗斯的安全困境，俄罗斯在接二连三的退让中逐渐丧失了大国尊严。因此，对内恢复秩序、对外复兴大国地位的“历史律令”为俄罗斯回归传统政治提供了理由。回顾近三十年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反向的运动，一是俄罗斯的政治从祛魅重新走向复魅，二是俄罗斯在现代“国家性”还没有稳固建立的情况，就开始回归传统“国家性”。

马克斯·韦伯“理性祛除巫魅”的逻辑在于消除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神性因素，回归理性，使政治由“以神为中心”转变到“以人中心”的轨道上来。“多元现代性”概念的倡导者艾森斯塔德也因循韦伯的研究方法，将现代性的核心界定为对所有轴心时代文明所持的神授世界观的解构。^②在西欧

2003. C.74-375.

① Леонтьев К.Н. Восток, Россия и славянство. Том 1. С.98.

② [德]萨赫森迈尔、理德尔、[以]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

国家，经过启蒙运动的理性荡涤之后，借助宗教力量为自己积聚正当性资源的君主政体，逐渐失去了政治正当性的强大支持力量，王朝国家体系亦逐渐被民族国家体系所取代。但是艾森斯塔德同时也认为，现代性并未使传统解体，各种文化在经历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发展出独特的应对模式、善的概念以及相应的体制。^①在俄罗斯，以专制、东正教和人民性为三个重要支柱的君主制一直延续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是在君主制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发生的。19 世纪下半期农奴制的废除、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提高，以及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为帝俄政治的祛魅做了铺垫；而十月革命胜利所建立的人民政权则是这种祛魅的结果。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在其现代性政治方案中强调要在政治上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偏离了原有的方向，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实际上使人民民主流于口号和形式。在意识形态上，苏联虽然将东正教排除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但是继承了帝俄的精神传统，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帝国。

在新俄罗斯的国家建构中，现代“国家性”理念得以提出并集中体现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叶利钦在回忆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时写道：“新的国家性理念不是在今天诞生的，也不是在我或者舒什科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的头脑中形成的。”^②他强调，签订别洛韦日协议让俄罗斯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俄罗斯选择了新的全球战略，摒弃了‘半个世界统治者’的传统形象，不再与西方文明进行军事对抗，也不再充当解决民族问题的宪兵角色。”^③由此可见，新俄罗斯决定放弃“帝国”，作为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平等的新型“主权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这种“主权国家”理念也是别洛韦日协定的基础。此后，叶利钦多次强调这种现代“国家性”。1994 年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巩固俄罗斯国家”的任务^④；1995 年在独立日庆祝会上强调俄罗斯的主权国家地位是人民赋予的，政治架构是新宪法确定的。这也是

及其他的阐释》，第 21 页。

① 同上。

② [俄]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131 页。原文中的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在中文版本中被译成“国家”，此处引文改用“国家性”。

③ 同上，第 132 页。

④ Об укрепле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5 февраля 1994 г.

为了防止俄共重新上台执政，回归原来的共产主义制度。

以“民主斗士”著称的叶利钦经常以“鲍里斯沙皇”自嘲，在权力观念上尚未摆脱历史的束缚；炮打白宫、以极端方式解决政治冲突的举动，显示了俄罗斯政治家还不具备现代政治品格，同时亦显示俄罗斯这个民族还缺乏现代政治所应有的妥协精神。瑞典学者赫德兰认为，虽然叶利钦承诺在法治基础上将俄罗斯建设成为以民主、分权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但是他从一开始关心的是个人权力，并且将个人权力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①在西方批评者眼里，这个体制是一个名义上的，“由一小撮寡头政治家控制的、一切以效忠为原则的民主体制”^②。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是一个理念国家，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用‘思想’连接和组织起来的整体”^③，无论是帝俄还是苏联都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在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之后，没有国家理念支撑的现代“国家性”注定会使个体精神缺失的俄罗斯陷入精神真空之中。因此，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叶利钦授命萨哈罗夫动员全社会寻找“民族思想”，企图从“传统国家性”之中寻找精神资源。

普京上台前夕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可以被视为俄罗斯社会全面回归传统的先声。在这篇宣言式的纲领中，普京提出了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和社会团结这些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珍视的传统价值观，尤其强调“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同时他也表示，需要“把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与俄罗斯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④。普京执政前期曾经常提及利哈乔夫、契切林等学者，从思想上显示了其自由主义和西方主义的一面，在一些观察家眼中，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合力将他由一个“亲西方的自由主义总统”造就成为威权统治者和西方的敌人。^⑤他倡导的“新保守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

① 韩冬涛、孔令兰萱：“斯蒂芬·赫德兰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路径依赖”，《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② Maura Reynolds, “Yeltsin Legacy Impressive but Clouded”,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1, 2000.

③ Панарин А.С. Философия политики. М., 1996. С.168.

④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 декабря 1999 года.

⑤ Зыгарь М. Вся кремлевская рать.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2016.

酝酿，最终成为俄罗斯的准国家意识形态。而在此之前，苏联时期的一些国家象征标志已经被重新启用。

随着垂直权力体系的建立，俄罗斯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政治的控制性不断得到强化。法理性的执政基础、个人魅力的全面放送，以及深谙俄罗斯民族心理的为政之道、不屈服于西方的示强姿态，使得普京成了俄罗斯的国家象征符号。2014年10月在索契举行的“瓦尔代”会议上，总统办公厅负责内政的第一副主任沃洛金将普京与国家等同起来，做出了这样的表述：“普京在，俄罗斯就在；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①诚如俄罗斯体制内人士所言，这个表述反映了当时俄罗斯国家及其公民的状态^②；在普京收回克里米亚后，西方发起的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使俄罗斯迎来了“至暗时刻”，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对民众来说，普京这个给俄罗斯带来秩序的人则是不二人选。不唯如是，近年来关于恢复君主制的议论在俄罗斯社会中也有着比较稳固的市场，而且有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克里米亚入俄之后。2017年3月，克里米亚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声称，俄罗斯应该改变政体，实行君主制；在当前情况下普京应该成为终身总统。^③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随后的民调显示，28%的受访者容忍甚至赞同恢复君主制，2006年则是22%；在容忍君主制的受访者中年轻人的比例更高，相反，曾生活在苏联时代的老一辈则大都反对这一观念。^④对于君主制的拥护者来说，君主制会带来清晰、稳定、明确的道路^⑤，甚至消除权力竞争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甚至混乱的局面。在摆脱君主制百年的俄罗斯重新实行君主制，显然不具可行性，正如俄学者所言，“在俄罗斯恢复君主制度可能也是合乎需要的，但这未必是现实的”^⑥。

① «Есть Путин — есть Россия, нет Путина — нет России». 22 октября 2014. <https://iz.ru/news/578379>

② Там же.

③ Аксенов: сегодня России нужна монархия. https://www.gazeta.ru/politics/news/2017/03/14/n_9796817.shtml

④ Монархия для России: сто лет спустя. 23 марта 2017.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116126>

⑤ Эксперты – о том, нужна ли в России монархия. <https://www.pravda.ru/news/expert/1328327-vasilev/>

⑥ [俄]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胡学星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5页。

苏尔科夫 2018 年 4 月发表的《混血儿的孤独》^①以及 2019 年年初发表的《普京的长久国家》，似在给俄罗斯“国家性”的复魅以及政治的复魅做出一个总结。现在的俄罗斯与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时的俄罗斯，它们的“国家性”已经发生改变：2008 年的格俄战争、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克里米亚“回归”事件，显示俄罗斯仍然是那个被宿命框定的孤独帝国，需要回到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源头。

结 语

自 19 世纪以来，关于“俄国特殊论”和“俄国特殊道路”问题的讨论就已经展开，并且一直延续至今。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学界出现了大量关于这种特殊性的历史隐喻，如 В.Б·帕斯图霍夫的“俄罗斯基因”、А.Л·诺夫的“伊凡雷帝阴影”（Тень Грозного царя）、А.А·奥赞的“俄罗斯之轨”（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лея）、Ю.С·皮沃瓦洛夫的“俄罗斯系统”^②，这些隐喻旨在揭示俄罗斯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以克服的历史依赖，这种依赖是制度性的，更是精神性的。俄罗斯的“国家性”亦是如此，简单而又深层的权力结构、绵延持久的正统观念、散发神性光芒的宗教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三位一体”。在这个一体结构中，权力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而正统观念和意识形态作为其精神支撑以及合法性工具则必不可少。缺乏理念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不能长久，以“暴力模式”为基础的蒙古人的统治就是一个例证；而缺乏权力支撑的正统性和意识形态是不坚固的，同样不能持久。因此可以说，俄罗斯的统治者利用瓦兰人建国这个久远绵延的叙事作为其世袭的正统性，从蒙古人那里学习并继承了深层权力的运作模式，从拜占庭那里获得了宏大的意识形态和理念，通过这个“三位一体”的“国家性”，牢牢地控制着这个疆域辽阔的国家。

苏联解体之后，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俄罗斯重新回归被历史主义和传统

①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Одиночество полукровк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2.

② Лубский А.В. Концепт русская власть: 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тология. 2010. №.2.

主义所覆盖的传统“国家性”，而与基于普遍主义的现代“国家性”渐行渐远。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不断地在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徘徊，显示出一种周期性和钟摆性。在俄罗斯未来的道路中，西方的普遍主义是否会如苏尔科夫所言，被普京模式彻底排挤出去？或者说，俄罗斯完全有信心在自己的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俄罗斯现代性”，以自己的模式真正解决自身的问题？

俄罗斯当前的复魅趋向既有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呼应了当前全球的政治复魅化运动；保守主义的盛行、民粹主义的蔓延、强人政治的回归、民族主义浪潮的重兴以及自由主义所遭受的全面挑战，已经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现实。在俄罗斯领导层的眼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在当下的国际政治现实中构成了“价值竞争”，正如苏尔科夫所说，“俄罗斯业已形成的政治体系不只适用于本国的未来，而且显然也具备极大的输出潜力”。他的话也许是对的，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普京已经将自己打造成了世界各国“社会、文化保守派民众”的领袖。^①

诚然，发轫于西方并向全世界推进的现代性当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应该看到，虽然西方现代性同非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张力，但是不能因为它源于西方就简单地加以全盘否认或者全面接受。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即使我们并不否认启蒙理想及现代性方案有其欧洲特定的历史起源，但却不能因此便认定它们就永远被烙上了“欧洲”记号，无法进入其他地区民族的历史，无法融入其他地区民族的文化。诸如权利（自由）、公正（平等）、宽容（博爱）以及和平（秩序）等启蒙理想以及法治、民主、宪政、分权制衡等现代性建制方案，即便率先产生于西方的启蒙运动，但一经产生后它们就得到了自在的意义以及确定的内涵，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欧洲文化，使之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况且，不少非西方文明中本身也包含有一些与西方现代性要素相类似的特质。^②

在新世纪的反思中，俄罗斯坚持做一个“特殊性”大国。其实，不论是

① Robert Kagan, “The strongmen strike back,”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2019.

② 吴冠军：《多元的现代性——从“9·11”灾难到汪晖“中国的现代性”论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64-167页。

过去还是未来，它曾经是、也将是一个“特殊性”大国，它有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有过辉煌的经验。帝国一直是俄罗斯的形态，作为一种秩序，帝国的多样治理为其存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民族国家是欧洲的发明创造，这个创造也许不太适用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但是“帝国”更强调的是它的内部，与以权力政治为圭臬、唯势力范围为务的“帝国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俄罗斯强调它的特殊性，只不过这种“特殊性”不应与现代性对峙，而与现代性接轨也不会湮没其“特殊性”。俄罗斯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如何超越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峙，寻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之路。

【Abstract】 “Statehood” is a complex concept with many meanings. It appeared in the literature of Russian workers’ movement theorist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n it was widely used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Russia. As a concept in law and politics, the meaning of “statehood”, at the beginning,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state”. Nevertheless, it was endowed with divinity among Russian conservatives, reflect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Russian historic evolution. “Statehood” is a concept with relatively stable connotation and ever-developing denotation. It originates not only from the historic structure of the basic political system, but also from the spiritual structure centered on ideology and ideas. In history, Kiev Rus was a loose alliance of aristocratic republics, but the invasion of Tartar Mongolians destroyed its political system, transforming the quaternary structure composed of princes, aristocrats, churches and veche(assembly) into a single autocratic monarchy structure. The continuing hereditary tradition, divine elements in the Orthodox Church, the highest power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people formed the spiritual aspect of Russian statehood, serving together the legitimacy of autocratic rules. Russia’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mainly li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utocratic politics to modern politics. The key is to reconstruct its statehood and transform from traditional national characters into modern ones.

【Key Words】 Theories Holding Russia’s Particularity, “Statehood”,

Modern Politics, “Putin Doctrines”

【Аннота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 это комплексное понятие со множеством значений, появилось оно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русских теоретиков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и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получило широк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и за её пределами. Как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ое понят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значально было схоже с поняти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однако русские консерваторы придали ему божественную окраску, что отражало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концепция с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устойчивым ядром, но и концепция измен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исходящая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баз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а также от духов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основанной на идеологии и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была свободным союзом арист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однако вторжение татаро-монголов разрушило её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превратив состоящую из князей, аристократов, церкви и вече структуру в структуру единой княжеской диктатуры. Верховная сила и народн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сформировавшиеся на давней патримониальной традиции, божественных факторах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и служащие легитимацией авторитарного правления,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духовный уровен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основном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ереходе от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к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ключом к перестройке страны является превращен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воеобразие Росс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путинизм»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舆情与地区**俄罗斯对华认知的新变化及前景展望***

王 文 张婷婷**

【内容提要】俄罗斯对华认知延续着多年友好合作的方向。近年来的事实表明,这一趋势体现为总体上进一步积极评价中国 in 政治、经济、金融等领域的治理经验,强调互信互鉴,深化与中国在多领域的合作。当前这种变化趋势还在进一步形成之中,在舆论多元的背景下,尚显示一定的脆弱性。为此,有必要深化实践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加强相互信任,进一步充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拓展其发展的空间。

【关键词】俄罗斯对华认知 中俄关系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互信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2-0067(21)

国际关系中,相对客观的认知可以促进国家间关系的良性发展,反之,错误的认知会影响到国家间关系,甚至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或战争。因此,研究俄罗斯对华认知的新变化,有助于把握中俄关系的发展态势及其走向。正如俄罗斯学者卢金(А.В. Лукин)所言,“相互认知在一个具有长久和复杂历史关系的双边关系中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中俄两国毫无疑问就属于这种范畴。”^①

* 本文在刊发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冯绍雷教授、万青松副研究员的帮助与指导,在此对两位专家与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文中可能仍存在不当之处,由作者本人承担。

** 王 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婷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① Alexander Lukin, “The Image of China in Russian Border Regions”, *Asian Survey*, 1998, Vol.38, No.9, pp.821-835.

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俄罗斯对华认知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且涉及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①已有的研究对理解现状有不少帮助,但其中的若干研究,有的停留在事实描述层面,有的限于对俄罗斯人文作品中的中国题材或中国情节的分析,研究视角相对单薄,需要进一步丰富、充实。对此,笔者试图通过近年对俄罗斯数次的实地调研经历,包括拜访近百位俄罗斯官员、汉学家、智库学者、在俄华商、久居莫斯科的外国人,与他们深入交流有关对华最新认知变化,分析当前俄罗斯对华心态的变化趋势和具体体现,以及未来走向。

一、多样化是当代俄罗斯对华认知的主要特征

冷战结束二十多年来,中俄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历程,深刻影响着两国及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回顾历史就可以感知俄罗斯对华这种认知的变化。20世纪末期,中俄虽然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但是主张尽快融入“西方文明大家庭”的俄罗斯执政精英对华认知并不充分,包括对中国的市场潜力和制度优势的认识不足。时任俄罗斯代总理盖达尔(Е.Т. Гайдар)公开预言,中国在近期不会成为一个稳定、繁荣的市场经济国家。^②这一时期,俄罗斯主要是在官方层面与中国保持一定的接触,但双方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交往水平有限,理性认知也处于刚刚形成的初期阶段。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数据,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的背景下,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约20%,之后才慢慢发生新的变化,但整体而言,对华好感度并不高。^③

① 刘亚丁:“俄罗斯的中国想像:深层结构与阶段转喻”,《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54-60页;孙芳、陈金鹏等:《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王树富:“俄罗斯文学的东方幻象:佩列文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外国文学动态》,2013年第3期,第18-21页;魏梦莹:“21世纪前俄罗斯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安徽文学》,2016年第7期,第116-118页。

② Гайдар Е.Т. Россия XXI века: Не мировой жандарм, а форпост демократии в Евразии// Известия. 18 мая 1995 года. <http://gaidar-arc.ru/file/bulletin-1/DEFAULT/org.stretto.plugins.bulletin.core.Article/file/3518>

③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вызовы времени.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под ред. Горшкова М.К., Петухова В.В.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15. С.312-313.

21 世纪初普京刚刚执政之时，也并没有马上改变对中国的传统认知，而是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和思考，心理上对华接近的这一趋向才明显加强。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大众舆论的普及，俄罗斯民众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到本国对华认知的重新塑造过程之中。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数据，多数俄罗斯民众对华好感度的平均值呈上升态势，从 42% 上升到 55%，总体上保持着积极向好的趋势。而在俄罗斯老资格社会学家戈尔什科夫领导之下，该所研究团队的民调成果则进一步勾画出俄民意近二十年来变化的趋势。^①

表 1 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认知（1995-2014 年），%

	1995	2001	2002	2007	2008	2009	2011	2014
积极看法	41	39	43	45	59	55	43	64
消极看法	21	21	31	32	19	31	29	14
很难回答	38	40	27	23	22	14	28	22

总体而言，目前俄罗斯对华认知呈现出较为积极而多样化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不同方面。

1. 认知群体。俄罗斯国内对华认知主要群体，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知华型、本土型和亲西方型三类。第一类群体认为，俄罗斯应该将中国视为战略同盟国，以平衡西方对俄罗斯施加的战略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经验也应该成为俄罗斯实现现代化的参考对象；第二类群体认为，俄罗斯既要保持与中国的适当关系，也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之间保持密切往来，尤其是在不同的世界权力中心之间保持均势；除此之外，还是有一部分舆论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对手，并担心中国实力强大之后会重启领土争端，倾向于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同时警惕俄罗斯沦为中国的“小兄弟”，要求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建立盟友关系，“向西方靠拢”是这类群体的主流声音。^②

①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вызовы времени.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С.304-305.

② Alexander Lukin, “Russia’s Image of China and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999, Vol.17, No.1, pp.5-39; Anastasia Solomentseva,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Eyes of Russia: A Source of Threats or New Opportunities?”, *Connections*, 2014, Vol.14, No.1, pp.3-40; Vladimir Shlapentokh, “China in the Russian mind today: Ambivalence and defeatism”, *Europe-Asia Studies*, 2007, Vol.59, No.1, pp.1-21; Elizabeth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划分仅是相对而言，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定论，俄罗斯对华认知群体的立场区分和各自偏好处于变动状态。在不同外部环境和各自主观意志驱动下，特别是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不断恶化，甚至冲突、对抗的情况下，三种类型群体的对华认知倾向明显会出现调整。比如，来自左翼的重量级代表人物——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担任俄对外经济联络部长、现任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的格拉济耶夫（Сергей Глазьев），积极主张对华开展深层次合作，提出中俄需要走向深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比如建立大型合资企业，开启长期投资项目，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共建研发中心，尤其是航空航天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行业的研发中心等。^①也有原来与西方交往较多的资深学者、俄罗斯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卡拉加诺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等一批精英，在新世纪到来之后，表现出对华合作的巨大兴趣。他们身体力行，努力投身于和中国同行的合作，提出了很多有远见的与中国开展紧密战略合作的积极建议。^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被认为是俄罗斯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倾向学者伊诺泽姆采夫（В.Л. Иноземцев），早在 2003 年至 2011 年担任俄罗斯知名期刊《自由思想》

Wishnick, “In Search of the ‘Other’ in Asia: Russia-China Relations Revisited”, *The Pacific Review*, 2017, Vol.30, No.1, 2017, pp.114-132; Тен Н.В. Образ Росс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е сентября. 2012г. <http://cheloveknauka.com/obraz-rossii-v-sovremennom-kitae>; Paradorng Rangsimaporn, “Russian Elite Perceptions of the Russo-Chi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1996-2001)”, *Slovo (London, England)*, 2006, Vol.18, Iss.2, pp.129-145; Почему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литы не хотят сближ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http://www.profi-forex.org/novosti-rossii/entry1008254074.html>;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три вопроса о новых принципа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http://ru.valdaiclub.com/files/12218/>;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legalacts.ru/doc/ukaz-prezidenta-rf-ot-30112016-n-640-ob-utv-erzhdenii/>; 马凤书：“欧盟与俄罗斯关系探析”，《欧洲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88-89 页；张晓阳、杨大伟：“浅论欧盟与俄罗斯关系发展”，《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1996 年第 6 期，第 10-14 页；崔剑：“叶利钦时代的中俄经贸关系论略”，《甘肃社会科学》，2002 年第 6 期，第 44 页；罗英杰：“俄罗斯与欧盟的经济关系”，《外交评论》，2005 年第 4 期，第 92-93 页；邢广程：“俄罗斯的欧洲情结和西进战略”，《欧洲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2-3 页。

① “环球时报专访俄总统经济顾问谢尔盖·格拉济耶夫：要让民众对中俄合作感觉更舒服”，《环球时报》，2018 年 7 月 24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07/12559875.html>

② 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 о том, почему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нужно «отдать» азиат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Газета.Ru. 05.05.2015. https://www.gazeta.ru/column/vladislav_inozemcev/6661477.shtml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主编时期，就曾通过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向中国宏观经济、财政、外贸、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制度、政治改革、社会政策等诸领域的知名学者约稿 12 份，在一年之中，每期一篇分门别类地刊出介绍中国改革成长的经验与问题，大力推动中俄相互认知，在俄罗斯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2. 认知方式。深层次学术研究、民调和传播交往的多样性也促使俄罗斯对华认知逐步走向成熟。首先，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如何认识上世纪晚期以来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的路径和结果，这是俄罗斯精英与民众客观认知中国的一个重要前提与动因。曾有过在各国工作经验、并任联合国专家的俄罗斯经济学家波波夫，在其所发著的《荣衰互鉴：中国、俄罗斯以及西方的经济史》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与俄罗斯经济的“转型性衰退”的大分岔在于：（1）1979 年改革得益于经济自由化与强大国家“制度能力”的结合；（2）强大的国家制度、有效且有为的政府，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增加；（3）有别于“休克疗法”的渐进性改革；（4）坚持集体主义制度，抑制较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波波夫强调，俄罗斯之所以在其市场化改革之后出现“转型性停滞”，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制度能力下降，并强调这一因素要对俄罗斯与独联体经济不景气负主要责任。^①这一类对于社会经济转型问题的新的认识立场，深刻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意变化。其次，通过多种民调机构的研究搜集，发表了不少反映俄罗斯民意的舆论报告，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俄民意对华认知越来越趋于正面。俄罗斯社会舆论研究所 2018 年 5 月 25 日的报告显示，33% 的俄民众认为，中国是自己国家最为重要和最值得珍视的伙伴，近一半的俄罗斯居民认为，与中国合作，对当前俄罗斯最为重要。2018 年 5 月，列瓦达中心对俄罗斯 1600 名 18 岁以上的公民进行民意调查，在回答“五个与俄罗斯比较亲近的朋友或者盟国”时，

① [俄]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著：《荣衰互鉴：中国、俄罗斯以及西方的经济史》，孙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8 年，第 5 页。（原文参见 Vladimir Popov, *Mixed Fortun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Russia, and the 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波波夫曾在俄罗斯权威的瓦尔代论坛上做主题发言，可视为俄罗斯学术和传媒领域的主流见解。

中国得票率达到 40%，仅次于白俄罗斯（49%）。^①而在该机构 2013 年的同一调查中，仅有 20% 的受访者选择中国，2014 年以后选择中国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俄罗斯知名汉学家马斯洛夫对此评论说，总体而言，毫无疑问，普通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态度保持着积极趋势。^②最后，从媒体传播角度看，媒体对华认知也逐渐趋于成熟。这既与俄罗斯国内媒体政策变化有关，也与此后媒体涉华报道增多有密切关联。如 2002 年 11 月俄罗斯通过《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修正案，要求大众传媒进行自我约束，各联邦频道主管们每周应召去克里姆林宫，听取当局的指示，大众传媒需要和国家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③当前 70% 的俄罗斯电视媒体、80% 的地方媒体和 20% 的全国报刊是国家所有，^④这有助于俄罗斯主流媒体在对华报道上大体与官方立场保持一致，基本上以正面为主。如在塔斯社、《生意人报》、《今日俄罗斯》和《论据与事实》等俄罗斯民众日常关注较多的媒体涉华报道中，不仅把中国视作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大国，而且也是俄罗斯的好伙伴。2018 年 12 月 17 日，在中国召开改革开放 40 周年纪念大会前夕，俄罗斯知名的报纸《生意人报》刊发专题文章，对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详细报道，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超级大国，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做出了榜样。该报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遵循 9 条基本原则：（1）依靠实践，而非意识形态；（2）敢于承认错误，并采取补救举措；（3）维护国家主要的象征符号，同时赋予其新内涵；（4）鼓励试验，减轻犯错的代价；（5）承认薄弱地方，有针对性地强化；（6）培养新生代精英，安顿好老一辈的生活；（7）向所有国家和人民学习，包括曾经的敌人；（8）依靠专家治理国家；（9）外交为本国经济服务。该报最后认为，这些原则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发展。^⑤当然，上述趋势并不意味着俄媒体的

① Враги и друзья России. <https://www.levada.ru/2018/06/14/druzya-i-vragi-rossii-3/>

② Россияне все более позитивно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 Китай на фоне укрепления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25.05.2018. <http://mixednews.ru/archives/133638>

③ 靳会新：“大众传媒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27-28 页。

④ 杨希：“俄罗斯大众传媒发展研究”，《新闻传播》，2018 年第 6 期，第 44 页。

⑤ Михаил Коростиков. Пример лучших правил. 40 лет политике реформ и открытости

对华报道都是正面的。在一些大报上也会出现“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报道，同时还存在一些比较接近于西方立场的媒体，对华立场较为偏颇。

3. 地域分布。俄罗斯对华认知呈现出地域差别。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这些地区的民众比较容易在一个信息比较丰富的环境中，感受到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他们的对华认知要相对视野开阔和活跃一些。而与莫斯科、圣彼得堡相比，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民众受到自身环境限制，对华认知滞后于现实。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和较为封闭的小城市、小村镇，有不少人还停留在昔日的经验上，甚至还可能出现“认知缺失”。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受到俄罗斯领导人大力推动“转向东方”政策影响，中俄在远东开发中的互动频度和密度有了质的提升，在此背景下，远东地区持对华友好态度的民众数量逐渐增加。特别是，与中国毗邻的远东沿边地区居民与中国来往较为频繁，可以直观感受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其对华认知更加客观。根据2017年上半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在远东地区的民调数据，64%的远东居民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较好，26%的居民对中俄关系表示满意，仅有1%的居民认为，两国关系不好。这一比例显著高于韩国（对俄韩关系较好的评价仅有25%）、日本（对俄日关系较好的评价仅有18%）、美国（对俄美关系较好的评价仅有2%）。^①即便如此，在远东地区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阻碍着中俄相互认知的理性化水平的提升，包括担忧中国威胁远东领土完整的声音仍然有一定市场。^②

二、俄罗斯对华心态的积极转变及其具体体现

虽然，当代俄罗斯对华主流认知是多样化的，但笔者通过调研发现，近年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甚至出现希望参考或借鉴中国

КНР//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7.12.2018.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829217>

① Ларин В.Л., Ларина Л.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2017 г.)//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18. № 2.

② 沈莉华、李淑华、于小琴、王琦：“俄罗斯媒体和民众对华态度分析”，《俄罗斯学刊》2019年第1期。

发展经验的声音。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在政治、经济、金融等领域的治理经验和新动向。

（一）对中国政治治理经验的关注

1. 关注中国发展经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俄罗斯政治精英越来越趋于反思西方模式。^①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加速推进“转向东方”战略，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也使得俄方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发展经验。这可以从俄罗斯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精英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或者对外表述中了解到。

在政界，普京总统在近年瓦尔代俱乐部年会等多个重要场合，表达过对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的积极看法。^②如2018年5月31日，普京总统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专访时就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有益、重要、有前景的倡议，且更具全球性。俄罗斯一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坚定支持者，并补充说，如果中俄共同努力，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将产生更好的结果。^③同年10月在第十五届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普京总统再次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紧迫性不但没有变小，反而获得更多响应。^④普京总统还多次邀请中国的知名企业家——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参加瓦尔代俱乐部会议或者俄罗斯主要的经济论坛（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或东方经济论坛），并与其多次会面，听取中国在推动电子商务与经济发展方面的情况介绍。2017年10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С.В. Лавров）在瓦尔代俱乐部年会的演讲中也指出，“俄方视‘一带一路’为重大发展机遇，该倡议有助于俄方更好地了解中国发展经验。”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С.С. Собянин）也

① 2014年4月1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5名议员甚至致函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要求追究戈尔巴乔夫西化改革致使苏联解体的责任。参见Депутаты Госдумы требуют судить Горбачева за развал СССР. апреля 2014г. <https://russian.rt.com/inotv/2014-04-10/Deputati-Gosdumi-trebuyut-sudit-Gorbacheva>

② 王文：“俄罗斯悄然‘偷师’中国”，《环球时报》，2018年4月11日。

③ “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专访”，新华网，2018年6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07/c_1122948379.htm

④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赞赏俄对‘一带一路’支持和参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0月20日，第2版。

主张参考中国的发展经验，包括引进中国的支付宝系统，邀请中国企业参加莫斯科地铁项目建设等。此外，莫斯科州政府也关注中国的治理经验。2018年10月，该州专门邀请中国专家赴莫斯科介绍中国工业的发展经验。

在知识界，笔者在莫斯科访谈的知名汉学家塔夫罗夫斯基（Ю.В. Тавровский）提到，“近年来，很多俄罗斯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模式，俄国内成立了智库团队，向媒体、公众和政府介绍中国模式值得借鉴的优点，以期通过研究中国发展经验来为俄罗斯的复兴提供参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拉林（А.Г. Ларин）明确谈道，“俄罗斯想要实现复兴，是时候参考中国经验了。”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积极推动中俄合作的老资格汉学家布罗夫（В.Г. Бров）则指出，“中国领导人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空前强大起来了。”^①此外，伊兹博尔斯科俱乐部副主席纳戈尔内（А.А. Нагорный）也表示，俄罗斯应该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早前他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谈道：“俄罗斯面临选择：是向美国投降，还是向中国学习？我们应该果断地抛弃自由主义意识形态。”^②

在舆论界，近年来俄罗斯三大民调机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列瓦达中心以及“舆论”基金会——的民调，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俄罗斯民众对华心态的积极变化。^③2017年11月，有俄罗斯官方背景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数据显示，有近50%的俄罗斯民众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经济伙伴。俄罗斯老百姓越来越多地夸赞中国的经济发展。^④而2018年5月，列瓦达中心对俄罗斯52个联邦主体的136个居民区进行的调查显示，有40%的俄罗斯民众认为，中国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或盟友。^⑤此外，俄罗斯民间智库“舆论”基金会2018年7月在全俄53个联邦主体的104个居民区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62%的俄罗斯民众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

① [俄]布罗夫著：《一个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中国》，李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Нагорный. Россия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сдать Америке или учиться у Китая, апреля 2017г. <https://cont.ws/@oskar/910417>

③ О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ах мира. Июля 2017г. <http://fom.ru/Mir/13624,24>

④ Эксклюзив: Граждане РФ видят в Кита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а -- эксперт ВЦИОМ, Синьхуа. 24 ноября 2017. http://russian.news.cn/2017-11/25/c_136777658.htm

⑤ “Друзья” и “Враги” России// Левада-Центр. 14.06.2018. <http://www.levada.ru/2018/06/14/druzya-i-vragi-rossii-3/>

有 45% 的民众认为，过去一年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68% 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发展比俄罗斯更加成功。^①

2. 关注中国的反腐经验。腐败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顽疾，普京多次开展较有规模的反腐运动，包括颁布一系列相关法律，有一定的成效，但仍有待继续努力。根据 2017 年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虽然此机构数据的采集背景不太“透明”），俄罗斯居第 135 位。^②换句话说，国际舆论中的俄罗斯反腐形象依然面临挑战。近两年中国开展坚决的反腐行动，俄罗斯开始把目光投到邻国——中国的反腐经验上。俄罗斯金砖国家研究委员会执行主席托洛拉亚（Г.Д. Толорая）认为，中国用法治手段惩治腐败值得俄罗斯借鉴，特别是“依法治国”对很多为一己私利贪污腐化的地方官员构成重大约束。此外，早在 2015 年，俄罗斯共产党国家杜马党团成员、国家杜马金融市场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库明（В.В. Кумин）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也认为，中国反腐领域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两国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③此外，据统计，2012 至 2016 年期间，俄罗斯周报《论据与事实》涉华的 166 篇报道中，有 31 篇与反腐主题有关，占涉华报道总量的 18.6%。^④近两年，普京总统也明显加大了反腐力度，指出：“没有碰不得的人，没有碰不得的领域”。^⑤这与中国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思想不谋而合。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在欣赏中国的反腐败经验的同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注重其反腐制度与本国的政治制度构建相匹配，比如，每年要求各级领导人定期公布财产等。

3. 关注中国的网络治理方式。近几年来，以“夺命蓝鲸”等网络为工具教唆青少年自杀的事件频发，网络引发的犯罪活动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面

① России важно укрепля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и с Западом, и с Китаем — опрос// REGNUM. 12 июля 2018. <https://regnum.ru/news/2446896.html>

② Россия и Гондурас поделили 135-е место в индексе коррупции. <https://www.rbc.ru/society/21/02/2018/5a8d679c9a79472b4c8bbb7d>

③ “惩治腐败，中国经验值得借鉴”，人民网，2018 年 10 月 22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108/c1002-26345468.html>

④ 胡帆：“‘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交往过程中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设”，《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7 年第 11 期，第 109 页。

⑤ Заседание Совета п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ю коррупции, января 2016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1207>

临的严重问题。对此，普京总统顾问克利缅科（Г.С. Клименко）建议，在互联网管理方面参考中国同行的经验，他指出：“按照中国模式限制俄罗斯网络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唯一方法。”^①2017年4月，普京总统指出：“不要再批评中国的网络监管了，网络自由哪里都没有。”^②俄罗斯逐渐加强对网络的监管，2017年7月30日，普京总统签署法律文件，禁止俄罗斯VPN服务商帮助人们匿名访问在俄被禁的网站。

（二）持续强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关注

1. 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兴趣正在扩展。不少俄罗斯经济学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得益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式，但中国方式不是简单的自由化和对外开放，其在刺激私有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现代化与加强有效治理相互关联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萨利茨基（А.И. Салицкий）认为：“仅仅是经济自由化和对外经济领域的现代化不会使中国取得这样的经济成就。”^③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教授拉玛扎诺夫（Ж.Ш. Рамазанов）也指出：“俄罗斯对中国模式中创造有利条件促进私有经济发展的经验充满兴趣。”^④此外，俄罗斯经济、治理与法律研究所的专家加里波娃（В.В. Гарипова）也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的现代化特征。^⑤汉学家塔夫罗夫斯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已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中国不仅是该理念的首倡者，更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实践者。”^⑥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西莫尼亚（Н.А.

① Советник президента Герман Клименко высказался за ограничение рунета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модели, января 2017г. <https://geektimes.com/post/285190/>

② Путин: не надо критиковать китайскую модель, свободы в интернете нет нигде. апреля 2014г. <https://meduza.io/news/2017/04/03/putin-ne-nado-kritikovat-kitayskuyu-mode-l-svobody-v-internete-net-nigde>

③ Салицкий А.И. Китай 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модель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9. №.7. С.43-55.

④ Рамазанов Ж.Ш. Соци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Китая и уроки для России// Известия Томского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нжиниринг георесурсов. 2009. Т. 314. №.6. С.13-15.

⑤ Гарипова В.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Китая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ка и социум. 2014. №.1-3(10). С.156-159.

⑥ [俄]尤·塔夫罗夫斯基：“一带一路”西行漫记——一个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一带一路”，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第2-9页。

Симония)就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就是，在国家发展的过渡阶段使改革获得成功的保证是稳定、发展和改革，而俄罗斯则是以‘反向的’消极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即，最开始就破坏政治稳定，停止发展，最后改革不顺。”^①

2. 关注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经验。经济特区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实现经济改革目标的试验场地。普京总统曾于 2005 年签署并推动议会上下两院通过《俄联邦特区法》，推动本国经济特区建设，截至 2017 年，俄罗斯已经设立了 24 个经济特区。

俄罗斯经济特区虽然种类较多，但是真正取得成功的还是少数。而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对俄罗斯有一定借鉴意义，包括吸引外资、税收优惠等方面。近两年，俄罗斯政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设立自由贸易港，除利用远东港口历史发展经验之外，也吸取了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经验。^②俄罗斯自由派的代表性人物伊诺泽姆采夫指出，俄罗斯远东发展之所以一直无法取得“突破”的原因之一，就是忽视世界经济行情的变化，全球 60% 的生产值都是由海滨城市或距离海港较近的城市创造的，中国就是这方面的最佳案例。他建议，俄罗斯领导人推动远东发展的出发点应该是充分利用这一地区作为沿岸领土的潜力，特别是与中国接壤的发展空间，在这方面，中国深圳经济特区的做法值得学习。俄罗斯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设立超前发展区，俄罗斯准备与中国在石油加工、石油天然气化工、机器制造、船舶制造、航空和飞机制造以及海洋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合作。^③

3. 注重中国企业的管理和发展经验。俄罗斯建有很多工业园区，如，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为中心的化学和机械工业园区、以乌拉尔和新西伯利亚

① Симония Н.А. Уроки китайских и южнокорейских реформ//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6. No.9. С.33-34.

② А.О·廖武什金娜：“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法：经验、问题、矛盾”，《俄罗斯学刊》，2016 年第 5 期，第 88 页。

③ Андрей Остро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может дорого заплатить за дружбу с Китаем. Отношения Москвы и Китая строить надо, но остудив эмоции. <https://svpressa.ru/politic/article/184605>; Елена Трегубова. Эра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Поможет 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Китаем//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9 мая 2014.转引自沈莉华、李淑华、于小琴、王琦：“俄罗斯媒体和民众对华态度分析”，《俄罗斯学刊》2019 年第 1 期。

为中心的钢铁和机械重工业园区等。但是随着时代发展，一批绿色、环保、智能、物流便利的高技术园区逐渐建立起来，传统的工业园区已经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中国园区建设经验开始在俄罗斯扩展影响。中国央企直接投资运营的格林伍德商贸园区是其中的一个案例。该园区由中国诚通集团于 2010 年 6 月以 3.5 亿美元收购建立，毗邻莫斯科州政府，接壤莫斯科国际机场，拥有俄罗斯最大的国际展览中心。虽然俄方员工是中方的 7 倍，但是园区在人才管理、基础设施、网络化以及后勤建设方面都直接采用了中国园区经验，如表 2 所示。^①格林伍德商贸园区在将中国工业园区管理经验和设备引进俄罗斯、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大量聘用本地员工，增加了本地就业和财政收入，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开始融入到了当地经济发展之中。

表 2 格林伍德商贸园区运营模式

智能建设	人才建设	网络建设	后勤建设	文化建设
消防自动化系统；国内智能化综合仓储系统和物流系统。例如，现代化的装卸设备，自动调温系统等	直接运用诚通集团中国公司的管理制度：《员工招聘管理制度》、《员工入职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以中兴通讯云计算、物联网、运营支撑三大技术平台为基础，能够快速、方便地创建各类 SaaS 应用和物联网的应用。采用 B2B 商业模式	将中医保健引入园区，提高园区的后勤服务水平	举办中国音乐会

资料来源：GreenWood Бизнес-парк, <http://www.greenwoodpark.ru>

此外，中国上海在圣彼得堡的投资项目——“波罗的海明珠”，由 7 家中国企业投资建设，每家企业各自发挥项目优势：锦江集团主营酒店业务，百联集团主营商业，绿地集团侧重于做房地产，工投则发挥电机制造优势，将中国的建设经验运用到俄罗斯房地产建设中，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房地产投资项目。这一项目多年来历经各种困难与挑战，仍受到圣彼得堡市政府和联邦中央政府的各方面支持。俄罗斯官方的支持，对这一项目舆论环境的营造起到了积极作用，以至于该项目能不断经受住各类风险，在当地立稳脚跟。

^① 韩雪梅：《在俄中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研究——以格林伍德有限责任公司为例》，首都师范大学 2013 年硕士论文，第 42-44 页。

4. 借鉴中国电子商务经验打造俄版“阿里巴巴”。俄罗斯拥有较大规模的电商市场，据 2018 年 10 月俄电商企业协会的预测，2019 年俄罗斯人将把近 5000 亿卢布花在国外电子商城购物上，其中超过 50% 的消费额“流向”中国。俄负责邮政物流的专家切布宁（Игорь Чебунин）透露，2018 年前 9 个月比上年同期多出 25% 的国际包裹，其中 94% 来自中国。中俄之间日益壮大的电子商务发展，不仅推动了两国在该行业的现代化，也促使俄罗斯借鉴中国的经验。有俄罗斯企业家指出，虽然俄罗斯的物流公司已经足够多，且竞争相当激烈，但这个运营商的榜样无疑在竞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①对俄罗斯而言，虽然本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但是缺乏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平台，一些中小商户选择在 VK、whatsapp 等社交媒体上销售商品，但是缺乏信用保障，传播空间也十分有限。2010 年，俄罗斯引进中国阿里巴巴速卖通（AliExpress），经过几年发展，已经成为俄罗斯两大重要电商平台之一。如果说几年前俄罗斯人对待速卖通的态度还比较谨慎，且仅是尝试性地购买一些低价商品，那么现在速卖通已成为俄罗斯人的日常购物平台。以 2017 年“双十一”为例，俄罗斯人在活动开始不到 5 分钟的时间里，就通过速卖通平台购买了 1 亿卢布的商品。有数据显示，约 40% 的俄罗斯买家是年轻人。^②由此可见，电子商务正在提升俄罗斯人对中国产品的认知。

阿里巴巴能够在俄罗斯获得成功，其原因在于，不仅对俄境内的物流、信息基础设施投资（阿里巴巴仅最近一年就投入 25 亿卢布发展俄物流和 IT 技术，并在莫斯科设立新的数据中心，拟投资 3000 万美元）^③，还不断地创新基于本地特色的运营模式，以期得到俄罗斯人的认可。进军俄罗斯市场初期，AliExpress 采用中国母公司的营销模式，通过与当地利用率最高的两大搜索引擎 Google 与 Yandex 合作，逐渐打开俄罗斯市场。如表 3 所示，在支付系统、产品服务、售后服务等方面，AliExpress 都采用了中国母公司的管理

① Анастасия Башкатова. «Почту России» спасет Кита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33. 29 октября 2018. С.4.

② Made in China, эволюция: как молодежь изменила восприятие китайских брендов. И почему увлечение молодых россиян смартфонами оказалось выгодно всем// Известия. 9 ноября 2018. <https://iz.ru/810502/elena-poltavskaia/made-china-evoliutciia-kak-molodezh-iz-menila-vozpriiatie-kitaiskikh-brendov>

③ Там же.

模式。但是，AliExpress也根据俄罗斯市场特点，实施了一些俄式运营模式，与当地的支付系统运营商、快递公司等进行合作。此外，AliExpress还与俄罗斯本土电商Wikimart、Technosila、220Volt进行合作，使后者集体入驻AliExpress。^①在2018年9月举行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阿里巴巴集团与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RDIF）、MegaFon公司和Mail.Ru公司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此框架下，将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成立电商领域的大型合资企业。^②

表3 AliExpress 俄罗斯运营模式

营销系统	俄版阿里巴巴采用中国母公司的营销方式，投入大量资金在 Google 与 yandex 两大搜索引擎上推送
支付系统	1、采用国内支付方式，买方的货款不会马上付给卖方，而是先存在 AliExpress，直到买家收到货物并确认货物的完整性； 2、与俄罗斯 4 大手机运营商合作，提供花费支付； 3、与本土的支付公司 QiwiWallet 和 Yandex money 建立合作
产品服务	1、俄罗斯版的“天猫”商城“精品馆”； 2、未来计划引进中国版的“聚划算”针对俄罗斯低端用户； 3、采用中国母公司模式，利用俄罗斯一些重要节日进行营销
物流系统	1、AliExpress 与俄罗斯邮政实现了 EDI 系统对接；还搭建了国内多条中俄专线，特别推出在哈尔滨的中俄包机专线，这是世界上第一班“全货机”专门运输 AliExpress 包裹； 2、未来将会与俄罗斯市场的国际快递公司 DPD、DHL、TNT、UPS、FedEX 和本地快递公司 Pony Express 合作
售后服务	1、采取国内 7 天无理由退货模式； 2、为买家和卖家搭建沟通平台

数据来源：AliExpress, <https://ru.aliexpress.com/?spm=2114.11010108.1000001.16.78fb649bzfQue8>; 苏香兰：《阿里巴巴在俄罗斯的国际化战略研究》，对外经贸大学 2013 年硕士论文，第 23-31 页。

虽然 AliExpress 将国内母公司的发展模式搬到了俄罗斯，但是本土化是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的重要原因。通过与本地的支付公司、物流公司以及电商进行合作，AliExpress 迅速融入俄罗斯经济体系中，在为俄罗斯用户带来

① 苏香兰：《阿里巴巴在俄罗斯的国际化战略研究》，第 24 页。

② “马云预计与俄罗斯相关的项目将越做越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8 年 9 月 28 日，<http://sputniknews.cn/economics/201809111026324176/>

方便的同时，也将自身的发展前景与俄罗斯的经济网络捆绑在一起，容易得到俄罗斯本土经济力量的支持。目前，中国在一些地区或领域的投资并非到处畅通，这里有着值得多方关注的地理、人文及政治经济的复杂原因。因此，阿里巴巴集团利用当地力量开发市场的模式为赴俄投资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三）重视中国的金融发展走向

1. 经济圈精英开始注意到中国金融体系的优良。中国推动经济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绩，促使一些俄罗斯经济圈精英看到中国发展方式的独特性和影响力，主张参考中国经验。如，格拉济耶夫就指出，中国发展经验有三方面值得俄罗斯参考：一是中国摒弃西式民主，更注重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管理的有效性；二是中国通过制定“五年规划”，采取政府调控与市场协调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从而保证了宏观经济稳定与社会公平正义，建立起全球最为完备的产业链体系；三是中国建立了一套在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机构体系，这套体系相对独立于西方金融体系，并且行之有效。这些经验对俄方而言有重要借鉴价值。^①

2. 主张两国之间开展深度金融合作。俄罗斯经济学家斯米尔诺夫（А. В. Смирнов）撰文指出：“我们有一些东西需要向中国学习，他们在为了发展运用所有手段的认知方面已经超过我们，中俄两国在金融领域发展合作有助于两国的共同繁荣，共同克服世界经济问题。”^②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资本市场部主任米尔金（Я.М. Миркин）也指出：“中国以顽强、执着和理性的精神，在金融领域向所有人发起挑战，的确令人羡慕，昔日不如我们的大国，如今正快马加鞭发展。2001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折合成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4，到2016年已达到133%。”^③

尽管俄罗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本国在金融领域的发展并不逊色

① 王文：“俄罗斯悄然‘偷师’中国”。

② Китайский опыт поможет России. <https://www.bfm.ru/news/15814>

③ Юань показал рублю путь вверх. <https://rg.ru/2018/03/27/iakov-mirkin-kto-bytree-rastet-i-izmeniaetsia-tot-i-silnee.html>

于中国，甚至在一些领域（货币的自由兑换、财政预算经议会三读的严格审核制度等）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但无论如何，俄方越来越多地积极主张两国之间开展深度的金融合作。现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А.Г. Силуанов）就是这方面的坚定支持者，他早在 2005 年出任俄财政部副部长期间就力主中俄强化金融合作，认为两国在金融领域开展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在双边合作层面，西卢阿诺夫提出两国就税法、审计、共同打造金融评级机构等寻求合作，并希望推进两国在包括本国货币互换结算、互相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等方面的合作，推进双方国有银行之间的深度合作，预防经济和金融风险。2014 年，他曾倡议中俄两国打造共同的评级机构，重点评估两国之间和跨地区的投资项目及其经济效益，时机成熟之时，可将评级标准推广到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领域。2017 年，为应对西方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他提出俄罗斯国债发行需要多元化，包括购买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国债，并且不是一次性购买，而是基础性的长期合作。为此，俄罗斯需要减少对资本流出的诸多限制，让两国的金融合作深化、常态化，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投资收益。在多边合作层面，他主张两国在国际组织框架（比如金砖国家、G 20）内开展积极合作，还主张邀请中国加入欧亚发展银行（2006 年由俄罗斯主导构建，成员国包括俄、哈、吉、塔、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 6 国），认为此举有助于该组织资本扩大和信贷排名的提升。他还表示，其领导的财政部愿意与中国相关部门共同推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框架内的资金融通。由此可见，以西卢阿诺夫为代表的当代俄罗斯自由派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的金融发展及其巨大潜力，主张推动两国之间的金融合作。

3. 对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期盼。在这一方面，与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头十年相比，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俄罗斯国内的主流媒体，如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等，也对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进行过多次报道。目前俄罗斯的绿色金融还处于形成阶段，^①每年的联邦预算中

① Богачева О.В, Смородинов 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меры по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развитию рынка «зеленых» облигаций// Финансовый журнал. 2016. No3. С.55-65.

都有一部分资金用于该领域的发展。^①当前，中俄两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处于相互了解阶段，如中国人民大学下属的绿色金融中心，曾在第四届中俄经济对话期间，邀请中俄两国经济学家就绿色金融展开研讨，俄方学者对中方的相关研究成果非常感兴趣。

三、以加强实践和深化研究推进俄对华认知的积极趋势

虽然，当前俄罗斯对华认知出现上述新的积极变化，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变化的态势远不意味着最终定型，甚至还显示出一定的脆弱性。为此，有必要继续巩固这些积极变化，进一步充实当前和未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与发展空间。

第一，需要以契合实际的扎实努力和深入研究，推动塑造更为健全、理性的俄罗斯对华认知。从国家层面来讲，需要积极回应俄罗斯心态调整，深化与俄合作，为两国进一步增进互信提供机会。国家需要对赴俄公民进行提前和恰如其分的教育，塑造公民正面形象，对中国公民在俄的不文明行为给予批评教育，情节恶劣的直接列入黑名单，限制赴俄，甚至是出境。从社会层面来讲，智库要发挥运用各种交往空间便利开展二轨外交，为两国加强沟通、深化各领域合作提供更多平台。同时，要为来华留学生提供更多了解中国发展经验、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动员更多中国高校面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招收学生，培养更多知华、能够为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的青年人。此外，在媒体宣传领域，中俄两国应进行沟通 and 深度合作，各自通过对方媒体采取专栏形式，定期报道本国的大政方针或者两国关系中的热点问题；中国的专家学者可以利用俄方媒体平台就中俄关系中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注意对外宣传必须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求正确引导俄罗斯对华舆情。

第二，以积极而慎重的态度借鉴俄罗斯的相对优势，加强互信互鉴。长期在莫斯科生活的中国企业家谢林就指出，“中俄关系正在进入新时代。两

^① Сергеевна В.М. Зеленые финансы в обеспечен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банков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2016. №17. С. 34-41.

国都要放下身段，超越历史，认真发掘对方的优点与长处。俄罗斯一直具有扎实的文化科技底蕴，普京执政前8年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俄罗斯将能源获得的一些外汇收入用于更新教育资源。^①目前在航空、航天、军事、卫星等方面，俄罗斯仍拥有相对优势，如，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是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因此，当前中国应该继续专注于中俄双方共同的发展问题，在面临外部挑战与压力、各种可能的制裁的背景下，客观评价俄罗斯的大国优势、潜能以及挑战与风险，寻求多方面的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第三，俄希望提升中俄双方合作水平的一些公开评论，需要引起关注。俄专家斯科瑟列夫（Владимир Скосырев）最近在《独立报》撰文，提出：“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目前尚无一个项目落实”；“2013年中国前往欧洲的铁路运输99%从俄罗斯过境，而至2017年初，这一比例已降至15%”。^②但另一方面，根据俄媒体透露：俄央行统计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在2016年为3.5亿美元，2018年上半年为1亿美元。这一数额对于战略伙伴大国身份而言，并不太相符。尤其是，2017-2018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因担心美国制裁，从俄撤出10亿美元的投资。同时，俄对华投资微不足道。相比较而言，俄罗斯在2016-2018年对美直接投资为13.1亿美元，对英投资14.4亿美元，而这两个国家却对俄进行着严厉的制裁。^③这说明中俄金融合作的规模还相对有限。对于这些在“对接”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显然应该通过研究和磋商，切实予以协调、解释和解决。

结 语

为了推动更加合理、更加健康的国际资源配置体系的形成，中国和俄罗斯等非西方国家仍然需要紧密合作，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争取更多的话语

①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Двойная прочность власти. Москва: Время, 2009. С.43-60.

② Владимир Скосырев. Россия остается на обочине Нового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33. 29 октября 2018. С.6.

③ 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сонов. Китайские инвесторы обходят Россию стороной. Китай видит много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г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но не хочет подставляться под вторичные санкции США. 10.12.2018. <https://www.fondsk.ru/news/2018/12/10/kitajskie-inv-estory-obhodjat-rossiju-storonoj-47271.html>

权，同时引导国际体系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方向转型。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夯实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基础、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中俄两国不断加强相互信任、相互认知水平，特别是在两国发展问题上互学互鉴。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给世界不少国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中国发展经验。俄罗斯也不例外，其国内越来越多地出现重视中国发展经验的声音，并在一些领域尝试参考或借鉴中国经验。但是鉴于中国自身也存在着新的发展风险，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借助俄罗斯对华认知发生变化的积极态势，中国也需要夯实发展内核动力，提炼中国经验，认真探索对外传播的合宜方式。同时，汲取俄罗斯现存优长，以双赢利益为动力，让俄罗斯更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推动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Russia's perceptions towards China continues the direction of friendly cooperation for many years. In recent years this trend has been reflected in Russia's further positive evalua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experience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ields, emphasizing mutual trust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deepening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various fields. It is worth noticing that at pres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luralistic public opinions, it still shows certain vulnerabil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strengthen mutual trust by advancing practice of cooperation, to further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Sino-Russia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to expand its denotation as well.

【 Key Words 】 Russia's Perceptions towards China,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Sino-Russia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Аннот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Китая продолжает тенденцию многолетнего друж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Факты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данная тенденция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дальнейшей позитивной оценке Россией опыта Китая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финансовой сферах. Россия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 взаимное доверие и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е, а также углубляе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Китаем в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данная тенден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 формироваться, 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люрализм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она всё ещё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хрупкость. В та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необходимо углубить практик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укрепить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е и взаимное доверие, ещё больше обогати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расширить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осприятие Китая Россие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взаимное доверие

(责任编辑 崔珩)

俄罗斯地区选举与地区政治新发展 ——兼论 2018 年地区选举

官晓萌*

【内容提要】俄罗斯地区选举与俄罗斯地区政治发展、央地关系变化密切相关,涉及到政党、选举、地区精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复杂问题,是研究俄罗斯威权制度内部运行机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从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开始,地区选举的制度与实践一直在变化中发展:中央的选举策略由严格控制政党数量转为允许更多政党存在;地区立法机构选举由大力推行比例选举制转为促进混合选举制回归;州长选举经历了直选-任命-直选的变化;威权选举制度的主要角色由统一俄罗斯党转化为州长;地区精英从追求独立性转向合作妥协,尽量争取得到更多的利益。在地区选举和地区政治中,除了上述变化,也存在一些不变的逻辑:中央对地区选举控制的决心不变;中央控制地区选举的主要手段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自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以来,俄罗斯国内政治领域的控制性增强,这种控制体现在其内部政治生态的各个领域,包括地区政治和地区选举。2018年的地区选举中出现了近10年来相对意外的选情,但分析威权制度设计的根本可以发现,在当前环境下,俄联邦地区选举中依然很难出现反对派实际掌控地区局势的情况。

【关键词】俄罗斯选举 俄罗斯地区选举 俄州长选举 俄地区立法机构选举 俄罗斯州长

【中图分类号】D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2-0088(39)

* 官晓萌,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自苏联解体以来，在威权主义理论框架下对俄罗斯政治进行研究，在国内外学界已经相当普遍。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威权主义制度内部的运行机制，选举是此类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具体的选举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央级别选举以外的选举活动，这是因为全国性的选举固然是当权者实力的体现，但“区分不同层级的威权式选举，以及研究这些竞争是如何被建构的，对于解开选举的角色之谜意义重大”。^①

俄罗斯联邦的行政体系包含联邦中心（центр）、联邦主体（субъект）以及市级行政单位（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②。与之相对应，当代俄罗斯有三个级别的选举，即：联邦、地区和市级选举。其中地区选举主要指联邦主体立法机构议员和联邦主体行政长官^③的选举。对俄罗斯政治和选举研究来说，地区选举意义重大，这是因为：第一，俄联邦的地区选举是各方政治力量在联邦主体具体分布的体现。第二，地区选举的发展体现了俄罗斯联邦制度的变迁，与俄央地关系的发展变化互为因果。第三，地区选举是俄精英发展的重要政治舞台。在垂直权力建设过程中，俄罗斯地区精英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而是在各自的活动区域依然保持着影响力，其重要的影响力平台就是地区选举。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俄罗斯地区选举，这些研究主要分为几种类型：第一，对于选举的选情或结果进行综合阐述或详细分析，通常涉及长时间的跟踪研究。^④第二，在政党研究（主要是统俄党）的框架下进

① [美]詹妮弗·甘迪、艾伦·拉斯特·奥卡：“威权体制下的选举”，《国外理论动态》，王丽娜、马得勇译，2014年第1期，第79页。

② 根据《俄联邦地方自治组织一般原则法》规定，市级行政构成（或称市镇构成）包括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市镇区、城市郊区以及联邦直辖市的市内区域（2014年联邦法律新增两种市镇构成的类型，所以当前俄罗斯共有7种市镇构成的类型）。在俄罗斯法律中，常用“地方的”（местное）这一概念来表述“市镇的”概念。

③ 因为俄罗斯联邦主体分为共和国、自治州、自治专区、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等类型，因此联邦主体首脑的称呼也多有不同，有总统（2012年立法修正案已取消该称谓）、州长、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等，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为“州长”或“地区首脑”。

④ 参见 Под ред Орлова Д.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 2016. М.: Грифон, 2017; Кынев А.В, Любарев А.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местные выборы 2014 года в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новы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М.: 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2015; Cameron Ross, “Regional Elections an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in White Stephen, *Russia's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111-131 等。

行地区选举研究。^①第三，进行具体的数据统计和案例分析，分析地区选举中的某些具体问题。^②除上述类型外，诸多涉及俄罗斯政治总体发展的研究也将地区选举作为重要的分析对象。

威权主义选举研究涉及不同的对象和内容，这些研究或关注选举作用，或关注选举行为本身。俄罗斯地区选举的研究涉及到政党、选举、央地关系、地区精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多个层面和维度。本文主要关注地区选举的制度改革和实践发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央地关系和俄罗斯地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本文不仅试图关注地区选举的结果，而且希望描述威权主义选举制度如何被构建，厘清其基本的参数和特点，从而尝试解释地区选举乃至俄罗斯整体政治制度形成的逻辑和功能，并以此为基点，“思考俄罗斯国家制度的生命循环——建立、发展和衰落，以及弄明白进一步演化的可能性”。^③

一、当代俄罗斯地区选举的改革与实践

当代俄罗斯地区选举的实践始于转型时期。1989年至1991年苏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选举，包括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1990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选举、1990年苏联总统选举（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选举产生）、1991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选举，也包括了最初的地区层面选举。

1991年3月17日，苏联进行全民公投，与此同时在莫斯科还进行了一场舆论调查。这一调查的实质是莫斯科市民全民公决，决定“是否进行莫斯

① 参见 Ora John Reuter, *The Origins of Dominant Parties: Building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in Post-Sovie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Коргуню Ю.Г. Партийная реформа 2012-2014 гг. и структура электоральных размежеваний в регионах России//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5. №.4. С.97-113.等。

② 参见 Сироткина Е.В, Карандашова С.А. Лояльность элит и выборы глав регионов: Роль предвыбор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и исходе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7. №.6. С.76-91; Ora John Reuter, “Regional patrons and hegemonic party electoral performance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2013, Vol.29, pp.101-135 等。

③ Гельман В.Я. Расцвет и упадок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го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я. 2012. №.4. С.65.

科市长的全民直选”。最终，莫斯科 54.8% 的注册选民参与了调查，其中 81.1% 的选民认为必须进行市长直选。^①1991 年 6 月 12 日（与俄首次总统选举同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莫斯科市长选举。这是当代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地区首脑选举。在地区立法代表或立法机构选举方面，1989 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了《人民代表选举法》^②及《地方人民代表选举法》^③。后者奠定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边疆区、州、自治区、自治州、城市等级别的人民代表选举的法律基础。1990 年 3 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后，次一级的地区代表和立法机构选举陆续在各地展开。1991 年在三个地区（阿迪格、阿尔泰、哈卡斯）进行了地区最高委员会的选举。

转型时期的地区选举的法律和制度基础与如今的地区选举有诸多差异。比如，有部分地区由地区议会选举产生州长^④；州长直选中具体选举制度在各地区有所不同^⑤；长期没有确定选举的程序^⑥；地区立法机构选举很少采用比例选举制等。

① Кынев А.В. Партии и выбор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Эволюция и Деволюция. М.: 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2011. С.260.

② Закон РСФСР «О выборах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РСФСР».

③ Закон РСФСР «О выборах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местных Советов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РСФСР».

④ 1993 年通过的俄联邦宪法允许联邦主体自行设置国家权力机关体系（在符合俄联邦宪法体制和联邦法律决定的国家权力代表和执行机关组织总体原则的基础上设置）。与地区选举相关的诸多法律制度在 1999 年才最终完善。在此之前，联邦立法中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被总统令和俄联邦宪法法庭的决议所补充。1993 年至 1994 年间，大多数联邦主体中允许建立地区宪法或章程，同时还有地区选举立法。大多数联邦主体的宪法和章程中规定地区首脑由直选产生。同时，一些地区规定执行机关首脑由立法机关选举产生。1996 年 1 月 18 日，俄联邦宪法法院在对阿尔泰边疆区的一系列宪法章程审议过程中做出决议，认定其产生行政长官的程序不符合俄联邦宪法。在此之后，直选的规定在各个联邦主体执行。总体来说，大规模的州长直选于 1996 年开始（有三个共和国 1998-2000 年才进行第一次直选）。参见 Кынев А.В. Партии и выбор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Эволюция и Деволюция. М.: 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2011.С.362-376.

⑤ 苏联解体后，大多数地区首脑选举遵照绝对多数制（第二轮相对多数制），但有一些地区采取一轮相对多数制，一些地区采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行政首脑选举法》的规定，要求胜选者必须在第一轮取得 25% 以上注册选民的支持，一些地区要求获胜者取得不少于 25% 的支持率。

⑥ 指缺少相关法律，以确定具体选举应在什么时间、由哪个机构提出举行。这一情况曾使叶利钦在 1996 年可以人为地拖延地区首脑的选举。

总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至今，俄罗斯的地区选举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制度改革和实践。如今俄罗斯每年都在“统一选举日”^①进行多地区、多级别、多类别的选举，每年的地区选举是研究俄罗斯地区政治的重要途径。本文将研究的主要时间维度设定为普京第一次当选总统之后，因为正是自普京时代起，开启了诸多对于俄罗斯地区政治和选举来说极为关键的改革。

（一）普京第一、二任期的地区选举改革与选举实践

1. 改革前的地区选举

在叶利钦时期的地区选举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地区政治精英，中央对地区政治进程的杠杆影响作用丧失。地区精英甚至还成了全俄政治进程中的重要角色。^②这一地区选举的特性与叶利钦时期的央地关系一致。在这一时期，中央向地区转移了一系列重要的行政权力杠杆，地区精英享受着独立的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中央与地区的不对称性加大，各地区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失衡。

俄罗斯联邦制度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的“去中央化”后，在普京上台后实现了“再中央化”，即建立了“垂直权力”，实现了：制度法规重新向中央集中，行政权的中央再集权、经济资源的中央再集权、央地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政治地位逐渐平衡，中央对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提高，地区精英在全俄政治进程中的作用明显下降。^③这些结果是通过普京第一、第二任期内的联邦制度改革实现的。

① 2005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公民选举权力及参与全民公投权力基本保障法》修正案规定，俄罗斯各地区、市级选举应该在“统一选举日”进行。根据该法律第8条第1款，统一选举日为任期结束当年3月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此之前，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有某个联邦主体、市级单位在举行不同类型的选举。2012年俄联邦通过立法修正案，规定统一选举日由3月移至9月。

② 1999年联邦级别选举前，对叶利钦政权形成巨大挑战的“祖国—全俄罗斯”（Отечество—Вся Россия）选举团就包含俄罗斯重要的地区精英。该选举团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尤·卢日科夫（Юрий Лужков）所领导的中派政治组织“祖国”和由一批有影响力的州长所建立的“全俄罗斯”运动。

③ 参见[俄]弗拉基米尔·格尔曼：“中央-地区-地方自治：当代俄罗斯的中央再集权政策”，《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第69-93页。

2003年起^①，政党和选举领域的改革也是联邦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领域的改革及实践，不仅触及联邦级别的选举，也触动了地区选举和地区政治。在地区选举改革之前，虽然联邦改革初见成效，但是地区精英还保留着相当实力，这从地区选举结果也可窥得一二。

在州长选举方面，从2000年至2005年取消州长直选的5年间，共进行了116次选举，其中2000年41次，2001年17次，2002年12次，2003年23次，2004年22次，2005年1次（2005年取消州长选举法律生效前还进行了1次州长选举）。在地区选举改革前，在任行政长官继续当选的比例较叶利钦时期大幅提高。2000年至2002年期间，70名在任州长中，有59人参加了地区选举（其余11人没有参加，是因为被选派担任了联邦委员会委员^②）。在参选的59位在任州长中，有44人胜选，在任州长连任的比例大幅提高。1996至1997年间在任州长连任的比例为46%，1997年至1999年这一比例为61%。普京上任至2003年，在任州长连任的比例为75%。^③此外，普京整个第一任期非本地新任州长的数字为0。^④总体来说，在联邦层面的改革伊始，地区精英还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普京对地区精英的对策是将现有的地区精英尽量纳入垂直权力管理。这一时期，联邦中央对州长选举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因候选人注册问题被排除在选举之外的情况较叶利钦时期增加，比如2000年库尔斯克州在任州长阿·鲁茨科伊（Александр Руцкой）在选前几小时被撤销候选人资格。

在地区立法机构方面，根据俄罗斯独立报和“地区”信息分析中心2004年10月刊登的数据，截至2004年，在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立法机构中，统俄党在19个地区立法机构中占据多数党地位，在18个地区立法机构中的

① 关于政党法、选举权法的立法改革自普京上任后（2001年）即开始，2003年开始更进一步进行集中立法修改，且从2003年开始大批此前的立法修正案开始集中生效。在地区选举改革开始以后，大多数地区在2003年到2009年进行了第一次改革后的地区选举。

② 普京上任后改变了联邦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自2002年起，地区行政长官不再担任联邦委员会委员。

③ Кынев А.В. Партии и выбор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Эволюция и Деволуция. М.: 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2011. С.379-381.

④ Два взгляда на одну систему// Коммерсантъ.11.04.2017.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263816>

席位接近一半，另外在 35 个地区的席位不足 1/3。^①由此可见，尽管当时统俄党已经成为联邦第一大党，但联邦中央依靠其完全控制地区议会的设想还没有达成。

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在 1999 至 2003 年之间，不论是在地区首脑选举中，还是在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中，政党的参与度与叶利钦时期相比均呈下降之势。^②如果说在叶利钦时期地区选举的主要内容为左翼政党与联邦权力之间的博弈，那么，普京第一任期伊始，政党在地区选举中的总体作用下降，地区选举中的主要竞争者是大量独立选举人。许多政党候选人甚至在选举中刻意淡化自己的党派特征，某些地区还出现了大部分立法机关议员都是无党派人士的现象。^③这其中原因也与民众在经历了 90 年代的动荡和左右翼党派在这期间的斗争后对政党活动感到疲乏不无关系。总之，这一时期地区内的竞争不再主要是政党之间的竞争，而是诸多有地区影响力的集团之间的竞争，包括家族、商业集团等等。

2. 地区选举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改革结果

普京第一、第二任期政党和选举领域改革的核心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各级选举中力推混合选举制度，主要是提高比例选举制在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中的比重。^④第二，严格政党注册制度，提高政党注册难度，提高候选人注册难度。第三，取消州长选举。具体来说，改革通过一系列立法修正案，如《俄联邦政党法》、《俄联邦公民选举权力及参与全民公投权力基本保障法》等，得以实现。^⑤在普京第一、第二任期结束后，梅德韦杰夫任总

① В регионах «медведи» –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8.10.2004. <http://news.samaratoday.ru/news/37985/>

② Голосов Г.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артийная система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1993-2003. С.66-67, 78-84.

③ Голосов Г.В. Измер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Полис. №.4. 2001. С.71-85.

④ 此前许多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中使用单席位选区多数选举制进行选举。1999-2003 年间，比例选举制只在 4 个地区的地区选举实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加里宁格勒州、普茨科夫州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且比例选举制产生的席位数均占较小的比例（加里宁格勒州 32 个席位中的 5 个，普斯科夫州 33 个席位中的 11 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42 个席位中的 20 个按比例制产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州立法机构当时还实行两院制，每两年更新两院中的一院，其中一半席位按照比例选举制产生）。

⑤ 具体法律法规包括：禁止以选举团、选举联盟等形式参选；在各级选举中加大比例选

统时期，尽管对具体法律法规有一些修正，但没有改变普京第一、第二任期地区选举改革的大框架，更于 2010 年在市一级的立法机构选举层面继续推进提高比例选举制的法律法规。

这一时期改革的核心目的，在于降低地区精英在俄罗斯联邦层面和地区政治中的实际影响力，实现联邦中央对于地区的完全控制。在现实结果上，改革极大地减少了政党数量，为联邦和地区选举建立了极为严格的“准入”机制，将此前地区精英利用地区性政党、小党、选举团、选举联盟等各种方式在地区选举中进行活动的空间完全压缩。地区精英的活动被纳入以政权党为框架的机制中。同时，尽管在俄罗斯政治体系中议会的地位和作用与执行机关相比较低，但改革以来，地区议会的权力地位得到了事实上的提升。地区议会议长成了地区层面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最高职位，地区议会多数党掌握了提名地区首脑候选人的权力。与之相对应的是，联邦中央掌握了州长的任命权，州长失去了民选地位、不再具有联邦委员会委员资格，在联邦权力结构中的地位降低。

在地区选举改革之后，联邦中央依托于统俄党，至少在外部形式上实现了对地区选举和地区政治的全面控制。这首先体现在更多州长开始加入统俄党。普京第一任期虽然已经推动第一轮垂直权力改革，但地区精英多不急于加入统俄党。因为尽管从现在的角度观察，2001 年成立的统俄党奠定了当代俄罗斯的政党格局，然而对于当时的地区精英来说，并未看到其与此前“昙花一现”的政权党有何实质性的区别，许多州长均处于观望状态。而随着普京第二任期联邦改革和地区选举改革的进一步深化，2005 年有 15 位在任州长加入统俄党，还有 8 位统俄党成员被任命为州长。总体来说，2005 年至

举制的份额并且提高障碍线；改变选举活动的金融保障；在席位划分等问题上采取有利于大党的法律法规；严格候选人参选的注册程序；取消对选举的独立社会监督；改变大众媒体选前宣传的法律法规；取消“反对所有人”选项等。具体改革内容可参见官晓萌：“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研究”，《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129-142 页；Кынев А.В. Выборы парламент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2003-2009: Первый цикл внедрения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М.: Центр “Панорама”, 2009; Stephen White, Ol'ga Kryshantovskaya, “Changing the Russian Electoral System: Inside the Black Box”, *Europe-Asia Studies*, 2011, Vol.63, No.4, pp.557-578; Cameron Ross, “Regional Elections an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Russia's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111-131 等。

2011 年没有一个新任州长是反对派政党成员。此外，随着联邦中央对地区政治的掌握度增强，外来政治精英越来越多地进入地区政治层面。普京第一任期时，非本地新任州长的数字为 0；第二任期时，非本地新任州长的比例为 13%。梅德韦杰夫时期这一数据为 48%。^①

在地区立法机构选举方面，统俄党自 2006 年起在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中的优势越来越大。自 2008 年起，在所有地区选举中都取得了胜利，并在地区立法机构中占据多数党的地位。（2007 年统俄党只有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选举成绩逊于公正俄罗斯党）。总体来说，大部分地区立法机构席位主要在统俄党和其他三个杜马党之间划分。统俄党通常占据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席位，其他三个政党瓜分剩余的三分之一席位。剩余几个没有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在地区选举中基本丧失影响力。更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地区层面，俄罗斯实际上只存在“一党半制度”（即地区实际活跃的政党数量平均只有 1.5 个）^②。

3. 地区选举改革的内在隐患与 2011 年的选举危机

地区选举改革以后，从地区选举的外部形式上，联邦中央对地区实现了完全的控制。这一控制主要依靠政权党实现。联邦中央期待依靠“垂直政党”对地区进行控制和管理。这是对于联邦改革中行政再中央化、经济再中央化的补充。但在完全控制的态势下并非没有隐患，这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统俄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协助中央实现对地区政治的管理，而不只是外在形式上的控制。作为从上而下建立的政党，统俄党在完成众多分支机构铺设的过程中，在尽力实现选举最大胜利的过程中，必然将大批拥有选举实力，把个人利益、派系、意识形态上差异性极大的精英纳入自己党中。地区各方精英则放弃了过去“投资”多个政党或组织的方式，转而进入统俄党的地区分支机构。这实际上意味着地区精英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了党内的分歧，最终导致地区精英之间的斗争以争夺党的控制权的方式展开。^③与

① Два взгляда на одну систему//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1.04.2017.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263816>

② Кынев А.В. Выборы парламент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2003-2009: Первый цикл внедрения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М.: Центр “Панорама”, 2009. С.12.

③ Darrell Slider, “How United is United Russia? Regional Sources of Intra-party Conflict”,

此同时，为了保障这种多个派系的联盟，必然会产生一个意识形态松散的政党。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政党自身的长期发展，也不利于培养真正忠实的选民群体。在这一时期，统俄党尽管取得了极大发展，但是作为自上而下建立的政党，作为与“领导人”紧密绑定的政党，有时被认为只是一种“虚拟的”霸权政党^①，政党的实际决策权被认为掌握在政党以外的人手中。

第二，州长任命制下的地区管理能效和选举动员问题。在取消州长直选后，州长不再需要从选民手中争取选票，只需对中央负责，而中央对州长的忠诚度要求高于对其经济管理能力的要求。有欧美学者在考察了 2005 至 2010 年期间的州长任命情况后发现，联邦中央在任命州长时更多考虑其对选举的动员能力，即州长能否在地区和联邦级别选举中保障统俄党的胜利，并以此评价其对联邦中央的忠诚度。中央对州长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表现的考虑是次要的。选举动员能力强的州长得到再次任命的可能性更高。^②这种任命取向实际上与国家地区治理的要求并不相符。此外，虽然中央对地区领导人选举有选举动员的要求，但是在取消州长直选后，苏联解体后经历了长时间选举实践建立的“地区选举机器”也面临着逐渐失去能效的情况。

第三，地区精英并没有在中央建立垂直权力后消失，而是在各地区依然保存着各自的实力。在这一时期，联邦中央对地区干部和精英的控制方式主要是要求其加入政权党，成为“垂直政党”中的一部分。“不听话的”干部则可能面临刑事指控，被剔除出地区政治。^③相较于叶利钦时期，地区精英确实放弃了离心倾向。但在非竞争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地区精英并没有停止与中央进行非正式的“讨价还价”^④。一些关键地区的传统地区精英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地位和利益。

第四，政党竞争空间的减少一方面引发了部分民众的反感，一方面从技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2010, Vol.26, pp.257-275.

① Sean Roberts, *Putin's United Russia Party*, London: Routledge, 2012.

② Ora John Reuter, Graeme B. Robertson, "Subnational Appointmen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Evidence from Russian Gubernatorial Appoint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2, Vol.74, pp.1023-1037.

③ Пятилетка КОЛа. Как Вячеслав Володин изменил российскую политику.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05.10.2016. <http://carnegie.ru/commentary/?fa=64783>

④ [俄]弗拉基米尔·格尔曼：“中央-地区-地方自治：当代俄罗斯的中央再集权政策”，《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第91页。

术上反而增加了反对派集中抗议选票的可能性。地区选举改革通过限制准入机制，虽然极大地减少了总体的政治竞争，压缩了反对派，但是在社会经济情况差的情况下，对政权党不满的民众反而容易集中抗议投票。这也是为什么 2011 年阿·纳瓦尔内 (Алексей Навальный) 提出“为随便哪个政党投票”的口号后，体制内的反对派政党获益最多的原因。

2010 至 2011 年间，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开始集中体现。2011 年末，统俄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失利，且俄罗斯爆发了 2011 年至 2012 年的抗议危机。这一危机是大的时代背景与中央的具体决策复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包括：第一，世界局势中的不稳定和变化触动到许多国家（阿拉伯之春、整个欧洲 2010 年至 2011 年期间的抗议潮等），俄罗斯也未能置身于整个世界环境之外。第二，自身不断发展的俄罗斯经历了社会结构的改变，中产阶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三，技术革命对全世界政治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社交媒体在俄反对派和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上述社会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经济发展不顺遂的条件下，前文提到的改革隐患使统俄党的选民基础发生动摇。此外联邦中央在选举前的决策也是造成选举结果的部分原因。在维·沃罗金 (Вячеслав Володин) ^① 倡议和普京支持下建立的全俄人民阵线在客观上分化了统俄党的支持率。^② 梅德韦杰夫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州长更换，将民选时代的一批州长换成更为忠诚的官僚，寄希望于其努力调动投票，结果反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③

在上述复合条件下，统俄党在 2011 年的地区选举前就遭遇了支持率下

① 维·沃罗金是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90 年代末是“祖国-全俄罗斯”选举团（后与团结党合并为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曾任国家杜马议员。2011 年全俄人民阵线在其主张下成立。2012 至 2016 年担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2016 年起担任国家杜马主席。

② 尽管全俄人民阵线成立之初标榜与统俄党合作、保障普京支持率，但 2011 年选举中统俄党和阵线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实际上当时的新闻中不乏“阵线”即将代替统俄党的各类猜测。这种情况有可能导致精英的站队，2011 年统俄党选举失利与此不无关系。参见 Драка в кабине пилотов. Чем опасн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Володина и Кириенко,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08.06.2017. <http://carnegie.ru/commentary/71176>

③ 关于州长轮替与选举结果的关系可参见大串敦：“支配型政党的统制界限——统一俄罗斯党与地方领导人”，《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101-119 页；Ora John Reuter, “Regional patrons and hegemonic party electoral performance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2013, Vol.29, Issue 2. pp.101-135.

降的危机，最终在联邦级别选举中遭遇了失利，甚至被诟病选举舞弊。选举后，俄罗斯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二）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地区选举和地区政治变化

1. 表面“放松”与实质“收紧”的政治进程

2011年末至2012年的街头抗议，导致普京的第三任期开局不甚理想。体制外的反对派通过组织抗议动摇国内政治的稳定，体制内的反对派利用政党的支持率下跌增加了自身的政治“分量”。普京第一、第二任期设定的一系列制度被认为有失效的可能。

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沃罗金接替弗·苏尔科夫（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担任总统办公厅负责国内政治的第一副主任^①，被认为将重塑在2011年开始失效的制度。沃罗金上台后，俄罗斯国内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带有宽松性质的具体改革，以提高政治领域的“公开性”、“竞争性”、“合法性”。改革内容包含：放松政党注册门槛、恢复州长直选、严格选举监督措施等具体立法改革。

然而这些改革现在来看，只是面对民众情绪的妥协性回应，其背后反而隐藏着一系列严格政治控制的实质。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实际上面临着威权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巩固，一系列政治制度及实践发生了原则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通过制度和非制度手段扩大对反对派政治人物的压制（对2011、2012年的街头抗议领袖和积极分子的监禁）；系统地进入公民社会，扩大意识形态管控的领域，并加强对个人领域的干涉；对媒体进行政治控制（包括“外国代理人法”及其他媒体监督选举领域的立法改革）等。

上述变化中当然也包括了一系列选举立法及相关政治制度的修正，联邦中央进一步增强了对各级选举的控制，主要体现在：第一，恢复州长直选和

^① 总统办公厅是负责保障俄联邦总统工作以及监督总统命令和决议执行的国家机构，通常由办公厅主任直接领导。总统办公厅还设副主任、总统新闻秘书及各类助理和顾问等各类职务。“负责国内政治的第一副主任”并不是官方的职位设置，而是俄国内各界承认，总统办公厅通常有一位第一副主任负责国内政治领域及人事干部等领域的具体工作，普京时代这一岗位经历了苏尔科夫（1998至2011年）、沃罗金（2012至2016年）、基里延科（2016至今）的变化。

加强竞争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制度上的约束，选举的准入机制进一步收紧。第二，通过混合选举制度的回归及其他配套的选举制度改革，保障统俄党在国家杜马的席位数。^①第三，通过放宽政党注册条件，用众多新政党分化选举市场，将集中的抗议投票引向众多小党、新党。

在地区选举层面，制度上的约束体现在，即使最为令人瞩目的州长直选也存在着各种保障机制和“过滤器”，比如：

第一，2013年俄联邦进行立法修正，规定联邦主体有权力自行决定地区首脑产生方式，可以选择直选或由议会代表投票的方式选举地区首脑。这一规定为一些地区取消直选提供了可能性。当前俄罗斯已经有数个地区采用议会投票方式选举地区首脑。这主要为北高加索等地区的民族共和国或自治区，包括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汉特-曼西自治区、阿迪格共和国、涅涅茨自治区等。这一改革被普京认为有利于保障有民族问题的地区的稳定。^②对此，有俄罗斯专家质疑，虽然当前只有少数地区实行议会选举州长的方式，但鉴于统俄党在各地区议会多数党的统治性地位，通过修改地区法律取消直选，从法律上讲是可能的。^③

第二，设置“犯罪过滤器”（Криминальный фильтр）^④，将真正的反对派排除在合法的选举舞台之外。犯罪过滤器不仅针对地区选举，而且针对俄联邦各级别选举，指的是对候选人的犯罪记录限制。2013年以前，犯罪记录并不是参加选举的障碍，候选人前科未消灭（即有犯罪记录）也可以参加选举。这一规定被认为使一些反对派候选人不可能通过注册手续。比如2018年总统大选最受瞩目的反对派候选人纳瓦尔内，其候选人资格被中央选举委

① 降低比例选举制的份额，被官方解释为旨在提高政治竞争。但是从最终的成果上分析，竞争并未增加。在统俄党普遍支持率下降的背景下，依靠候选人个人、通过各种制度保障在单席位选区获胜，反而有助于提高席位总数。具体参见官晓萌：“从第七届杜马选举看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3期。

② Синдром отмены. Власти начали избавляться от выборов губернаторов// Лента.ру. 24. 01. 2013. <https://lenta.ru/articles/2013/01/24/gouverneurs>

③ Там же.

④ 犯下严重罪行（特别严重罪行）被判处剥夺自由，且前科未消灭或提前撤销者，自前科消灭或提前撤销之日起10（15）年内不能参加选举。

员以犯罪记录问题为由驳回。实际上纳瓦尔内不仅不能参加总统选举，因为犯罪记录限制，他也不能参加俄联邦各级别的选举。

第三，设置“市政过滤器”（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е фильтр），将有实力的、但非中央“属意”的反对派候选人排除在选举舞台之外。市政过滤器指候选人必须收集到所在联邦主体市一级领导、议员的支持签名，才能最终完成注册并参加选举。这些签名包括：各市级立法机构代表和（或）市级行政领导的支持签名。根据各地区具体法律规定，签名的立法机构代表或领导比例应达到所有代表和领导总数的5%-10%，而且这些代表或领导应该至少来自该地区三分之二的市级立法机构或市政府，即不能在某几个行政单位一次收集多名代表签名。市政过滤器对于在任州长和政权党来说是有利的。现任州长拥有地区行政资源，政权党在地区、各市级立法机构中占优势地位。比如在2018年州长选举中，只有统俄党有能力在全部22个联邦主体、俄共有能力在3个联邦主体，靠自身政党实力通过市政过滤器，独立推出自己的政党候选人。^①否则，候选人通常需要经过跨党派协商，得到中央和统俄党的支持，才能注册为候选人。因此，尽管2012年以后出现一些体制内的反对派州长，但他们还是经过联邦中央“允许”的人选，不可能是真正的反对派。

除了对于州长选举的准入限制，立法机构选举中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注册难度也进一步提高。这首先体现在2014年春，俄法律恢复了对选举签名的要求，且标准较之前法律有极大提高。^②这一收集签名的标准被评论为“苏联解体以来最严格的收集签名要求”^③。此外，其他注册流程也较以前更为

①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 Выдвижение и регистр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ов на выборах глав регионов, назначенных на 9 сентября 2018 г. 10.08.2018. <https://www.golosinfo.org/ru/articles/142798>

② 2014年的选举权法修正案对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中候选人收集签名做出了新的要求，由2012年的“政党候选人免于收集签名，独立候选人收集0.5%所在选区选民签名支持”，修改为“政党候选人和独立候选人需要收集所在选区选民总数3%的签名”。具体法律内容参见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5 мая 2014 г. N 95-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сновных гарантия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прав и права на участие в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ivo.garant.ru/#/document/70648928/paragraph/43:0>

③ Кынев А.В, Любарев А.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местные выборы 2014 года в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новы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М.: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2015. С.11.

复杂，需要提供的文件繁复。这些因素都使没有签名优惠^①的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注册变得十分困难。俄专家对此认为，一方面决策层可借此控制体制外反对派或“未经中央核准”的体制内反对派进入选举；另一方面地区权力可以帮助一些没有真正选举实力的“搅局”党进入选举，以分流反对派的选票。^②

2. 政治控制的结果

普京第三任期起针对“舞弊”、“缺乏政治竞争”等抗议主题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增加了政党的数量（俄罗斯政党数量由 2011 年的 7 个迅速增加至 2012 年的 77 个）；引入了一系列选举透明的保障措施（监控设备等）。

然而从前文分析来看，尽管政党数量增加，真实的选举竞争并没有实现。2012 至 2013 年间出现了大量新的政党，在地区立法机构中也出现了杜马党以外的政党，然而在严格的选举准入条件下，真正的反对派进入选举市场的可能性并不大。更有俄学者认为，随着各项制度的严格，自 2014 年起许多新建政党的积极性严重下降。^③老的体制内政党一方面面临着来自“搅局者”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可能会被联邦中央在某些地区取消资格，因而在现实活动中更多选择与政权合作。在克里米亚危机后，这些政党更一致对政权表示支持，尤其是在对外政治领域的决策上坚定支持政权，也因此一部分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的选举中不再存在反对派，俄共等体制内反对派被评价为“忠诚的反对派”^④。

综上所述，从普京第三任期开始，联邦中央对各级选举活动实现了进一步控制。俄联邦从 2012 年恢复直选起共进行了 87 次州长选举，其中 2012 年 5 次，2013 年 8 次，2014 年 30 次，2015 年 21 次，2016 年 7 次，2017

① 指国家杜马党、或者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率 3%以上的政党、任意地区立法机关最近一次选举得票率超过 3%的政党可以免于收集签名。

② Сбор подписей делает выборы предсказуемыми, считают эксперты «Голоса»// Ведомости. 17.08.2015.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15/08/17/605002-sbor-podpisei-delaet-vibori-predskazuemimi>

③ Кынев А.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реформы: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вертик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2014-2016 институты и практики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2014-2016/ Под ред К.Ю. Рогова. М., 2016. С.177.

④ Голосов Г.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эволюция стратегий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система/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2014-2016 институты и практики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2014-2016/ Под ред К.Ю. Рогова. М., 2016. С.104.

年 16 次。选举的竞争性不强，只有 2015 年在伊尔库茨克州出现了第二轮选举。而且部分俄罗斯学者和媒体认为，伊尔库茨克州选举是联邦中央允许的“失败”，可以展示直选的“竞争性”，并不是联邦中心担忧的失控状态。^①2012 至 2017 年共进行了 92 次地区立法机关选举。其中 2012 年 6 次，2013 年 16 次，2014 年 14 次，2015 年 11 次，2016 年 39 次，2017 年 6 次。在这些选举中，统俄党均保持着在所有联邦主体立法机关中多数党的地位。最终在 2016 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俄党重新夺回多数党的地位。在上述完全控制的局面下需要注意到以下特点：

第一，政权党支持率并没有质的提高，地区选举、国家杜马选举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保障和克里米亚共识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 年代在经济发展顺遂的大潮下，统俄党不仅是总统权力的表现，更实质性地巩固了一部分中派立场的选民。然而经历了 2011 年复杂的经济政治局势后，其中派选民的基础受到了严重的冲刷。从民调数据也可以发现（见图 1），虽然近年来政权党的支持率的起伏与普京本人的支持率走向基本保持一致，但两者之间的差距自 2012 年起有增大的趋势。尽管 2014 至 2015 年统俄党支持率上升，但更多是克里米亚共识的红利。

第二，俄罗斯靠制度设计和跨党派协商等方式，实现了高程度的政治控制。在精英领域，这一策略必然使部分精英的晋升通道受阻。比如有俄学者认为，“克里姆林宫指定的统俄党候选名单也没有保障地区精英代表的渠道。”^②长此以往，本来忠于体制的精英也会被向其他方面挤压。这有引起精英分裂的可能。威权制度下选举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将精英纳入政权体系。政治精英们的利益附着于政权生存，从而维护政权本身的稳定。^③如果政治精英在体制内的晋升渠道受到阻碍，就有可能破坏威权制度本身的稳定。

① Сибирь за «красными»: как кандидат от власти проиграл иркутские выборы. РБК. 09.27.2015. <https://www.rbc.ru/politics/27/09/2015/56082d319a79472b3f3a4800>

② Под ред Рогова К.Ю.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2014-2016 институты и практики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2014-2016. М.: 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2016. С.21.

③ Btatriz Magaloni, *Voting for Autocracy – Hegemonic party survival and its demise in Mexic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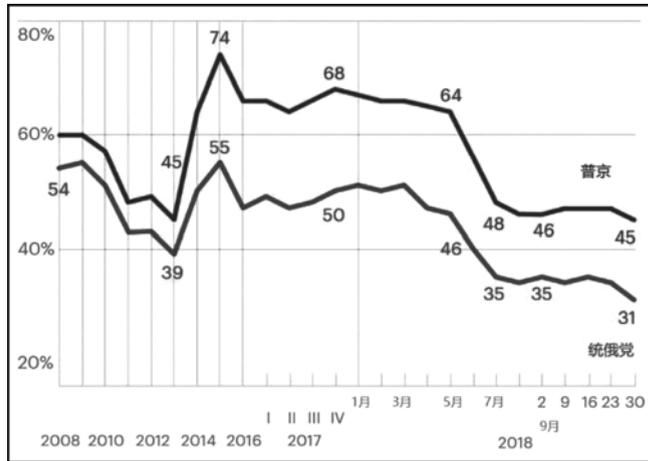


图1 普京及统俄党支持率走向图（2008年至2018年9月）

资料来源：«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добралась до минимума.РБК. 05.10.2018. <https://www.rbc.ru/newspaper/2018/10/08/5bb74f429a7947d234df963a>

第三，实行直选制度后，民选州长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有所上升，部分州长开始要求一定的独立性，而与之相对，联邦中央不但在选前控制州长的人选，更在选后要求其绝对忠诚，不允许州长展现自身的独立性。比如2015年萨马拉州州长尼·梅尔库什金（Николай Меркушкин）希望在萨马拉市形成忠于自己的市杜马，但随后就被威胁可能被清除出统俄党。^①中央和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张力。

在上述背景下俄罗斯迎来了2018年的总统选举和地区选举，选举前进行了一定的地区层面的人事改革。

二、2018年地区选举分析

2018年的地区选举尤为引人关注。从选举结果来说，4个地区的州长选举进入第二轮，为2012年恢复直选以来首次出现的状况；统俄党在4个地区的立法机构失去了多数党地位，为政权党2007年以来最大的选举失利。

^① Два взгляда на одну систему// Коммерсантъ.11.04.2017.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263816>

从选举的时间节点上来说，这是 2018 总统大选后的第一次集中选举，发生在俄罗斯社会近年来最受争议的退休年龄改革之后。从选举覆盖的地区来看，本次选举包含 26 个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选举、16 个联邦主体的立法机构选举^①，选举地区既包括莫斯科等重要中心城市，也包括多个边疆区、共和国。从选情的复杂程度来看，选举不仅包括一些传统上抗议情绪较重、反对派较为活跃的地区，也涉及一些政权党实力相对较为薄弱的地区。从地区发展角度看：在选举前，大批在任州长提前卸任，总统新任命大量代理州长，大规模的干部轮替带来了地区精英的新变化。

综上所述，2018 年地区选举是普京第三任期以来在国内选举领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在统俄党和普京在联邦级别的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后，作为整个 2016 至 2018 “大选举周期”的终结点，2018 年地区选举值得具体研究。

（一）新一轮干部任命

2018 年共有 22 个联邦主体以直选方式选举州长。本次举行选举的地区数量并非恢复直选以来最多的。2014 年共有 30 个联邦主体进行了直选，且提前选举现象比本次更多，但当时三分之二的地区都是在任地区首脑谋求连任（即在任州长提前结束任期，以代理州长身份参加选举）。与之相比，本次选举中 22 个直选联邦主体中有 16 个为提前选举，都是在前任地区首脑提前卸任情况下，由新任命的代理州长参加选举。这涉及到近两年来大规模的州长轮替现象，是普京“干部年轻化”方针在地区首脑任命方面的体现。“干部年轻化”是 2016 年末以来总统办公厅主导的国家人才方针，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国家需要 50 岁以下的管理者。

观察 2012 年恢复州长直选以来的选举情况可见，自 2017 年起，新任命代理长官的参选比例明显增加（如图 2 所示），其前任通常因各种原因提前卸任。其中以 2016 年 10 月为分界线，代理州长的人物背景和职业履历有了

^① 2018 年俄罗斯地区选举于 9 月 9 日统一选举日举行，包括：26 个联邦主体行政长官选举（其中 22 个联邦主体采取直选形式，4 个联邦主体采取议会投票形式）、16 个联邦主体立法机构选举、一些联邦主体首都立法机关或行政长官（市长）的选举。

明显的变化。在 2016 年 6 月集中任命的 4 名代理州长中，苏联时期克格勃出身的官员占 3 名。如果继续向前追溯，则 2016 年参加地区选举的 5 名新任代理州长中有 3 名为强力派精英，分别出身于苏联时期克格勃、内务部、国防部。然而 2016 年 10 月基里连科（Сергей Кириенко）接替沃罗金担任总统办公厅负责国内政治的第一副主任后，俄罗斯媒体中开始频繁出现“年轻技术官僚”（молодые технократы）这一表述，以此解释联邦中央选拔地区管理人才的新趋势。俄罗斯地区层面开始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自那时起至 2018 年地区选举前夕，俄联邦共任命了 27 位代理州长（如果包括 2016 年 10 月 6 日任命的加里宁格勒州代理州长，则为 28 名），这 27 名代理州长先后参与了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州长选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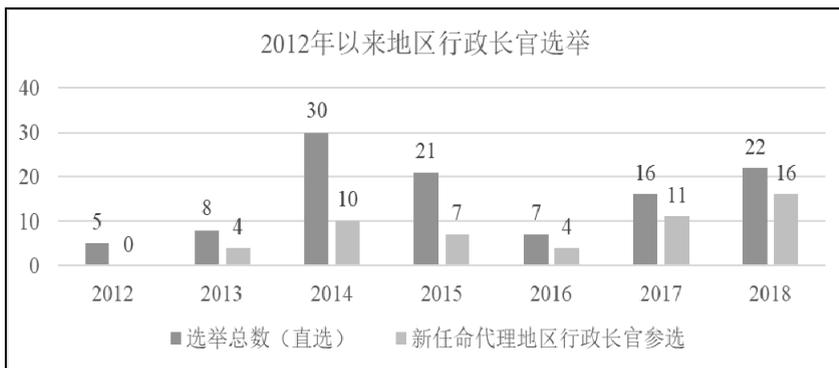


图 2 2012 年恢复直选以来俄罗斯地区行政长官选举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俄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数据库具体选举数据总结，<http://www.izbirkom.ru/region/izbirkom>

笔者根据俄网络公开资料，调查了 27 名州长的专业背景、政治生涯之前和之后的职业履历、地区和政党属性等基本资料。^①从中可以发现“干部年轻化”方针执行以来新任命代理州长的一些特征，由此也可以分析新一轮干部轮替的逻辑。

1. 年轻化

^① 由于资料无法穷尽，可能在个别数据存在争议，欢迎就具体数据提出进一步意见并进行商讨——作者注

普京和总统办公厅均曾在不同场合对“干部年轻化方针”做出过解释，认为新一代的俄罗斯干部年龄应在50岁以下（甚至45岁以下）。在地区首脑层面，27位新任代理州长中，三分之二年龄在50岁以下，约一半人年龄在45岁以下。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任命都完全符合“干部年轻化”的年龄标准。不过一些代理州长虽然超过50岁，但与原州长年龄相比，也可以算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年轻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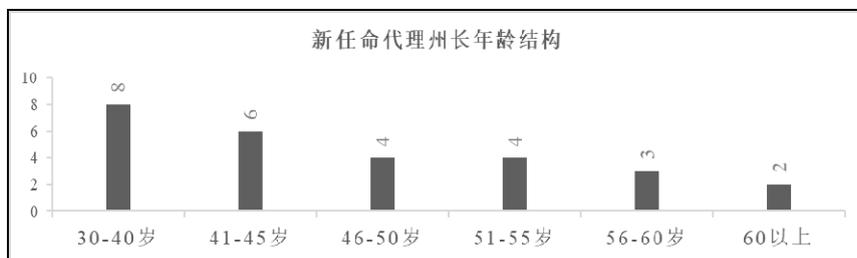


图3 2016年10月至2018年地区选举前新任命代理州长的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各代理州长具体资料整理（通过俄网络检索各代理州长的详细资料）

2. 专业性

从研究意义上讲，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官僚概念强调官员能够取得管理权力，是因为其具有知识，是“技术精英”的一员，认为技术官僚政府的领导人物应该在其担任相关职位前没有政党背景。^①一些学者强调技术官僚在问题决策上是以专业性为指导原则的。^②总体来说，对于技术官僚的技术究竟应该包含哪些专业领域，当前学界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但通常将其与传统政治官僚（bureaucrats）相区分，更强调其专业性而非政治性。

俄罗斯媒体在提到基里延科的“技术官僚”方针时，通常会用“在经济和管理领域有经验的、能够解决具体管理任务的专门人才”^③来诠释这一术

① 参见Duncan McDonnell and Marco Valbruzzi, “Defining and classifying technocrat-led and technocratic govern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14, Vol.53, No.4, pp.654-671.

② 参见 Frank Fisher, *Techn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Sage Publications, 1990.

③ Кремль омолаживает до 50-ти, кремль взял курс на омолож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адров // Газета.09.21.2017. https://www.gazeta.ru/politics/2017/09/20_a_10899794.shtml?updated

语。分析新任命的 27 名州长的专业背景和相关履历后可以发现，从专业角度考察，27 人中有 20 人出身于经济、管理以及自然科学类专业，另有 7 人具有法学等传统政治人物常见的专业背景。^①从管理经验来讲，27 人中从政以前有 15 人有管理国企或私人企业的经验，还有 2 人有高校管理经验，有 10 人是直接进入不同机关任职，成为职业政治家。在政治生涯方面，这 27 人中半数以上曾负责相关地区或联邦级别的经济工作，其中至少 6 人曾任部长，2 人曾任全权代表。值得注意的是，27 人中依然有 3 人的政治生涯始于内务部、检察机关、刑侦机关等强力部门。

从上述资料分析，这些新任命的代理州长并不完全契合传统政治学学科对于“技术官僚”的定义，与苏联时期出身于工程专业的技术官僚概念也无相关之处，他们大多具备“经济标签”并具有一定的联邦或地方管理经验。一些代理州长是来自联邦的部级干部，在普京任总理期间与其有工作接触。

3. 政党背景

27 名新任命代理州长中，大多数人为统俄党党员，还有一些在担任州长后加入统俄党（如诺夫哥罗德州代理州长）。4 名代理州长为无党派人士，但均由统俄党推荐参与州长选举。1 名代理州长为全俄人民阵线成员，由统俄党推荐参选。1 名代理州长为公正俄罗斯党成员，由统俄党推荐参选。真正并非统俄党成员、也非统俄党推荐参选的代理州长，实际上只有 1 名，即奥廖尔州的安·克雷奇科夫（Андрей Клычков）。对此需注意，统俄党对该代理州长人选表示公开支持。奥廖尔州前任州长也是俄共党员，克里姆林宫这一任命显然考虑到了当地实际的政治力量。

综合来说，2012 年恢复直选后开始陆续出现一些体制内的反对派州长，但这些任命实际上包含了现实考虑。比如前面提到的奥廖尔州的克雷奇科夫等人。体制内的反对派能够得到克里姆林宫的任命，受到统俄党推荐参选或支持，是跨党派协商的结果。因为联邦中央也希望在非关键地区适当让渡权力给体制内的反对派，以保证其不会在对政权更为重要的地区参加选举。

^① 政府官员通常在职业生涯中会继续进修获得更高学位，因此通常其最高学位为经济、管理、法律等政治人物通常拥有的相关专业学位，而本文的考察和统计的专业出身为其开始政治职业生涯时的专业背景。

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对于州长选举的限制分析，体制内的反对派州长能注册为候选人，真正走上选举舞台，一定是经过中央核准的，是跨党派协商的结果；又或者被认为实力不足，不构成威胁。否则各类“过滤器”能够将有实力的、有竞争力的反对派剔除出竞选名单。

4. 外来管理者

根据资料分析，新任命的代理州长大多数人不属于当地精英，27人中只有10人有当地政治活动的背景^①，多数系从联邦层面或从其他地区调任，俄罗斯媒体将这些州长称为“瓦良格州长”（Губернаторы-варяги）^②。总体来说，自普京上任以来，“外来”州长的数量增加。普京第一任期时，非本地新任州长的数字为0。第二任期时，非本地新任州长的比例为13%。梅德韦杰夫时期这一数据为48%。普京第三任期时，外来州长的比例已经达到64%，^③新的地区干部任命显然继续保持了这一趋势，只有近三分之一的新任命代理州长拥有本地政治资源。针对非本地精英，普京在选前会通过精英进行公开会晤（有时甚至多次会晤）的方式，利用其个人的影响力提高其当选可能。

5. 新一轮干部任命的逻辑

普京在第三任期后期开始这一轮特点鲜明、规模较大的地区干部轮替，必然有其现实及深层次的逻辑。这首先是普京整体人事政策在地区层面的体现，也是普京对国内政治领域规划的体现。2016年普京邀请基里延科担任总统办公厅负责国内政治问题的第一副主任。这一决定曾引起外界的广泛猜测。基里延科作为俄罗斯自由派代表人物，其人物形象本身与其前任苏尔科

① “本地背景”主要指在本地有实际政治履历或管理经验，有些出生于该地区但没有在此地区有实际政治经验的官员被视为外来官员。此数据为作者本人根据代理州长公开履历归纳。有俄媒体统计，新任代理州长中9人有当地背景。参见 Кремль назначает губернаторами молодых технократов — но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 управленцев.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нет! 2018.06.03. <https://meduza.io/feature/2018/06/03/kreml-naznachayet-gubernatorami-molodyh-tehnokratov-novoe-pokolenie-upravlentsev-na-samom-dele-net>

② 瓦良格人，也被译作“瓦兰人”。关于俄罗斯国家起源的“诺曼说”主张，古罗斯时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诺曼人，即瓦良格人，是罗斯国家的创立者。瓦良格人相对于罗斯土地而言是“外来者”，因此俄罗斯媒体将外来的、非本地的州长称为“瓦良格州长”。

③ «Варяг» из центра: как изменился портрет губернатора-новичка за 18 лет. 16.10.2017. РБК. <https://www.rbc.ru/politics/16/10/2017/59de58a99a79474f1855c9d0>

夫、沃罗金等人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基里延科本人就被认为是技术官僚。与其相比，苏尔科夫、沃罗金都是成长于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中的政治人物，被认为是“政权党缔造者”、“主权民主意识形态构建者”或是“选举制度的设计者”。因此俄各界在该任命颁布之初普遍猜测，基里延科将在政治领域实现技术官僚统治，而不是像苏尔科夫、沃罗金一样从事政治本身和政治制度建设的工作。

这一国内政治领域的变化受到了多方猜测。作为研究者，很难从公开资料推测普京决定的原因。也许是普京个人厌恶周边精英集团无序竞争；抑或是在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局势下，普京希望淡化政治意识形态，专心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基里延科上任后，在干部人事政策中体现了其个人风格。“年轻化”和“技术官僚”不仅是地区政治层面的新特点，也是整个联邦各层级用人的新准则。为了实现这一人事政策，基里延科与总统办公厅主导实行了“州长培训”^①，此外，他还主导了以选拔新一代俄罗斯领导人为目标的大型公开竞赛——“俄罗斯领袖”。2017年“俄罗斯领袖”竞赛的获胜者中，45位被任命为各级别的领导，其中有些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干部，还有些被任命为能源部、医疗保障部副部长等副部级干部。^②

“年轻化”的干部任命确实为国家政治管理层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广大青年干部有了政治上升的通道。在普京第三任期，俄罗斯靠制度设计和党派协商等方式实现了高程度的政治控制。但在精英领域，这一策略也存在一系列负面效果，其中一点就是，对部分精英来说晋升通道受阻。“年轻化”的干部任命有助于重新打开青年精英的晋升渠道。

在地区层面，具备经济管理能力的州长也被期待能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

① 许多新任命的代理州长均曾“毕业于”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РАНХиГС)的州长培训课程。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的第一期“州长培训”课程共有74名学员参加，其中9名在课程期间和课程结束后被任命为州长，2名被任命为部长。该课程由总统办公厅发起，目的是为总统的干部资源增加新的储备。课程包括讲座、单独辅导、小组项目培训和团队拓展活动，授课者包括总统办公厅和政府内的代表、地区行政长官和大公司领导。第二期“州长培训”课程已于2018年6月启动，参与学员有77名。

② 45 участников конкурса «Лидеры России» получили новые назначения.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Лидеры России. 12. 03.2018. <https://xn--d1achcanypala0j.xn--p1ai/page2450021.html>

一定的动力。普京在大选前后通过国情咨文等文件向选民承诺过诸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这些目标需要通过众多相关领域的管理人才实现。但是从此次干部轮替开始的时间节点和政治背景来看，这一措施也是针对总统选举、针对国内整个政治局势的现实选择，具有相当的实用目的。在外部制裁、经济低迷、普京即将参与第四次总统竞选的大背景下，干部使用上的新面孔以及经济标签都是俄罗斯决策层应对民众情绪的具体举措，目的在于改变民众对于“缺乏变化”的反感情绪，打破地区社会的悲观情绪。新的干部任命还体现决策层重视年轻人对于自我实现局限性的抱怨、以及在各类抗议中对于政权更新的要求。

除了应对选情和民情的现实考虑，中央选择好管理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外来人才担任地区首脑，是在直选机制下，继续保持对地区首脑控制权、从而维护垂直权力平衡的新手段（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二）2018 年地区选举结果分析

1. 具体选情和选举结果

关于 2018 年的地区选举，俄媒体纷纷报道统俄党和联邦中央的“失利”。而选举结果究竟说明了俄罗斯当前何种地区局势，还需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仅根据表面数据判断。

首先，本次地区选举延续了近年来俄罗斯选举低投票率的趋势，此次州长选举中投票率较上一届增长的只有 6 个地区（鄂木斯克州、马加丹州、阿尔泰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哈卡斯共和国和弗拉基米尔州），在大部分选举地区，投票率较上一届地区选举有明显降低。投票率的降低不仅是选举制度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现象，更是俄罗斯国内民众对于政治领域缺乏竞争的消极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在 6 个投票率增加的地区中，3 个地区正是发生第二轮投票的地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哈卡斯共和国、弗拉基米尔州），这说明本次选举中增加的投票率可能多来自于“抗议”投票。

总体来说，2018 年进行选举的地区本就包括了许多传统上统俄党支持率低、抗议情绪较重的地区。参考 2016 年杜马选举统俄党的支持率可以发

现，4个州长选举进入第二轮的地区中^①，2016年杜马选举中统俄党的支持率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支持率（滨海边疆区38.98%，哈卡斯共和国38.06%，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37.31%，弗拉基米尔州45.02%，统俄党全国平均支持率为54.2%）。在地区立法机构方面，许多举行选举的联邦主体本身就不是统俄党的强势地区（对此可以参考统俄党2016年杜马选举中比例选举制选区的得票率：在16个举行立法机构选举的联邦主体中，统俄党得票率只在5个地区超过其全国平均支持率）。反观俄共的情况可见，至少在本次举行选举的地区，几乎都是俄共支持率高于全国平均支持率的地区，其中伊尔库茨克、乌里扬诺夫斯克、伊万诺夫等州俄共的支持率均超过20%或接近20%。

在这一背景下需注意到这4个发生第二轮州长选举的地区中，只有一个新任命的代理州长在第一轮选举中落选，即滨海边疆区的安·塔拉先科（Андрей Тарасенко），这与其公开支持退休金法案不无关系。^②政权党在4个地区的第一轮州长选举中失利，但这些地区本身是抗议区域，几位候选人又都有负面消息，且其中三名为老面孔，在地区抗议情绪重、求变心理强的背景下，在第一轮选举中失利并非意外。^③而在第二轮选举中，这些候选人

① 第二轮选举的结果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自民党候选人当选；哈卡斯共和国俄共候选人当选；弗拉基米尔州自民党候选人当选；滨海边疆区统俄党候选人当选。

② 塔拉先科在第一轮选举中以46.5%的得票率大幅领先位列第二名的俄共候选人安·伊先科（Андрей Ищенко）。滨海边疆区第二轮选举中，在统计完95%选票时，中央选举委员会和滨海边疆区选举委员会网站上均显示俄共候选人伊先科的得票率领先代理州长塔拉先科6%，然而在清点99%选票后情况突然反转，塔拉先科反而领先，由此产生了选举舞弊争议。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计票结果，第二轮选举中代理州长得票率为49.55%，俄共候选人为48.06%。在伊先科抗诉，认为一些地区的投票数据在计票系统中被篡改后，中央选举委员宣布选举无效，第二轮重新选举被推迟至2018年12月16日。

③ 这3位在任州长均涉及一些负面消息。弗拉基米尔州的斯·奥尔洛娃（Светлана Орлова）在选前一直被传将会“提前卸任”，其不同机构的州长评价排名中成绩不佳。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在任州长维·什波尔特（Вячеслав Шпорг）的失利则是本人选举策略失当、地区抗议情绪较重（2018年总统选举中普京主要对手格鲁吉宁在该地区得票率超过18%）、反对派动员积极的综合结果。哈卡斯共和国同时进行州长、地区立法机构、地区行政中心立法机构等多个选举，选情本身较为复杂。哈卡斯在任州长维·济明（Виктор Зимин）是梅德韦杰夫时期任命的州长，虽然2013年在直选中当选，但2016年以来一直受困于负面消息：2016年州政府高层贪腐事件后被要求辞职；2016年地区经济情况恶化，地区债务大幅超过地区收入；2017年在电视对话栏目中的不当表达引发社交网络上的反对情绪等。当地以俄共为首的地区反对派也一直积极组织对其抗议。

失利则是正常情况，并不能就此说明当选的自民党或俄共候选人作为反对派实力更强。因为通常反对派容易在第二轮选举中集中选票，这是世界各国选举中的常态。总体来说，2018年州长选举的结果对政权党和联邦中央来说不能算成功，但代理州长的任命也没有失败。在滨海边疆区塔拉先科失利，第二轮选举结果取消后，普京将萨哈林州长阿·科热米亚科（Олег Кожемяко）调至滨海边疆区任代理州长。在2018年12月16日举行的第二轮重新选举中，科热米亚科获胜。至此，所有普京任命的代理州长均保持了在地区选举中的胜利。2018年地区选举后，普京又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地区首脑轮替，任命了新一批代理州长，为2019年地区选举提前布局。

在立法机构选举方面，选举后俄罗斯国内外大批媒体报道了统俄党的失利和俄共的胜利，即，统俄党在伊尔库茨克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哈卡斯共和国的支持率低于俄共支持率。对此，若从具体数据分析来看，尽管在这三个州俄共在比例选举制部分支持率超过统俄党，但如果计算单席位选区的结果，俄共实际上只在伊尔库茨克州总席位数超过统俄党，且没有达到议会多数党席位数。统俄党在四个地区（哈卡斯共和国、后贝加尔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失去了议会多数党地位（席位数低于50%），此为近十年来首次出现的情况。

考虑到退休年龄改革大背景，这一选举结果也是正常的。执政党为不受欢迎的政策在选举中付出代价是正常现象，这并非俄罗斯的特点，而是世界选举政治中的常态。在统俄党自身发展过程中，2004年也曾因为福利货币化改革政策在支持率上受到过相当影响。2004年8月，福利货币化法案在俄国家杜马的一片反对声中通过，引发了普京上任以来第一次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2004年6月到8月，俄罗斯30多个城市爆发了反对改革的游行。统俄党和普京本人的支持率都因这一法案下降。根据不同社会调查机构的数据，统俄党的支持率在2004年下降超过10%（社会舆论基金会公布统俄党支持率由31%下降至20%^①）。

① Индикаторы. ФОМ. 24.02.2005. <http://bd.fom.ru/report/map/dd050801#d050808>. 根据该调查，在民众考量的诸多因素中，社会经济原因（主要指福利货币化改革）甚至排在灾难恐怖事件（主要指别斯兰事件）之前。

表 1 2018 年俄罗斯地区立法机构选举情况（统俄党）

联邦主体	总席位数 (比例制席位/单席位 选区席位)	统俄党得票率与席位情况			是否多数党		备注
		2016 年杜 马比例制 得票率	2018 比例制 得票率/ 席位(较上届)	2018 单席位 选区席位 (较上届)	本届	上届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混 (55/55)	56.37%	58.31% /35 (-14)	44 (+5)	是	是	
布里亚特共和国* ^①	混 (33/33)	43.34% ^②	41.9% /16	25	是	是	
卡尔梅克共和国*	比 (27)	70.61%	68.58% /21 (+3)	/	是	是	
萨哈共和国(雅库特)*	混 (35/35)	46.42%	50.84% /20 (-1)	23 (-6)	是	是	
哈卡斯共和国	混 (25/25)	38.06%	25.46% /7 (-7)	10 (-10)	否	是	俄共 16 席
后贝加尔边疆区	混 (25/25)	39.87%	28.30% /8 (-6)	13 (-9)	否	是	俄共 14 席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	混 (23/24)	44.48%	31.59% /9 (-9)	16 (-9)	是	是	
弗拉基米尔州	混 (19/19)	45.20%	29.57% /7 (-6)	16 (-3)	是	是	
伊万诺夫州*	混 (13/13)	42.38%	34.14% /5 (-5)	10	是	是	
伊尔库茨克州	混 (23/22)	39.80%	27.83% /8 (-5)	9 (-7)	否	是	俄共 18 席
克麦罗沃州	混 (23/23)	77.33%	64.31% /16 (-6)	23 (+1)	是	是	
罗斯托夫州	混 (30/30)	58.79%	57% /21 (-3)	25 (-3)	是	是	
斯摩棱斯克州	混 (24/24)	48.13%	36.34% /9 (-4)	17 (-6)	是	是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混 (18/18)	48.46%	33.96% /7 (-8)	10 (-6)	否	是	俄共 14 席
雅罗斯拉夫尔州	混 (25/25)	58.79%	38.43% /11 (-6)	21 (-2)	是	是	
涅涅茨自治区	混 (11/8)	41.11%	38.97% /4 (-2)	7	是	是	

资料来源: 根据各地区选举委员会数据及媒体公布数据总结, <http://www.izbirkom.ru/region/izbirkom>

① *标表示数据来源并非权威的选举委员会发布, 截至论文截稿, 并非所有地区选举委员网站均公布了官方选举结果, 有些数据来源于媒体报道。

② ■表示统俄党支持率低于其全国平均支持率 54.20%。

退休年龄改革因素、选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低支持率的统俄党籍地区首脑，这些都是此次统俄党选举失利的外部因素。但究其内因，政权党近两年来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瓶颈，这涉及更多复杂因素，包括前文所提到的政权党选民基础问题，也包括普京对政权党发展的策略摇摆，还涉及沃罗金和基里延科权力交接后，政权党的地位和党内人事关系等诸多问题，这些复杂因素需进一步综合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统俄党在普京第三任期以来取得的选举成绩，并不是其自身支持率的体现，而更多来自于制度设计。因此，在存在诸多外部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取得当前的选举结果也并不意外。

许多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将此次选举称为反对派的胜利，尤其是俄共的胜利，但是从选举结果分析，俄共主要是在其本来相对来说支持率较高的地区（伊尔库茨克州、哈卡斯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进一步扩大了“战果”。总体来说，俄共的胜利之处并不在于其选举实力较此前有长足提高。毕竟在2017年地区选举后，俄共还被俄国内选举专家评论为“选举实力进一步减弱”。^①此次选举中，俄共的真正成果在于“消化”统俄党失去席位的能力更强。俄共除了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克麦罗沃州、涅涅茨自治区和伊万诺夫州没有席位增加以外，在其他地区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且增加幅度较大，其比例制部分得票率也较两年前的杜马选举有较为明显的提高。俄共支持率提高也与俄共对退休年龄和养老金改革的反对态度有关，是民众对于改革反对态度的投射。

综上所述，地区选举中反对派的胜利并非自身实力有长足的进步。在政权党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在其自身竞选出现问题（不受欢迎的州长）的情况下，在不利于政权党的选举背景（退休年龄法案的影响）下，反对派通过有的放矢的竞选活动，在本身具有一定优势的地区继续扩大了影响力。

2. 选举后的地区格局

从数据上来看，此次地区选举对于统俄党自身来说肯定是失败的，但分析全国各联邦主体的情况，此次选举并不意味联邦中央对地区的失控。首先在地区立法机构方面，联邦中央依托统俄党继续实现了对大部分地区立法机

^① Орлов Д.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 2018: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и обновление элиты. 12.09.2017. <http://www.regcomment.ru/articles/regionalnye-vybory-2017-konkurentsiya-legitimnost-i-obnovlenie-elity/>

构的控制。俄罗斯当前各个联邦主体中，议会多数党非统俄党的仅有 4 个地区，且统俄党在其中 3 个地区立法机构席位总数超过其他政党，只有在伊尔库茨克州的席位数低于俄共。

在地区首脑方面，俄罗斯当前各联邦主体中共有 14 名无党派州长（截至 2019 年 1 月），但均为统俄党推荐当选。非统俄党籍州长当选情况如表 2 所示，除了 2018 年地区选举中的 3 个联邦主体外，其他联邦主体中只有伊尔库茨克地区是通过第二轮选举，由俄共候选人当选。其余鄂木斯克州、斯摩棱斯克州、奥廖尔州的反对派州长或为统俄党推荐，或为统俄党支持，或为统俄党主动在该地区放弃提名候选人，说明这些地区的州长人选均是决策层首肯的结果，是跨党派协商的结果。

表 2 当前非统俄党州长地区、立法机构统俄党非多数党地区一览表

	地区行政长官	议会	备注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自民党（2018 年第二轮当选；非统俄党推荐或支持）	统俄党议会多数党	
伊尔库茨克州	俄共（2015 年第二轮获胜；非统俄党推荐或支持）	无议会多数党	2018 年选举，俄共 18 席，统俄党 17 席，
哈卡斯共和国	俄共（2018 年第二轮；非统俄党推荐或支持）	无议会多数党	2018 年选举，统俄党 17 席，俄共 14 席
鄂木斯克州	公俄党（2018 年当选；统俄党推荐参选）	统俄党议会多数党	
弗拉基米尔州	自民党（2018 年第二轮当选；非统俄党推荐或支持）	统俄党议会多数党	
奥廖尔州	俄共（2018 年当选；统俄党支持）	统俄党议会多数党	
斯摩棱斯克州	自民党（2016 年当选；统俄党在该地区未推出候选人）	统俄党议会多数党	
后贝加尔边疆区	统俄党	无议会多数党	2018 年选举，统俄党 20 席，俄共 14 席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统俄党	无议会多数党	2018 年选举，统俄党 17 席，俄共 14 席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区选举委员会及媒体公布数据制作

实际上在 2018 年选举后，反对派占绝对优势的只有伊尔库茨克这一俄共传统强势地区（见表 2）。此外哈卡斯共和国第二轮选举中俄共候选人

瓦·科诺瓦洛夫（Валентин Коновалов）当选，第二轮选举前除科诺瓦洛夫外的所候选人相继退选，最终只有俄共候选人一名候选人出现在选举中并胜选，这一情况是 90 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特殊情况，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不能排除最终的选举结果是联邦中央与党派协商的结果。鉴于统俄党在该地区失去议会多数党的地位，该地区后期局势仍值得进一步关注。滨海边疆区第二轮选举结果被取消，重新选举时间被推迟。在等待 2018 年 12 月 16 日重新进行第二轮选举的过程中，普京任命的临时代理州长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拉拢”选民的地区经济、社会政策，以期扭转该地区不利的选举局势。最终在第二轮选举中普京任命的代理州长获得胜利。

三、选举中的俄罗斯地区政治——变化与维持

从叶利钦时期至今，以俄罗斯地区选举为切入点观察，俄罗斯的地区政治一直经历着发展变化，具体的选举制度经历了改革，选举结果也发生着变化。但是分析制度建设和权力结构的本质，依然可以发现，俄罗斯地区政治在变化中一直保持着某些固有特点。

（一）垂直权力主角的变化

普京第一任期起，尤其在州长直选被取消后，俄罗斯威权主义的稳定是依靠垂直权力和政权党共同实现的。政权党作为选举威权主义制度中的主要角色，不仅保障了对选举过程的控制，更促成了俄罗斯联邦“单一制”^①的既成事实，州长在这一时期需要得到总统和地区议会的双重支持，其地位是被弱化的。

2011 年杜马选举前后，统俄党实际支持率下降。尽管在选举结果和形式上，统俄党依然保持着无可置疑的优势地位，但这一地位不是依靠其自身支持率取得，而是不断加强的制度保障、克里米亚共识和普京本人的威望带来的。从普京第三任期的选举改革内容来看，决策层实际上基本放弃靠提高

^① 对俄罗斯“联邦制”、“单一制”问题的讨论，参考温恒国：“单一制联邦：俄罗斯国家结构的法理悖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1-8 页。

政权党支持率保障选举结果，而是通过对选举的行政控制和制度操控，最终实现政权党在立法机构的席位保障。但这也引出一对矛盾关系，即一方面政党自身发展乏力，另一方面政权对其需求没有完全消失。尽管统俄党的中长期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必须承认其在当前俄罗斯政治中已经发挥的独特作用和所拥有的现实地位。统俄党在各级立法机构拥有绝对优势，这极大地降低了领导人推行各种法案的立法成本，比如该党党团在国家杜马中提出的立法草案和通过的立法草案数量，远远多于其他杜马党（参见表 3）。统俄党可以保障普京的政策方针实现。此外，统俄党完善的基层政党组织能够承担精英招募和选举活动的任务，可以在各级选举中限制反对派，可以制衡直选州长的权力。当前俄罗斯国内外发展环境都对政治稳定有极大的需求，上述事实都意味着统俄党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

表 3 2018 年统俄党党团在国家杜马的立法表现

党团	提出法案	其中		
		接受审查	被召回，返回，取消，否决	总统签署
统俄党	5287	3639	310	1338
公俄党	666	514	111	41
俄共	970	471	480	19
自民党	425	309	62	54

资料来源：Итоги 2018: Законотворческа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депутатских фракц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09.01.2019. <http://cipkr.ru/2019/01/09/itogi-2018-zakonotvorcheskaya-konkurentsiya-deputatskih-fraktsij-gosudarstvennoj-dumy/>

一方面政权对政党有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政党本身发展又遭遇瓶颈，这一矛盾关系未来如何继续发展值得关注。但是从当前俄罗斯政治现实来看，虽然统俄党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有所降低，但是仍然很难被替代。这是因为从政权党自身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真正实现对各级立法机构的控制需要相当的时间和庞大的资源，更需要社会安全稳定、经济发展顺遂、领导人自身支持率稳固的“天时、地利、人和”。在当前俄罗斯经济、政治、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统俄党被其他政党迅速替代的可能性并不大，随着沃罗金离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其所创立的“全俄人民阵线”被作为统俄党“备胎”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

与统俄党发展相比，在恢复州长直选后，取得了总统任命和民选背书合法性的州长成了垂直权力体系中新的重点，在联邦权力体系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这一地位的提高还与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中央-地区-地方这一联邦权力结构关系中地方自治的变化有关。地方自治是指，俄联邦行政体系中的地方级别^①区域中的居民，以直接方式或通过建立地方自治机关的方式来行使自治权。《俄联邦宪法》和《俄联邦地方自治组织一般原则法》^②是俄联邦地方自治的法律基础，这一法律规定实际上也是国家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③

地方自治（МСУ）作为联邦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及独立性从普京第一任期起就持续下降。普京第一任期除了通过相关法律将联邦主体纳入垂直权力改革外，还对俄联邦地方自治的法律基础进行了改革，给予联邦主体以权力，在没有市镇级行政机关的同意下可以改变地方自治模式。联邦主体有权决定，其辖区内市镇一级单位的行政首脑（下文简称市长）是由选民直选产生，还是由市级立法机构从其成员中选举产生。^④至2014年，已经有43个联邦主体取消了地区内的市长直选。在此基础上，2015年2月3日通过的《俄联邦地方自治组织一般原则法》修正案，增加了新的选举市级首脑的方法——由地方自治机构立法机关代表从选拔委员会提供的候选人中选取，选出的地方首脑可以领导市政府。这意味着市长可以由选拔委员会任命的、非民选产生的城市管理者担任。这说明联邦中心在取消市长选举后进一步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通常是州长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关键城市市长的任命权。

取消市长直选有利于联邦中央瓦解过去长期存在的、独立于垂直权力体系之外的、一些以城市地方自治为中心的反对派势力。在州长直选恢复后，地区权力掌握在具有民选合法性的州长手中，与此同时，随着地方自治的独

① 指市镇级别。

②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бщих принципах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6 октября 2003 г. №.131-ФЗ.

③ 刘铁威：“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内涵解析”，《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第52页。

④ 法律规定联邦主体有权力选择市级机关首脑产生的方式——直选或由市级立法机构从其成员中选举。直选产生的市长可以同时担任市级立法机构主席职位或领导市政府。由立法机构代表选举产生的市级首脑负责领导市级立法机关，市政府管理则由任命产生的城市管理人（сити-менеджер）负责，该法案于2009年1月1日生效。

立性降低，州长在地区层面一般不大会受到来自有实力的市长的挑战和制衡。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政权党的支持率下降，直选州长在垂直权力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自然有所提升。

（二）州长任命方式的变化与中央控制的维持

在苏联解体后初期，自叶利钦确定了最初的各地区首脑后^①，俄罗斯州长选举实际经历了直选、任命（准任命）、恢复直选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叶利钦本人以及联邦制度对地区精英缺乏有效制衡。普京第一任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建立垂直权力并将叶利钦时代存在的精英纳入垂直权力的管理。普京第二任期和梅德韦杰夫时期取消州长直选，后期更进一步提出由地区议会多数党提名候选人担任州长，这一机制使决策层开始有可能依托政权党，替换掉部分地区的行政长官，将其更换为总统认可的本地精英或外来干部。事实上，州长选举方式的变化，一直与俄罗斯央地关系发展和联邦制度变革密切相关，互为因果。比如，叶利钦时代开始的直选制，对应苏联解体后中央对于地区的权力让渡；取消州长直选则对应普京建立和强化垂直权力体系。那么，2012年恢复直选是否意味着对垂直权力体系的控制的放松？答案是否定的。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梅德韦杰夫任期末到普京第三任期伊始推出的政党、选举领域的宽松政策，在2013年后迎来了“矫正”，俄国内政治整体向控制性更强的方向发展，这体现在一系列制度领域的变化上。在制度保障的同时，决策层对关键地区关键人选提前进行跨党派协商和布局，使得恢复直选后的州长选举，更接近于总统任命、地区选民对总统任命人选进行全民公决的活动。归根结底，恢复州长直选并不意味着中央试图对地区让渡权力。

事实上，与苏联时期相似，当代俄罗斯的地区威权制度依然受到委托-代理（patron-client）关系问题的影响。^②联邦中央和地区执行机关之间是“自

① 叶利钦时期，首批俄罗斯地区首脑实际上由任命和直选两种方式产生。

② [俄]弗拉基米尔·格尔曼：“中央-地区-地方自治：当代俄罗斯的中央再集权政策”，第88页。

上而下”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①没有实质的变化。不论是直选还是任命制，委托人的追求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联邦中央作为委托人，对地区权力的要求一直是忠诚，只是忠诚的具体表现有细微的变化——在叶利钦时期是保持联邦统一不分裂，在普京时期是保障联邦中央要求的选举结果。地区权力执行机关（以州长为代表的地区精英）的追求，在叶利钦时期是尽量保持更多的经济、政治独立性；自普京时期开始，中央逐渐要求地区执行机关放弃政治独立性，地区执行机关转而追求中央给予一定的自由度以追求个人的政治利益和地区经济利益。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掌握着奖惩机制的杠杆。在普京时期，不论是任命制还是直选制，中央除了通过各类手段实现对地区首脑的“任命权”，在选举后也一直在通过各类手段加强对地区首脑的管理。在苏尔科夫担任总统办公厅负责国内政治的副主任时，地区层面并没有太多“意外”的选举结果出现，反对派更多地在市级层面的选举中发力，中央更倾向于针对具体情况进行“惩罚”。比如 2007 年斯塔夫罗波尔市市长在地区杜马选举胜利后，很快遭到了刑事指控。^②沃罗金接任后，反腐败成为地区政治工作中最显著的主题之一。沃罗金 2011 年主导建立的全俄人民阵线，负责大量反腐败资料收集工作，成为其对州长施压的工具。^③当然在经济危机情况下，州长对于普通居民的资源掠夺可能造成许多更加严重的后果，俄联邦中央本来也很难对地区的贪腐视而不见。此外在 2014–2015 年期间俄强力机构在国内政治领域，尤其是地区层面针对地区领导人的调查等也值得注意。^④基里延科上任后，反腐败的主题暂时被放到了第二位，技术官僚、干部资源储备等话题成

① 委托-代理问题可以简化为两个效用函数——委托人的效用函数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二者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代理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委托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就可能降低代理人的效用，影响代理人的积极性，最终又影响自身效用。参见倪星：“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第 148–157 页。

② Пятилетка КОЛа. Как Вячеслав Володин изменил российскую политику.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③ Два взгляда на одну систему// Коммерсантъ.11.04.2017.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263816>.

④ 参见 Петоров Н.В., Рогов К.Ю.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власть и силовые корпор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2014–2016, Институты и практики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 Под ред. К.Ю. Рогова. М., 2016.

为新的地区工作主题，这也许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增加了新的办法来维持对州长的控制。这些新的州长是非政治化的经济或管理人才，且大部分并非本地精英。这些精英一方面可以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自身作用，另一方面，“去政治化的”、“可靠的”、“易于管理的”非本地精英，更利于继续保持联邦中央对于地区权力的主导，维持垂直权力的平衡不被打破。

综上所述，普京时期中央对地区的关系与俄罗斯帝国时期、苏联时期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这与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传统相关。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的激励和管理措施虽然有阶段性的重点不同，但是与苏联时期的“选择性惩戒加干部轮替”策略基本相同，俄罗斯联邦中央对地区的管理带有极大的“手动控制”特点。

结语

普京就任总统至今，当代俄罗斯的地区选举中一直发生着一些具体制度和选举实践的发展变化，比如：选举改革由严格控制政党数量改为允许更多政党在地区选举中存在；州长的选举方式的改变；权力结构的主导由政权党变为地区行政长官；在具体的地区干部任命策略上的变化。但是，地区政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也始终包含着一些不变的逻辑。

首先，自普京上任以来，不论选举的具体情况如何，中央从未真正让渡过对地区选举的控制权，但是在控制中会考虑具体的政治成本，在很多情况下会允许部分地区精英保留一定的经济、政治利益。归根结底，俄罗斯央地关系现状的成因是复合的，“一方面是由于联邦精英间竞争的消除，使得克里姆林宫垄断了政策的制订；另一方面，也是国家领导人的理想和政治理念的结果。因此，只要这两个条件没有改变，同时外在因素（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也无法迫使中央去改变自己的方针，那么俄罗斯的中央再集权政策就很难发生根本改变。”^①第二，不论是严格政党注册、减少政党数量，还是放松政党注册、增加政党数量；也不论在地区推行哪一种具体的选举制度，

① [俄]弗拉基米尔·格尔曼：“中央-地区-地方自治：当代俄罗斯的中央再集权政策”，第93页。

联邦中央的制度设计就是一步一步地严格控制选举的准入机制，打压体制内外的反对派，实现对地区选举的完全可控。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只是不断因势改变具体的策略。

除了上述地区选举的特点，可以发现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俄罗斯地区选举呈低参与的趋势。这既符合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趋势，也是俄罗斯威权体制下选举的正常现象，因为在威权制度下，民众有一种对政治的“被动的服从和冷感，退而扮演褊狭的和臣属的角色”^①。政权本身也越来越倾向于避免群众过于热衷参与政治。尤其是自 2011 年至 2012 年的抗议危机后，可以观察到，在联邦级别的选举（如 2016 年国家杜马选举）和一些地区选举中，决策层的选举策略就是淡化选举活动，避免过度调动投票反而引发抗议投票。^②与之相矛盾的是，威权制度下的选举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在于，选举可以提供有关政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信息。^③在这一意义上，地区选举实际上比联邦级别选举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会连接和识别选民的意义。当前俄罗斯选举低参与率向决策者提出了问题，即俄罗斯实际上存在着大量不愿意参加选举的民众。联邦中央需要获取信息，了解这些人属于什么样的群体，不参加投票的原因是什么，这也应该是未来研究俄罗斯选举活动的重点之一。

俄罗斯地区选举的制度和俄罗斯整体政治控制的情况一样，均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联邦中央不断因势而变，进行制度修正，然而每次改革实现一定控制后往往出现新的问题打破控制，如此往复。为了保持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的稳定性，权力中心必须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实现选举结果的可控性。在这一过程中，决策层在力图保证选举结果的同时，往往无法兼顾对地区治理实际效果的要求。实际上俄罗斯的地区政治和国家政治发展不仅仅

① 参见 Juan Linz,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 in Erik Allardt and Stein Rokkan eds., *Mass Politics*, Free Press, 1970, pp.251-283.

② 不包括 2018 年总统选举，2018 年总统选举前俄罗斯大力推行各种旨在提高投票率的制度改革，以保障普京当选的合法性。参见官晓萌：“当代俄罗斯总统选举制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26-43 页。

③ 参见 Btatriz Magaloni, *Voting for Autocracy – Hegemonic party survival and its demise in Mexic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是政治问题，更是“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的特殊性”^①问题。在新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维持政治控制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在这一背景下，尽管 2016 至 2018 年的选举周期刚刚结束，更多研究者却已经开始关注 2019 年的地区选举相关信息。2018 年地区选举后，又有 11 个地区开始了新一轮在任州长提前退位和大批代理州长的任命。这些地区的人事变动，一方面是中央针对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决策，另一方面也是针对未来国家政治的布局，保障地区选举结果还是为 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做准备。因为 2018 年及以后几年的地区选举，决定了 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时的地区主要领导和权力构成，对保障联邦选举在各地区的具体选举动员具有重要意义。在 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后，俄罗斯将迎来 2024 年总统选举。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杜马选举后的立法机构构成、地区权力布局，均对普京之后的俄罗斯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未来两年俄罗斯国内政治除了联邦级别的人事任命等要点外，地区选举和地区政治也是需要关注的要点。

【Abstract】 Regional elections in Russi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g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ussian and th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y involve many complex issues such as political parties, elections, regional elit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y constitut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in making researches on the internal operating mechanism of Russian authoritarian system. Since Putin's first presidential term, the system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elections in Russia have been undergoing the following changes. The central electoral strategy has changed from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number of political parties to allowing more political parties to exist; the regional legislative elections have changed from vigorously promoting proportional elections to mixed elections; for governor elections, they have undergone changes from direct elections to appointments then to direct elections; the main role of the authoritarian electoral

① 庞大鹏主编：《普京时期的俄罗斯（2011-2015）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system has changed from the United Russia Party to the governor; regional elites changed from pursuing independence to cooperating and making compromises, striving for more benefits.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changes, there also exists some unchanged logic: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to control regional elections remains unchanged; the main means of central control of regional elections have not changed substantially. Since Putin's third presidential term, Russia's domestic political control has increased, which is reflected in various areas of its domestic political ecology, including regional politics and regional elections. Although something relatively unexpected happened to regional elections of 2018, yet it is still rather difficult for the opposition to actually control the regional situation in Russian Federal Regional Elections against current background by analyzing the design of authoritarian system.

【Key Words】 Russian Elections, Russian Regional Elections, Russian Governor Elections, Russian Regional Legislature Elections, Russian Governors

【Аннотац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 в России тесно связаны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развитием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центром и регионами, затрагивают множество сложных вопросов, таких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выборы,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элит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являются одной из важных отправных точек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механизма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системы. Со времени пер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 Путина система и практик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выборов менялись: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избиратель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была изменена с жёст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за количеств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на создание больше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энергичное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выборов 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органы уступило место возвращению к смешанн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е; выборы губернаторов претерпели изменения от прямых выборов к назначениям и опять к прямым выборам, основная роль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перешла от патриии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к губернаторам,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элиты изменили тактику с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н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мпромисс, пытаясь добиться большей выгоды. 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выбора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в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вышеуказанным изменениям, всё ещё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некоторая неизменная логика: решим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 остаётся неизменной, и основные средства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и выборами не претерпели существе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После треть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 Путина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ой России усилился, что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внутрив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логии, включ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выборах 2018 года произошл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еожиданны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10 лет изменения, однако анализ структуры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системы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в нынешних условиях оппозиции всё ещё трудно реальн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ситуацию в регионах.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Выборы в Росс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 в России, выборы губернаторов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 в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органы, российские губернаторы

(责任编辑 崔珩)

中东欧问题研究

顿巴斯战争与前线城市中的政治 ——以马里乌波尔、克拉马托尔斯克为例*

松里公孝**

【内容提要】本文比较了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州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较量前线的两个城市——马里乌波尔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城市政治。2014年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曾占领这两座城市，但乌克兰又夺了回来。两座城市都是公司城（单一城市），大工厂的负责人（经理人），又称“工作职位给予者”，对城市的决策拥有决定权。本文比较了两个城市的领袖在顿巴斯战争前如何应对里纳特·艾哈迈托夫商业帝国的扩张，战时又如何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打交道。由于乌克兰方面分化了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家大公司，获得其中一家大公司的支持，导致两座城市在战后建设中走向不同的方向。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选举竞争白热化，而反对派集团（前地区党）在马里乌波尔继续维持一党独大的地位。

【关键词】顿巴斯战争 马里乌波尔 克拉马托尔斯克 公司城 反对派

【中图分类号】D7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2-0127(28)

这是一项将战争前线的两座相似的城市——马里乌波尔（Маріуполь）

* 原文发表于 *Nationalities Papers* 杂志 2018 年第 6 期（Kimitaka Matsuzato, “The Donbas War and politics in cities on the front: Mariupol and Kramatorsk”, 2018, Vol.46, No.6, pp. 1008-1027）。本文获得 *Nationalities Papers* 杂志 2018 年最优论文奖。作者授权本刊发表中文译本，在此表示感谢。

** 松里公孝（Kimitaka Matsuzato），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承担者。

和克拉马托尔斯克（Краматорск）进行比较的研究，旨在探寻顿巴斯战争后幸存的两座城市，其地方政治精英是如何参与到 2014 年之后乌克兰恢复中的政党政治。两座城市离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onetsk People's Republic, DPR）都非常近，同时也是乌克兰政府控制的顿涅茨克州的第一、第二人口大城市。^① 马里乌波尔在 2014 年 6 月到 11 月曾是顿涅茨克州首府，随后其位置被克拉马托尔斯克取代。选择这两座城市不仅是因为它们很重要，也是因为两座城市都具有乌克兰东部地区城市的典型特征——公司城（Company town）。公司城指的是一座城市里有一家或几家大型企业，这些企业控制着地方的经济命脉，为城市提供绝大多数就业岗位，提供公共服务，繁荣地方市场，在选举中通常具有决定性影响力。公司城应该在多数国家都可以看到，许多语言都有同样的习语就是证据：如俄语的моноград（单一企业型城市），德语的Arbeitersiedlung，日语的勤行上町，中文的公司市镇等。此外，俄语中有大量广泛使用的词汇，表示这种能形成市镇的大公司。公司城的地方政治体制是能够自动运转的，但同时这种体制对外界冲击的反应很敏感，因为它们资源丰富、经济发达，同时也是票仓，容易招来四方覬覦。再加上这些市镇拥有单一文化的工业结构，难以适应市场全球化的要求。的确，新世纪以来马里乌波尔和克拉马托尔斯克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要为三个严峻的外部挑战做好准备：即里纳特·艾哈迈托夫（Ринат Ахметов）商业帝国的扩张，乌克兰亲欧盟分子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武装争夺，以及波罗申科（Пётр Порошенко）将这些城市整合进后 2014 时代乌国家政党体系的努力。这些城市的领袖们在应对这些挑战时表现反应各不相同。

虽然多数乌克兰问题专家都赞成乌亲欧盟示威及随后出现的顿巴斯战争与地区因素高度相关，我也有一些相关成果^②，但在这个领域，相关研究却较为贫乏。有关顿巴斯战争的次地区（地方）研究成果，我仅知道朱可夫

① 顿巴斯战争前，顿涅茨克州的城市人口排名是：约 95 万人的顿涅茨克市，45.9 万人的马里乌波尔，31.5 万人的马凯耶夫卡，25.4 万人的格尔洛夫卡，16.3 万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但现在，顿涅茨克、马凯耶夫卡与格尔洛夫卡构成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② Kimitaka Matsuzato, "Domestic Politics in Crimea. 2009-2015",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16, Vol.24, No.2, pp.225-256; Kimitaka Matsuzato, "The Donbass War: Outbreak and Deadlock",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17, Vol.25, No.2, pp.175-200.

(Yuri Zhukov) 做的定量分析研究。^①我赞同朱可夫的发现，即机器制造业工人占雇佣工人的比重决定反基辅政权暴力抗争的频率，理由是机器制造领域强调工人协作互助，与俄国工业形成高度互补。下文将分析，顿涅茨克州的三大工业带的城市“代表”，似乎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精神气质与行为：煤矿城市顿涅茨克市（Donetsk）、冶金城市马里乌波尔以及机械制造之都克拉马托尔斯克。

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公司城，拥有极其典型的寡头式社会-政治结构。该结构源自苏联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建设工厂和集体农庄。这些单位不仅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成为满足当地居民生存和生活之需的共同体：管理公共住房，向当地人提供电、天然气和自来水，给幼儿园和学校提供午餐与牛奶，清除道路积雪，为丧礼提供汽车服务等。即便是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企业和工厂主们仍（无奈地）继续在地方公共服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正是这种情况让这些企业成为强大的选举机器，成为竞争性选举时代政党的替代者。企业管理的头头们由此获得不同的绰号：红色经理（red directors），工作职位给予者（job-givers, работодатели）或叫寡头（oligarchs）。

我们可以将马里乌波尔的亚速和伊里奇两个钢铁厂（Azov and Il'ich Steelworks）、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New Kramatorsk machine-building Factory, NKMI）和动力机械特钢厂（the Energomashspe-tsstal）看作是“建造城市”（city-forming）的企业。尽管这些企业工人数量已下降到不及苏联鼎盛时期的一半（例如NKMI，苏联时期有 25000 人，而现在只有 9000 人），但他们依然会给退休工人发放退休金和额外的养老津贴，给孩子们修公园，建造方便的公交站点，从企业预算中拨出一部分用作学校建设资金。因此，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几乎可以决定谁应是市长，市议会的多数派应是哪些人。2015 年颁布的新选举法案虽然降低了“建造城市”的企业负责人当选为地方代表（下文会分析）的可能性，但他们还是难以输掉选战。就算是出了问题，这些竞选失利的候选者们还是会努

^① Yuri M Zhukov, “Trading Hard Hats for Combat Helmets: The Economics of Rebellion in Eastern Ukrain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6, Vol.44, No.1, pp.1-15.

力工作兑现竞选承诺，以报偿选区的选民及其赞助方——建造城市的大企业——提供的经费支持。这样他们就极有可能赢得下一次选举。这也难怪，里纳特·艾哈迈托夫 2014 年 5 月底开始决定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强硬，谴责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积极分子连个办公场地都不给落实。^①因此，只有那些为当地人提供就业岗位的企业家才应该是他们的领袖，另外，“社会活动家”（общественники）在顿巴斯地区通常被视为贬义词。借用克拉马托尔斯克一位反对派寡头马克西姆·叶菲莫夫（Максим Ефимов）的一个精彩说法，这个系统将市议会和市长变成了“建造城市”巨头的另一个“车间”（workshop）。^②他要是赢得了市长大选，可能也会这么做。我们将这种地方政治视为一种极端形式，不仅是基于公司城市的原因，也与亨利·赫尔（Henry Hale）提出的“庇护政权”（patronal regime）概念有关。姑且将这种政治称之为“工作职位给予者政权”。本文将分析顿巴斯战争前后马里乌波尔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地方政权如何运转并克服外部挑战。首先，我们对顿巴斯战争时期顿涅茨克州的地理区位和几个城市的地方观念（localism）做一个简短介绍，以了解这些地方政权运转的军事和文化环境。

一、战争的地理区位

顿巴斯战争不是单线进程。顿涅茨克州裂分为三个军事区：第一区是顿涅茨克市及其周边城乡地区，直到现在（2018 年）还处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控制下；另一个是包括马里乌波尔市在内的亚速海滨海地区（Priazov Region）；第三区主要由红利曼（Красный Лиман）、斯拉维扬斯克（Славянск）和克拉马托尔斯克（Краматорск）组成的北方区。^③一大片森林将顿涅茨克

① Приз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亚速海滨工人报》，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地方报纸，下文简称 PR，2014 年 5 月 21 日。

② 《克拉马托尔斯克真理报》（Kramatorskaia Pravda）2017 年 11 月 11 日，下文称 KP。

③ 我对顿巴斯战争区域的划分与乌克兰反恐行动制定的冲突区域划分方法相一致。参见 https://www.depo.ua/static/files/gallery_uploads/images/%D0%9C%D1%96%D0%BD%D0%BE%D0%B1%D1%8C%D0%BE%D1%80%D0%BE%D0%BD%D0%B8.jpg。乌克兰军队分散在五个地区：防卫马里乌波尔的 M 区，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顿涅茨克市核心地区为目标的 B 区，保卫克拉马托尔斯克和顿涅茨克州北部的 C 区，以卢甘斯克为目标的 A 区。最神秘的 D 区涵盖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内部区域，或许旨在对该区进行火力牵制。

州北部与中部（由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隔开。这一距离的存在使得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手中“解放”之后能够集中精力恢复重建。只有一条穿越丛林无人区的高速公路同乌克兰巴赫穆特市（Бахмут，旧称阿尔乔莫夫斯克Артёмовск）相连。这唯一的通道连接着乌克兰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北部边界”，包括戈尔洛夫卡（Горловка）——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北大门。相比之下，顿涅茨克市与马里乌波尔之间有一片生机勃勃的大草原。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着从马里乌波尔到俄罗斯之间的大部分城镇，即原新亚速斯克（Новоазовск）和捷利马诺夫斯克地区（Тельмановский район）。顿涅茨克市和马里乌波尔之间距离感知要比顿涅茨克市与北方地区短得多。只是南方前线持续处于军事紧张状态，大规模炮火袭击持续不断。这也是为什么在 2014 年 11 月顿涅茨克州州长塔鲁塔（Сергей Тарута，1955 年生）被撤职后，基辅控制顿涅茨克州的地区中心，须立即从马里乌波尔转移到克拉马托斯克。

从俄罗斯来的民间武装在顿涅茨克州中心地区控制力最强，北方最弱，滨海地区介于两者之间。2014 年 4 月 12 日，斯特列尔科夫（Игорь Стрелков）与俄罗斯其他民间武装在斯拉维扬斯克展开军事行动。但顿涅茨克市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没有将这次行动视为共同行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在北方的军事行动并不成功。他们认为乌克兰不会对拥有 100 万人口的顿涅茨克市展开军事行动，况且城里还有中学、大学、医院以及大量的社会基础设施。对他们而言，战争的周年纪念是 5 月 26 日（波罗申科针对顿涅茨克机场发起的空袭行动），而不是 4 月 12 日。来自俄罗斯的民间武装控制力大小，可以从其占领区乌克兰民族-爱国者的人权状况窥探一斑。^①在斯特列尔科夫占领北方之后，民族-爱国者们被迫立即撤离。因为亲俄分子到处宣称，“第五纵队”成员（民族-爱国分子及其组织）的安全将不会得到保障。不过马里乌波尔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民族-爱国者依然在城里斗

^① “民族-爱国者（national-patriots）”这一称呼不是原先就有的，因为乌克兰民族-爱国者称他们自己是爱国者。在乌克兰政治中心，这个称呼早已过时，因为民族-爱国者阵营分化得很明显。波罗申科、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阿瓦科夫（Arsen Avakov）、利亚什科（Oleh Liashko）及其各自支持者相互之间分歧很大。但在乌克兰东部的地方层面，这些支持者却都视自己属于同一阵营，与亲俄分子、分离分子和寡头们区别明显。

争。^①在顿涅茨克市，尽管 2014 年 4 月 7 日亲俄叛乱分子（Novo-russianists）占领了州政府行政大楼，州政府租用州长塔鲁塔的私人酒店和办公室进行办公，政务依然正常运转。州政府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袖一直就行政大楼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由此出现两个政府并存的特殊情况。5 月 26 日波罗申科对顿涅茨克市展开空袭行动，引起市民对乌当局的愤懑敌视，6 月 13 日州政府不得已转移到马里乌波尔。

二、地方荣耀

战争爆发前，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顿涅茨克州差不多有 28 个较为重要的城市（相对大的城市），但只有 18 个农业县（rural counties）。而乌克兰与俄罗斯类似的行政区一般有几个大城市和几十个农业县。两者差别明显。第聂伯罗市（旧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自 18 世纪以来就是行政中心，哈尔科夫在帝俄时期就以大学城而闻名。而顿涅茨克市直到 1869 年因英国企业家约翰·休斯（John Hughes）来此建立生铁厂才发展起来。顿涅茨克市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苏联时期的工业化，马里乌波尔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也是如此。总之，顿涅茨克市是顿涅茨克州各市的佼佼者，但绝不意味着其中心地位不可挑战。

马里乌波尔的知识分子将滨海地区与产煤的顿巴斯区别看待。马里乌波尔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希腊殖民地。2014 年之前顿涅茨克州的人口占到乌克兰总人口约 1/10，而马里乌波尔人口占到了顿涅茨克州总人口约 1/10。马里乌波尔依靠亚速和伊里奇两个钢铁厂发展起来。二者拥有并管理着马里乌波尔“40-50%的城市劳动力”。城市主干道两侧的建筑高大雄伟，似乎表明苏联有意再建设一座像类似顿涅茨克和扎波罗日一样的城市。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的过度工业化减缓了马里乌波尔的城市化进程，这里至今还只是 50 万人的城市。在苏联时代，这里两座冶金工厂直接服从于苏共中央委员会（CPSU），因此苏共顿涅茨克州委员会第一书记无法

^① 2017 年 8 月 21 日笔者分别对马里乌波尔城市议会副议长博罗金（Maksym Borodin）和反对派集团顿涅茨克州州长纳戈尔尼亚（Irina Nagornia）进行访谈。

管理控制这两座工厂，这就保证了马里乌波尔在顿涅茨克州实质的自主性。顿涅茨克人抱怨顿巴斯一直在供养乌克兰却从未获得相应回报，马里乌波尔人则认为滨海地区向顿涅茨克贡献差不多 30% 的地区生产总值，但也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历史上顿涅茨克曾因妒忌而阻止马里乌波尔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反对马里乌波尔脱离顿涅茨克成为独立州。^①甚至一位当地反叛势力的政治人物告诉我：“顿巴斯人是煤矿工人，因此只要命令他们就行动了。我们是冶金家，除非你用道理说服我们，否则我们是不会行动的”。

19 世纪 60 年代末，哈尔科夫地方自治组织和贸易商人，共同发起了连接哈尔科夫和亚速海（塔甘罗格港口）的铁路建设运动。10 年后，在连接哈尔科夫-塔甘罗格铁路与煤矿基地尤佐夫卡（Iuzovka，“约翰·休斯”村庄，后来的顿涅茨克）的交汇点，克拉马托尔斯克诞生了。建成这座城市旨在将煤运到欧俄的中部地区。过后不久，这里勘探发现了白垩矿。1887 年，普鲁士企业家埃德加·埃尔德曼（Edgar Adelman）在这里投资建厂生产石灰、雪花石膏和阻燃材料。基于该城早期工业化的成就，克拉马托尔斯克又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工业巨头——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的所在地。克城由此受到非常多的特殊关照，以至于当地居民对 30 年代的大饥荒也不知情。^②这座城市很快成为苏联的航空工业重镇。

虽然如此，与马里乌波尔不同，克拉马斯托克很难感受到地方荣誉感，这是与顿涅茨克市长期竞争造成的。克拉马斯托克居民通常拿自己的城市与顿州北方相对落后的城市像斯拉维扬斯克、红利曼作比较。克拉马斯托克的民族-爱国者告诉我，斯拉维扬斯克已成为斯特列尔科夫武装分子的大本营，因为那个城市没有工业，到处都是毒品与烈酒。克城没有煤矿，当地居民宁愿称顿州为顿涅奇纳（Донецчина）^③而不是顿巴斯。^④克城蓬勃发展的机械制造业吸引大量高素质劳动力不断涌入，令当地百姓非常骄傲。游客们的到

① 2016 年 9 月 7 日与马里乌波尔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巴雷克（Maksym Bulyk）和切列普琴科（Oleksandr Cherepchenko）的访谈。

② 2018 年 8 月 8 日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地历史学家科察雷科（Volodymyr Kotsarenko）的访谈。

③ “Донецчина”是对顿涅茨克的非正式的、历史的称呼——编者注

④ 2017 年 8 月 3 日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议会彼得·波罗申科集团代表基斯利齐娜（Liliia Kislytsina）访谈。

来更是增添了克城百姓的自豪感。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克城百姓的温文尔雅，并且在这个规模不大的城市竟有 6 所高校。其中一的所，顿涅茨克国立机械制造学院，尽管是理工类院校，却已成为民族-爱国者媒体活动的阵地。^①2014 年，马里乌波尔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与顿涅茨克州中心地区城市的命运截然不同，地方爱国精神在多大程度上促成这一结果需要论证。但这种精神却非常有助于强化 2014 年以后双方对立的既成事实。

如上文所说，马里乌波尔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知识分子，将煤炭工业视为顿涅茨克人坚定反对乌克兰亲欧盟分子的源头。如果不进行价值判断的话，我觉得这种解释很有说服力。在一个几近枯竭的矿脉继续进行煤矿开采，煤矿工人通常都需要在狭窄的矿道里匍匐爬行数百米。在上午开工前，工人们都想知道他们出来的时候是否还能见到太阳。这种劳动环境造成了顿涅茨克人对生死有特别的理解。^②顿市西边的一些学校位于战斗前线，经常遭到乌克兰军队的炮击。虽然我觉得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很有必要废弃这些残破不堪的校舍，将孩子们疏散到东边安全的地方。但炮击之后，政府很快就重建校园，恢复教学秩序。^③抛开波罗申科对孩子无差别轰炸的战争罪责不谈，我经常向顿涅茨克人解释，即便是在残酷恐怖的军国主义时代，日本儿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战败之前，都会被疏散到农村地区。

三、战前的工作职位给予者政权

马里乌波尔的两个冶金厂支持霍特鲁别伊（Iurii Khotlubei, Юрий

① 2017 年 8 月 3 日与顿涅茨克国立机械制造学院院长科瓦廖夫(Виктор Ковалёв)访谈。

② 2017 年 8 月 14 日，我在顿涅茨克市与栋梁(Pillar)组织总办公室女性支持者进行交流。栋梁组织是内战达到高潮期间的军事化组织，后来转变为一个政治组织。栋梁组织的领袖扎哈尔琴科(Александр Захарченко)非常有名。由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中的组织都变成普通的政党，参与党争活力下降，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袖需要一个政治组织投入到“新俄罗斯”的建设事业中。扎哈尔琴科也需要这样一个政治组织，结果栋梁组织便发挥了这种作用。

③ 2017 年 8 月 9-17 号我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进行田野调查，在顿涅茨克市西区近郊看了一所完全被毁掉和两家遭到严重破坏但还在使用的校舍，很遗憾，当时在放暑假，我没有找到这些学校的师生。

Хотлубей, 1944 年生)。^①这位老市长除了 1994–1998 年调到中央机关工作外, 自 1989 年起就一直管理着马里乌波尔。在克城, 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厂长斯库达里 (Георгий Скударь, 1942 年生) 与动力机械特钢厂负责人叶菲莫夫 (Максим Ефимов, 1974 年生) 自 2006 年起就轮流控制市长职位。来自机械厂的克里沃舍耶夫 (Виктор Кривошеев, 1937 年生) 于 1998–2006 年担任克城市长, 而特钢厂的科斯秋科夫 (Геннадий Костюков, 1947 年生) 于 2006–2014 年任克城市长。在马里乌波尔和克拉马斯托尔克所有的负责人中, 只有斯库达里享有盛誉。作为乌克兰工业界企业家协会的主席, 1999 年斯库达里曾说服协会成员支持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库奇马 (Леонид Кучма), 击败了乌共第一书记西蒙年科 (Петр Симоненко)。^②2014 年前, 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 70% 的订单来自俄罗斯, 2014 年后俄罗斯订单数量大幅度下降。克拉马托尔斯克位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到俄罗斯罗斯托夫–顿河机械制造产业带上, 当地生产的重工业产品与俄罗斯经济高度互补, 但顿涅茨克的煤炭工业和马里乌波尔的冶金工业在俄罗斯都有相应的竞争对手。正如朱可夫 (2016) 所说, 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民对俄罗斯的同情似乎源于经济, 哈尔科夫也是如此, 但顿涅茨克和马里乌波尔对俄罗斯的偏好主要是在政治和文化上。

颜色革命很难影响到顿涅茨克州的政治运转, 更难影响到马里乌波尔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地方政治。2005 年尤先科总统任命的州长丘普伦 (Вадим Чупрун), 在 2006 年地方议会选举中, 因难以为橙色集团赢得多数议席而直接引咎辞职。对马里乌波尔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工作职位给予者来说, 21 世纪头十年最大的挑战就是里纳特·艾哈迈托夫名下的企业——系统资本管理公司 (System Capital Management) 的商业扩张。这家公司已经重绘了顿涅茨克州的“所有权地图”。系统资本管理公司在 2006 年就已持有亚速和伊里奇钢铁厂的股份。通过不断增持股份, 到 2010 年“战胜”了威胁公司扩

① 霍特鲁别伊 (Khotlubei) 姓氏来自单词 khutlu, 在乌鲁姆语中是“快乐”的意思。(乌鲁姆语为自称乌鲁木人所使用的语言, 乌鲁木人主要分布在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俄罗斯的库班地区。——译者注)

② 2017 年 8 月 3 日, 与顿涅茨克国立机器制造学院讲师, 彼得·波罗申科集团领导阿纳索夫 (Валерий Аносов) 的访谈。

张的最后一位红色经理——弗拉基米尔·博伊科（Владимир Бойко，1938年生）的绝望抵抗。博伊科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支持尤先科，成为乌社会进步党（the Socialist Party of Ukraine）的国会议员。在波诡云谲的乌东部政治中，博伊科的政治“反叛”突然改变了乌克兰东部地区从左翼到地区党（Party of Regions）的选民支持率。在2006-2007年国会和地方议会选举期间，马里乌波尔约有20-40%选民支持乌克兰社会进步党，该党在城市议会中占据21个议席，成为拥有41个议席的地区党的强劲对手。

系统资本管理公司在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首要目标就是重工集团（Промкомплект）。重工集团的负责人是卡尔片科（Валерий Карпенко），他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拥有私人酒店，在反对艾哈迈托夫期间痛失二子。^①卡尔片科满怀复仇之心，成了尤利娅·季莫申科祖国党在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代理人。2006年市长选举中，卡尔片科挑战科斯秋科夫（Костюков），但并不成功。当前克拉马托尔斯克民族-爱国者们的兴起^②，与21世纪头十年寡头卡尔片科组织亲欧盟活动有关。相比之下，动力机械特钢厂负责人叶菲莫夫向艾哈迈托夫妥协，出售所持股票，保住了负责人的位置。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厂长斯库达里也是如此。博伊科的“投降”结束了马里乌波尔市议会的左翼倾向。结果在2010年地方选举中，地区党获得了克城议会74个议席中的66个（89%），而乌克兰共产党（CPU）和人民阵线（亚采纽克的政党）各自获得4个席位。^③克拉马托尔斯克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对民族-爱国者较为有利：地区党虽然“只”占50议席中的40个，然而民族-爱国者获得5个席位，左翼阵线获得3个席位。2012-2013年，克城这种“相对”而言对民族-爱国者友好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在马里乌波尔，由博罗金（Максим Бородин，1978年生）发起的环保运动“让我呼吸”^④（Let Me

① 很难找到这类犯罪案件背后的真相，但与本文明显相关的是，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领袖们都觉得，卡尔片科的儿子是被艾哈迈托夫爪牙杀害的。

② 在2010年总统选举期间，亚努科维奇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只”获得70.87%的支持率，这几乎是他在顿涅茨克州获得的最差选举结果。2012年，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有大约600个祖国党党员。2017年8月3日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副市长菲利琴科（Svitlana Filichenko）的访谈。

③ 参见马里乌波尔市议会网站，<http://marsovet.org.ua/articles/show/article/384>

④ 在马里乌波尔这样的滨海工业城的确很难呼吸。1970年代建起来的钢铁厂锈迹斑斑，

Breath) 发展迅速。马里乌波尔是民族-爱国者的生养之地和圣地，也是基辅政府在顿巴斯战争中可以依仗的大本营。2013 年，亚采纽克的人民阵线并入季莫申科的祖国党，但事实上是为了控制后者。克拉马托尔斯克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严重损害了祖国党“老近卫军”的形象。^① 卡尔片科也和这些人一道，失去了对克城民族-爱国者们的影响力。

四、战时的工作职位给予者政权

前文已经讨论，在乌亲欧盟示威革命前夜，马里乌波尔的工业领袖很快改换阵营，由支持博伊科转向支持艾哈迈托夫。同时，向艾哈迈托夫投诚的当地“工作职位给予者”也不是没有要求。或许精通英德双语的叶菲莫夫，开始思考他的动力特钢厂如何在欧洲市场上生存下来。而斯库达里却觉得新克城机械制造厂很难适应从俄罗斯市场到欧洲市场的转型。另外，马里乌波尔的城市精英们似乎比克城精英们更有能力。马里乌波尔的民族-爱国者通过环保运动维系阵营的稳定，但民族阵营不停“洗牌”毁掉了克城的祖国党。在 2014 年夏秋两季，马里乌波尔的战略重要性凸显，城市政界和工业界精英更加团结协作，而在被占期间克城领袖们似乎慌乱无序。同样是被顿涅茨克叛军占领的两个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两个冶金大企业合作得很好，而克城两个企业即新克城机械制造厂和动力机械特钢厂似乎缺乏协调互动的策略。叶菲莫夫 4 月 17 日公开出席亲乌克兰的会议，但是斯库达里却在他的工厂给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修理军事装备。^②

两个城市都有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组织，这些组织中既有地方组织，也有军方支持者。地方组织在不同城市的称号不同，但军方却有统一的称号叫“人民民兵”（Народное ополчение）。地方组织由当地人组成，这

迷雾萦绕，就像身处地狱一般；海洋污染也很严重，很难想象今天的亚速海过去曾是世界上海产品产量最高的海域之一。Соловьев А.И. Азовское море и Приазовье. История, география, экономика, эк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а. Таганрог: Таганрогский радиотехн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1993.

① 2017 年 8 月 3 日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副市长菲利琴科的访谈。

② 2017 年 8 月 3 日与顿涅茨克国立机器制造学院讲师，彼得·波罗申科集团领导阿纳索夫（Valerii Anosov）的访谈。

些人出席城市议会，组织论坛，发起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两个城市的政治人士都告诉我，“没有特权”的老百姓（妒忌地区党领袖社会地位）组成了地方组织。当地政治人士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地方组织的头目，例如马里乌波尔的库兹缅科兄弟（Кузьменко）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金（Геннадий Ким）当做是（一般意义上的）犯罪分子。另外，他们确信这些军方组织都是从俄罗斯来的人组成的。为了创造一种革命氛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支持者们发放传单反对卖淫，捣毁私人酿酒厂设备，没收赌博游戏机。^①他们一般将这些游戏机作为路障使用。

1. 马里乌波尔

在顿涅茨克市，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们是自发形成的，因此没有北方的支持者凶狠暴虐。这也是地区领袖为什么敢于将他们作为同基辅谈判的筹码。^②相比之下，马里乌波尔与俄罗斯距离太近，以至于处于一种“利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叛乱分子达到自己政治目标的幻象之中。2014年2月22日亚努科维奇逃离之后，马里乌波尔地区党组织领袖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他们要将自己同民族-爱国者和新俄罗斯叛乱分子（Novorussianists）区分开来。

2014年3月2日，城市议会召开全体大会，“约1500名”支持乌克兰联邦化的积极分子在城市议会大楼前集会，有“约2000名”民族-爱国者与之对垒。市议会的秘书^③安德烈·费代（Андрей Федай）建议请求乌克兰最高拉达重新恢复2012年7月10日通过的乌克兰语言法效力，确保将俄语作为官方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乌亲欧盟示威“革命”后，最高拉达通过的第一项议案就是废除该法案）。费代同时建议成立城市警察部队；停止对历史强加的片面阐释；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抑制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蔓延，

① 2017年8月7日与卡拉马托尔斯克市议会代表（统一克拉马托尔斯克派）奥利霍瓦娅（Irina Ol'khovaia）的访谈。

② Kimitaka Matsuzato, “The Donbass War: Outbreak and Deadlock”,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17, Vol.25, No.2, pp.175-200.

③ 乌克兰地方自治法规定，市长与管理城市的市议会要通力合作，尽管这从现实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市长任命市议会秘书来处理议会相关事务并且与议会各党协商。地方政府自治最大的变数就是市长在什么情况下授权以及授权给秘书多大的权力来“管理议会”（run the Council）。

缓解族群仇恨；解除乌克兰全境所有的非法武装力量；授权地方政府自治，撤走监督地方的国家执法官；公共预算权交给地方；修改宪法以确保中央权力下移。费代最后陈述道，“乌克兰应该成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费代的议案，并上报乌克兰最高拉达。由于这一议案回避使用“乌克兰的联邦化”和“公投”的说法，乌东部居民对亲欧盟运动的反感情绪得到完全释放。霍特鲁别伊市长在议会大楼前宣读这一议案，但参会者注意到了这个把戏。他们即刻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写信，请求派俄军进驻顿巴斯地区，并请霍特鲁别伊签字。霍特鲁别伊极力拒绝，但最后在参会代表的压力下签了字，但在签名上方他加了一个字——“非正式”。(informal)

2014年3月8日大众会议召开，再次发出强烈请求，希望通过公投以实现乌克兰的联邦化。城市精英，新俄罗斯叛乱分子以及民族-爱国者们连续举行两次圆桌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这一请愿。市领导官员告诉新俄罗斯叛乱分子3月8日的大众会议请愿与3月2日的城市议会决议没什么不同。3月28日召开的城市议会会议实现了城市领袖们的心愿，将城市请愿的目标定为乌克兰去中心化而非联邦化，去掉任何有关公投的文字。^①

2014年4月13日，地区党积极分子占领了马里乌波尔城市议会大楼，导致14日市政官员拒绝去议会大楼办公。基辅立即将马里乌波尔列入反恐行动区域名单；4月16日，第一次反恐行动造成3名人员死亡。5月9日，乌政府军亚速营(Azov Battalion)破坏了伟大卫国战争纪念日的纪念活动，将暴力冲突推至顶峰。4月底，乌内政部长亚阿瓦科夫(Арсен Аваков)任命安德罗休克(Валерий Андрощук)为马里乌波尔警察局长。^②5月1日，拥挤的人潮包围了市警察局，要求安德罗休克辞职，要求副局长接任局长并保证5月11日全民公投不能遭到破坏。市民们要求安德罗休克签署正式辞职的声明。尽管这个声明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但安德罗休克对马里乌波尔的市民深深憎恶。5月8日，他鲁莽地向他的下属警官公布一项袭击5月

① 2014年5月6日，PR。

② 瓦列里·安德罗休克1960年生于切尔卡瑟州。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他一直从事警务工作，分别在马里乌波尔、顿涅茨克市和扎波罗热州工作过。在亚努科维奇赢得总统大选后，他退休了。作为退休人员，他参加了马里乌波尔的反新俄罗斯运动。在了解他的事迹之后，阿瓦科夫让他重新回到警局工作(PR, 6 May 2014)。

9号胜利日纪念活动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他们参与这项行动。这些警官拒绝参与行动，因为这项行动肯定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随后，控制强力部门的顿涅茨克州副州长尼古拉耶克（Andrii Nikolaenko）表示，尽管警官们不赞成这次行动，但他能做的也只是将警官们撤职，收回他们的警察身份和枪械，而不是逮捕警察局长安德罗休克、将他抓做人质并攻占警务大楼。

城市领导集团似乎预知了这次军事行动，所以他们在早上6点钟就准备好鲜花献给老兵。但市议会秘书费代否认了这层因果关系，表示他们确实知道一些挑衅行为可能会出现，但并不希望这些挑衅升级为敌对行动。（2016年）5月9日事件促成了暴力冲突的升级。5月10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支持者烧毁了市议会大楼。同时，5月9日事件促使城市精英更加团结。从城市警务系统瘫痪的那天开始，各冶金厂的负责人和市议会领导们组织志愿巡逻队，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准军事力量相互协作。^①5月14日，地方政要和各冶金厂的负责人以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代表库兹缅科（Денис Кузьменко）一起向被毁掉的警务大楼敬献鲜花。^②不过这些合作也是有限度的。2014年5月12日，城市议会并没有给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支持者提供公投的室内场地。

公投之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支持者开始逮捕市长霍特鲁别伊，让他签署辞职声明，因为公投结果确认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而市长的权力没有得到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授权。最后在5月13日，他们在环亚速海国立科技大学（Mariupo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抓到了市长和亚速、伊里奇钢铁厂的多名负责人。这些名流正在大学访问，准备给学生作演讲。随后召开一次准圆桌会议，霍特鲁别伊市长说服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支持者们不要指望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公投后最紧迫的任务是稳定顿涅茨克州的政局。后一个建议也是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目标。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代表库兹缅科表示，如果他们（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分子）解除了霍特鲁别伊市长的职务，两天后这个城市可能会被废弃，双方应该达成妥协。与会者中，一名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支持者要求霍特鲁

① 2014年5月16日，PR。

② 2014年5月16日，PR。

别伊“向我们（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投诚，和我们一起工作，但不能要薪水，因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是没有钱的”。^①

随后，基辅和地方民族-爱国者达成了一致共识——联合巡逻，共同敬献鲜花。5月13日圆桌讨论——成为霍特鲁别伊和其他领导人分裂国家的证据。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市领导们开始隐藏他们宣称绥靖的证据，并一道歪曲了事实，即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支持者不仅有强硬的准军事力量和受蛊惑的俄罗斯人，也有听从市领导理性建议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5月9日事件是改写历史的一种尝试。马里乌波尔事件是波罗申科和地方反对派集团有意忘掉的历史事件，相比之下，敖德萨反对集团却有意将5月2日大屠杀事件国际化。

5月20日左右，马里乌波尔市领导和地方报纸突然放弃他们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妥协。艾哈迈托夫做的这个决定，但他并不是城市领导干部。他的文章“开心顿巴斯——统一的乌克兰”5月15日在《亚速海滨工人报》上发表。文章还是使用说服性的语调。艾哈迈托夫列出了马里乌波尔的四种可能性：继续留在集权国家乌克兰；跟随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独立；与俄罗斯合并；修改宪法出现一个去中心化的乌克兰。艾哈迈托夫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性或许没什么区别，即带来国际制裁和马里乌波尔工业城市的毁灭。他支持第四种方案。在5月19日（发表于5月21日的《亚速海滨工人报》），艾哈迈托夫开始猛烈批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认为这是顿涅茨克州民众做出的毁灭性选择。霍特鲁别伊市长和好几个冶金厂负责人听进了艾哈迈托夫的建议。新闻媒体停止批评5月9日事件，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暴行”的深度报道。可能是基辅当局要求艾哈迈托夫和城市领导们改变心意以迎接即将到来的5月25日乌克兰总统大选。但艾哈迈托夫的“背叛”，只带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叛乱分子更加激进的回应，他们激励要求对寡头资产进行国有化。甚至艾哈迈托夫冶金厂的工人们都不接受老板提出来的另一条实现和平的道路。在马里乌波尔，5月25日参加乌克兰总统选举的选民只有14.5%。

乌政府军于2014年6月13日重新占领了马里乌波尔，但城市继续遭受

^① 2014年5月16日，PR。

军事攻击。从8月底开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开始反击，一直持续到9月5日明斯克协议结束。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分子与俄军组成联军，在装甲车和坦克的掩护下于8月27日抵达城市的东部边界。城里只有亚速营的几百名士兵。州长塔鲁塔（Сергей Тарута）和地方政府职员逃离。马里乌波尔城市议会秘书费代曾对我说，“如果俄罗斯人愿意，他们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占领马里乌波尔。”然而不知什么缘由，俄军到那里就停了下来。

2. 克拉马托尔斯克

2014年1月25日在列宁广场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领导们对基辅亲欧盟示威运动的激进化，做出了回应。这次会上，新城机械制造厂的负责人斯库达里在发言时指出，西方外交官干预乌克兰政治，是因为他们担心乌俄之间存在经济利益的长期较量。西方需要乌克兰，以便于北约接近俄罗斯，且将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转变为能源基地。西方真实目的是希望克拉马托尔斯克停止生产高附加值商品。斯库达里认为，克拉马托尔斯克难以打入欧洲市场。如果俄罗斯市场被迫关闭，失业率激增和公共职位的薪水拖欠将难以避免。“但这不是西方人考虑的内容”。^①克城城市议会地区党分支领袖维克多·潘科夫（Виктор Панков，未来市长的父亲）认为，他们那天的集会是在向欧洲展示，不仅三个加里西亚地区“已控制了基辅”，同时也表示他们才是乌克兰人。潘科夫注意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Ивано-Франк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的GDP总量还没有克拉马托尔斯克一城GDP的总量高。^②这些都是地区党领袖都很清楚的典型的乌东部的诡辩（rhetoric），为的只是强调他们希望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在亚努科维奇2月22日逃亡后，成千上万反“亲欧盟示威”的市民每

① 不幸的是，这发生在2014年之后。在2014年之前，俄军给克拉马托尔斯克工厂很多有关火箭运载和发射等设备的生产订单，以挽救这个城市自苏联解体以来不断衰落的航空工业。2014年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风力发电设备生产在乌克兰成为最赚钱的行当。一家德国公司正在亚速海边上建设风力发电设备，但这家公司要求发电设备要从波兰工厂进口，而从克拉马托尔斯克订购圆柱体和风车（低附加值产品），要求现场组装。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工程师们向德国投资者抗议，认为对他们而言，生产风力发电设备一点也不困难。但德国人并不相信。这些是我在2017年8月4日到克拉马托尔斯克重型机器工具制造厂观察所得。

② 2014年1月29日，《克拉马托尔斯克真理报》。

周末都会在列宁广场集会。同时“差不多 50 名”民族-爱国者在临近列宁广场的塔拉斯·舍甫琴科（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雕塑前聚集开会。2014 年 3 月 1 日的会议，请求城市议会通过决议，否定“亲欧盟分子建立政府”的合法性，同时实施预算联邦主义，避免向基辅交纳过多的税款以“供养西乌克兰”。^①4 月 7 日新俄罗斯叛乱分子在顿涅茨克市宣布建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后，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同志们”要求城市议会组织全民公投，实现顿巴斯“自治”。4 月 12 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叛乱分子同时宣布，已经在斯拉维扬斯克、红利曼和克城建立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政府，城市议会大楼被占领。^②叛乱分子同时攻占了警务大楼，但却将其归还给了乌克兰当局，让他们对城市安全负责。^③一些警察确实佩戴圣乔治丝带（Георгиевская лента）绕城巡逻，证实了新俄罗斯反叛分子的观点。^④与马里乌波尔一样，克城也很快成为乌克兰亲欧盟政府反恐行动名单上的城市。5 月 3 日，在克城展开第一次正式反恐行动，造成 21 岁护士伊佐托娃（Юлия Изотова）和其他一些乘客在车中被射杀。数千克城市民参加了这位护士的葬礼，2014 年 5 月 5 日《纽约时报》进行了跟踪报道。

在这些危机出现时，科斯秋科夫市长没有从中央或塔鲁塔州长那里收到任何命令或指示。在绝望中，科斯秋科夫于 5 月 23 日辞职。根据法律规定，城市议会秘书博尔苏克（Андрей Борсук）担任代理市长。7 月 1 日乌克兰军队炮击市中心酿成 6 名市民遇难时，他也辞职了。在博尔苏克之后，潘科夫（Andrii Pankov）成为克城代理市长。现任（2017）副市长菲利琴科（Svitlana Filichenko）告诉我，潘科夫担任副市长期间，曾在克城陷落时将乌克兰战士隐藏在家中，这是他成为“2016 年乌克兰最好的市长”的一个原因。^⑤7 月 5 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放弃克城，撤回顿涅茨克。

① 2014 年 3 月 5 日，《卡拉马托尔斯克真理报》；Александр Сурнин. Краматорские тетрад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Новороссии. Quadrivium. 2015. Том 2. С.29-31.

② 2014 年 4 月 16 日，《卡拉马托尔斯克真理报》；Александр Сурнин. Краматорские тетради.

③ 2014 年 4 月 23 日，《卡拉马托尔斯克真理报》。

④ 2017 年 8 月 4 日，克拉马托尔斯克城与顿涅茨克州民防和动员部门领导人洪察洛夫（Serhiy Honcharov）的访谈。他同意以公共活动家的身份接受访谈。

⑤ 2017 年 8 月 3 日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副市长菲利琴科的访谈。

五、战后的工作职位给予者政权

为了将乌克兰东部地区并入“后亲欧盟示威时代”的乌克兰，波罗申科设计出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中央政府花费大笔经费支持前线“附属城市”（accessory cities）的经济复苏。这些城市位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边界地区，将这些城市作为展示橱窗以吸引这些分离共和国的居民。由于政府的去中心化政策，之前花在地区层面的预算开始下移至各个地方。另外，顿巴斯前线城市极有可能获得其他国家和国际不同层面的援助。^①2017年8月，马里乌波尔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经历了一次基建繁荣。克城市长潘科夫自豪地告诉我，战后3年（2017年）他们辛勤努力的工作现在已经取得一些成效。

波罗申科的第二种方案即重建乌克兰东部地区，设计出一种特殊的选举系统，阻止反对派集团在2015年地方选举中获得绝对优势。这类似一种比例代表制，即城市被分为不同的选区，来自不同政党的选举人相互竞争。支持政党的选民数量决定其拥有多少议席，但议席的数量是根据候选人政党在选区中获得的选票份额分配的。假设一个城市有6个选区，有3个政党参选。（如表1）加粗斜体的候选人将会成为议员。诡谲的是，候选人C1、B4和B5在同一选区得票率上要低于A1、A4和A5，但他们选上了。另外，如果这些选举在普通的单一制选区进行的话，A党将会垄断议席，但在这一制度下，它只可能赢得3个议席。

作为地区党创始人之一，波罗申科实施的第三种方案是使用惯用的潜规则和罗名制政治。但这些措施用于对付民族-爱国者过于理想化。因此，渗透乌克兰东部地区唯一的方法就是分裂现存的精英共同体。^②2014年议会选举前夕，波罗申科与克城主要的工作职位给予者叶菲莫夫进行合作。相比之

① 来自于2017年8月4日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同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议会秘书奥舒尔科的访谈。

② 来自于2017年8月3日与顿涅茨克国立机器制造学院讲师，彼得·波罗申科集团领导阿纳索夫（Valerii Anosov）的访谈与2017年8月8日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议会代表（彼得·波罗申科集团）勒扎夫斯基（Volodymyr Rzhavskiy）的访谈。

下，他对马里乌波尔 2015 年地方选举所能做的，只是说服即将退休的市长霍特鲁别伊在马里乌波尔建立“我们的地区”党分支机构。这个政党由亲波罗申科的国家官员和企业界人士组成。^①虽然波罗申科在 2014 年议会选举时已经建立了彼得·波罗申科集团（PPB），但 PPB 民族主义过于强烈，难以在乌克兰东部获得影响力。因此他建立“我们的地区”党，通过实用型政纲对乌克兰东部地区进行渗透。这个党从政治目标到名字都让我们联想到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Виктор Черномырдин）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

表 1 波罗申科的特殊选举系统

政党		A	B	C	总计
获得投票数		最多	中间	最少	
获得议席数		3 个	2 个	1 个	
选区选票比例	1	50	15	35	100
	2	70	25	5	100
	3	60	30	10	100
	4	50	40	10	100
	5	50	35	15	100
	6	55	30	15	100

1. 马里乌波尔

乌克兰亲欧盟示威“革命”后，马里乌波尔地区党得到亚速和伊里奇钢铁厂的坚定支持，在 2014 年议会选举中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派集团。在选举中，反对派集团在比例代表制选举中赢得了 61% 的选票。^②也就是说，这一支持率超过了地区党在该城议会选举中以往所获得的，如 2006 年是 52%，2012 年是 47%。可能是发生在马里乌波尔的暴力袭击，增强了市民对“亲欧盟示威运动”支持者的厌恶感。

在 2015 年地方选举中，居住在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州居民的投票权成为热议话题。顿涅茨克州军事长官热布罗夫斯基（Павел Жебровский）要求，居住在前线的所有居民，不论是在马里乌波尔还是克拉马托尔斯克，都

^① 来自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在马里乌波尔与马里乌波尔前市长、市议会代表霍特鲁别伊的访谈。

^② 在马里乌波尔的两个多数选举选区中，前州长塔图塔和一位反对派集团候选人获胜。2014 年 10 月 31 日，PR。

应被取消选举权。他考虑的是地方安全，但从中央到地方的民族-爱国者都支持这个决定，目的是让前地区党政治家难以在地区政治中获得优势。在波罗申科不停地说选举应该在马里乌波尔举行之后，热布罗夫斯基改变了决定。^①但控制地方城市选举委员会的民族-爱国者一致通过行动反对马里乌波尔的选举。后来，他们“发现”《亚速滨海工人报》印刷厂有虚假投票行为。而这里一直由两个冶金厂控制着，被视为反对派集团的大本营。^②正是这件事的发酵，马里乌波尔的地方选举推迟了。为了让马里乌波尔的选举活动继续进行（另一座城市，克拉斯诺梅斯克市 10 月 25 日的选举无效），最高拉达需要通过一项特殊法案。在得到波罗申科对马市的多次支持后，11 月 10 日，塔鲁塔州长提出的一项特别法案由最高拉达通过，其中 233 票赞成两座城市在 11 月 29 日进行地方选举。祖国党和利亚什科（Олег Ляшко）的激进党代表没有投赞成票，自助党（Self-Help）只有一个投票支持两座城市进行地方选举，这也反映了该议题具有政治倾向性。^③民族-爱国者根本没有机会在马里乌波尔赢得地方选举。霍特鲁别伊的接班人，亚速和伊里奇钢铁厂未来的负责人沃伊坚科（Вадим Войтенко）经理熟练地操作了一场工作职位给予者的选举。2015 年 9 月末，马里乌波尔的约 40 个公司和社会组织达成一致，建立马里乌波尔发展基金会。^④在这次选战中，沃伊坚科不仅做出承诺，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向选民说明基金会资金用途，这也在《亚速滨海工人报》上得到详细报道。沃伊坚科的团队批评霍特鲁别伊在担任市长的这几年间马城经济停滞不前，并将其归咎于霍特鲁别伊向波罗申科阵营的倒戈。11 月 29 日，沃伊坚科大胜，赢得了 72.8% 的选票，而第二位候选人只获得了 8.4% 的选票。在城市议会选举中，反对派集团获得 63.9% 的支持率，占据了 54 个议席中的 45 个（83%）。而民族-爱国者支持的“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和“我们的地区党”只超过基准线（5%），各自获得 5 个和 4 个议席。^⑤尽管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我们的地区党”作为叶菲莫夫寡头集团的核

① 2015 年 8 月 15 日，PR。

② 2015 年 10 月 27 日，PR。

③ 2015 年 11 月 13 日，PR。

④ 2015 年 10 月 13 日，PR。

⑤ 马里乌波尔市议会官方网站，<http://marsovet.org.ua/articles/show/article/2363>; PR, 2015

心组织，只获得了 20.5%的支持率^①和城市议会的 10 个议席，但在马里乌波尔的政坛上却表现得比较温和。也许这种温和是因为缺乏赞助公司大规模的支持吧。马里乌波尔“我们的地区党”尝试举起左翼大旗，例如提出提高工资或加强环保的倡议，以吸引亲反对派集团选民的支持。霍特鲁别伊批评反对派集团对两个冶金工厂俯首帖耳，导致其在处理这些议题上犹豫不决。霍特鲁别伊发现，反对派集团周期性地组织一系列“说乌克兰语”运动获得大量支持，这在没有赞助者慷慨援助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乌亲欧盟示威“革命”之后，马里乌波尔生态学家们加入一个新的国家层面的政党，叫“人民的权力”。该党在城市议会中取代了祖国党的位置。“人民的权力”将活动集中在对城市当局各项招投标、秩序建设和各项活动的监督上，结果非常有效。“人民的权力”积极分子维什尼亚科（Kyrylo Vyshniako）将前地区党“变形”为亲乌克兰的反对派视为假冒伪善，强调从 2014 年秋开始，地区党地方分支就开始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进行合作。虽然“人民的权力”对是否支持马里乌波尔 2015 年地方选举犹豫不决，但维什尼亚科承认，当马里乌波尔成为前线城市后，市民的心态发生了巨变。

反对派集团比地区党更期待成为极左力量（根据费代的说法是社会民主倾向），因为在可见的将来，贫困将是乌克兰政治的中心议题。但是这种导向与刚才霍特鲁别伊提到的冶金厂赞助商理念相违背。我在 2016 年 9 月采访费代的时候，他强调基辅中央是有意放缓同俄罗斯进行的和平谈判，因为没有顿巴斯的乌克兰对波罗申科最为有利。费代说，反对派集团要是掌权的话，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反对派集团力量的壮大和“人民的权力”影响力的增长，挤压了马里乌波尔彼得·波罗申科集团的空间，使其在 2015 年地方选举中没有越过 5%的门槛。相比之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的彼得·波罗申科集团获得了 10.6%的选民支持和相应的 6 个议席。^②

2. 克拉马托尔斯克

2014 年 8 月 2 日，叶菲莫夫（Максим Ефимов）退出地区党组织，去

年 12 月 4 日。

① Краматорський ТИК предоставил данные по 100% протоколов. 28 Октября 2015. <https://www.6264.com.ua/news/1010326>

② Краматорський ТИК предоставил данные по 100% протоколов.

基辅拜访了波罗申科。总统向叶菲莫夫承诺，下一轮议会选举中他会得到彼得·波罗申科集团的支持。当时的竞争对手是 2010 年接任克城国会议员的博亚尔斯基（Юрий Боярский）。与这位新克城机械制造厂负责人斯库达里的接班人的竞争非常激烈。叶菲莫夫以微弱优势赢得选战（34.12% 比 31.1%）。2015 年 10 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反对派集团重获影响力，由斯库达里提名的潘科夫竞选市长。尽管已经是国会议员，叶菲莫夫还是参加市长竞选。他批评新克城机械制造厂独揽大权，造成克城僵化、缺乏发展活力。所有的民族-爱国者和亲总统政党，如彼得·波罗申科集团、祖国党、退休者党（the Party of Pensioners）和自助党都支持叶菲莫夫。^①潘科夫最终获得 52.7% 的支持率，而叶菲莫夫在最后一轮只获得 47.3% 的选民支持。^②城市议会选举同第一轮市长选举同日举行（10 月 25 日）。四个政党进入议会：“反对派集团”、“我们的地区”、“彼得·波罗申科集团”及“退休者党”分别获得 23 个、10 个、6 个和 3 个议席。^③“退休者党”以退休人员和社会其他弱势群体为选民基础，在乌克兰共产党被禁止参选后成为政治上的独行者。不久，城市议会“反对派集团”党员集体退党，建立了一个议会内部的派别，名为“统一克拉马托尔斯克”（United Kramatorsk）。这是为了将他们的活动与民族反对派从事的政治活动区分开来，同时全身心地投入城市的日常事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政治反对派很难在政治和军事重镇生存下来。^④可能是波罗申科或是热布罗夫斯基州（Жебровський）州长说服了斯库达里，让其支持者离开反对派集团。其次，斯库达里并不属于反对派集团的两个主要支持者——艾哈迈托夫家族和菲尔塔什（Dmytro Firtash）家族。他并不想赞助斯库达里的反对派集团。根据沃罗什科夫^⑤的说法，艾哈迈托

① 2015 年 12 月 4 日，《克拉马托尔斯克真理报》。

② 2015 年 11 月 18 日，《克拉马托尔斯克真理报》。

③ 我比较 2014 年 10 月 4 日的 I counted these numbers by comparing KP, 4 October 2014 and “Spysok deputativ Kramators'koirady VII sklykannia.” Accessed November 6, 2017. <http://www.krm.gov.ua/person/viewall/page/>.

④ 来自 2017 年 8 月 21 日与马里乌波尔反对派集团顿涅茨克州机关负责人纳格玛尔（Irina Nagornaia）的访谈。

⑤ 来自 2017 年 8 月 2 日在克拉马托尔斯克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社会政策部联络官沃罗什科夫（Voroshkov Oleksandr）的访谈。

夫卖掉了克城机械制造厂和动力机械特钢厂的股票，重建了正在缩小的商业帝国。因此斯库达里和叶菲莫夫较 2014 年前更加独立，受艾哈迈托夫的羁绊更少。还有另一个奇怪的情况，虽然 2014 年 11 月前，反对派活跃的中心地区早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他们从未尝试将顿涅茨克州委员会从马里乌波尔转移到克拉马托尔斯克。一种解释是，虽然反对派集团在马里乌波尔一直有一位国会议员，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反对派组织（地区党）却丢掉了一直占据的议会席位，而且博亚尔斯基在 2014 年输给了叶菲莫夫。^①所有的民族-爱国者和亲总统的政党，联合起来抵制联合克拉马托尔斯克政党和新克城机械制造厂。这使得城市议会出现了权力制衡的局面，新克城机械制造厂的 23 名议员与亲总统的 19 名议员相互制衡。总的来看，新克城机械制造厂和动力机械特钢厂的分歧，使得克城的政治环境比马里乌波尔更具有竞争性。（参见表 2）

表 2 2014 年之后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选举

年份	选举	支持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		支持叶菲莫夫	
2014	国会	博亚尔斯基(现任)	31.1%	叶菲莫夫	34.12%
2015	市议会	反对派集团	23 位议员	其他代表	19 位议员
2015	市长	潘科夫	52.7%	叶菲莫夫	47.3%

这种新的政治形势导致几个重要现象出现。首先，叶菲莫夫有机会向外界展示克城政治的真正议程，是在新旧两个克拉马托尔斯克中进行选择。相比之下，马里乌波尔依然是传统矛盾，即工作职位给予者和民族-爱国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尽管马里乌波尔民族-爱国者（生态学者）博罗金说马里乌波尔的未来并不在冶金业，而是旅游业和 IT 产业，但这只是他个人的判断。

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民族-爱国者们虽然有一些犹豫，却还是接受了叶菲莫夫这位亲总统和开明寡头分子的领导。退休者党年轻的领袖斯塔什克维奇 (Ihor Stashkevych) 诉诸民粹主义，反对普遍意义上的寡头。^②根据彼得·波罗申科集团的地方领袖安德瑞·安索夫的说法，乌克兰历史告诉我们，波罗

① 来自 2017 年 8 月 21 日与马里乌波尔反对派集团顿涅茨克州机关负责人纳戈尔娜娅 (Irina Nagornaia) 的访谈。

② 2017 年 8 月 3 日在克拉马托尔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议会代表斯塔什克维奇 (Ihor Stashkevych) 的访谈。

申科对这个频繁遭受外来入侵的国家而言是“更小的恶”，因为寡头更爱钱，他们之间的联合和团结更迅速，不像民族-爱国者，后者用民主理念加以联结的。^①同时，潘科夫市长尝试超越新克城机械制造厂的传统支持者范围，以赢得更为广泛的支持。他说新克城机械制造厂不再是城市的巨头，单纯依赖这个力量已经无法帮他赢得2015年的选举。在2015年选举中，潘科夫请教曾为律师的城市议员、祖国党代表菲利琴科，希望得到她的帮助以赢得选战。在赢得选举之后，潘科夫提名菲利琴科担任副市长，这让她感到意外。潘科夫尝试创造一个大联盟，同时还提名原新克城机械制造厂青年组织（The NKMF's Youth Organization）领袖奥舒尔科（Денис Ошурко）担任城市议会秘书。^②潘科夫认为民族-爱国者是一群积极的人，因此要同他们合作。这只会给民族-爱国者造成一种自强的幻觉。他们经常将潘科夫对他们的态度与顿涅茨克州州长热布罗夫斯基进行比较，这位州长只会对他们讽刺挖苦。^③

虽然工作职位给予者和民族-爱国者之间的对立逐步缓和，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在后者的阵营中只会产生更多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异分子。一个例子就是勒扎夫斯基（Volodymyr Rzhavskiy），此人是2014年克拉马托尔斯克彼得·波罗申科集团分支的建立者。2015年他批评乌克兰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之间存在非法的“跨境”贸易，这些灰色地带得到顿涅茨克州州长基赫坚科（Александр Кихтенко）的庇护。结果基赫坚科将勒扎夫斯基征召入伍作为惩罚。勒扎夫斯基被分配到马里乌波尔军用机场，继续他的政治活动。勒扎夫斯基认为，基赫坚科2015年5月被免除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基赫坚科腐败的指控。勒扎夫斯基批评2014年前顿涅茨克州制定的所有议题上的“腐败方案”还在原封不动地执行，年轻的干部难以在地区行政部门得到提拔，亚努科维奇时期的干部到现在还在位子上。在勒扎夫斯基看来，克服这些腐败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外国支持者自己花钱建设项目，

① 来自2017年8月3日与顿涅茨克国立机器制造学院讲师，彼得·波罗申科集团领导阿纳索夫（Valerii Anosov）的访谈。

② 新克拉马托尔斯克青年组织（The NKMF's Youth Organization）是由1991年该厂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变而来，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工作职位给予者政权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组织国际会议和优秀技工技能大赛等。

③ 来自2017年8月5日在克拉马托尔斯克与共同体发展基金负责人鲁达（Svitlana Rud'）的访谈。

不要委托给任何乌克兰代理人来执行预算。^①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勒扎夫斯基在社会经济和反腐败议题上，与统一克拉马托尔斯克派成员走得很近。彼得·波罗申科集团的马里乌波尔分支，将勒扎夫斯基从政党中除名，只给他保留了彼得·波罗申科集团城市议会小集团成员资格。

六、炮火记忆

乌克兰“反恐行动”的持续推进，使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民众对乌克兰产生戳心灌髓般的憎恶。^②据说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解放”的一些乌克兰民众也有类似的情况。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在占领克拉马托尔斯克时，人数只有 50 多人。在马里乌波尔，他们人数较多但那不重要。他们只装备了机枪和火箭炮，甚至没有迫击炮。因此，是否真有必要对民用建筑实施大规模炮击，并酿成了克城 36 名平民伤亡的惨剧？^③另外，通过断绝水源、关闭银行账户甚至停止发放养老金和工资的“饥饿战法”，也存在是否必要的问题。这也造成克城需要领取养老金的市民，在军事包围的三个月里只能靠浆果为生。后来，顿涅茨克州长塔鲁塔批评“反恐行动”是针对分离精英的特别手段，却给整个顿巴斯人带来恶劣印象，起到了反效果。^④克城的一些民族-爱国者告诉我，克城人口中大多数是国家公务员和工厂工人，至今还等着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或者普京）重新占领这座城市。^⑤如果我们认为乌克兰政府重建政策相对成功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一个

① 来自 2017 年 8 月 8 日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议会代表（彼得·波罗申科集团）勒扎夫斯基（Volodymyr Rzhavskiy）的访谈。

② 我在 2017 年 8 月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进行田野调查期间，并没有听到顿涅茨克居民谴责基辅政府亲北约的说法。所有和我交流的人都说自己的亲友和私有财产受到损伤或损害。当他们谴责西方的时候，他们一直强调的是乌克兰对顿巴斯平民建筑和住宅不顾一切地疯狂炮击。

③ 来自 2017 年 8 月 7 日与卡拉马托尔斯克市议会代表（统一克拉马托尔斯克派）奥利霍瓦娅的访谈。

④ 来自 2016 年 8 月 28 日在基辅与 2014 年顿涅茨克州州长，最高拉达代表塔鲁塔（Serhii Taruta）的访谈。

⑤ 来自 2017 年 8 月 3 日与顿涅茨克国立机器制造学院讲师，彼得·波罗申科集团领导阿纳索夫（Valerii Anosov）的访谈；2017 年 8 月 4 日与克拉马托尔斯克企业家和公民活动家斯维里坚科（Oleksandr Svyrydenko）的访谈。

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难以忘记战争带来的痛苦记忆。

或许是为了处理好这个问题，克城的民族-爱国者在宣传中，强调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俄罗斯）军队在占领期间仍在冒充乌克兰政府军炮击城市。这种奇怪的说法，甚至他们的庇护人叶菲莫夫，都认为难以自圆其说。对克城的民族-爱国者而言，是否接受这种说法成为一种类似忠诚测试的东西。统一克拉马托尔斯克派议员提出议案，要求城市议会建立一座纪念碑，以纪念死于2014年5月至7月的平民，马里乌波尔市已经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以缅怀2015年1月死于炮击的受害者。^①然而，占领期间（某些人）炮击造成遇难者的议题，对当地民族-爱国者过于敏感，使得议会中统一克拉马托尔斯克派担心这个议案的通过，会造成城市政治的极端化。^②

2015年1月24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对马里乌波尔东部地区进行炮击，造成31名平民死亡。^③2015年8月15日，马里乌波尔一个名叫“萨尔塔纳”（Саргана）的村庄遭遇剧烈的炮火袭击。^④不断遭到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炮火袭击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马里乌波尔市民的亲俄情结。有种说法是，乌克兰军队假充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于2015年1月袭击了克城。这种说法很奇怪，但却在马里乌波尔很盛行。^⑤我在与一位知识分子（马里乌波尔州立大学的高级讲师）讨论时，听到他坚定地相信这种“自我挑衅”理论，觉得非常惊讶。

七、结论

当社会主义公司市镇适应竞争性选举时，工作职位给予者政权也就出现

① 2015年11月24日，PR。

② 来自2017年8月7日与卡拉马托尔斯克市议会代表（统一克拉马托尔斯克派）奥利霍瓦娅（Irina Ol' khovaia）的访谈。

③ 在乌克兰军队炮击顿涅茨克市波森（Bosse）定居点之后，顿军开始发动持续两天的进攻，造成了8名平民死亡。这其实违反了乌克兰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达成的默契，即乌克兰不会炮击顿涅茨克市的中心地带。乌军的这种行为遭到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极端报复。

④ 2015年8月22日，PR。

⑤ 来自2017年8月21日笔者与马里乌波尔城市议会副议长博罗金（Maksym Borodin）的访谈。

了。在 21 世纪，马里乌波尔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工作职位给予者政权，需要应对外部多方面的挑战。为了抵抗艾哈迈托夫的系统资本管理公司的商业扩张，一些工作职位给予者要么支持左翼，要么加入民族-爱国者反对派。抵抗结束时，马里乌波尔已成为坚固的外部堡垒，而克拉马托尔斯克却成为艾哈迈托夫商业帝国的前哨基地。后者向艾哈迈托夫投降也是有条件的。马里乌波尔城市领袖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保持步调一致以应对挑战，而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领袖却毫无头绪。兵临城下时，斯库达里和叶菲莫夫仍然相互猜忌。波罗申科利用这种猜忌成功地分化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地方精英集团，使政治更具竞争性。这种竞争性，至今对亲欧洲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和马里乌波尔而言，都是出乎意料的。

他们的双重责任（确保产量最大化和保护社区共同体），不允许工作职位给予者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但同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去政治化的，因为这种沉重的责任，并没有给他们多少空间去思考意识形态和信仰问题。斯库达里亲俄的热情，似乎与他支持的社会主义者或欧亚分子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毫无关系。当欧盟还在为是否购买乌克兰风力发电机而摇摆不定的时候，俄国人直接从他那那里订购了火箭发射器，他怎么可能是亲欧分子？工作职位给予者和市政议会代表们，从不隐瞒他们对“亲欧盟示威运动”的厌恶。可是，一旦情况恶化到暴力冲突的层面，他们对地缘政治就失去了兴趣，反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城市安全、维持生存、保证经济和公共部门的正常运转之中。现在他们很自豪，因为直到军事包围时，他们还能成功保证最低工资和养老金，维持幼儿园的正常运转。民族-爱国者总认为工作职位给予者与市政领导们采取特定行动，是为了勾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里通外国。事实上，他们并不支持改变乌克兰领土现状，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爱国，而是因为工作职位给予者骨子里都是风险厌恶者。乌克兰东部的城市政治不仅与地处战争前线有关，也应被视为观察亲欧的乌克兰重建国家政党制度的实验室。

（翻译 孙超）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politics in two cities, Mariupol and Kramatorsk, located near the frontline between Ukraine-controlled Donetsk Oblast and the Donetsk People's Republic (DPR). The DPR controlled these

cities in the spring of 2014, but Ukraine recaptured them. Both cities are company towns, in which owners/managers of dominant factories, nicknamed job-givers, have a decisive voice in the city's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compares how leaders of the two cities reacted to the expansion of Rinat Akhmetov's business empire before the Donbas War, and to DPR paramilitaries during the war. The two cities diverged decisively in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because Ukrainian government succeeded in splitting two major companies and making one of them pro-presidential in Kramatorsk. As a result, electoral politics in Kramatorsk became highly competitive, while one-party dominance of the Opposition Bloc (former Party of Regions) continues in Mariupol.

【Key Words】 the Donbas War; Donetsk Oblast; Mariupol; Kramatorsk; company town; the Opposition Bloc

【Аннотаци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сравнивается политика в двух городах, Мариуполе и Краматорске,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недалеко от линии фронта между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й Украиной Донецкой областью 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ДНР). Весной 2014 года Донец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оккупировала эти два города, однако Украина вернула их себе. Оба города являются городами компаний, 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рупных заводов (менеджеры), также известные как работодатели, имеют решающее право голоса в принятии решений о городе.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сравнивается, как лидеры двух городов отреагировали на расширение бизнес-империи Рината Ахметова до войны на Донбассе, а также на военизированны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ДНР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два города пошли разными путями, т.к. Киеву удалось разделить две круп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превратив одну из них в пропрезидентскую в Краматорске.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избира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Краматорске стала очень конкурентной, а однопартийное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Оппозиционного блока (бывшей Партии регионов)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в Мариупол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ойна на Донбассе, Мариуполь, Краматорск, город компаний, оппозиция

(责任编辑 阎德学)

波兰西里西亚人争取族群地位问题评析

杨友孙 卢文娟*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来，波兰西里西亚人的族群意识开始复苏，族群文化活动也逐渐增加。目前，西里西亚人在主客观方面基本符合“少数族群”的标准，其“少数族群”的身份也基本获得了波兰社会的认可。但由于各方面原因，波兰仍未正式承认西里西亚人的少数族群地位。随着形势的发展，波兰政府可能会适当改变立场，而西里西亚人也有必要适当放低诉求，最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西里西亚人的“少数族群”地位问题。

【关键词】波兰西里西亚 波兰少数民族 波兰少数族群

【中图分类号】D771.1;K15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2-0155(25)

在欧洲，“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y)，“少数人”(minority、minorities)的概念是和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相对应的三个主要概念。其中，“少数人”的概念较广，它一般是指“在民族或族裔、宗教、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1950年联合国“防止歧视暨保护少数族群小组委员会”和197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人凯博多蒂(Capotorti)，对“少数人”(minority)的概念界定，都强调了“少数人”应具有“族裔、宗教和语言方面的特殊性”。^①1992年联合国出台的“在民族

* 杨友孙，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卢文娟，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① UN Doc.E/CN.4/Sub.2/85, see T.H.Bagley.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Geneva: Imprimeries Populaires, 1950, pp.180-181; Francesco Capotorti, *Study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Ethnic, Religious and*

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也被简称为“少数人权利宣言”。由此可见，“少数人”概念涵盖了在民族、族裔、宗教、语言一个方面或者多个方面具有独特特征的少数群体，即，它涵盖了“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少数语言”群体和“少数宗教”群体。

由于不存在统一的“少数人”、“少数民族”、“少数族群”的概念，欧洲国家在确认“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少数语言”群体和“少数宗教”群体方面有不同的标准，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少数族群”概念的确定及其区分，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做法。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通常将这些群体称为“少数族群”。而波兰，则将“少数人”细分为“少数民族”、“少数族群”、“地区语言”等群体。然而，西里西亚人却不在这三个群体之内，由此引发了波兰国内外的众多争议。本文并不打算评析波兰对“少数人”的分类方法是否得当，而是参照波兰和国际上关于“少数民族”、“少数族群”的标准，分析西里西亚人的族群特性，在此基础上对波兰的族群标准和族群政策进行评析。

一、波兰的“少数民族”、“少数族群”标准

自从 1795 年被俄奥普三国瓜分之后，波兰历经了 123 年的亡国时期，在 1918 年才得以建国。亡国的剧痛使波兰在建国后执着地强调国家的“波兰特性”，对非波兰族人采取了排斥态度，使波兰成为在国际联盟中受到最多少数族群申诉的国家。^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欧国家普遍积极创立民族、语言同质的现代民族国家，波兰也不例外。波兰社会的共识是，波兰国家应由使用波兰语和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人组成。^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纳粹大屠杀的波兰又先后经历了排斥和驱逐德国人、乌克兰人，清洗和驱逐犹太人，排斥和同化罗姆人，同化西里西亚人等政策，^③导致波兰的

Linguistic Minorities, United Nations Pubns, 1991, p.96.

① Leo Cooper, *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 Palgrave Publishers, 2000, p.47.

② Tomasz Kamusella, “Poland and the Silesians. Minority Rights à la carte?”, *Journal on Ethnopolitics and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 2012, Vol.11, No.2, pp.42-74.

③ Tomasz Kamusella, “Ethnic Cleansing in Silesia 1950-89 and the Ennationalizing Policies of Poland and Germany”, *Patterns of Prejudice*, 1999, No.2, pp.51-73.

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少，波兰族人口比例则不断提高。据估计，从 1918 年到 2000 年，波兰的少数民族（包括少数族群）人口比例，从 33% 下降到了 1%。^①而 2002 年和 2011 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波兰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的人口比例也只是稍高于 1%，分别为 1.23% 和 1.46%。^②这种高达 98% 以上的主体民族比例，不仅在欧洲，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

冷战结束后，波兰在 1997 年通过了新宪法。宪法第 35 条要求保护“少数民族或族群”（national or ethnic minorities）的权利，即将“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等同罗列而未加以区分。^③根据波兰 2002 年的人口统计，被波兰政府承认的“少数民族或族群”为：卡拉伊姆族（Karaim）45 人，兰科族（Lemko）5863 人，罗姆族（Roma）12731 人，鞑靼族（Tatars）447 人，而生活在波兰北部沿海地区的卡舒比语（Kaszubi, Kashubians）使用者为语言少数群体，人数为 52665 人。由于卡舒比语言群体中认同“卡舒比族”的只有 5100 人，不到 1/10，所以卡舒比人只被认定为一个语言群体，而未考虑认定为少数民族或族群。而在这次人口统计中，认同为西里西亚族的有 173153 人（绝大多数居住在西里西亚地区），占当时波兰总人口（3823 万）的约 0.45%，而波兰所有少数族群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1.23%；其中使用西里西亚语的人口只有 6 万左右。^④根据该数据，波兰政府宣称自己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人口在 1% 以下——因为卡舒比人只是地区语言群体，他们在族群上仍然属于波兰族。^⑤但上述数据被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① Tomasz Kamusella, “Poland and the Silesians: Minority Rights à la carte?”

② 与 2002 年只统计非波兰族人口不同的是，2011 年的统计口径比较复杂，它分别统计了：既认同波兰族身份同时又认同其他某个族裔身份的群体；首先认同波兰族身份，同时又认同少数族群身份的群体；首先认同少数族群身份的群体；只认同某个少数族群身份的群体等。在本文中，2011 年的数据笔者撷取的是只认同少数族群的群体。参见“Ethnic minorities in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thnic_minorities_in_Poland

③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 April 1997, <http://www.sejm.gov.pl/prawo/konst/angielski/kon1.htm>

④ Tomasz Kamusella, “Poland and the Silesians: Minority Rights à la carte?”; 2002 年的波兰人口统计具体数据参见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Raport z Wyniki Narodowego Spisu Powszechnego Ludności i Mieszkań 2002; 或参见 Ethnic minorities in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thnic_minorities_in_Poland

⑤ Lucyna Nowak edited,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Ludność, Stan i struktura społeczno-demograficzna, Narodowy Spis Powszechny Ludność i Mieszkań 2011, https://www.stat.gov.pl/gus5840_14076_PLK_HTML.htm

认为是波兰政府操纵的结果。^①但即使按照这个数据计算，西里西亚人也占了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36%，遥遥领先于其他少数民族人口。^②根据波兰政府 2011 年的人口统计，波兰西里西亚人总人口为 81.7 万人，占波兰总人口的 2.1%，占波兰所有“少数人”总人口的 58%。^③

2005 年 1 月，波兰出台“少数民族、民族与地区语言法案”之后，^④波兰将国内的“少数人”（minority）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少数民族”（mniejszości narodowych, national minorities），一共有 9 个，即白俄罗斯族、捷克族、立陶宛族、德意志族、亚美尼亚族、俄罗斯族、斯洛伐克族、乌克兰族和犹太族；

第二类是“少数民族群”（mniejszości etnicznych, ethnic minorities），一共有四个，即卡拉伊姆人（Karaim）、兰科人（Lemko）、罗姆人（Roma）和鞑靼人（Tatars）；

第三类是“地区语言群体”（społeczność posługująca się językiem regionalnym, community of the users of language Kaszubi），即生活在波兰北部沿海地区的卡舒比语群体。^⑤

该文件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群”区分开来，这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做法。“少数民族”是指，必须是一群波兰公民，他们共同满足如下条件：（1）在数量上少于波兰的其余人口；（2）在语言、文化或传统方

①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9 of the Convention: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United Nations, June 2, 2003, www.unhcr.org/cgi-bin/texis/vtx/refworld/rwmain?page=publisher&docid=3f2738c84&skip=0&publisher=CERD&querysi=poland&searchin=title&display=10&sort=date

②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Raport z wyników Narodowego Spisu Powszechnego Ludności i Mieszkań, 2002.

③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Raport z wyników. Narodowy Spis Ludności i Mieszkań 2011, http://www.stat.gov.pl/gus/5840_13164_PLK_HTML.htm

④ ACT of 6 January 2005 on national and ethnic minorities and on the regional languages (Ustawa o mniejszościach narodowych i etnicznych oraz o języku regionalnym), http://ksng.gugik.gov.pl/english/files/act_on_national_minorities.pdf

⑤ Charakterystyka mniejszości narodowych i etnicznych w Polsce, Mniejszości narodowe i etniczne ministerswo spraw wewnętrznych i administracji, <http://mniejszosci.narodowe.mswia.gov.pl/mne/mniejszosci/charakterystyka-mniejs/6480,Charakterystyka-mniejszosci-narodowyc-h-i-etnicznych-w-Polsce.html>

面与其他公民有很大区别；(3) 努力保护其语言、文化和传统；(4) 知晓其历史、民族群体，并致力于表达与保护自己；(5) 其祖先在波兰持续生活了100年以上；(6) 认同某个民族国家。

而“少数族群”也同样应该满足6个条件，其中前5个条件和“少数民族”的条件完全一样，区别在于第6条，即——“不认同某个民族国家”。换句话说，“少数民族”必须有一个在国外由该民族建立的民族国家，即存在一个“母国”，而“少数族群”则不存在“母国”。和“少数族群”相比，“少数民族”拥有更高的政治权利，例如在国家议会选举中，“少数民族”的政党或组织的候选人，可以不受5%的当选门槛限制，而直接进入波兰议会。^①

总体上看，波兰对于“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的标准和国际较为认可的标准大致相符，例如它基本符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人凯博多蒂（Capotorti）在《关于隶属于种族的、宗教的和语言的少数人权利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少数人”定义：“一个群体，它的人数在数量上少于该国的其余人口，在国家中处于非支配地位，它的成员——作为该国国民——在种族、宗教或语言特征上与其他人口不同，表现出（至少隐性地）团结感，并要求保护他们的文化、传统、宗教和语言。”^②差别主要是两点，其一，波兰的“少数民族”需要有一个以该民族为主体建立的“母国”，而“少数族群”则不能有一个这样的“母国”——这个标准在国际上比较少见，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有些群体——例如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等国的库尔德人，波兰的西里西亚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成为少数民族。不过，这个标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例如，2001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一个文件就规定，作为“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一般需要有一个邻国作为其“母国”。^③其二，波兰要求“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必须在波兰持续生活了100年以上，

① Rocznik, Andrzej, ed. *Związek Ludności Narodowości Śląskiej w dokumentach*, Część I, Zabrze: Narodowa Oficyna Śląska, 2012.

② Francesco Capotorti, *Study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United Nations Pubns, 1991, p.96.

③ “Pamphlet No.9: The High Commissioner on National Minor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e_Minorities9en.pdf

欧洲大多数国家在少数民族居住时间方面，都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二战以后移民来的群体，哪怕其他方面符合“族群”的特征，也只被认为是“移民”或“新少数民族”，只有少数国家，例如匈牙利，才有与波兰相似的规定。可见，波兰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群”标准要稍高于国际上较为认可的“少数人”标准。

二、西里西亚人的族群特性分析

根据波兰政府 2011 年的人口统计，波兰西里西亚人口总数为 81.7 万人，而使用西里西亚语的人口约为 50.9 万人。^①西里西亚人在波兰社会被普遍认为是少数族群，而且也是最大的少数族群，西里西亚语则是除了波兰语之外使用人口最多的少数语言。但是长期以来，波兰政府都没有承认西里西亚人作为少数族群的地位以及西里西亚语作为地区语言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对西里西亚人的族群属性进行深入分析，以客观而准确地把握不同方面的分歧所在。

根据上述波兰制订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的标准，由于世界上并不存在着一个由西里西亚人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波兰的西里西亚人最多能够获得“少数族群”的身份。而“少数族群”的 5 个条件中的第 1 条“在数量上少于波兰的其余人口”和第 5 条“其祖先在波兰持续生活了 100 年以上”，西里西亚人都完全符合。争议在于第 2-4 条。其中第 3 条“努力保护其语言、文化和传统”、第 4 条“知晓其历史、民族群体，并致力于表达与保护自己”，主要是主观标准，和凯博多蒂定义中的“表现出(至少隐性地)团结感，并要求保护他们的文化、传统、宗教和语言”的意思接近；第 2 条“在语言、文化或传统方面与其他公民有很大差别”，则偏重于客观标准，和凯博多蒂定义中的“在种族、宗教或语言特征上与其余人口不同”相近。但波兰使用了“很大区别”一词，增加了主观色彩，抬高了认定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的门槛。

① 波兰国家统计局数据，参见“Raport z wyników. Narodowy Spis Ludności i Mieszkań 2011”,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http://www.stat.gov.pl/gus/5840_13164_PLK_HTML.htm

（一）西里西亚人作为“少数民族”的客观标准分析

波兰的“少数民族标准”的客观方面，主要是“在语言、文化或传统方面与其他公民有很大区别”，下面依次对西里西亚人的历史、语言、文化（包括传统、习俗）进行分析。

1. 西里西亚人的独特历史

在波兰，西里西亚是具有十分复杂历史的区域，它在大多数时候属于普鲁士、奥地利和波兰，而目前绝大部分属于波兰，只有极少的部分属于德国和捷克。西里西亚最早居民已无法考证。据研究，在西里西亚地区生活的较早居民是凯尔特人，他们在公元前 4 世纪就来到了今天波兰的弗罗兹瓦夫的斯莱扎山(Mount Ślęza)一带生活。^①公元 1 世纪左右，日耳曼的一支鲁基人(Lugii)开始在西里西亚一带生活，而斯拉夫人则在公元 7 世纪左右来到这里。^②公元 9 至 10 世纪，西里西亚地区先后被大摩拉维亚、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等王国统治。约 990 年，波兰皮亚斯特王朝将西里西亚并入波兰。在波兰分裂期间（1138-1320 年），西里西亚地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西里西亚公国，但未得到波兰中央政府的承认。1335 年，波希米亚王国占领西里西亚，继而又于 1348 年迫使波兰正式放弃了对西里西亚地区的统治权。1526 年，西里西亚随着波希米亚王国归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16 世纪，西里西亚民族初步形成，在一些正式文件中出现了“西里西亚民族”（the Silesian nation）的提法。^③

1742 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取胜，从奥地利获得了大部分西里西亚地区。这些地区后来组成了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省。普鲁士对西里西亚推行德国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西里西亚在国联主导下，被分割为波兰部分、德国部分和捷克部分。^④三个国家分别对其管辖范围内的西里西亚人，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波兰化、德国化和捷克化。

① Marek Czpliński, *Historia Śląska*,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Wrocławskiego, 2007, pp.34-35.

② Ibid.

③ K. Kwaśniewski, “Jeszcze o narodowości śląskiej”, In Nijakowski, Lech, ed, *Nadciągają Ślązacy, Czy istnieje narodowość Śląska*, Warszawa Naukowe Scholar, 2004, pp.69-89.

④ 参见杨友孙：“国际联盟‘民族自决’原则的欧洲实践考察”，《历史教学问题》，2014 年第 5 期。

1945 年之后，波兰整个国家向西移动，一战后存留在德国的那一部分上西里西亚全部并入波兰，下西里西亚也基本上并入波兰，德国、捷克只保留了极少的部分。一个基本统一的西里西亚再度出现在一个国家之内。对于西里西亚人，波兰人并没有像对待德国人那样将他们驱逐出境，但也不允许他们自由选择返回德国。波兰政府对待西里西亚人并不像对待普通波兰人一样，而是将西里西亚人统称为“原住民”（Autochthons）或“不知自己波兰特性的波兰族人”（ethnic Poles unaware of their Polishness）或“地下德国人”（crypto-Germans）。而捷克将其境内的西里西亚人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归属为“捷克族”和“波兰族”，德国则将其境内的西里西亚人归入德意志族。^①

冷战结束后，随着波兰的民主化进程，被压抑的西里西亚族群意识开始重新苏醒。虽然波兰官方没有承认西里西亚人为少数族群，但西里西亚族群的各种组织开始建立起来。1993 年，德国承诺给予愿意返回德国的波兰、捷克等国的原德国居民以德国国籍。波兰和捷克均有西里西亚人——他们居住在原先德国统治的范围之内——选择返回了德国，而波兰和捷克政府对此基本采取了默认态度。不过，为了防止更多的西里西亚人返回德国而对上西里西亚地区——尤其是奥波莱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带来震荡，波兰政府承认波兰存在德意志民族，这些德意志族人大部分是生活在波兰西里西亚地区的西里西亚人。^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上，西里西亚确实有一定的独特性。首先，一战以后，尽管相对于德国和捷克来说，波兰对于西里西亚人的政治诉求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压制政策，但波兰仍然将西里西亚地区合并成了一个“西里西亚省”，并给予了“西里西亚省”较高的自治权：西里西亚省建立了自己的议会，有自己的财政部，除了外交事务和防务问题之外，西里西亚政府可

① Wanatowicz, Maria Wanda, “Od indyferentnej ludności do śląskiej narodowości? Postawy narodowe ludności autochtonicznej Górnego Śląska w latach 1945-2003 w świadomości społecznej”, Prace Naukowe Uniwersytetu Śląskiego w Katowicach Series, Vol.2224, Katowice: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Śląskiego, 2004.转引自 Tomasz Kamusella, “Poland and the Silesians: Minority Rights à la carte?”

② Wanatowicz, Maria Wanda, “Od indyferentnej ludności do śląskiej narodowości? Postawy narodowe ludności autochtonicznej Górnego Śląska w latach 1945-2003 w świadomości społecznej”

以完全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1945年5月6日，波兰政府出台法令，取消了西里西亚的高度自治地位。1990年波兰政权更迭以后，西里西亚自治运动再度出现。但波兰政府不再支持西里西亚的自治运动，并将西里西亚地区分割为以下几个省（Voivodship）：大波兰省、小波兰省、下西里西亚省、卢布斯卡省、奥波莱省、西里西亚省。^①其次，在历史上，西里西亚地区就是一个较为独立而特殊的经济区域。该地区从属于普鲁士的时期开始，就是一个仅次于鲁尔地区的重要工业基地，尤其是上西里西亚，甚至不逊于任何其他西欧地区的著名制造业基地。^②即使在社会主义波兰时期和今天的波兰，西里西亚地区仍然是波兰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同时也是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至今仍然以其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而吸引着波兰其他地区的人前来就业和创业。

总之，从历史来看，西里西亚地区和西里西亚人的历史，与波兰国家和波兰人的历史并不完全一致；西里西亚地区的历史也与德国、捷克的历史不完全重合。它有自己的独特历史。据称，在普鲁士统治西里西亚期间，德意志人将西里西亚人称为“有水分的波兰人”（Wasserpollacken），而波兰人则认为西里西亚人“讨好德国人”。可见在那时，德国人和波兰人都认为西里西亚人不是波兰人或德国人，这个族群夹在德国和波兰中间两头受气。^③至今，不少波兰人仍然将西里西亚人视为“边缘人”或“边界群体”。当人们询问西里西亚族人心中的祖国是哪里时，他们会说，他们没有祖国，但西里西亚是他们的家园。^④“西里西亚自治运动”和“西里西亚民族联盟”的

① 其中，奥波莱省和西里西亚省又称为“上西里西亚”，而今天德国的下西里西亚上卢萨蒂亚（Oberlausitzkreis）、霍耶斯韦达（Hoyerswerda）和波兰的下西里西亚省，被统称为“下西里西亚”。其中，上西里西亚的族群意识和自治意识要强于其他地区。在19世纪中期德国占领时期，一些上西里西亚人还曾试图建立一个“上西里西亚共和国”。

② 西里西亚地区的工业化发展状况，参见 Nóra Baranyai, Gábor Lux, “Upper Silesia: The revival of a traditional industrial region in Poland”, *Regional Statistics*, 2014, Vol.4, No.2, pp.126-144.

③ A. Faruga, “Czy Ślązacy są narodem? Przemilczana historia Górnego Śląska”, In Nijakowski Lech. ed, *Nadciągają Ślązacy, Czy istnieje narodowość Śląska*, Warszawa Naukowe Scholar, 2004, pp.157-164.

④ “Heimat”为德语，是故土、故园、家园的意思。Gorzelik, J, “Ruch śląski-między nacjonalizmem i regionalizmem”, In Nijakowski, L.M. ed., *Nadciągają Ślązacy*, Warszawa: Wydawnictwo Naukowe Scholar, 2004, pp. 15-34.

领导人杰吉（Jerzy Gorzelik）也曾多次表达自己认同西里西亚族而非波兰族的观点。^①可见，土生土长的西里西亚人曾经在过去的 80 年里多次转变国家归属，但它们的族群仍然得以延续，它们的民族认同仍然很稳定。^②

2. “西里西亚语”的发展状况

语言本身或者语言差别，并不是决定某个群体是否能成为一个民族的关键因素，例如世界上就存在着母语都是英语的不同民族。但语言的差别常常可以加强差异性和民族认同。在中东欧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独特的语言甚至被抬升为建设民族国家的条件之一，即只有那些有着独特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民族才有资格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③西里西亚人并没有统一的语言，他们有的使用德语，有的使用波兰语，更多的人使用当地化了的斯拉夫方言，并夹杂一些德语词汇，即西里西亚语。这种语言同波兰语比较接近，但和波兰语在词汇、发音方面又有差异，普通波兰人听不懂。西里西亚语在历史上主要是一种口头语言，没有留下西里西亚语言的书籍；在字母、语法方面也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语言体系。因此，长期以来，西里西亚语被波兰政府视为“波兰语的方言”之一，而不是一种地区语言，波兰的主流语言学界也持这一观点。^④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西里西亚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因为不论是德语群体还是波兰语群体，都无法听懂西里西亚语。^⑤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反映了该语言的独特性：二战结束以后，出于对德国人的仇恨，波兰政府试图遣返所有的德国人，但首先需要识别谁是波兰人，谁是德国人。政府让那些可疑的人用波兰语朗诵基督教《主祷文》（Pater noster），很多西里西亚族

① Jan Cieniński, “Silesian push for autonomy tests Poland’s unity ahead of poll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5, 2014.

② K. Heffner, “Ethnically mixed regions in the Polish conceptions of regionalization: the Opole region in Silesia”, *Region and Regionalism*, 1999, No.4, pp.71-83.

③ Tomasz Kamusella, Motoki Nomachi, “The Long Shadow of Borders: The Cases of Kashubian and Silesian in Poland”, *Eurasia Border Review*, 2014, Vol.5, pp.35-60.

④ L.M. Nijakowski, “O procesach narodotwórczych na Śląsku”, In Nijakowski, L.M. ed. *Nadciągają Ślązacy*, Warszawa: Wydawnictwo Naukowe Scholar, 2004, pp.132-156.

⑤ Wojciech Janicki, “Minority Recognition in Nation-States—The Case of Silesians in Poland”, in Tomáš Drobík, Monika Šumberová edited, *Chapters of Modern Human Geographical Thought*,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 pp.155-184.

人没有通过测试而被当作了德国人。^①

冷战结束以来，一些西里西亚人开始对西里西亚语进行系统化，希望它能成为一种官方承认的地区语言。卡托维茨的西里西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ilesia）大力加强了对西里西亚语的研究；1997年，弗罗兹瓦夫建立了下西里西亚大学（University of Lower Silesia），也积极进行西里西亚语言和文化研究。卡托维茨电台设立了一些固定的西里西亚语节目。2003年，在“西里西亚民族联盟”组织支持下，成立了“西里西亚民族出版社”，资助出版波兰语、德语和西里西亚语的书籍，并发行了一个波兰语、西里西亚语的双语期刊。2012年5月，上西里西亚10个民间组织成立了“上西里西亚理事会”（the Upper Silesian Council），提出了以下三项目标：正式承认波兰存在西里西亚民族；承认西里西亚语为一个地区语言；在波兰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有介绍西里西亚地区的内容。^②

西里西亚人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2007年，“西里西亚民族联盟”成功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申请到了西里西亚语的语言代号（ISO 639-3），这实际上使“西里西亚语”获得了国际承认。^③2007年6月，美国国会图书馆（US Library of Congress）也承认了“西里西亚语”为一种“地区语言”。2009年，有标准拼写方案的西里西亚书面语言正式问世；2010年，出版了两本用于小学教学的西里西亚语言初级教程。^④此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西里西亚语的教材和书籍，网络上的西里西亚语教学平台也开始陆续出现了。学习西里西亚语的人口也逐渐恢复和发展，到2011年，已有50万之多，远超2002时的6万。

西里西亚语言发展运动也受到了西里西亚一些地方政界的支持，例如卡托维茨地方议会在2008年就专门资助了西里西亚语言会议，以庆祝西里西

① Wojciech Janicki, “Minority Recognition in Nation-States—The Case of Silesians in Poland”.

② Mirosława Siuciak, “Czy w najbliższym czasie powstanie język śląski?”, *Poznańskie Studia Polonistyczne Seria językoznawcza*, 2012, No.19.

③ Tomasz Kamusella, “Poland and the Silesians: Minority Rights à la carte?”;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批文，参见“Request for Change to ISO 639-3 Language Code” (2007), SIL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Languag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rzej Rocznik, http://www.sil.org/iso639-3/cr_files/2006-106.pdf

④ Tomasz Kamusella, “Poland and the Silesians: Minority Rights à la carte?”

亚语言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在 2007 年和 2010 年，一些卡托维茨地方议会的议员两度向波兰议会提交议案，希望波兰政府承认“西里西亚语”作为波兰“地区语言”的地位，但波兰中央政府第一次是拒绝了该议案，第二次则决定不予讨论该议案。

2012 年 5 月，西里西亚族群代表写信给时任波兰总统图斯克，希望能启动政府与西里西亚族群之间的对话。7 月，一些西里西亚族群组织向波兰议会再度提交了议案，希望承认西里西亚语作为“地区语言”的地位。官方没有作出回应。欧洲地区与少数语言宪章专家委员会，曾经要求波兰政府就西里西亚语的地位问题与西里西亚人举行对话，但波兰政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①

不过，波兰官方文件使用了“西里西亚语”的语言代号 ISO 693-3。^② 同年，波兰行政与数字化部承认西里西亚语是一种“传统语言”。这是近年来波兰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松动迹象。

波兰政府使用“西里西亚语”的语言代号，虽然是一种进步，但并不能算承认了西里西亚语；而波兰行政与数字化部将西里西亚语言称为“传统语言”，也正是谨慎地避免使用“地区语言”或“少数语言”的称谓。而且，波兰政府在承认“西里西亚语”为地区或少数语言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社会压力。例如，一些波兰人攻击那些研究西里西亚语或完善西里西亚语的学者为“敌人”“卖国贼”。^③

3. 西里西亚人的文化独特性分析

虽然西里西亚文化运动常常受到所属的波兰、德国、捷克等国政府或多或少的压制，但西里西亚地区的文化运动自从 19 世纪开始就一直持续发展。这些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就是宣传西里西亚地方文化，强调该文化与波兰文化、德国文化的差异，以唤醒西里西亚民族意识。

①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Application of the Charter in Poland”, Council of Europe, 2011, www.coe.int/t/dg4/education/minlang/Report/EvaluationReports/PolandECRML1_en.pdf

②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Administracji i Cyfryzacji z dnia 14 lutego 2012 r. w sprawie państwowego rejestru nazw geograficznych”, February 14, 2012, *Dziennik Ustaw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http://isap.sejm.gov.pl/DetailsServlet?id=WDU20120000309>

③ Mirosława Siuciak, “Czy w najbliższym czasie powstanie język śląski?”

西里西亚在文化上具有边界地区特有边缘文化性质。该地区先后受到摩拉维亚、波西米亚、捷克、奥地利、普鲁士、德国、波兰等力量的统治，受到了多重文化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一种丰富多元又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西里西亚人有着与波兰人、德国人不同的文化节日和文化活动，有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烹饪方式，具有独特的民族服饰，还有专属该族群的民族习俗、名人、歌曲和戏剧。例如他们有庆祝 15 岁生日的各种活动；在周日晚上吃用薄片卷和红卷心菜做的饺子，几乎是每个西里西亚人家庭的必修课程。

在宗教方面，除了少数西里西亚人信奉新教之外，绝大部分西里西亚人和波兰人一样，对天主教有着强烈的感情和深度的虔诚，所以在宗教方面几乎无法区分普通波兰人和西里西亚人。不过，西里西亚人更加遵循天主教“亲生命”、“亲家庭”、“亲传统”、“亲道德”等传统价值观，他们比普通波兰人更加注重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

（二）西里西亚人作为“少数民族”的主观标准分析

从 19 世纪起，西里西亚人就开始表现出明确的族群意识，并逐渐走向联合。但在一个多世纪里，西里西亚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被分割在德国、波兰和捷克统治之下，严重挫败了其民族联合进程。在社会主义波兰时期，波兰政府将波兰视为“单一民族国家”，在 1950、1960、1970、1978 和 1988 等历次人口统计中，并不统计“民族”，包括西里西亚人在内的各种族群意识，被淹没在大一统的“波兰人”的族类之中。

冷战结束之后，西里西亚人的族群意识开始逐渐复苏。1990 年初，捷克出现了“摩拉维亚及西里西亚自治运动”，试图实现捷克境内的西里西亚人的自治，但在经过了短暂的高潮后，在新世纪逐步走向式微。而在波兰，西里西亚自治运动虽然遭受到一定的挫折，但仍然在发展之中。肇始于 1990 年 1 月的“西里西亚自治运动”党（Ruch Autonomii Śląska, RAŚ），则试图将目前西里西亚地区的分散省份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单独的省份，实现类似一战之后的西里西亚高度自治。1997 年开始，该组织发动了很多活动。例如组织西里西亚人到上西里西亚的“圣安妮山”搞“圣山”集会活动；举行“3×TAK “（“3×是的”）活动，即，“自治、语言、民族游行示威活动”。

有的极端份子甚至在活动中打出了德语“Oberschlesien”（上西里西亚）的口号，以强调该地区与波兰其他地区的差异，引起了一些冲突。

在 2002 年、2011 年的人口统计过程中，“西里西亚自治运动”在西里西亚地区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鼓吹西里西亚人“有权表达自己的西里西亚族群身份”。在此影响下，从 2002 年人口统计开始，人们可以自由填写自己认同的民族或族群，一些西里西亚人选择了公开自己的西里西亚族群身份。^①近年来出现的“上西里西亚理事会”（the Upper Silesian Council），在为争取西里西亚人族群地位和复兴西里西亚文化而努力；“为了西里西亚语”组织（For the Sake of the Silesian Language），“彩虹协会”（Danga）、“西里西亚民族联盟”组织等，也在积极为复兴西里西亚语言和文化进行持续不断的努力。

由于波兰政府的不妥协立场，争取西里西亚族群身份的运动一直未取得明显进展。近年来，“西里西亚自治运动”开始将活动重点放在参与地方事务上；而“西里西亚民族联盟”则致力于发展西里西亚语言，以争取波兰政府承认“西里西亚语”与“卡舒比语”一样，拥有“地区语言”的地位。

三、波兰政府对西里西亚人族群地位的基本观点 ——“Gorzelik and Others v. Poland 案例”^②分析

“Gorzelik and Others v. Poland 案例”是西里西亚人注册“西里西亚民族联盟”组织的一个司法案例，它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波兰政治生活中一个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波西里西亚人族群觉醒运动的一个焦点问题。在本案例中，波兰政府、法院表达了自己对“西里西亚人”是否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的基本看法。

本案例原告为三个认同自己是西里西亚人的波兰男性公民：杰吉（Jerzy

^① Paweł Popieliński, “Etniczność i narodowość rdzennych mieszkańców Górnego Śląska po 1989 roku”, *Poznańskie Studia Slawistyczne*, NR 8/2015.

^② “Case of Gorzelik and Others v. Poland, Application No.44158/98”, Judgment Strasbourg (Grand Chamber), 17 February 2004, http://www.menschenrechte.ac.at/orig/04_1/ Gorzelik_PL.pdf

Gorzelik)、鲁道夫 (Rudolf Kołodziejczyk) 和埃尔温 (Erwin Sowa), 其中, 杰吉和埃尔温生活在波兰的卡托维茨 (Katowice), 鲁道夫生活在离卡托维茨 35 公里的城市雷布尼克 (Rybnik)。杰吉兼任“西里西亚自治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和“西里西亚省”的代言人。1996 年 12 月 11 日, 三人在 190 位西里西亚人的支持下, 向卡托维茨地区法院申请注册“西里西亚民族联盟”组织。卡托维茨地区法院根据波兰“结社法”第 13 (2) 条, 将相关材料转送给卡托维茨市市长, 向其征询意见。1997 年 1 月 27 日, 卡托维茨市市长将自己的反对意见提交给了法院:

从民族的角度看, 我们并不存在“西里西亚人”。没有事实表明波兰存在着西里西亚族。将“西里西亚人”称为“少数民族”也违反了波兰宪法。“西里西亚人”只是意味着一个地区族裔群体, 而不是一个民族……申诉人利用某些社会学的研究来证明波兰存在着“西里西亚族” (Silesian nationality), 但这与其他很多科学研究是不相符的……如果批准该组织, 意味着承认“西里西亚人”为一个少数民族, 就要享受少数民族在教育、媒体等方面的权利, 而这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是有害的; 而且这也意味着波兰回到了在波兰国家还未建立时期的部落主义状态之下。

市长还向卡托维茨地区法院展示了波兰内务部的意见信: 波兰还没有批准欧洲委员会的“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框架公约”, 因此该公约在波兰无效; 不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民族角度来看, 西里西亚的居民都不能被认定为少数民族。

但卡托维茨地区法院并没有采纳市长的意见, 而是允许申诉人注册“西里西亚民族联盟”组织, 因为法院认为: 不适合确定“西里西亚族” (Silesian nationality) 和“西里西亚少数民族” (Silesian national minority) 的准确含义, 但一般的常识是认为存在着西里西亚族群, 而且政府也没有否认西里西亚是一个少数民族 (ethnic minority)。^①

1997 年 7 月 2 日, 卡托维茨市长向卡托维茨上诉法院提起诉讼, 9 月

^① 需要注意的是, 政府代表曾经在协调会上驳斥过西里西亚人是一个“少数民族”。“Case of Gorzelik and Others v. Poland, Application no. 44158/98”

24日，卡托维茨上诉法院在裁决中支持市长的观点，并做了如下解释：^①

在国际社会，并不存在着关于“民族”（nation）和“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的正式界定。西里西亚人显然属于一种有深度自我认同，包括文化认同的地区性群体，他们无疑是具有独特性的，但这些不足以让他们构成一个民族。他们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试图按照“民族”的标准来创建自己的身份。而波兰其他人也未认同存在着“西里西亚民族”。他们只是被认为是地方性群体。在国际社会，波兰和法国、德国一样，常常被认为是单一民族国家（single-nation State），尽管波兰也存在着一些其他族群。

尽管波兰社会学家一般认为西里西亚人属于一种族群（ethnic group）和区域群体，同时也具有“民族”（nation）的一些特征，但西里西亚人也不符合“族群”的界定。“族群”（ethnic group）可以被理解为具有独特的语言、文化和某种社会联系，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自我意识、有专门的名称的群体。

卡托维茨上诉法院的某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西里西亚人曾经明显地表达过它们自己对于“少数族群”或“少数民族”身份的追求。^②

申诉人不服，于1997年11月3日上诉到波兰最高法院。1998年3月18日，最高法院裁定申诉人的申诉失败，并提出下述理由：

注册一个组织的前提条件，是该组织及其备忘录完全符合波兰国内法律以及波兰签署的国际条约。在本案例中，“西里西亚民族联盟”组织备忘录中，将西里西亚人称为“西里西亚民族”（Silesian nation）或“西里西亚少数民族”（Silesian national minority）是违法的。一般的感受是，西里西亚人是一个族群群体（ethnic group），但从未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群体，而且该群体也未表达过这种要求。

最高法院同意卡托维茨上诉法院关于“少数民族”（national

① “Case of Gorzelik and Others v. Poland, Application No.44158/98”, paragraph 32.

② 一些波兰学者也认为，在 Gorzelik and Others v. Poland 案例中，西里西亚人注册“西里西亚民族联盟”组织，实际上已表明了西里西亚人追求“民族身份”的愿望。参见 Anna Śliz, Marek S. Szczepański, “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a Sociological Case Study of the Upper Silesians’ Group”, *Przegląd Zachodni*, 2014, No.II.

minority) 是一个法律术语的观点, 尽管这个词语在波兰法律和一些国际公约中都没有界定。“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框架条约”的解释报告也指出, 个人民族身份的主观选择要与其民族身份的客观标准联系起来。因此, 主观上认同自己归属一个社会并没有接受的民族, 是存在问题的。个人虽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民族身份,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这种选择确立一种新的民族或少数民族。

在这里, 波兰最高法院承认, 波兰社会的普遍认识是, 西里西亚人是一个族群群体。但是最高法院也认定, 西里西亚人没有表达过成为“民族”的要求。申诉人不服, 向欧洲人权法院上诉, 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认为, “少数民族”的定义是非常难以确定的, 甚至包括“欧洲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在内的所有国际条约, 都没有界定这个概念。而且, 对于少数民族、少数族群和其他少数群体的确定, 各国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安排, 国际条约也没有强制国家出台关于“少数民族”的定义。

由上可见, 对于“西里西亚人”是否为“少数族群”, 波兰国内意见并未完全统一, 主要有以下意见:

卡托维茨市市长认为, 西里西亚人只是一个地区族裔群体;

卡托维茨地区法院认为, 一般的常识是认为存在着西里西亚族群 (minority);

卡托维茨上诉法院认为, 西里西亚人既不是一个少数民族, 也不能算是少数族群;

波兰社会学家一般认为西里西亚人属于一种“族群”和区域性群体, 而波兰民族学界认为西里西亚人只是一种地区群体; 近年来也有不少波兰学者承认西里西亚人为一个少数族群群体。波兰内务部认为, 西里西亚人不是一个少数民族, 但对西里西亚人是否能作为一个族群则未作判断。波兰最高法院认为, 西里西亚人是一个族群群体 (ethnic group), 但从未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群体。波兰学者斯切潘斯基 (Szczepański) 的观点可谓代表了波兰社会的总体意见: 西里西亚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族群色彩的族群群体, 但它还没有完成“民族”的构建。^①

① M.S. Szczepański, “Regionalizm górnośląski: los czy wybór?”, In L.M. Nijakowski ed.

四、各方声音

波兰西里西亚人的民族地位问题，也引起了欧洲学界和政治界的关注。大多数的意见，是希望波兰积极对待西里西亚人的呼声，承认西里西亚人作为一个少数族群甚至少数民族的地位。

欧洲人权委员会咨询委员会（the Advisory Committee）多次呼吁波兰政府采取更加开明的态度，发起对话协商该问题，它还呼吁波兰议会少数民族与族群委员会落实其 2008 年的一个倡议，就西里西亚人的语言、族群身份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①但事后并没有出现进展，因为该问题既不是波兰议会少数民族与族群委员会的重要事项，也不是波兰议会的重要事项。

2008 年欧洲委员会在一份白皮书中指出，虽然欧洲人权法院在 *Gorzelik and Others v. Poland* 案例中强调，多元性要求真正地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和文化传统、族群和文化身份、宗教信仰、艺术、文学、社会经济思想和观点。但是，仅仅强调多元性（pluralism）、宽容（tolerance）、宽厚（broadmindedness）等原则还是不够的，应该在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有组织的和广泛参与的措施；而跨文化对话则是实现多样性这个目标的一个主要手段，缺乏这个手段，就很难保护每个人的自由与福利。^②

比利时鲁汶大学学者朱莉·林格尔海姆（Julie Ringelheim）专门谈到了 *Gorzelik and Others v. Poland* 案例及西里西亚人的族群地位问题，她认为，尊重少数族群文化也是多元性和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多元性不仅是思想和观点的多样性，它还要求真正地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和文化传统、族群和文化身份等。尽管有的学者认为，集体的文化身份是自然形成的，它由集体所有成员共同拥有的一些客观的核心特点所构成，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集体文化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在历史和政治过程中构建而成

Nadciągają Ślązacy, Warszawa: Wydawnictwo Naukowe Scholar, 2004, pp.90-115.

① Sprawozdanie z 30. posiedzenia Sejmowej Komisji Mniejszości Narodowych i Etnicznych z dnia 3 grudnia 2008.

② Council of Europe, “White Paper on Intercultural Dialogue: Living Together As Equals in Dignity”, Launched by the Council of Europe Ministers of Foreign Affairs at their 118 the Ministerial Session, Strasbourg, 7 May 2008, https://www.coe.int/t/dg4/intercultural/source/white%20paper_final_revised_en.pdf

的，而且这种文化身份的社会构建过程永不停息。因此，这种稳定性与文化身份的变动性、模糊性和开放性也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波兰西里西亚人的集体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从一个地区性群体“构建”为一个族群或民族群体。^①

圣安德鲁斯大学学者托马斯·卡穆色拉 (Tomasz Kamusella) 认为，西里西亚人的族群地位问题是检验波兰民主好坏的石蕊试纸。长期以来，波兰固守自己的标准，在承认西里西亚人为“少数民族”或承认西里西亚语为“地区语言”的问题上始终不肯做出任何让步，这种僵硬的立场违背了波兰已经签署的“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框架公约”和“欧洲地区与少数语言宪章”的精神。^②他认为，当波兰社会出现真正的社会需要时，波兰政府并没有去认真应对，而是滥用法治否决了西里西亚人的权利。波兰政府这么做，是担心西里西亚地区最终会走向脱离波兰的结果，而事实上，从“西里西亚民族联盟”和“西里西亚民族联合会”的备忘录、活动和出版物中，都没有表现出任何脱离的意图。他建议，波兰政府应该放弃对国家“纯洁性”的过度追求，积极遵守国际义务，最好在欧洲委员会以及一些相关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下，由西里西亚地区组织的代表和波兰政府的代表举行谈判，来解决西里西亚人的身份问题。^③

五、评述与展望

其实西里西亚人族群地位问题本身并不复杂。目前，从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来看，西里西亚人已经基本具备了波兰和国际社会关于“少数民族”的标准，而波兰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多数观点也认为，西里西亚人是一个族群群体，但其作为一个“民族”的构建还远未完成。即使波兰官方，也存在着认同“西里西亚人”为一个族群的观点。但波兰中央政府目前仍然认为西里西亚人只是一个区域性群体，西里西亚语不过是波兰语的一种地方方言。因而，

① Julie Ringelheim, “Identity Controversies Befor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ow to Avoid the Essentialist Trap?”, *German Law Journal*, 2002, Vol.3, No.7.

② “欧洲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和“欧洲地区与少数语言宪章”分别于 2001 年、2009 年经过波兰批准而生效。

③ Tomasz Kamusella, “Poland and the Silesians: Minority Rights à la carte?”

西里西亚人的族群地位在现阶段出现了僵局。波兰学术界在分析波兰的民族和族群问题时，不是去积极讨论西里西亚人和卡舒比人的族群地位问题，而是常常有意地回避该问题。^①

实际上，西里西亚族群地位问题的关键有两个：第一，波兰不承认西里西亚人——一个社会多数意见认为存在着的族群——的少数族群地位，其主要考虑是什么，是否有可能变化？第二，如果“少数族群”或“少数民族”没有一个通用的国际标准（包括欧洲的标准），是否意味着各国可以自由采取措施确定哪些群体属于“少数族群”或“少数民族”？

首先，关于波兰不给予西里西亚人族群地位的内在原因。波兰的“少数族群、民族与地区语言法案”要求“少数民族”必须有一个母国，实际上剥夺了西里西亚人成为“少数民族”的可能。至于波兰的这个标准是否专门针对西里西亚人，无法从表面事实去判断。而波兰不承认西里西亚人为一个“少数族群”，则主要与其追求国家的“民族纯洁性”有关。在 2011 年人口统计之后，波兰再度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民族、语言同质性国家”（ethnolinguistically homogenous）。^②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尽管波兰签署了少数民族保护的一些国际文件，但并没有很好地遵守其精神，因为波兰应对民族问题的直接反应和持续目标，就是推进深植于波兰政治和行政系统之内的民族同质性。^③当前，波兰的少数族群教育制度和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差不多，和法国的“共和模式”类似，具有一定的同化色彩。例如在那些“少数族群学校”，每周也只有 2-3 个小时用少数族群语言授课，其余时间仍然是用波兰语授课。^④如果承认西里西亚人为少数族群，必然使其民族同质性大

① Marek Barwiński, “The Ethnic Structure of Poland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Geographical Polonica*, 2015, Vol.88, Issue 1, pp.41-63.

② 根据波兰 2011 年的人口统计，波兰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不到波兰总人口的 1.5%。但是，如果将西里西亚人算成少数族群，波兰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比例将上升为 3.6% 左右。而且实际上认同西里西亚人的人口还要远远超过官方统计的西里西亚人的人口。“Raport z wyników. Narodowy Spis Ludności i Mieszkań 2011”,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http://www.stat.gov.pl/gus/5840_13164_PLK_HTML.htm

③ Tomasz Kamusella, “Poland and the Silesians: Minority Rights à la carte?”

④ Tomasz Kamusella, “Poland: The Reluctant Shift from a Closed Ethnolinguistically Homogenous National Community to a Multicultural Open Society”, In Elena Marushiakova editd, *Dynam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pp.1-25.

大降低。而且，由于西里西亚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波兰政府认为这可能会对其国家建设构成某种威胁，因而波兰政府在是否承认“西里西亚人”为“少数族群”或“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抱有高度的警惕。^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波兰法院和政府对于“西里西亚民族联盟”申请注册时的警惕心理了。西里西亚人一旦获得了“少数民族”的地位，对于波兰的民族国家建设是不利的。它与其他存在母国的少数民族不同的是，那些少数民族基本都是由于国家地理位置变动而成为波兰的少数民族的，他们人数稀少，并且与固定的领土结合并不紧密，因而不大可能出现某个少数民族带着领土一起脱离波兰的可能性。而西里西亚人则是一个在固定地域生活的世居性群体，而且它还在过去成立过单独的国家 and 实现过高度的自治。这种民族类似于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通常被认为存在着潜在分离的可能性。由此，波兰政府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没有“少数族群”或“少数民族”的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各国是否可以自由采取措施确定哪些群体属于“少数族群”或“少数民族”？目前，欧洲地区和国际层面都没有关于“少数族群”、“少数民族”的统一定义或标准，其结果是，虽然波兰制定的少数民族、少数族群标准很高，但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在内的欧洲国际机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也不能说好说歹。虽然欧盟在 1993 年出台的“哥本哈根入盟标准”中，将少数民族保护作为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但事实证明，欧盟对“少数民族保护”这项标准并没有硬性要求。在少数民族保护标准方面，包括欧盟在内的欧洲地区性组织，基本上采取了欧洲委员会的标准和立场，即赋予每个国家自由认定需要保护哪些少数民族、少数族群、地区语言或少数语言的权利。《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框架公约》也明确赋予了各缔约国识别和确认哪些群体属于“少数民族”的权利。而欧洲人权法院在处理 *Gorzelik and Others v. Poland* 案时也认为，由于国际上不存在“少数族群”、“少数民族”的界定，缔约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去界定哪些群体属于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这可以说是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标准方面的一个巨大缺陷，而波兰的

^① Paweł Popieliński, “Etniczność i narodowość rdzennych mieszkańców Górnego Śląska po 1989 roku”, *Poznańskie Studia Sławistyczne*, NR 8/2015.

“西里西亚人”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个缺陷的“受害者”。

那么，当某个少数民族在“客观上”具备了少数民族的特征，作为主权国家，有没有权力不承认这种“客观事实”呢？

早在 1935 年，国际联盟的常设国际法院在“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学校”案例^①中就表示，少数民族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就是说，国家没有权力去决定在它的境内是否存在某个少数民族，而是应由“历史事实”来决定。国际联盟常设国际法院的这个原则被联合国所继承，体现在 1989 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1992 年通过的“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等文件之中。欧安组织少数民族事务高级委员也表达过类似观点。^②另外，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The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的意见，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某个少数民族，并不需要依赖于国家的认定。^③

而且，即使国家不承认一个满足了少数民族的标准群体，也不能免除其保护这个少数民族的责任和义务。^④而且，根据欧安会议 1990 年“哥本哈根文件”提出的“少数民族自我认同理念”，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归属于哪个族群，它是一个个人选择，而不需要外界的指定。^⑤1994 年，人权观察组织也在报告中强调，少数民族身份是由个人决定的，不是由国家决定的。^⑥

那么，如果国家并不能判断一个少数民族的存在是否属于“历史事实”，或者说无法判断某个少数民族是否真实存在，那该怎么办呢？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学者史蒂文·惠特利（Steven Wheatley）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可以从“少数民族自我认同理念”出发，看有多少人实际上认

① “Minority Schools in Albania”, Advisory Opinion, PCIJ (Apr. 6, 1935), in *Manley O. Hudson* edited, *World Court Reports: A Collection of the Judgment Orders and Opinions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1932-1935*, pp.484-512.

② “High Commissioner on National Minor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Pamphlet 9”,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e_Minorities9en.pdf

③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23: Article 27(Rights of minorities)”, 1994, para 5.2.

④ Francesco Capotorti, *Study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United Nations Pubns, 1991, p.96.

⑤ *Ibid*, p.97.

⑥ “Report of Human Rights Watch, Helsinki Denying Ethnic Identity: The Macedonians of Greece”, April 1994,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GREECE945.PDF>

同自己归属这个族群。^①但最少需要多少人，国际上并没有统一标准，凯博多蒂的定义中也未涉及到这个标准。这仍然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瑞典政府曾经设定过 100 人的下限，而波兰的个别少数民族也不过只有几十个人而已。不过，1953 年联合国防止歧视与少数民族保护小组委员会指出，作为“少数民族”，必须具有保持其传统特征的“足够人口”。^②《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框架公约》第 10(2)、11(3)、14(2)规定要有“相当数量”的人口 (substantial numbers)，使他们能够保护其群体身份和特点而不被主体民族所淹没。而根据 2011 年的人口统计，波兰的西里西亚人口为 81.7 万以上，而且在历经多个世纪不同国家的统治，它仍然能保持自身的传统和族群认同，从这点上看，笔者认为它完全达到了作为少数民族群的“足够人口”。

总体看来，在少数民族和族群保护方面，欧洲层面的国际制度仍然属于一种弱势制度。理论上，缔约国也应该本着由“历史事实”决定的原则来确定某个少数民族或族群是否存在，但缔约国可能偏向主体族群的利益、国家安全或主观印象，对“历史事实”做出其他解释，这就可能弱化由“历史事实”决定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身份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对此，欧洲国际组织也无法采取有力措施。

今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双方可能都做出一定的妥协，通过接触和协商解决该问题。对于双方来说，较为现实的选项是，努力使“西里西亚语”获得和“卡舒比语”类似的地位，但这点仍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西里西亚语发展的程度，即它是否在各方面具备了一种单独语言的要素，或说是否具备了作为一种地区或少数语言的标准。二是波兰政府，尤其是波兰主体民众能否接受。而更远的方向和选项，则是确定西里西亚人为波兰的一个“少数民族”的问题。尽管国际社会、波兰国内社会已表示，西里西亚人基本上可以算是少数民族，但要获得波兰政府的承认，仍将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这不仅将涉及到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分

① Steven Wheatley, “Democracy, Minoriti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Studies*, Vol.26, No.4, December 2006.

② “UN Doc.E/CN.4/703(1953), para.200”, cited in Javaid Rehma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 Practical Approach*, England:Pearson Education Ltd, 2003, p.300.

配问题，还涉及到一些高级政治问题，例如国家认同、地区自治等^①。总之，正如波兰学者帕威尔·波别林斯基（Paweł Popieliński）所指出，随着波兰社会政治条件的改善，波兰社会、波兰领导人对西里西亚问题认识的加深，承认西里西亚语为“地区语言”以及承认西里西亚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②

当然，不论是西里西亚人，还是波兰社会、波兰政府，都会将西里西亚人的诉求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防范分离主义及独立倾向。有人认为，“西里西亚”族群意识和“波兰特性”具有一定的内在冲突。^③尽管言之过激，但从近年西里西亚人争取族群地位的发展态势来看，如果不采取谨慎的态度，则很可能跑偏方向，站到“波兰特性”的对立面。例如近年已经出现了一些西里西亚人发起的主张分离主义的极端政党或政治势力，也出现了一些将族群问题扩展为西里西亚地区问题，试图实现联省高度自治的倾向，这反而不利于西里西亚人族群地位问题的解决。

【Abstract】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Silesians in Poland revived and the ethnic cultural activities increased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Up to now, Silesians match well the conditions of an “Ethnic Minority” subjectively and objectively, and their status of an “Ethnic Minority” has been acknowledged generally by Polish society. However, the Polish government didn’t officially recognize Silesians’ status of an “Ethnic Minority”. As something changed recently, it is necessary for Polish government to change its attitude towards the status of Silesians, and for Silesians to lower their goals, so they can negotiate a better solution for the status of Silesians.

【Key Words】 Poland Silesia, Poland national minority, Poland ethnic

① 根据波兰 2011 年 4 月 12 日出台的“议会选举法”第 133、134 条，波兰的“少数民族”有权豁免 5% 的议会当选门槛，而“少数民族”无此特权。参见 Parliamentary Election Law, “the Act of April 2001 on Elections to the Sejm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and to the Senate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id/4543>

② Paweł Popieliński, “Etniczność i narodowość rdzennych mieszkańców Górnego Śląska po 1989 roku”, *Poznańskie Studia Slawistyczne*, NR 8/2015.

③ Mirosława Siuciak, “Czy w najbliższym czasie powstanie język śląski?”

minority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этническ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Польской Силезии начало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и этн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остепенно набирала обороты.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убъективной и объективной оценки, жители Силезии в основно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критериям «группы меньшинств», и их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как «меньшинства» в основном признана польским обществом. Однако в силу разных причин Польша официально не признала статус меньшинства силезцев. По мере развития ситуации поль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изменить свою позицию, а силезц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снизить свои требования, 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путём консультац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оронами решить вопрос о статусе «меньшинства» силезцев.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ольская Силезия, Поль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меньшинство, Польское этническое меньшинство

(责任编辑 阎德学)

日本的中东欧政策及对中国 “16+1合作”的影响分析

刘作奎*

【内容提要】日本对中东欧国家的政策，中国学界尚缺乏研究。本文分别从全球层面、欧洲层面、次区域合作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四个维度，分析日本推动同中东欧国家关系的主要目的和框架安排，总结日本目前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合作的主要措施：机制化建设、资金和技术支持与援助、推进经贸关系发展以及文化合作。同时，本文对日本针对中国“16+1合作”而采取的四大基本政策——价值观外交、安全领域合作、高技术领域合作、推进民主化和转型工作也一一进行分析。在比较分析中日双方对中东欧政策的基础上，针对中日两国对中东欧国家的不同政策特点与优劣，提出一系列推进“16+1合作”的政策建议：加快投资协定谈判，做好自贸协定谈判调研；开展第三方合作、取长补短；对接中东欧和欧盟关注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官方金融机构和私营或中小机构融资相互结合等。

【关键词】“16+1合作” 日欧关系 中东欧国家 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D831.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2-0180(22)

自2012年4月“16+1合作”框架确立以来，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至今，“16+1合作”已进行了七年，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进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一直存在。中东欧既是地缘

* 刘作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东欧研究室主任、16+1 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秘书长。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淑娥提供的日文技术支持。

政治敏感区域，又是市场高度开放且高度融入欧盟的区域，自古以来各种利益相关者交错存在。从现有状况看，中东欧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制度性或结构性行为体，欧盟、北约等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二是重要的国家行为体，比如美国、俄罗斯、欧盟成员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日本、韩国等；三是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体，比如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特殊的地区合作组织（比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维谢格拉德集团等）。

关于中东欧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国际和国内的研究较多，国内关于欧盟、德国、美国甚至是俄罗斯等的研究有一定的积累^①，但对于日本的关注则不多^②。就利益相关者对中国和中东欧合作产生影响的研究目前更为缺乏。^③笔者拟在此文中分析日本作为利益相关者对“16+1合作”的影响并做出评估。

日本对中东欧地区的战略或政策，学界一直缺乏关注，相关成果不多，只是聚焦对中东欧地区的一般性介绍。^④但日本无疑在中东欧地区是有重要

① 代表性成果有Valentina Glajar, *The German legac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2004; Claus Hofhansel, *Multilateralism, German foreign policy, and Central Europe*, Routledge, 2005; 朱晓中：“冷战后中东欧与美国关系”，《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6期；朱晓中：“近年来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能源合作”，《欧亚经济》，2014年第5期；朱晓中：“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4期。杨焯、高歌主编：《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的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金玲：“中东欧国家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欧盟因素分析”，《欧洲研究》，2015年第2期；胡丽燕：“俄罗斯、欧盟和美国在中东欧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2期。

② Winfried Flüchter edited, *Japan and Central Europe restructurin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5; 相关作品只找到一篇，赵发顺：“冷战后日本与中东欧关系的发展演变及分析”，《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2期；与此相关的成果还有刘作奎：“中国和日本对欧盟看法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第2期。

③ 201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16+1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牵头，成功申请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项目《中东欧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影响研究》，对中东欧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做了系统的研究。该项目广泛征集中东欧国家学者，最终完成了一本英文论文集，这也是国际学界首次就此问题出版相关作品，见Huang Ping, Liu Zuokui edited, *Stakeholders in China-CEEC Cooper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6.

④ 渡辺博史「中欧経済ウオッチ 新段階を迎えたEUの対中・東欧政策」、『世界週報』81(2)、54-55、東京：時事通信社、2000-01-18。渡辺博史「中欧経済ウオッチ 21世紀初頭の中・東欧情勢の変化の方向」、『世界週報』81(37)、52-53、東京：時事通信社、2000-10-03。

利益存在的，而且对该地区介入较早。近些年来，日本政府官员开始积极访问中东欧地区，推动日本和中东欧国家合作，这其中既有扩大对中东欧投资和经贸合作、增进日欧合作的考虑，也有与中国争夺在中东欧地区影响力的潜在意图。

一、日本与中东欧地区国家合作的主要目的和框架安排

从日本发布的历年《外交蓝皮书》^①（2015、2016、2017）可以看出，日本对欧（包括对中东欧）外交总体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强化民主价值共同体纽带——日欧之间共享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双方将致力于共同推进自由和开放的世界秩序而加强合作，同中东欧民主国家合作也是推进日欧价值观共同体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是加强同欧洲包括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目前是积极推动在日欧自贸协定框架内达成更多实质性成果，并在赛博、海事、核武、地区冲突等安全领域，加强合作。

为了增强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日本也做了一系列框架性安排。总体来看，有四个主要维度：（1）面向全球层面的政策安排，充分利用北约、欧安组织、亚欧会议等合作框架增强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2）面向整个欧洲的政策安排，通过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来推动日欧经贸和安全合作。（3）次区域合作安排。日本积极推进“V4+日本”^②和“北欧-波罗的海八国+日本”（NB8+日本）以及“古阿姆国家+日本”（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日本）的合作^③。日本外交蓝皮书中没有提到

① 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7』、<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7/html/index.html>、2018年7月6日；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6』<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6/html/index.html>、2018年7月6日；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5』<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5/html/index.html>、2018年7月6日。

② V4是指维谢格拉德四国，又称中欧四国，即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V4+日本”合作框架启动于2004年。

③ 同古阿姆国家合作不涉及中东欧国家，但由于古阿姆国家是欧盟东部伙伴计划的核心国家，这些国家的和平稳定与中东欧国家利益攸关，因此，也成为日本推进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

“西巴尔干+日本”的合作框架，但近几年，日本和西巴尔干国家的高层互动频繁，西巴尔干大部分国家总理访问过日本，双方加强了多个领域的交流。2018年安倍访塞尔维亚之后，“西巴尔干+日本”合作框架也呼之欲出。^①通过这些次区域合作框架安排，日本不断巩固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4）一国一策。日本针对每个具体国家，又强调一国一策，推进双边合作。同维谢格拉德四国坚持经贸先行，推进经贸、政治和人文领域全方位合作。对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同爱沙尼亚加强赛博安全领域合作，同拉脱维亚加强物流合作，同立陶宛更强调人文相通。在巴尔干地区，日本推出与保加利亚加强在西巴尔干国家合作的构想；对于罗马尼亚，日本计划把罗马尼亚作为新的加工制造基地；在塞尔维亚，日本对投资基建和能源等行业较为感兴趣，并欲借此推进与西巴尔干国家的深度合作。

日本对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某种程度上存在与中国竞争的色彩。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外交蓝皮书（2015年）》^②，首次将中东欧16国纳入日本对欧外交中，日本版的“16+1合作”逐渐形成。日本通过一系列合作框架来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其中，经贸、安全、人文领域是合作重点。近年来，日本主要是拉动该区域国家与日本加强经贸合作，推进日本和欧盟自由贸易协议的尽快签署生效（目前已生效），在朝核、海洋安全、地区冲突问题等国际事务上加强立场协调，共同维护“民主价值观共同体”。

总而言之，日本对中东欧外交是日欧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日本塑造的新全球贸易格局，即，日欧自贸区的组成部分，也是价值观共同体外交的一部分，更是更大范围内与北约合作来打造安全共同体的一部分。

二、日本的中东欧外交基本举措

提升与中东欧国家政治和经贸关系是日本的主要目的，但同时，与中国争夺在中东欧的影响力，显然是日本的外交目标之一。

① 日本外交蓝皮书，详见 <http://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index.html>

② 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5』<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5/html/index.html>、2018年7月6日。

随着“16+1合作”的持续推进，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引发日本的关注。2013年6月16日，在中国启动“16+1合作”一年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访问中东欧，在波兰首都华沙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四国总理举行首届峰会，达成一系列框架安排。^①2018年1月12日至17日，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五周年，取得一系列成果之际，安倍再次造访中东欧6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实现对中东欧各区域（波罗的海、东南欧、中欧）全覆盖。^②同时，2018年10月18日，在亚欧会议间隙，日本首相安倍与维谢格拉德四国总理举行了第二次峰会，各方表示加强在科技、旅游等领域合作，并推动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投资。^③目前，针对日本和中东欧国家合作，日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1. 机制化建设

把日本和中欧国家对话机制从外交部长级升级为总理级，与V4通过“V4+日本首脑峰会”和外交部长会议，以及政治高层对话（副部长级）等一系列合作机制来保持高层对话；建立V4轮值主席和日本驻所在国大使以及V4驻日大使和日本相关部门的周期对话机制；^④建立“V4+日本政策计划”对话来增进双方对国际问题的共识；加强与V4在推动欧洲东部伙伴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在针对欧洲东部伙伴的政府发展援助方面与V4形成配合。日本专门在日本驻四国使馆设一名联络官，而维谢格拉德四国为此也做好与日本的协调工作，共同推进针对东部伙伴的政府发展援助。^⑤日本还确立与波罗的海三国的正式对话机制，对话集中在

① 日本外務省「安倍総理大臣の欧州訪問及びG8 ロック・アーン・サミット出席」、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4_000089.html、2018年7月6日。

② 日本外務省「安倍総理大臣の欧州訪問」、https://www.mofa.go.jp/mofaj/erp/we/page24_000933.html、2018年7月6日。

③ Second “Visegrad Group plus Japan” Summit Meeting, https://www.mofa.go.jp/erp/c_see/page6e_000143.html

④ 2013年日本将邀请V4轮值主席国匈牙利总理访问日本，参加在日本举行的V4+日本峰会。日本外務省『「V4+日本」首脳会談 共同声明』（2013年6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06751.pdf>、2018年7月6日。

⑤ “Visegrad Group plus Japan Joint Statement: Partnership based on common values for the 21st century”,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06466.pdf>; 日本外務省「第5回「V4+

波罗的海国家比较关注的安全、信息技术、经贸合作等问题上。^①针对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合作，日本尝试建立“日本+西巴尔干国家”对话机制，2018年1月安倍访问中东欧时，提出并设立了日本西巴尔干特别大使，以保持同西巴尔干国家的常态化联络。^②特别大使将在东京办公，并将经常到访西巴尔干国家，特别大使将关注西巴尔干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2. 资金、技术支持与援助

日本加强与V4在核能源与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与V4针对东部伙伴国家政府发展援助方面的合作，共同分享援助的技术和经验。^③此外，日本还将持续加强对西巴尔干转型和加入欧盟进程的援助。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尝试构筑国际战略力量版图，曾任外务省次官的栗山尚一在分析全球三个主要经济体的力量分配时，提出美、欧、日的“5-5-3”结构，并宣布日本要与美国和西欧共同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以此为指导，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竹下登任首相期间，积极倡导“三根支柱”外交，即“和平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扩展政府发展援助，以及促进国际文化交流”。1990年1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欧洲时，宣布向波兰和匈牙利提供总共2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并表示如果其他东欧国家在民主改革方面有所进展的话，日本愿意扩展这种援助。日本还积极参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工作，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贡献者。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主要是对中东欧转型国家进行援助。栗山尚一认为，日本广泛参与东欧改革和建设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东欧国家政治和经济改革成就不但对重建欧洲国际秩序很重要，而且这种改革有助于重构东西方关系。”^④目前，日本致力于援助欧盟东部伙

日本」外相会合 共同プレス・ステートメン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19082.pdf>、2018年7月6日。

① 此前，已经有北欧—波罗的海八国加日本（NB8+日本）等合作框架，此次日本又做了细化安排。「日エストニア首脳会談:安倍首相「日バルト協力対話」提案 ラタス首相と会談」、<https://www.2nn.jp/mnewsplus/1515773497/>、2018年7月7日。

② <http://www.balkan.eu.com/japan-appoints-special-ambassador-for-western-balkans/>；「安倍晋三首相、セルビア訪問 西バルカンとの協力推進を表明」、<http://www.sankeibiz.jp/macro/news/180116/mca1801160027007-n1.htm>、2018年7月7日。

③ “Visegrad Group plus Japan Joint Statement: Partnership based on common values for the 21st century.”

④ 转引自刘作奎：“中国和日本对欧盟看法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

伴和西巴尔干国家的转型及经济和社会发展。

3. 推进经贸关系发展

新近达成的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自贸协定），将成为日本推动与中东欧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抓手。从目前情况看，中东欧国家均表示支持。这是双方迄今达成的最大的双边贸易协定，市场规模涉及6.38亿人、21万亿美元GDP，占全球经济总量近三分之一。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生效后，超九成商品将减免关税，预计每年减免关税约10亿欧元，欧盟对日出口将增加200亿欧元，将为中东欧国家进出口带来发展机遇。日本还鼓励日欧双方中小企业加强合作，日本企业也开始将触角伸到中东欧各个国家，在电子商务、能源、基建、人文等领域加强投资合作。

4. 文化、教育等人文交流与合作

日本将2014年确立为维谢格拉德四国（V4）与日本文化交流合作年，并互派友好大使，并以此为契机，夯实未来人文合作基础。在相关国际组织中加强对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对话。向V4推行“酷日本”（Cool Japan）文化政策，增加其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加强在相关协会之间推进青年专家和学术交流的工作。在教育机构之间推行语言教育和学生交流项目，支持V4各国在日本推广语言教学，日本则通过基金资助日本教育机构在V4国家进行日本语言和文化教育。支持开发旅游项目，推行日本到V4旅游的工作假日计划（Working Holiday Scheme），以鼓励民间互动和交往。^①在其他中东欧国家，日本计划对罗马尼亚等国实行免签证制度，促进两国的旅游交往。

三、日本针对“16+1合作”的四项政策

事实上，针对日本近期在中东欧的一系列举措可以看出，日本主要用下列“四张牌”与中国争夺在中东欧的影响力。

1. 价值观外交

年第2期。

① Visegrad Group plus Japan Joint Statement: Partnership based on common values for the 21st century.日本外務省『「V4+日本」首脳会談 共同声明』（2013年6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06751.pdf>、2018年7月6日。

在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中，中东欧地区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从东南亚经由中亚到中东欧，连成一条弧线包围欧亚大陆，支持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这一政策也被广泛理解为旨在“围堵中国”。但在其第一届任期内，围堵并不顺利。安倍二次执政后，重拾价值观外交。日本强调与中东欧具有共同的普世价值和原则，诸如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等，双方均指出中东欧国家与日本的合作，是欧盟-日本战略伙伴关系不可分割的和具有实际附加值的一部分。日本强调，日本和V4等中东欧国家准备尽它们的努力，在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中，推进善治和以规则为驱动的合作。^①

以价值观外交为基础，近年来日本与V4国家在一些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有限进展。日本对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参与度有了提高。2013年5月16日，日本与V4国家在华沙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建立21世纪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关系。以普世价值观为纽带，日本支持“V4+东部伙伴关系(V4EaP)”框架。2013年2月，“日本与V4国家——携手东部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召开；2013年11月，日本派代表参加在维尔纽斯召开的东部伙伴关系峰会。另外，日本与V4集团就政府发展援助合作(ODA)达成了进一步共识。双方将在“尊重人权”与“普世的价值观下”对接合作计划。然而，近年来，日本和维谢格拉德四国在“V4+日本”框架下开展的活动不多，该框架下有三个层面的机制性对话，总理级、外长级和政治高官级(副部级)，虽然仍在维持，但时断时续，总理级和外交部长级对话多数时候被安排到重要峰会(如亚欧会议)的间隙举行，且会晤时间较短，会晤成果缺乏实质性内容。2013年，日本和V4举办了第一届总理峰会，直到2018年才举行了第二届总理峰会。日本承诺的对东部伙伴国家的民主援助并没有兑现。日本对同V4合作领域的投入非常有限，导致近几年V4在日本外交中本不重要的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从维谢格拉德四国担任V4轮值主席期间的政策安排看，同

^① Visegrad Group plus Japan Joint Statement: Partnership based on common values for the 21st century. 日本外務省『「V4+日本」首脳会談 共同声明』(2013年6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06751.pdf>、2018年7月6日。

日本的合作不多，且没有实质性计划安排。但日本和V4会把推进民主价值观念的旗子一直举下去，以增加对彼此的认同感，维持时断时续的合作。

2. 安全领域合作

日本虽不是北约成员国，但在安全领域同北约的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一直是重要抓手。与波罗的海国家进行安全对话，是推进安全合作的具体举措之一。因核武问题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也是日本推进安全共识的一个手笔。日本和V4在2013年峰会上强调，双方致力于在联合国、欧盟、北约以及其他多边组织的合作，以促进和巩固全球安全。双方强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导弹和导弹技术扩散、有组织犯罪和武器非法交易是对国际安全和世界经济的严重威胁。V4和日本重申基于国际法和航海自由与安全原则维持海洋秩序的重要性。双方强调海洋是所有民族的共同财产，应该开放、自由和安全，并强调在国际法基础上坚持这些原则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的重要性。双方表示东亚的安全与稳定是整个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不可缺少的部分。V4和日本承认东亚和欧洲安全紧密相连，双方决定加强彼此在该领域关注的理解。双方一致认为对武器出口和具有军民双重使用性质的物品和技术进行有效管控的重要性。^①日本拉拢维谢格拉德国家在南海等问题上积极围堵中国，但基本没有达到目标，V4国家中的匈牙利更积极支持中国的立场，并且在欧盟内部公开反对南海仲裁案的合法性。2018年“V4+日本”总理峰会，甚至无法就全球性问题发表共同声明。总体来说，日本对东亚和南亚地区的安全关切，并不是中东欧国家所感兴趣和愿意参与的议题，因为日本的安全关切对中东欧国家来说过于遥远，因此，中东欧国家实质上对日本提出的安全议题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018年安倍访问波罗的海三国时，安全合作是日本提出的一个重要议题。比如与爱沙尼亚总理拉塔斯的会谈，达成了加强两国在网络安全方面合作的意向。安倍访问拉脱维亚，双方就如何加强对朝鲜的制裁达成进一步共识，并承诺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日本与波罗的海四国（波兰、爱沙尼亚、

^① Visegrad Group plus Japan Joint Statement: Partnership based on common values for the 21st century.日本外務省『「V4+日本」首脳会談 共同声明』（2013年6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06751.pdf>、2018年7月6日。

拉脱维亚、立陶宛) 计划于2018年早些时候或2019年初举行首轮对话。围绕在 NATO 安全框架下的合作将是探讨的焦点, 北约目前在波罗的海区域设立多个安全框架, 日本对加入这些安全框架比较感兴趣, 比如北约在拉脱维亚里加设立北约最佳战略沟通中心 (NATO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Center of Excellence), 以及在爱沙尼亚塔林设立北约最佳联合赛博防御中心 (NATO's Cooperative Cyber Defence Center of Excellence)。日本政府表示, 虽然已有与北约建立的安全和沟通框架, 但会单独探讨与波罗的海国家安全合作的可能性。从实际情况看, 由于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诉求主要依赖美国、北约和欧盟, 对日本提出的安全合作意向并不感兴趣, 务虚大于务实。多年来, 日本同波罗的海国家安全合作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

3. 高技术领域合作

日本充分利用在核能等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 开展对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从1993年开始, 日本就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核能领域的工作人员提供安全培训计划。由日本通产省于1992年10月发起的这项计划规定: 每年培训100名主要核工业的工作人员。培训形式是举办多种不同类型的为期两周的培训班, 培训对象是东欧和发展中国家涉及核电厂安全的顾问、管理员、监督员、维修人员、检查员以及设计人员。在2013年与V4会晤中, 日本重申致力于通过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所获得的经验来共享信息, 增强世界范围内的核能安全。为了进一步发掘在能源效率方面合作的机遇, V4被邀请参加在日本举办的“全球优势能源伙伴关系”(Global Superior Energy Performance Partnership) 会议, 该会议由波兰和日本联合在2013年秋季召开。由于中欧国家普遍需要核技术, 日本试图以对中国的核能技术优势来争取更多的合作。安倍访问中东欧国家期间, 也多次尝试推销日本在高铁、能源、通讯等领域的技术, 以期与中国竞争。目前为止, 日本基本未同V4国家达成多少高技术合作协议。在高铁和核技术领域, 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双方基本处于意向性沟通层面。

4. 推进民主化和转型工作

日本以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为具体平台, 推进与V4的合作。日方强调支持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政策, 强调它有助于东欧的民主化和推进市场

经济。日本支持V4致力于与东部伙伴国家分享改革和转型经验，推进东部伙伴国家系统转型和民主化。V4和东部伙伴计划项目将是V4和日本在未来共同行动的一个合适的平台。^①日本还确立同波罗的海国家在北约框架内的合作，确立日本和西巴尔干国家合作新框架，加强对西巴尔干国家转型的援助以及大项目投资。

推动中东欧民主化和转型，其实是一个日渐式微的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中东欧国家亟须欧洲化和融入欧盟，对来自国际社会包括日本的转型支持，有着迫切的需求。但随着大部分国家在2004年及以后加入欧盟，这种转型的急迫需求基本结束。日本只好将目标定位到未加入欧盟的西巴尔干国家，以及中东欧的周边国家——欧盟的东部伙伴六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但这些国家的发展和转型需求缺口巨大，部分国家还面临严峻的安全问题，加上日本政府对欧洲政府发展援助力度的减弱，日本对这些国家的转型支持实质上“口惠而实不至”。尽管日本政府发布了多次声明，但始终没有得到积极兑现，落地的资金和项目不多。

四、中国和日本各自对中东欧国家政策的优劣势分析

从日本政策具体实施情况来看，中日双方政策各有优势。

1. 日本的优势分析

日欧自贸协定释放优势利好。日欧自贸区的达成会联动中东欧，长期释放政策利好。我与欧盟达成自贸协定的过程还较为漫长，尚未提上议事日程，这一点显然落后于日欧合作。研究表明，日欧自贸协定将使日本和欧盟的宏观经济大多受到正面影响，且日本获益更多，而中国的福利水平、GDP、贸易顺差和贸易条件等宏观变量都将受到负面冲击；中国与日本、欧盟的双边

^① Visegrad Group plus Japan Joint Statement: Partnership based on common values for the 21st century.

贸易则会出现小幅下降，且中国对日欧出口遭受的负面冲击比进口大。^①

日本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会产生一定效果。中东欧均是转型国家，其对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一向较为敏感，崇尚自由主义，对相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缺乏认同。日本极力放大价值观在双边合作中的重要性，意在重新唤醒中东欧对以往制度的不好记忆，从而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从目前在中东欧地区热炒中国的“锐实力”外交就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差异对中国和中东欧双方合作造成的干扰依然存在，而这一点在日本身上显然不存在。

日本对中东欧投资积累比中国更深厚。日本对中东欧尤其是维谢格拉德国家的汽车产业投资有着深厚的积累，深度融入了欧洲发达的汽车产业链。此外，日本在电子、化工等领域的投资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形成了较好的技术积累优势，在中东欧国家拥有较好的口碑。日本早期在中东欧打下的基础较好，与V4合作已有很长时间，熟悉中东欧情况，利于扩展在中东欧的存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之后，日本利用中东欧市场作为进入欧洲市场产品的加工基地。据统计，仅2017年，在匈牙利的151家日本公司在匈投资就达到44亿美元，比中国在中东欧16国投资的总和还多两倍（2015年中国对中东欧投资为近20亿美元左右），是来自亚洲的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投资者。^②

日本版“16+1”政策未引起欧盟方面的反弹。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些中东欧国家未入盟时，日本已经积极介入，政府发展援助政策根子扎得较深且易引起欧盟的认同，通过支持东部伙伴来支持欧盟的具体政策领域，也得到欧盟的认可。同时，日本对中东欧外交细化到更细的次区域，以次区域合作引领大区域合作，突出示范性。而中国对中东欧的“地区方式”从一开始就被欧盟所怀疑和猜忌，成为发展“16+1合作”一个不小的挑战。

① 黄凌云、王丽华、刘姝：“日本—欧盟 EPA 对中国、日本、欧盟的影响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5 年第 1 期。

② “Japan is now most significant Asian investor in Hungary”，<http://www.kormany.hu/en/ministry-of-foreign-affairs-and-trade/news/japan-is-now-most-significant-asian-investor-in-hungary>。匈方提供的日本在匈投资数据准确性有待考察，因为日本和匈牙利的统计数据仍然有很大差距，就像中国对中东欧投资一样，官方统计数据 and 实际投资情况差异比较大，中国的实际投资比官方统计数据要大得多。

2. 中国的优势分析

机制化合作的力度和深度明显强于日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每年一度的总理峰会力度较大，影响面较广，引发中东欧国家广泛而积极的参与。通过创造性设立观察员国制度，放大了这一平台的机制化影响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每年举办两次协调员会议以及每年颁布合作纲要，使得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更加务实和具体。设有基建、能源、农业、物流、教育、智库等20多个领域的具体对话与协调机制，中国的机制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如果再考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联动全区域与周边，增加了中东欧国家参与的积极性，形成了更大的顶层设计保障，更加凸显中国的机制化保障力度。^①

经贸合作总量明显高于日本。2016年日本和中东欧国家贸易进出口总计约105亿美元，比起中国来有明显的差距，2016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总额是586.5亿美元，且近年来呈增长趋势。^②七年来，中国开展的一系列经贸促进举措在“16+1合作”中取得了实效。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相对均衡，但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是全部贸易顺差，贸易顺差问题引发了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关注。

技术优势有实现反转的趋势。中国的装备和技术能力近年来发展迅速，并积极“走出去”。日本的技术优势虽在，但中国的快速追赶逐渐拉近了双方差距。比如，日本推行核技术存在一系列难题。首先是靠近中东欧的德国坚决反对利用核能，其次是日本核和安全事故影响犹在。另外，安倍推行核技术的民意支持率不高。《朝日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59%的被调查者反对把核反应堆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③此外，中国高铁技术、核技术以及装备制造技术快速发展，市场应用前景明显提升。上述种种不利因素使得日本的技术攻势大打折扣。目前，日本在中东欧主要通过汽车制造等行

① 客观地看，也许正因为这种较强的机制化合作，引发了欧盟及一些利益相关者的反弹。强机制化也是把双刃剑，利用得好，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利用得不好，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阻碍。

② 商务部欧洲司统计数据，<http://ozs.mofcom.gov.cn/article/zojmgx/date/201702/20170202520524.shtml>

③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AJ201306170051、『経済成長に原発利用、「反対」59%朝日新聞世論調査』、<http://www.asahi.com/senkyo/senkyo2013/news/TKY201306090137.html>、2013年7月7日。

业发挥优势。20、30年前，日本可能有些优势，如今中国的技术和装备已经引起国际市场广泛关注。在技术争夺中，中国赶超的趋势较为明显，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等一系列项目落地，表明了中国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力度。目前，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基建、能源、交通等领域的投入，整体优势日益突出。

表1 日本对中东欧16国的经贸统计（2016年）

	出口 (万美元)	占日本总出口 的比重	进口 (万美元)	占日本总进口 的比重
阿尔巴尼亚	538	0.000834%	818	0.00135%
波黑	406	0.00063%	679	0.00112%
保加利亚	8392	0.013%	10551	0.0174%
捷克	123556	0.192%	76610	0.126%
爱沙尼亚	11868	0.0184%	9528	0.0157%
匈牙利	145992	0.226%	123120	0.203%
拉脱维亚	5085	0.00788%	8546	0.0141%
立陶宛	5461	0.00847%	53614	0.0883%
马其顿	1011	0.00157%	667	0.0011%
黑山	490	0.000759%	277	0.000456%
波兰	169423	0.263%	114841	0.189%
罗马尼亚	38727	0.06%	47762	0.0787%
塞尔维亚	1596	0.00247%	25572	0.0421%
斯洛伐克	25521	0.0396%	22604	0.0372%
斯洛文尼亚	12019	0.0186%	14231	0.0234%
总计	550085	0.00853213%	509420	0.00838926%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数据，<http://www.customs.go.jp/toukei/info/tsdl.htm> 2018年7月7日。

3. 双方优势未明确领域

价值观外交与中东欧国家的实际发展需求。在中东欧国家转型初期，价值观或者民主转型是最重要的。转型基本完成后，这些国家的发展需求浮出水面。就中国来说，尽管日本在中东欧有一定的存在，但是在广大的中东欧地区，中国仍有密切合作的伙伴，而中东欧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感兴趣。尽管中国和中东欧国家V4未在东部伙伴关系上形成有效配合，但中国与部分东部伙伴国如白俄罗

斯、乌克兰、阿塞拜疆等国有着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为中国和该区域进一步开展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自贸协定对中东欧国家影响如何仍有待观察。自贸协定为中东欧国家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创造了便利，但中东欧地区是否有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入日本市场仍有待观察。中国提出多项改革举措后，比如扩大市场准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进口等，尤其是201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对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的外部投资者释放了多重利好，可能会部分对冲日本自贸区战略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

高政治领域合作存在问题。安全领域的合作是日本针对中国具有的独特优势，但有时也未必能够形成必然的优势。高政治领域合作也许是个亮点，但难以兑现，日本无法出兵海外，也无法帮助解决中东欧国家的安全关切，只能是道义上支持。在政治关系上，日本还要处理好同塞尔维亚等国的关系，因为在科索沃问题上日本与塞有分歧。日本是较早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的国家之一，难免与塞有互信问题。因此，虽然与塞尔维亚等国有合作，但难以达到一定的高度。

中日在中东欧的投资竞争力仍有待观察。事实上，中日在中东欧投资，在账面数据上难以做出比较，因统计口径差距较大，难以横向对比。比如据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2016年日本投资大致为1396亿日元（约合12.70亿美元）^①。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2016年中国对中东欧的投资是16.67亿美元^②，实际上还高于日本。

中国作为后发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16+1合作”框架加强与中东欧合作，尤其是投资合作。考虑到中国的投资统计以企业自愿申报为基本依据，官方金融机构资助的投资和民间未注册的投资也占据相当的比重。近年来，中国投资中东欧成就突出。日本在中东欧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中欧国家，而中国在西巴尔干国家的投资增长迅猛，已将日本甩在后

① “Outward/Inward Direct Investment, breakdown by Region and Industry(Historical data)”, Ministry of Finance, Japan, https://www.mof.go.jp/english/international_policy/reference/balance_of_payments/ebpfdi_i.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

面。中国的投资也愈发体现出技术竞争优势，比如在基建、能源等领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优势。^①

五、中东欧国家的反馈与评价

从现有研究文献看，研究中国在中东欧地区影响以及日本在中东欧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多，这里不再赘述，下文拟集中分析有关中日在中东欧地区存在及影响的有关研究成果。

中东欧国家对中日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反馈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罗马尼亚学者伊瑞娜·安格莱斯库（Irina Angelescu）和捷克学者瓦克莱夫·科佩茨基（Václav Kopecký）撰写的文章。他们对中日在中东欧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做了比较，部分观点较为中肯，但大部分结论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且缺乏中立和客观性。

首先，两位作者强调了中国的投资承诺不如日本的投资承诺有效，认为中国媒体尽管多有报道“16+1合作”的成就，但对中东欧国家投资承诺落地的时间较慢，进展缓慢。而且两位作者有意列举两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罗马尼亚和捷克来作为例证。根据《金融时报》的估计，捷克和罗马尼亚是2012-2016年中国基建投资的两个重要国家，仅次于波黑、塞尔维亚，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承诺的55亿美元对这两个国家基建投资落地。相反，日本在这些国家的经济领域却做出了一些具体的落地项目。

其次，两位作者的分析表明，现有的中日在中东欧投资，主要集中在具有一定互补性的部门，中日两个投资者在中东欧地区没有直接竞争关系，日本经常投资于绿地和褐地项目，这符合日本高科技公司推进价值链延伸的做法，中国则关注于并购和基础设施项目。

最后，中东欧国家欢迎中国和日本的投资，但目前中东欧地区面临诸多

^① 也必须看到，中国对中东欧的投资获得官方或官办金融机构的支持过多，尤其是大型贷款项目过多，基建又很难走市场化道路，投资数额大，回报率低，同时还引发了债务风险的担忧。这一点日本反而解决得相对较好，投资高度市场化，投资效率和回报率也较高，当然，这也跟日本在欧洲投资几十年的积累和政府发展援助有关，对此，中国还应保持一定的耐心。

地缘政治风险让中日的企业有些犹豫。在初期阶段，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让美国、欧盟和日本重新考虑它们参与中东欧地区的机会，这三个合作伙伴带有相似的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将增加它们的影响力并统一面对非自由政治行为体（暗指中国）的压力。^①

最有争议的是，该文章引用最多的是中日在罗马尼亚和捷克的投资合作比较。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在这两个国家投资明显不如在西巴尔干国家。比如在分析在罗马尼亚的投资时，文章引用罗马尼亚一位高层外交官表述，有很多日本投资成功的例子，但很难找到中国有什么像样的投资。近些年来，罗马尼亚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中国整体上处于买方地位，可以向罗马尼亚投资数以十亿计的欧元，一家罗马尼亚电视台在2017年11月的报道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另有罗马尼亚媒体报道说，有超过20家巨型中国公司访问罗马尼亚，来发掘未来的商业机会，代表团尤其对能源项目感兴趣，但已经过去五年了，中国投资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Cernavodă）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的进展十分缓慢，另外还有几个计划中投资的风能发电和烟草合作项目。相比较而言，日本在罗马尼亚的存在没有获得多少媒体的关注，但成果却是多样的。早在2000年前后，日本公司便开始在罗马尼亚运营，到去年，它是罗马尼亚最大的亚洲投资者。超过150家日本公司在当地市场创造了约4万个工作岗位。日本投资主要集中在机动车产业，但对其他部门也日益感兴趣，包括IT产业。除了商业投资，日本的政府发展援助贷款帮助修建或者现代化了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康斯坦察港船运码头、天然气和热力能源产品以及公路和铁路。在2007年罗马尼亚成为欧盟成员国后，罗马尼亚不再享受日本政府发展援助。实事求是地讲，这一报道将缺乏落地项目的责任单方面推给中国，实际上，中国也在积极推进在罗马尼亚的核电等项目，然而由于罗政局变动频繁，很多大项目深受影响，难以按时推进。

关于捷克，文章指出，早在2012-2013年，中国成为捷克总统泽曼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标。捷克政府的目的之一是吸引中国的

^① Irina Angelescu and Václav Kopecký, “East Asia Comes to Europe: A tale of two suitors: Chinese and Japanese investment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Diplomat*,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6/east-asia-comes-to-europe/>

投资以及增加捷克对东亚市场的出口。2016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布拉格并签署了到2020年价值73.9亿欧元的合作项目。现实中，到2017年，中国投资到捷克的总数量只有230亿捷克库纳（约合9亿欧元或11亿美元）。中国华信负责大量在捷克的投资项目，所有这些投资主要是并购。在中国华信出现问题后，中国国企中信集团接管了相关业务。除此之外，中国四川长虹和西安陕鼓动力在捷克有投资。相比中国，日本在捷克的投资有着大量的存在，但并未引起更多关注。最近几年，只是在日本朝日啤酒并购捷克最大也是最受欢迎的啤酒品牌皮尔森之后，媒体才做了有限的报道。总体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已经在捷克市场活跃起来，大约有250家日本公司在捷克经营，主要集中在汽车产业及其供应链。有相当多比例的公司参与绿地或褐地投资，提供了5万个工作岗位。根据捷克投资促进署的统计，日本已经是捷克的第二大投资者，日本累计的投资数量截至2016年达到36亿欧元。丰田汽车公司和标致雪铁龙在捷克的联合投资，是迄今日本在捷克最大的投资项目。

在最后结论中，两位作者缺乏学术的公正性，建议美欧日三方联手加强在中东欧的合作，抵制或防范中国的投资。尽管他们认为，美欧日三方在中东欧投资的钱包没有“一带一路”那么鼓，但三方可以以提高合作标准为着眼点（暗指中国无法达到欧盟合作标准）并且打出“日本制造”的良好品牌，以贬低认为仍是低质量的“中国制造”。两位作者还积极建议欧洲国家加强针对中国的投资安全审查，并提出在人权和基本价值观上三方加强合作。^①

相比较而言，匈牙利学者阿格尼斯·斯泽诺马尔（Ágnes Szunomár）和波兰学者石艾妮（Agnieszka McCaleb）在评价中国投资时相对比较客观，他们研究认为，相比日本和韩国，2012年之前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只是一个无足轻重者，但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中东欧地区最重要的投资者之一，进展非常明显。文章也强调，中国通过积极投资，满足了不少中东欧国家用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②如果全面、客观的考察中国和

① Irina Angelescu and Václav Kopecký, “East Asia Comes to Europe: A tale of two suitors: Chinese and Japanese investment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② Ágnes Szunomár and Agnieszka McCaleb, “Comparing Chinese,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FDI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ttps://editorialexpress.com/cgi-bin/conference/>

日本在中东欧地区的合作现状，可以有如下的结论：

首先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和投资合作进展较快，尤其是“16+1合作”七年来，投资增长迅速，影响力有所提升。日本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积累深厚，有先发优势以及良好的投资经验，在当地反响不错，包括绿地投资较多，产业链投资良性发展，投资方式灵活丰富，很好融合当地需求等。这是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

其次是西方舆论对中国投资和影响力持有负面看法，这是国际舆论长期对中国不客观、带有意识形态思维报道的具体反应之一。对此，应客观看待中东欧学界或舆论界负面认识的狭隘性和主观性，保持合作定力，以务实合作推动“16+1合作”不断前行，逐渐赢得中东欧国家的认可。

再次是对中国在较短时间内确立了在中东欧市场的一些投资优势，比如在基建、能源领域，以及在具体区域如西巴尔干的投资优势，这种势头应得以维持，以点带面，推动16+1全面合作得到发展。同时也要对中东欧这一特殊市场要有明确的定位和认识，推动企业提升对中东欧市场的了解，避免走更多的弯路。

六、启发与建议

日本对中东欧国家的政策经验和做法，无疑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启发，中国应充分分析日本在中东欧地区的长处和短板，积极为我所用。有鉴于此，笔者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加快投资协定谈判，做好自贸协定谈判调研。目前，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应该得到积极推进，积极扩大双向投资，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适度启动自贸协定谈判，争取中欧自贸关系早日开花结果。立足于做好同欧洲部分国家双边自贸协定的缔结，如与冰岛、瑞士达成的自贸协定以及与挪威推进的自贸协定谈判，有条件情况下逐步深化同其他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中欧自贸区谈判应秉承先易后难和渐进原则，先集中力量着力解决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问题。深入了解欧盟-加拿大、欧盟-日本自贸协定达成情况及内容，

[download.cgi?db_name=WCCE2015&paper_id=205](#)

为将来中欧自贸协定谈判做好前期可行性研究。

其次，开展第三方合作、取长补短。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及在该地区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因此，应推进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三方合作。鼓励欧盟及其成员国（包括德国、法国）等以第三方形式加入到“16+1合作”当中。积极推广中国企业并购阿尔巴尼亚修女国际机场（德国管理层负责中国企业并购后机场管理）的三方经营示范作用。做好我企业在欧盟的投资项目（例如，中国企业投标成功的、欧盟资助的克罗地亚佩列沙茨跨海大桥项目，该项目预估造价超过4亿多欧元，是克罗地亚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战略性基建项目，欧盟基金将承担85%的项目建设支出^①）的引领作用。即使是中日之间，通过在中东欧地区加强合作，也是扩展各自第三方合作的良好机遇，通过分享各自的投资成就和经验，来扩大对中东欧的投资，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再次，对接中东欧和欧盟关注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学习日本经验，如何促进在欧盟层面的互利共赢。事实上，日本最初的策略与中国一样，即把中东欧地区作为加强制造基地，作为进入欧盟市场的跳板，成功实现了互利多赢。中欧之间的合作还应该寻找突破口，加强规则对接，以案例和项目为导向。比如，中欧之间应在就各自的计划加强沟通了解的同时，鼓励双方在互联互通平台上对连接“泛欧交通网络”和“一带一路”走廊进行联合研究，拿出可行性方案，以基础设施对接为突破口，共同研究、共同设计、共同开发。中国、欧盟和中东欧国家可共同积极推进欧洲东部伙伴计划、西巴尔干柏林进程等项目的实施工作。

最后，官方金融机构和私营或中小机构融资相互结合。日本大企业融入欧洲产业链，离不开国家支持，但一旦融入之后，国家的力量要适时退出，更加依靠市场的力量。这一点上日本有先发优势。过去七年的“16+1合作”，中国政府引导是主要的，出台的很多政策工具具有政府引导色彩，比如制度建设（主要是部委牵头）、金融工具（多是国有金融机构融资）、投资项目（多数是国企投资）、地方合作（主要是地方政府牵头），以及政策规划与

^① “中国企业签约建设克罗地亚跨海大桥建设项目”，http://www.xinhuanet.com/2018-04/24/c_1122730001.htm

纲要（多是政府间合作推动）。未来五年，在计划与市场、国家与民间之间需要做好平衡，更多让市场、让民间发挥基础性作用。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的民企和中小企业参与到中东欧国家项目中，让更多的民间外交和人文活动发挥基础性作用，让更多的市场化资本工具发挥融资的作用。一者可减轻政府的负担并分散决策风险，二者可缓解利益相关者的猜忌和质疑，三者可更好理顺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日本的经验就是企业先行，企业在中东欧扎根，很好履行了社会责任和推动当地人的就业。

【Abstract】 Japan's policies towards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EE) countries have not yet been studied by Chinese scholars. This paper analyses Japan's main objectives and framework arrangements in promoting its relations with the CEE countries according to four dimensions, namely, from global, European, sub-regional and bilateral levels. And it summarizes main measures which Japan has taken to cooperate with the CEE countrie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financial, technical support and assistance, advancing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in addition to cultural cooperation.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analyses the four basic policies adopted by Japan in response to China's "16+1" cooperation, that is, value diplomacy, security cooperation, high-tech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democrat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in view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oth countries' policies,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China's "16+1" cooperation including speeding up the negotiation of investment agreements; making researches in the negotiat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establishing third-party cooperation, drawing on strengths and complementing weaknesses; coordinating in the areas which both the CEE and the EU concern in order to realize mutual benefits; and combining official, private 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financing.

【Key Words】 16+1 Cooperation, Japan-Europe Relationship, CEE Countries, Policy Researches

【Аннотация】 Политика Япон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ока не заслужила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основные цели и рамк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Япони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на четырёх уровнях — глобальном, европейском, уровне суб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уровне — а также обобщаются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Японии п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финансовая и техническ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и содействие, с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тию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культур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четыре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Япон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16 + 1» — ценност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высо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содействие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На основ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политики Китая и Япон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исходя из различны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политики, а такж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 и недостатков Китая и Японии в 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ряд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комендаций по содействию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16 + 1»: ускорени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м соглашениям, улучшение работы по переговорам о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третьими сторонам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читывания сильных сторон друг друга, стыковка областей, вызывающих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ь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м Союзе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взаимной выгоды,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официальных финансов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частных или малых и средни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16+1»,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ЕС и Японией,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литики

(责任编辑 阎德学)